

编者按

在河南作家中,许建平可谓是唯一根系郑州城的小说家,父母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科技知识分子,支援大西北去了,他跟着祖父母在老城区(管城区)平民院里长大,作家李佩甫曾说许建平作为一个作家,有着一流的童年;后来他在此读书、生活、工作,是这个城市自1960年代初以来的见证者。

许建平自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中篇《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写一代人在一个街区的成长和分崩离析的历史,以及个人与时代生活互为的关系。199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小说描述这个城市的变迁,尤其是这个城市成为“商城”之后,人情、人性的变化。正如小说家红都所言,“建平的小说表达着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郑州”。

许建平之于郑州,犹如陆文夫之于苏州,王安忆、金宇澄之于上海,他们是书写这个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代表性作家,也是这个城市的时光雕刻师。我刊特约从郑州走出的作家、评论家艾云的深度长评,以飨读者。

小说家许建平的民间叙事

艾 云

(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 广州 510635)

摘 要:郑州本土小说家许建平,在小说里为郑州老城区设定了一个地理标识——槐树街,同时也建构了一个文化坐标。他以素朴笃诚的平民视角和浓郁的底层情怀,同时又秉持知识分子的文化观照,为这里古老里巷和新兴街衢人的命运写传,实际上也是在为郑州的今昔立传。他写人物命运总是向人的秉性、气质、个性深处延伸,他的小说具有无边现实主义的延伸感。

关键词:许建平;郑州;《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民间叙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01-11

郑州本土小说家许建平是个民间叙事的高手。他用素朴笃诚的平民视角和浓郁的底层情怀,同时又秉持知识分子的文化观照,为那些不入史册的平凡百姓立传。他笔下的人物,如老屋上的藤蔓总是企图挣扎着伸展着,却又在执拗和碰壁中遭遇湿苔的侵扰。这些边缘地带的人,绝少受到待见和恩宠,他们恍惚度日却又浪漫幻想,有时像黑夜一样黯淡无华,有时像风暴一样狂怒哀伤。他从对于生命的思考写起。

当他写出中篇小说《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以后,已经有了叙事自觉,以槐树街为根据地,将笔触伸向那些卑微而有意味的生命。他也由此确定了民

间叙事的基本立场。他在为郑州老城区设定一个地理标识——槐树街,同时也为此建立一个文化坐标。在这条狭仄的街巷,老槐树是它最醒目的景物,它峨冠蓬勃,虬枝伸展,覆盖廓大。春天时,木白色的槐花一朵朵、一串串绽放,它沁人心脾的清香将满街满巷都弥漫在梦的记忆里。槐花,是审美,也是穷人的吃食。夜色到来时,树荫处隐约可见低门矮户窗口的昏黄灯光……一个写小说的人,若是没有创造出那具有鲜明生存环境和文化坐标的典型环境,若没有塑造出那具有可解读性、带给人无限延伸性思考的典型人物,那么,这样的小说将是令人遗憾的。

许建平生性淡泊,他对写作似乎不抱过于宏伟

收稿日期:2023-09-10

作者简介:艾云(1957—),女,河南开封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多年来从事思想随笔、文学评论及散文创作,曾连续在《花城》《钟山》《作品》开设专栏等。

的志向与目标。他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学养修为、精湛的叙事能力,这一切,让他在众多小说家中具有清晰的辨识度,有着独异的风格与气质。他的人物薄如草芥和飘叶,他们执拗或挫败;却总有自己的说项和原则,也有自己的思想资源。这思想资源是民间社会中平头百姓遵循的德性与立场。

许建平总是用复杂的目光打量这座城市中的芸芸众生、民间百态,这如同他身上的矛盾气质:从小厮混在底层,对那里的生活不隔膜,这是他写作的题材材料;他不大像个文人知识分子,虽然他是。他写作,却不进入隐秘越界的美学生活,他不在美学生活与伦理学生活之间冲突挣扎,因为他本人秉德尊义,信奉的是伦理学原则。他秉持传统文化中的正气狷介、古道热肠,长尊有序、男女有别、扶弱恤贫;但他同时是个眼光敏锐、善于观察和思索、富于现代精神的小说家。他的反思,力透纸背,他的小说具有无边现实主义的可解读性和延伸感。对许建平的小说,我们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许建平小说里的郑州老城区地理标识——“槐树街”

我对许建平小说里描述和命名的那个叫槐树街的地方并不陌生。沿着他所给予的提示,那应该是在郑州市区东南方向。

我在郑州待了14年。4年大学,10年在位于郑州市经七路的河南省文联工作。许多的日子,闲歇时,我穿过金水大道、花园路口、紫荆山公园,再一路向南——我总喜欢到那段土城墙边蹀躞。

那墙体是赭褐色的,带着久远岁月积叠的沧桑。拨开榛丛,走到上边略为平展一些的地方,但见上边长满蒿草、剑麻和蒲葵。若是春夏之季,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花迎风摇曳。

向下看,是偃着城墙搭起的一片片临时棚户。低矮而陈旧的房子,有的用毛坯垒着四壁,有的是用整齐的砖块砌成。这是多少前来郑州闯荡的人们临时搭起的住处,时间长了,便成了平民的聚居地。走出棚户区,走到内街,便是鳞次栉比的房舍,车水马龙的人流。还有些僻静的街道,也是烟熏火燎的市井风情。这是管城区一带。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许建平所摹状的槐树街就是某一条街衢。

郑州东南一带,从德化街、管城街到东大街,曾是郑州的老城,保留着底层平民社会的原初风貌。这里是郑州最典型的、充满民间气息和底层社会图景的地方。这里的某个街巷,正是许建平笔下槐树街的原生地,他精心描绘过槐树街的外景:

槐树街原本是一条逼仄破旧的小街,

因成活于明朝末期的三颗老槐树而得名,依傍着几截商周时期遗留下来的黄土城墙拧麻花似的曲折延伸。破旧是真够破旧的了,但却不是那种古色古香的破旧,灰色平房、红砖炮楼和油毛毡窝棚,结伴出示给天空的永远都是一种棚户区景观。

这一段描写,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商周那一段古城墙。

郑州,史谓“天地之中”,古称商都,5千年前,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就在这里出生和建都。现在,郑州商城遗址更为世人瞩目。这正是槐树街毗邻的那段旧城墙,我当年在土墙上边溜达时,却不曾想这脚下踩着的是有3500年历史的西周遗存。

许建平笔下的郑州,便是嗅着历史遗风的城市。这里的三教九流都有历史沿革和血脉因袭,潜在的文化在一代代人身上淌流着。而许建平笔下槐树街上的人们,他们身上有植根于历史深层土壤的传统美德,也有不谙世事、冥顽的劣根性。这些游荡在体制外的人们,犹如古城墙上那长在砖缝和土屑中的野草,有的脆弱,有的柔韧,他们自生自灭,却又生生不息,这正是民间生活的真实图像。

许建平实际上是在为郑州立传,为这里古老里巷和新兴街衢人的命运写传。他的运笔很有深味,写人物命运总是向人的秉性、气质、个性深处延伸,写人物的不幸和悲剧,从不简单地归结为外部势力的欺凌。他用文学性笔法形象地表明,人的卑微和屈辱以及失败绝望,并不全因外因造成;也许,正是由于人的认知局限、盲从昏聩、非理性才造成了悲剧的发生。反过来又可以这么说,如果人都可能是清醒和理性的,就不会再有那么多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了。许建平写人物命运真是一把好手。

多年前,曾编发和阅读过许建平的小说,经年累月,对他小说中的人物诸如三哥、文先生、王胜利王总、断指者总是印象深刻。这些在郑州地界生活的人,他们生猛鲜艳、活蹦乱跳,把那片生活搅得沸腾而多姿。但他们又是不配有更好命运的,却是试问:谁配有更好的命运吗?

二、“三哥”的侠客梦

1996年我在《作品》杂志当编辑。是年,收到他的《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马上就被吸引了。三哥的形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送审很快通过,旋即刊发。可见,面对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家都有共识。许建平的写作一出手就可以用成熟、老辣、不凡来形容,他好像没有稚嫩的练摊儿期。不久,我又陆续责编了他另外几篇小说,都属质量上乘之作。“三哥”

出场,非常有光彩。可以用诸如扶携幼弱、敢爱敢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词汇来形容其秉性。他在槐树街,仿若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而他的浪漫与偏执、美德与迂阔的性格悖论,又如此发人深省。

许建平很会塑造人物,往往一个动作、表情、细节,人物个性与命运便有说头、有来历了。他塑造了不少人物,先说这篇小说里的“三哥”。

“三哥”其实是个无权无势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干着不法之事的无业游民。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里,“三哥”年方二十五六岁。他身材瘦高,有一双女性般漂亮的眼睛,有又黑又浓的眉毛。他脸部左腮上的那个刀疤,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年轻、英俊,反倒是平添了男人的刚毅血性气质。“三哥”长发披肩,这却又是艺术范儿男青年的气质。他总是穿着一件国防绿的旧军装,这是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衣服。从外形上看,“三哥”气度不凡。

“三哥”高中毕业以后因为一桩官司耽误了上山下乡,这让他滞留在城里、滞留在槐树街。他的父母双亡,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名叫五妹的妹妹要照拂。那么,他有什么经济来源,来支撑自己和妹妹活着?

小说没有仔细叙述这些情节,但通过写三哥因贩卖销赃物品不时光顾局子,入狱出狱成家常便饭这些细节,估计三哥干的是投机倒把等违法之事。他也因这行当维持了兄妹俩的生活消费。三哥住在父母留下的、偌着土城墙根儿搭建的平房小屋里,三哥是个并不富裕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穷人。

可三哥却又不是等闲之辈。三哥用他的威望和声誉,用他对一条街上良家少妇和幼弱之人的庇护,在街坊邻居中增加着对世道人心的持久影响力。三哥无权无势又无钱,他靠什么增加着持久的影响力呢?他靠的是担当、不背叛,秉持公义,并在关键时刻不惜抛洒一腔热血给你看。在他被抓的日子,三哥在公安局从不供出任何人,所有的责任他一个人担了。他出狱以后,自然是小兄弟们的敬重,好酒好肉的伺候。

小说第一人称的“我”,和三哥的际遇也缘于一场未发生的流血事件。

远在外地的父母给“我”买了一件新夹克,上学当天就叫赖四看中了,硬是穿身上不脱,说是要穿一段。扭打中赖四撂下一句话,晚上屋后城墙单练。这单练指的是一对一“火拼”。在等待晚上单练的大半天时间里,“我”这个刚上初中的小嫩鸡仔,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到了晚上,仍是揣了把菜刀以及半盒香烟,头冒虚汗单枪匹马出了门,下决心一赌胜败。等待自己的是赖四纠结了十几个小兄弟在那

儿,其中也包括三哥。三哥问是你自己一个人来吗?答是我一个人。就这一问,三哥对这个不怵不怯的小兄弟刮目相看。待细问周详,得知事情真相,三哥不仅让赖四还了夹克,还特意请“我”吃了一顿饭。从此,“我”也成了三哥队伍里一个成员。

三哥孚众,便是不欺软怕硬,是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三哥的威望和影响力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三哥无权无势无钱,可他有唯一的权力,那就是生命。他在危急关头,不怕流血不怕自残。这样的行为够壮烈。当秋妹被三个小混混盯梢跟踪,她将苦楚说给三哥听时,三哥当即出手帮忙。三哥让三人先拿砖拍自己,三个砖头拍得三哥鲜血淋漓。这之后,三哥可就不客气了,他拿砖分别往三个人的脑袋上拍,三股血泉眼儿冒着,好不疼人。未了,三哥还不忘拿些零钱让三个人到小诊所去包扎伤口。

正是这一次,三哥赢得秋妹的芳心,秋妹要铁了心跟定这个拿命换信任的男人。

小说故事发生在1975年前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社会呈现着混乱和失序状态,许多强梁之人欺凌弱小无辜。人们在无奈中,选择民间的公道人。那些不怕事,不惧危险、挺身而出帮人救人的好汉,成了人们的主心骨和民间英雄。

那时候的三哥,是槐树街上人们的依靠,靠他去摆平很多事情。三哥靠的不是口舌,不是说理;他靠的是拳头,是砸出个血窟窿给你看的那股子好勇斗狠,他不是因自己受侮辱受损害而以恶制恶,他的好勇斗狠,全因别人的信赖、依靠、夸赞。他认为没有他出手主持公道,那不公不义之事就压在弱者头上,他为别人而闯入险境。他因此成为槐树街上人们记忆中的神话和传奇。

被人尊重和称赞,让三哥成为活着的骄傲与光荣,他因此又可以生死置之度外。他的忠信仁义侠道,就是为了一个脸面。脸面在他那里竟是如此重要,它可以比生命重要。比方说,拿砖拍脑袋,如果别人拍死了自己,或自己拍死了别人,这都是血债、命案,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无权无势的三哥和槐树街附近的平民百姓一定会是这样的结局。三哥难道不知道吗?他知道,却明知不可为偏要为之。这是三哥在圆自己的侠客梦。

侠客是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这样的人总是白色衣袂飘飘于山崖或水湄。他们在月黑夜深之时飞檐走壁,干着杀富济贫、除恶灭害的行径;他们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之人;他们总是恪守承诺、重义轻生的侠气之人。

可以想象,在郑州老城根儿,三哥潜移默化的一

定是这种古老的文化遗产。他的认知结构便是这样，他是懵懂的，内心没有被理性照亮，也没有开始现代性启蒙。因此他不会发问：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有几条生命去救活那承受不平的人？不平让下层人气憋，有冤无处申。你拔刀相助了，于这个人于你自己又有更好的出路吗？事情只能向更加一团糟、不可收拾的厄运中走去。只有理性，才能呼吁现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他也不会发问：若是重义轻生，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轻易放弃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担起在世的义务和责任吗？说起义，那是对父母的赡养尽孝，对妻儿的看护抚慰，对朋友的扶携帮助，对社会的努力奉献。这是真正的义，而不是一个莽撞之人为了旁人的一个鼓噪随随便便就送了命。

三哥这个人身上，有着太多可解读的外延性、丰富性。不可讳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三哥”这个人物是应该占有独特地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表面看，许建平似乎在用一个少年的视角回望往昔，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文化的深层追问和个人命运的自省。这是反思小说，不仅反思个人精神价值的混沌无觉，也反思自以为从来如此的文化浸润带来的乖张、怪诞和蒙蔽。

三哥想做一个侠客，从这里引出了我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四大刺客的重新认识和梳理。

生活在郑州古城根儿下的三哥，他的文化基因里边，仍有千年厚土层叠积淀，仍有古老遗风在亘古之中的传递，三哥被浸润成执拗而幻想、辽阔而浪漫的模样。他的行为准则仿佛是可歌可泣，却是经不起推敲琢磨。往深处略作分析，就可以在他讲义节的美德秉承中，在他深陷于影响力的威望感和道德满足中，依旧是对权力的迷恋与崇拜。他喜欢摆平，他相信有他在，事情就可以摆平。他一个无权无势无钱之人，认为自己不怕流血不怕死，这种意志权力和生命权力的舍得，可以吓倒别人、战胜一切。这是非理性逻辑。但那时，三哥的确以拼死相较量，得到了许多精神上的满足；他也曾被崇拜。虽然他可以统帅的只有那些小兄弟，他的王国仅限于槐树街，出了这块地界，他什么也不是；而他的臣民就是遭遇麻烦把三哥夸得天花乱坠的人。但三哥已经很满足了，他不知道他在上当受骗中被蒙蔽很久了。

许建平借助于三哥这个人物，分析其性格命运，牵出其痼疾之源，将那春风不度、迟滞固守的文化环境与人文个性，写的是入木三分。

三哥能干什么、能干成什么？三哥擅长摆平这人伦关系的虚事，一旦涉及创造财富这些需要上手

的实操之事，他就蒙了。改革开放的初年，三哥那么一个好脸面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也走上前台。槐树街上，三哥的酒店开张了，迎接他的将是什么？

三、“三哥”的经商梦

在槐树街是个响当当人物的三哥，在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也要弄出些响声，他仍然要当个为人称羡仰慕的主儿。一番筹措，他在槐树街开起了第一家私营酒店，这真是一时间风光无两。

三哥依旧用他原先的江湖义气指挥酒店。他的中午和晚上，是在陪熟人吃饭喝酒中度过，这当然不用熟人花钱。有一般相识的人来酒店吃饭，临了要结账，三哥用手挡回道：“咋啦，咋啦，想打我脸不是。”那意思是说，你来我酒店吃饭是看得起我，你若付款结账就是不给我面子。三哥有所不知，开酒店，已经是走向市场经济，这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讲的是盈余、利润、赚钱；否则，一切就难以为继。酒店一旦开业，从门面租金、装修花费、桌椅碗筷、员工薪水、菜肴原料等等，都需要钱财进账。没有收入、利润，何来经营，又何来发展。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事，可三哥就是不明白。他依旧在用江湖义气那一套看似很道德化的思维来行事。他所谓的江湖义气，是前现代社会的“死本能”。遇事不怕流血不怕死，一个不怕死的人，放到战争年代，他自然是一条好汉，是一个有英雄秉质的人；但在和平年代，一个人不怕死，这就不是什么为人称道的高风亮节了。和平年代尤其进入现代性阶段，看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好好活着，给生存权利以最高的尊重和礼遇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首先活着，然后要担负伦理责任。三哥不怕死的那一套已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他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派也渐渐露出窘况。三哥依旧沉浸在“摆平”的自我陶醉之中。三哥注定是个悲剧人物。原先他所擅长的就是摆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现在他发扬光大。当员工中间发生不团结、相互齟齬时，他非常喜欢坐在那里进行循循善诱的说服劝诫工作；他乐此不疲，员工为了让他有事可干，于是不断制造麻烦和矛盾，他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开导、仲裁的角色里。三哥不懂酒店运营，也不懂正常的管理机制，他不去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是的，他从来没有学会算计得失，而做生意必须讲求算计得失。他终于走到酒店亏损破产的结局。赖四和秋妹逼迫三哥赋闲，这才使酒店死而后生。秋妹终于要离开他了。曾经，三哥因为不怕死，替秋妹摆脱了流氓的纠缠，才能获得美人的芳心，并且以身相许。那时的三哥，在一片瓦砾之上，勇猛果敢、济危解困，令女性倾心。秋妹顶着太大的压力，

非要与他在一起。秋妹的父亲,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刑警队长江老秃。他怎么可能允准如花似玉的独生女儿下嫁给一个不法分子、无赖之徒三哥?三哥有他的一套,他在江老秃家门前便是跪了三天三夜,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江老秃摆摆手,让女儿走了。这曾经是槐树街上的传奇。

秋妹原来是真爱三哥。那时的秋妹觉得一个敢为自己冒险流血的男人是大英雄,可以托付终身。她真是好人家走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刑警队长,是当时的现管,女儿也自然不会缺吃少穿。如此优渥环境中的秋妹,不会及早预卜生活之艰辛,她也不知未来的日子比树叶还稠。男人不仅要有仗剑天涯的江湖气,还要有养家糊口、仕途经济的在世本领。秋妹不管不顾,认定了三哥,非要跟了他。秋妹身上仍然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倾向。

但生活终于显露出它本来的真实面目。

三哥原本的莽撞、不计生死,在过去会被看成值得传唱的壮举;三哥原本不懂谋划,没有后继和可持续性的率意,在过去被看作是放野豁达之嘉德懿行。现在看,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曾经以为的潇洒、血性,都只能远观而不可近前,近前了,并参与其中,自己首先会被随性的飞刀砍伤,也同时会被如火的血性焚烧成黑色灰烬。当秋妹指望三哥为她遮风避雨、为她创造优渥的生活环境时,她的梦幻灭了。此时,她看穿了生活真相和个性真实。此时的三哥在秋妹眼里,不再是那个令她想起来就两眼放光、激情难抑的男人;三哥在她眼里只是一个毛发颓损、衰老肮脏的老熊。虽然三哥还不是太老。

曾经如此不堪的,跟在三哥屁股后边混混的赖四,只是稍稍动了下脑筋下了些功夫就将酒店做活了。秋妹并没有选择更远更高的人,只是眼前的赖四让她感觉可以衣食无忧,让她感觉至少比一蹶不振、又呆鹅一个的三哥有所指望,她跟了赖四。这不能从道德上指斥批判秋妹。女人要养儿育女、本能上的危机感、求安全感使她必然要选择可以给她解决生计之虞的男人。秋妹决定要与三哥天涯海角了。她坐飞机去了乌干达。

正是这最后一击,让三哥彻底崩溃了。他从此再也没有可凭恃、可牵挂的了。连女儿圆圆也留不住他。他做了一项决绝极端之举,一把火烧了酒店。三哥也从此无影无踪。不知他是否一同葬身火海,还是躲到哪里隐名埋姓。从此,槐树街上再也没有三哥,也没有关于三哥的传奇。

小说最后,小黑孩早已长大,成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若干年的某一天他在如厕时,见到了一个在

公厕旁收费的酷似三哥的人。这人确凿应该是三哥,左边脸上那道熟悉的刀疤不可能出错。三哥不再是逞强斗勇、呼风唤雨的英雄。他守着公厕收费,他的乐趣非常简单,抿几口二锅头,吃几口油纸包里的猪头肉和羊杂碎。他面光油亮,已经发福。他们终是没有相认。只要知道三哥仍活在人世就足够了。

许建平塑造了一个代表底层、来自民间的典型三哥。三哥身上有着许多可解读性。

三哥其实不是一个洒脱、好玩的人,而是一个沉重、乏味的人。他不加思索地背负着中国民间古老承训,不加甄别地运用于他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不合时宜的侠客梦里,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生存真相。他蛰伏于胡同深处,是民间社会最低位置的那个,他甚至可以说一无所有,却偏偏想要襄助他人。他实在是毫无资源,只能拿自己的血和肉、生与命来交换一声赞誉。三哥实在是幼稚,真有人把你的脸面看成美德的丰碑吗?但在民间公义里,在曲直不分的无望中,三哥的血性与暴烈,的确曾给绝望中的人带来慰藉和指望。

三哥打打杀杀的行径并不好玩,朝不虑夕的日子并不有趣。他没有公子派头和纨绔子弟的俏皮调侃,他总是眉峰紧蹙,每一步都仿佛在刀尖上过日子。他不是王朔笔下类似顽主那样的人物。王朔在《动物凶猛》《顽主》等小说中,曾塑造了一些欲望无从发泄的青春叛逆者的形象。但王朔写的是北京部队大院里一群横冲直撞的优越之人,他们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们可以任性而执拗的打架斗殴。他们不用担心闯祸以后怎么办,家长有办法。十八岁以后的男女都可以到部队大熔炉,当上令人艳羡的解放军。都说王朔“一贫到底”,有语言生猛、叙事鲜活的文风,他敢于撕破一向伪崇高的假面。

许建平笔下槐树街的青少年,不可能有王朔笔下那些人的任性逍遥,这些城市平民子弟,没有任何资本和资源。这些引车卖酱者流,是踉踉行走飞扬尘土中的微芥,在民间社会的传统逻辑中趑趄地翻卷腾挪,自以为可以置礼法秩序于不顾,能够秉持大义纲常等公德。

可以说三哥也有理想,他的理想就是在舍弃中彰扬一种强力意志。他以为自己可以作为强梁者存在,凭强力意志和不惧械斗可以摆平世间不平之事。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底层民众怀揣了这种梦想,以为可以这样去做。到头来莫不是一场痴想。

三哥甚至不是堂吉珂德似的人物。堂吉珂德挥舞长矛,带着他的老马和一个仆人在世界闯荡,他处

处碰壁而又不甘。他荒唐而执着，怪诞而自信，演绎着悲喜交加的剧目。而三哥懵懂而迂阔的人生里，总是错误判断着形势和个人能力，但他不甘心只成为槐树街上的一片落叶随风飘散归于泥壤，他的荒唐与悲壮，都是民间社会诸多人物类型的一种写实。

他不像西方小说和电影《教父》中的维克多。维克多多少年时代亲眼看见了父亲因得罪柯里昂村的恶黑势力而惨遭杀害，其母其兄也难逃一死。维克多躲开魔爪，从小的志向就是报仇，他成了意大利黑手党老大，成为比恶还恶的人，成为以邪制邪的人，他终于了了夙愿，但也从此走向非秩序、法外之地的危险之路。三哥没有外部挤榨而生的复仇之心，他没有受到威胁与伤害。几次进局子，肯定也与他做了不法之事有关。三哥的梦想更超逸更辽阔，他欲凭一己之力恢复江湖上的规矩旧制，他以狂傲不羁，欲以撞开漆黑的虚无之幕，他想做逃逸日常樊篱的奢侈之事。

三哥欲以捍卫的旧制，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哲学截然不同。儒家文化讲求妥协、隐忍的中庸之道，推崇浸润和缓慢，有耐性拼或等到最后。儒家文化讲求按下不表，在生命的每个节骨眼儿上学习反躬自问，一日三省吾身。这里，不看重一池城之得失，只是远虑未来远景。如果一个人表面看风光无限，若是德不配位，因狂谗戾气而无警策，到头来危险与厄运仍会追撵而来。

三哥怎么会想到这些远虑与筹划。他鄙夷实用而庸俗的经验。他一把火烧了酒店，与其说是对赖四和秋妹通奸的愤怒，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无法进入现代性社会的极度恐惧。他是注定没有出路和前途的，他干不了任何实际之事。他没有文凭学历，但若是凭他作为一个高中生的资质，努力勤奋重拾书本，考个大学应该不成问题，至少可以上个电大或者大专，但他不屑。三哥是那样坚决地要与文明、学养、成功划清界限。比如当三哥得知与他厮混的小黑孩考上了大学，三哥招呼众兄弟为小黑孩摆了最后一次酒席，为的是从此一刀两断。三哥自甘于民间底层，以不求上进、抵抗文明为盾牌，他与“混得好”的人是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中的人。

若干年过去，许建平情绪复杂、五味杂陈地写下三哥，为一个城市平民叙事，他写下反思，也写下惋惜与怀念，更写下延伸既广的文化隐喻与诠释。

混乱、失序的年月，要求人的强力意志，谁敢拼死谁让人怵畏。和平的秩序年月，伦理要求紧迫而肃严，人的理性判断将胜过强力意志。三哥却没有及时调整改进，没有及时拨开船头以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要求。和平秩序年月，一个人面对的每一天每一件事都需要判断。错误的判断会令一个人输掉手中的存有；正确的判断可将不堪入目的乱麻拾掇整理，进而织出夺目耀眼的锦缎。所谓穷人、可怜人，除了天灾人祸等不可预测之不幸令人同情悲悯，其他需要从自身查找原因。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甚至就连那些把身体弄得一团糟、不可收拾的所谓病人，也不能完全听信他们推诿于外因的口实。总认为不幸饶不过自己，总哀叹上天不公，这都是对自我责任的放弃。你为什么不去从内在查找原因，这里边要么是个人生活细节出了错，要么是认知观念的昏聩。总之，这个不懂生命与身体是个有机整体的人，偏于执念和妄论，连自己的身体都看顾不了，这人的领会、悟性都是大打折扣的。

那么关于三哥，一个如此颓丧而无前途的人，他不自救，那是任谁都救不了他的。他的绝路是咎由自取。日后，他如果还能守着公厕收费，为自己寻一口饭吃，还能活下去，已经很不错了。可他的活总是显得那样的摇摇欲坠，如同槐树街老槐树上的叶片，仿佛一阵风都可以将他吹向万丈深渊。

当年如此耀眼的三哥轰然倒塌了。这意味着民间边缘人物欲以进入历史壮丽美学幻梦的破灭。

类似三哥这等民间人物的故事还在这个城市发生，它以或悲或喜的命运形式继续。许建平仍然有兴趣和笔力去叙写新的历史阶段人之为人故事。

四、野蛮生长

许建平仍然将笔触伸向郑州，那里的男女老幼总是牵动着他的神经。

看完他的《郑州谣言》，心头涌出一句话：平民的野蛮生长与资本原始积累之原罪。

《郑州谣言》中的王胜利，仍然是从槐树街走出来的一个平民子弟。他的父亲原来是人人艳羡的铁路职工，每月都有固定工资。他因为娶了个乡下妻子，又生了众多子女，生活窘迫中他干起了沿着铁路四处爆玉米花的营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又加上本人的个性，王胜利从来都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但他又是一个遵循民间道德有情有义的人。他和一帮子小伙伴成了扒火车的“车厢帮”，按现在的解释，这是一群问题少年，干的是沿铁路打架斗殴扒车行窃的勾当。但他们不这样认为，反而觉得自己犹如高古侠客，干着杀富济贫、开仓放粮的壮举。他们在节日里杀回槐树街，把大包大包的冻鸡、冻鱼、冻猪肉羊肉和时鲜水果蔬菜分发给每一户街坊。要知道，在低标准时期，日常用品全都要凭票供应，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若是可以得到这么

多诱人的食物,而且不凭票、不花钱,人们明明知道这是小混混们从火车皮装载的物品中偷来的,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所谓“偷公家的不算偷”,于是,积极的居委会主任烈属王大娘也参与分配,但她留了一手,让领到的每户签名,以备日后追查。也正是这个王主任,后来把王胜利送进了班房。王胜利坐了将近三年牢,才被放出狱。许建平笔下的王胜利们,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率先进入商海的那一类人物典型。这些平民,生活在边缘的人,他们曾经被作为流痞、渣滓看待。正是改革开放,重新制定了识人用人标准,取消唯成分论,让以往被歧视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成为人民群众一分子,他们在升学、就业,甚至提干问题上都不再受阻、不再低人一等;取消城乡户籍的限制,让农村人不再是低人一等的贱民,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于大中小各个城市打工或经商,凭本事吃饭。而那些曾经有过污点被打入另册的人,只要不再违反法律,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完全可以享有国家公民待遇。正是这批人,其中有不少成为第一批下海闯世界的人,王胜利就是其中一员。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流行一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敢闯肯干,在某个行业、领域做出实绩,你就是响当当的能人、强人。

像王胜利们,他们原本就是一无所有,因此也就不怕失去什么。多年来他们在贫困、屈辱的底层挣扎,眼下,有机会让他们施展拳脚,可以赚钱盈利,改变从前的卑微命运,何乐而不为?他们不会瞻前顾后。那些在体制内混得不错的人,一般不想打破惯有的秩序和日常安定。进入新的冒险和闯荡许还会改变现状,至少不会比以前更差。从秉资上来说,这都是些不怕事、不怕输的人,也因此,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可以挖到第一桶金的,反倒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弄潮儿。

许建平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很少掉书袋子,他总是用浓郁的烟火味儿,笔致带着市井的活力与俗常,民间的不羁与犯规,去叙写时代生活中人物的性格秉质与命运嬗变。他在为郑州钩沉一段记忆,记忆它如何从内陆省会成为目前中国中部地区翘楚、现代商都的艰辛历程。他更主要是在写人的演变,写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横冲直撞、趑趄趑趑而迈向现代性门槛的。在这一行进过程中,有的人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有的人遭遇淘汰的无情结局。许建平记叙了这段喜忧参半的历程,他笔下的人物犹如活化石,是我们检索那段历史时的重要依据。

野蛮生长中的王胜利什么都干过。从王板凳、王像章、王签证的称谓,足可以看出他犯忌越界的出

格行为。小说从他开办“白云苍狗烧烤不夜城”写起。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事,从为饮食城取名、改名,到王胜利一路折腾直至开业,“我”一直是旁观者。

王胜利进入商界,如同三哥一样仍然是开办餐饮。民以食为天嘛。也可能是过去饿怕了,一放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餐饮业这个单一经营模式。曾几何时,这个城市的上空,飘散着浓郁的佳肴美食烹调烤煮刺激味蕾的熏香气流。

王胜利兴致勃勃要办一家规模颇大的“白云苍狗烧烤不夜城”。但是,小说里同时燃烧的三场大火——天然商厦、西苑烧麦城、《伊人生活》编辑部一座小楼相继起火,让迷信的王胜利对“烧烤”二字忌讳起来。

王胜利又让“我”想着改名,避开一切关于火的联想与牵涉。果然,烧烤改为“涮烤”,有火又有水。水能扑灭火,于是“白云苍狗涮烤不夜城”顺利开张了。他的餐饮业究竟能够走多远?不知道。

内陆省会郑州,比较岭南与江浙地区,经商传统不浓。商贾经验不足的河南,在改革开放初年,将走一条更加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探索之路。这条路上走来的是些什么人,能走多远,许建平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都埋下了伏笔。

来自槐树街的王胜利胆大、侠义,他自己虽然所受教育有限,但对文化知识充满敬重,也对禁忌迷信充满敬畏。他大大咧咧,有时涮嘴皮子;他豪爽,喜结朋友,结交的又多是喝高时的酒肉朋友;他是民间社会的典型人物,灵魂粗粝、经历复杂。他有过监狱生活的经历,柔韧与痞气共存。他不守规范,不按常理出牌,这才使他比一般守成者多了胆识,在野蛮生长的年月,敢于一试身手。

小说写到王胜利的不夜城开张为止,没有写他如何经营。许建平在铺垫一个即将登上时代舞台的上场人物。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月,各色人物纷纷亮相,他们的个性与做派悉数呈现,他们的走向与命运也是各有定数。

王胜利的言语行为真让人替他捏一把汗。他太咋呼,完全不是闷声发大财的模样。他很聪明,但他过去把聪明用在作假上,为人办理仿真的出国护照,居然可以以假乱真、蒙混过关。日后他进入经营领域,若还是依这种思维行事,那可就差矣。

槐树街上的人都不甘寂寞。三哥初涉商海,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总之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王胜利王总,也让人揪心。瞧他那做派,日常和娱乐就是喝酒、捏背、算命。他还在依以往的惯性思维行

事,尚未看出他的改变,看不出他给自己定的大志向、大筹划、大格局。他是第一代下海者某种类型的写照。那时,无论尊卑贵贱、穷富高下,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兴许,他会有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他有后续性强韧之力吗?

中国的改革开放,尝试着进入市场,正是在不断试验与纠错中。这里有骗局、歧路,也有机遇与成功。而机遇与成功正是由竞争与淘汰而来。

王胜利的形象塑造,体现着许建平不臧否只呈现,不批判只警策的春秋笔法。他本身就站在低处,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体恤亲情,却又勘察人性,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秉质、命运写得活灵活现。

每个有创造能力的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存地理位置。许建平借助于槐树街,他掀开平房屋顶油毛毡的覆盖,透过树隙间昏黄的光影,捕捉着那个街衢的浮生众相。这些无名之辈,因文学的叙事,被历史所收辑。

五、平民的粗暴与哀愁

我阅读完许建平的另一中篇《槐树街上没有树》以后,心情十分复杂。这里,有槐树街一桩桩死亡的报告,这要有多么粗粝而坚韧的灵魂,才能续写民间残忍而暴虐的生存真相。

《槐树街上没有树》由《舌头》《脸面》《哭灵》三个章节构成,它们可以独立成篇,又有内在关联,合辑起来是一完整中篇。

先说《舌头》。简要梗概是这样的:槐树街居委会刘主任欲将自己乡下老家、早已出了五服的远房侄女红姑娘介绍给革命残疾军人老宋。老宋不知在哪场战争中掉了一条腿,剩下另外半条腿。老宋在街边靠给人修鞋为生。就是这样条件的老宋也是香饽饽,农村户口的女子嫁了他,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了。谁知,刘主任的儿子刘东方与饱满红润的红姑娘却是对了眼。两个青春洋溢的男女半夜爬到平房屋顶学习切磋接吻的技艺。不想被查夜的刘主任一道手电筒强光照见原形。刘主任哭骂狂吼,以为丢了八辈子人,他一头栽地,突发脑出血身亡。儿子与红姑娘双双坠地,刘东方含着红姑娘的舌头未松嘴,情急之下,他将红姑娘的舌头吞进去了。本来是正常的男女相恋的事情,放到那个年月,刘东方却因破坏军婚被判三年徒刑。根本没结婚,哪来的军婚,就是因为老宋与红姑娘相过亲了。红姑娘决定等刘东方出狱,三年来她靠给人拆拆洗洗谋生。

终于等来了释放出狱的刘东方。红姑娘早已粉刷墙壁,糊裱好雪白的顶棚盼郎归。两人偃床依偎一起。刘东方抬头,却见雪白顶棚上有三块痰渍一

样的东西,他起着莫名疑心,突然变态似的将一个钟表朝红姑娘砸去。是监禁生活导致他这样吗?他冲出门外。卑微惊恐中的红姑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也不知那类似痰渍的东西是怎么跑到顶棚上的。她试着向上吐,试着寻找缘由。她吐着、呕着、咳着,后来气绝身亡。

对这一章节,我先不做分析,接着再看看《哭灵》里的老韩,老韩也是一个要脸面的人。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伪满人员,平时受到歧视。他的独女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却未婚先孕。这在当时是丢人现眼的丑闻。

怀了身孕的女人母爱爆棚,她对所有的孩子都充满怜爱,即使是那些拿沙包往她肚子上击打的狼孩子,她也不生责备,反而和他们一起玩耍。那游戏如此残忍。那小小年纪的孩子之行为如此暴力,让人不寒而栗。更让人不堪目睹的是老韩经过这里,他飞起一脚向自己亲闺女隆起的肚皮踢去,闺女当即流血满地,昏死过去。

男人们真道德啊。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不能丢面子。为了脸面,臭丫将自己无辜的、也是受害者的妻子杀死了。当他拿刀砍下去的刹那,他没有痴疯,没有精神病发作,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妻子脏了,丢他颜面了,为此,他把她杀了。老韩自己作为黑五类早就受人歧视,可他为了那脸面朝自己女儿踢去。他可能会治她于死命,难道他想不到?男人通过道德依据轻而易举完成了杀戮。读到此处,心惊搐收紧,无比哀恸,为那女人们卑微而短暂的生命而哭。

《哭灵》仍然在继续着槐树街人命运的演绎。

老韩闺女流产以后疯了。她被民警老左用自行车驮回她的家。老左是这里的片警,照顾关心街坊四邻是他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久,老韩闺女又怀孕了,不知父亲是谁。她口口声声说自己的男朋友是高层某某某。谁都知道她是花痴,痴魔了。她生下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不知是怎么活下来的。男孩儿平时受人欺负,却不哭。有一天他被人往嘴里塞盐无法说话。男孩儿从此失踪。有传言说男孩儿是民警老左的。老左只有乡下三个闺女,现在把男孩儿送回老家了。老韩闺女又有了新营生,靠给人哭灵度日子。她总是哭得彻心彻肺。

老左死了,街坊们感念他生前的好,决定办一场哭灵以祭奠他。老韩闺女职业性为老左哭灵,哭得是天地垂泪。正哭着,一个青年男子暗中起身将她嘴里塞满了盐。老韩闺女从此哭灵生涯结束。据说,这个青年男子正是当年送往老家的男孩儿,他天

资聪颖,已大学毕业,并发誓做官。

我不厌其烦地复述了此篇小说的梗概,常觉笔端滞重,心情压抑,寒气袭骨。

许建平不动声色却又神思严峻地进入身临其境的民间叙事。他的小说给人的裨益和延伸性思考就是:他不仅在摹状生存的原生态,他对人性本质和道德文化有着清醒的反思,并在沉稳结实的叙述中做着批判。许建平尤其怀着人道主义和人文立场,对民间卑微而又屈辱的女性寄寓着深切的同情。

可怜的女人红姑娘,她是那么生性恹惶,那么畏惧刘东方。她因害怕误解而窒息身亡。

那个老韩的闺女,她甚至是没有姓名的。她未婚先孕,从没暴露过侵犯她身体的男人,宁愿自己受着凌辱。她用痴疯挡住了屈辱与死亡的催逼。

许建平在反思男人,反思男权政治和人性之恶。男人要脸面,不惜逼女人去死。凡事男人可以做,女人不可以做。女人即使是被侮辱着,男人也让她以死平息社会舆论。男人这种思维和举动,自以为是天经地义,从来是对的。果真是这样,从来如此就从来是对的吗?男人不反思,灵魂扭曲,个性畸态,凡事都是女人的错,这种认知与秉性会让他们成为一个可怕的物种。文学的本质就在于一点点开启反思之门,直指人心,为一个充满善与爱的社会到来而努力。

实际上,挥舞堂而皇之道德大棒的,不仅戕杀女人,也同样谋杀男人。

然后,我又读许建平的小说《老蕊》,看得惊魂乱魄。女人老蕊是槐树街上的一个理发师。她的香胰子香脂,她的摩挲剃头洗面,都是槐树街上人的一享受去处。她来历不明,有人说她旧社会曾当过妓女,老蕊不争不辩,她仍然待人良善、义气。“我”堂哥清河,成分高,在乡下受白眼,于今逃婚来到槐树街。他到老蕊那儿理发。他进入缥缈的幻觉。清河堂哥听老蕊唱样板戏,跟着听,犹如“迷弟”。他上街捡大字报废纸,六麻袋可以换二块钱,这样可以买胖大海,让油烟嗓儿的老蕊喝了润喉。不知不觉中,50岁的老蕊和20岁的我堂哥相互取暖有了私情。

人们捉奸在床。人们把两个人挂牌游街。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人们的道德觉悟高,谁不道德了就被游街示众。堂哥清河喝敌敌畏死了。

小说从“我”去临终医院看望90多岁的老蕊写起,采取夹叙夹忆手法。油灯将近的老蕊对“我说,你哥来到世上,短短生命只经历过我一个女人。老蕊拿出她积攒的三千元钱和一个金项链,要“我”

逢着初三、清明、十月一找到清河的埋葬地——上坟,烧纸送钱。临了,老蕊还嘱咐我也到奶奶坟上烧个纸,原谅她给她老人家找麻烦了。老蕊没什么对不住我奶奶的,却是我奶奶对不起老蕊,在游街示众时,我奶奶对老蕊和堂哥的一顿责骂,或许是间接中逼死了堂哥。老蕊不计较别人对她的不仁,她始终以大度之义待之。

若是环境扭曲,人内里的恶会被激发、善会被掩匿;若是生存环境健康,人内在的善就会彰扬,恶会被制止。平民百姓的道德能力和水平是无从考验的,被利用的道德让人心冷漠如石头,冰冷而黑色。

当然,也不必那么悲观。民间仍有正直与善良的秉持,即使它以执拗而荒诞的形式存在。

六、血腥的尊严

许建平的小说《文先生》,写“槐树街中学”的一位老师。

一开篇写的就是“我”去看刑满释放的文老师。文先生已放出来多日,目前他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离婚证书复印件分散张贴,似乎想要昭告天下他终于离婚的事实。故事从1975年开始。

文先生与妻子林文老师是美满的一对,他们的情爱当时让多少人羡慕。妻子即将生育第三个孩子,有些不顺,需剖宫产。文先生可以与主刀医生讨论竖剖还是横剖的问题。正是这次文明的交谈,让主刀医生认定知书达礼的文先生是他完成计生结扎指标的合适人选。文先生结扎了,手术有些失败。文先生不仅丧失了生育能力,同时也成了一个丧失性功能的男人。他佝偻着腰,从一个儒雅翩翩的有风度的男人变成恹恹病夫。

他在学校却是例外地得到了照顾,唯有他可以坐着给学生上课。人们窃窃私语,说这一切缘于学校工宣队负责人王师傅对他的关照,王师傅之所以关照文先生,是因为林老师。王师傅的家属在农村,属于一头沉,业余时间,他干活,也与男生打篮球,似乎在发泄剩余精力。他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汗,林老师拎了热水帮他,问他凉不凉、热不热。他们是自愿地走到了一起,有了私情。林老师为王师傅饱满紧致的男性身体吸引,王师傅为林老师的女性温柔气质沉迷。

文明的文先生向工宣队王师傅讨要一份离婚证明。未果。

不知是否由文先生导演了一次捉奸剧目。要脸面的王师傅竟然服毒自杀了。文先生并不想要这样的结局,他只是想以一种“兵谏”的极端行为,让王师傅给他开一张离婚介绍信,这也是他为自己

男性尊严所做的抗争。王师傅之死,让文先生以破坏教育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13年徒刑。文先生出狱了,完成离婚这件大事了,他认为自己终于赢回了尊严。

许建平没有写任何人的不好。文先生成了结扎的受害者,他和林老师之间有了不为外人知的生理苦恼。王师傅和林老师之间,皆因春光太明媚、身体太旺盛。王师傅太笃诚,为了这次败露私情,却不惜以自杀谢罪。

你完全可以说王师傅可以选择不去招惹林老师,即使林老师主动传递强烈的诱惑也佯装不知,这样他就可以逃离悲剧的结局。你也可以说,王师傅可以选择不自杀,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他却把脸面看得比性命还金贵。开始迈出那一步时,已触犯道德脸面,事后却又为什么那么看重?

文先生那么善良、惹人同情,可他分明又间接地逼死了王师傅。可他又为什么不能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生活中若全是筹划得当,人们全都理性判断,就不会有那么多悲欢离合命运故事的讲述了。

《断指》这篇,讲述了另一个命运。

小说的主人公也叫胜利。那个年月,叫胜利的太普遍了。胜利是“我”初中同学,他约我有重要事聊一聊。原来他摊上大事了。他儿子在学校遭遇欺凌,他亲眼见到那个施暴的小子拿一把塑料水枪往儿子的屁眼儿里灌水,作为一个父亲,本能愤怒之下,一把撕裂了那个小子的耳朵。却不知,这欺负人的孩子有黑社会背景,名叫牛小辫,江湖称为“三老板”的人的儿子。这下还了得。三老板派手下人找到胜利,答应可以私了,但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十天之内送三万元钱,二是送去一根右手食指。胜利作为转业兵到国棉六厂工作,后来成了下岗工人,他哪里能拿出三万块钱?“我”宽慰胜利,给他出主意说可以选择报案,胜利不同意。“我”又劝他和儿子到外地躲避一下,他又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对这些主意胜利听不进去,说道上的人说到就会做到。胜利已经被恐惧攫住了。他想了断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他未等到三老板等人被抓服刑,在规定时间的最后期限,他把自己的一根手指剁了。不能想象胜利经历着怎样复杂、艰难的思想斗争。当他举起刀将自己的右手食指剁下来时,那是怎样的疼痛难熬;他该怎样从案几上捡了这根手指,并用白布包起来;他怎样拿着断指赶到三老板租住的酒店。到了酒店,却发现房门紧关,原来,三天前三老板及其手下全跑光了。接着就是三老板被抓的消息在报纸上公

布于众。

最后,当“我”见到胜利时,胜利右手吊着绷带,他脸上却无沮丧只有平静。他说出这番话:“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要我的手指头。一根手指头不当吃,又不当喝,要它干啥?但我这回偏偏就是要跟他们兑一个做人的秉气。”

胜利马上就使出了“精神胜利法”。他剁了自己一根手指,证明自己信守了承诺,兑了一回做人的秉气,他对自己下手狠,在嘴皮子上过瘾,让他释然;而当初为何引起的事端,早已被暗中转移了注意力。

有的人说了,这里是耀武扬威的牛小辫也是富人的三老板对无权无势的下岗穷人胜利的欺负。如果一定要按这种阶级层面划分,就会把里边应该反省的问题扭转了方向。应该说,三老板也是从穷人的阵营走出来的。他混的强势,便以为他可以随便吓唬欺负别人。他的儿子也在这种言传身教下小小年纪就成为校园暴力的施虐者。

话说穷人,这不是一个应该遭贬的阶级,也不应该是个不加甄别就给以价值首肯的阶级,穷人只是一种生存情态的暂时归名。在一个健康、正常的机会社会,每个人通过努力劳动,都可以从贫穷转成富裕;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偷懒怠惰,也可能由富变贫。当然,如果那些老弱病残确实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了,政府和社会机构理应给予看管护养,这也是公民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

那么,穷人中间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

应该说,不幸并不是穷人的专利,我们每个人随时都会遭遇不幸,无论贫弱贵胄;死亡也并不是穷人的专属,无论引车卖浆者,还是帝王将相家,都可能随时会被死亡覆盖。在人类所有的公平公正面前,唯死亡最为公平公正。

但现实中又真是贫贱之人百事哀。穷人和富人在思维方式和行事标准方面,肯定有所不同。每个人每一天都面临抉择,判断力拷人一辈子,理性判断力缺失,会处处遇到陷阱。不愿接受知识更新,耽于浮浅之事,人会日益变得狭隘与昏聩,他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他捡垃圾丢弃鲜花。事情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时,他归咎于命不好,因此,他成了不幸的穷人。

许建平就是这样深入穷人的内核,不偏袒其弱点,不讳忌其恶习,也不隐匿其高侠之气,从而写出他对民间、对穷人的独特认知。

七、民间叙事的意义

许建平的小说给评论家的解读造成一定难度。譬如我,虽不是评论家,但在很早的时候当他的责

编,阅读过他的小说,也写下不少阅读札记,对他的作品,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又拿不准该怎么说得深入、潜进内核,因此就一直延宕着,未结构出完整的文字。我由此也发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凡是难以归类的有难度的写作,人们心中敬佩,却找不到现成的术语评说,于是就会先放下再说。这不是冷落,而是面对挑战时的踟蹰乃至慎重。许建平写的是什么题材?比较而言,他写的是城市题材。可他的城市题材不像王安忆,王安忆擅长写流光溢彩的上海,写那些有家世背景的人物;也不像王朔,王朔写的是有权力背景的京城大少,他们是被罩着、有退路、可以任性泼皮的大院子弟。许建平写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城市底层的平民,老门老户,他们像古城墙边的野草一样,柔韧而又粗粝;他们秉持传统,却又受制于传统;他们的日子有成有败,他们的命运起伏无定。这些边缘地带的普通民众,谁能描摹他们生命的真相?

许建平不大在意当下潮流与观念,他的目光总会掠过城市那高楼广厦的精英人士,掠过那闯劲十足的白领中坚。他兀自走在古城的草丛间,走在槐树下的荫道;他眺望平房屋檐窗内的昏黄灯盏,知道那里的淳朴厚道,也明白那里的阴影反常。他望着熟悉的黝黑粗粝的面庞,写下歌哭长叹,记叙那底层中人无边的浪漫遐想,以及被命运无情箭矢击穿的痛疮。

有段时间大家在讨论底层叙事。凡叙写农民进城打工的被冠以这种命名,好像打工文学就是底层叙事,底层叙事就是在诉说农民工进城以后所遭受种种的苦,诉说他们住所拥挤、厂房嘈杂、劳动强度高,待遇福利低的不幸。总之,底层叙事带着无产者天然的道德优越,成为支持农民工向老板、向这座打工的城市进行清算的观念托举、文字凭证。

真正论及起来,许建平的小说好像更接近底层

叙事。他对那沉闷的煎熬和窘迫中挣扎的底层,充满牵挂;他熟谙那街道、旧屋、老槐的每一寸纹理和肌肤,他熟悉这里人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叹息。他写了记忆中的人与事,那从容练达的感受,哀而不怨的彷徨,隐而不发的揭示,都带着宽宥和清醒。他笔下的底层与穷人那诚恳而又茫然的表情,令人愀然。许建平的语言平实而高蹈,日常而诗意,超出了底层叙事的规范;他的民间叙事带有更加斑驳陆离的内容,他的挖掘与陈述更具有多重可解读性。

河南作家一向以农村题材创作为重中之重。许建平独出机杼,表现着都市的民间生态与心态,是对河南文学创作题材的丰富与补充。许建平本人低抑、谦卑,凡事淡泊虚无,有沉郁深邃的内心,宽阔辽远的胸怀。他从不把自己的写作看得有多么重要,他只是对文学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其他都不是自己要考虑的。我再一次理解了凡是关心命运的人从来都不骄傲,关注命运的作品从不陈旧的道理。许建平这种雅醇的文学品质,使他的小说经得起搁放,什么时候拿起来阅读都不觉过时。

如果一个人的作品时隔经年,仍然有那窖藏老酒般的厚醇香冽,这作品至少可以称得上是耐得住咀嚼品评的佳作,许建平的小说正是具有这种质地。多少年过去了,拂去落在书页上的土屑,我们仍看到那一行行文字炽热夺目的光亮。

参考文献:

- [1]许建平.槐树街上的浪漫主义[J].作品,1997(3).
- [2]许建平.雨人的夜晚[C].郑州:海燕出版社,2002.
- [3]许建平.永远的夏天[C].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2002.
- [4]许建平.生存课[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Novelist Xu Jianping's Folk Narrative

AI Yun

(Guangdong Writers Associ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5, China)

Abstract: Xu Jianping, a local novelist of Zhengzhou, sets up a geographical marker for Zhengzhou—Sophora Street in the old town, and also establishes a cultural coordinate in his novels. He uses a simple and sincere civilian perspective and strong feelings at the bottom, while upholding the cultural observation of intellectuals, to write a biography of the fate of the people in the old streets here, which is actually a biography of the present and past of Zhengzhou. The fate of his characters always extends to people's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and his novels have a boundless sense of realism that can be extended.

Key words: Xu jianping; Zhengzhou; *romanticism on Sophora Street*; folk narrative

论生态心理学对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秦 春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教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摘 要:生态批评应生态危机而发生、发展。在生态批评研究中,人们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视域,从文化、伦理、性别、种族、地域等视角展开深入研究,构筑生态批评跨学科性质的研究范式,体现其“外向”特征。但因突显“外向”而疏漏“内向”的深层发现,不免缺憾。生态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注重将人的心理及行为归置到文化观念、人性欲望、社会持续发展甚至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的根底加以研究,以此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除路径。生态心理学的发展为生态批评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了一个内向视角,启示生态批评研究还要深入到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之中加以呈现,以此深化、拓展生态批评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生态批评;生态危机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12-06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批评形式,是因生态危机的时代背景而发生、发展的。在生态批评实践中,其空间也不断得到拓展,从最初借鉴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揭示文学中人与自然已然与应然的关系,到近年来人们更多注重从文化、伦理、哲学甚至性别、种族、地域等方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以此警示人们在观念层面重新审视自身行为,反思人与自然相处中的过失并进行校偏、归正,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然而,在此过程中却缺失人的心理向度。戈尔(Al. Gore)就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的“内在危机的外在表现”^[1]。这里所说的内在危机,亦即是人的心理危机。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兴起,特别是到1990年代以来,生态心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即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阶段,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心理原因。作为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特性的生态批评,必将受到生态心理学的启示,以此推进生态批评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一、反思与建构:面向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的诞生,缘于人们对心理学科的反思维,体现了心理学科内在发展的逻辑和对现实关切的鲜明指向。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家通常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分析研究,而忽视现实情境和自然环境的参与。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这种心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而现代生态学的兴起正切合心理学学科改造的需要,为心理学的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194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就开始有意识地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心理学的研究,从而推进心理学研究的生态转向。格式塔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在1944年《心理生态学》(psychological ecology)一文中提出“心理生态学”概念,可看做生态心理学的最初萌发。生态心理学另一先驱布伦斯维克(E. Brunswik)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并提出“生态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的概念。后来,很多心理

收稿日期:2023-09-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态批评的理论问题及其中国化研究”(19JJD750005);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秦春(1969—),男,江苏滨海人,文学博士,江苏省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美学研究。

学家受到他们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启发,不断确立和完善生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式。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到1990年代,他们开始从心理学角度探索生态危机的原因,由此生态心理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也称为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2]

温特(D. D. Winter)是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生态心理学家之一。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出现了偏差,她指出:“我们正在接近地球所能承受的生物极限,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我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倡导的一系列观念正刺激我们滥用自然。”^{[3]29}温特对生态危机的揭示直击西方文化根源。西方文化深受二元论哲学影响,确证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对自然进行无度索取、大肆掠夺和自身贪婪消费也就理所当然,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系统失衡,引发生态危机。因此,她倡导的生态心理学是“在物理的、政治的与精神的联系中研究人类的经验与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3]283}。她认为,生态心理学要加强人类文化观念的改造,要注重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与人类的精神文化之间的联系,以此研究人类的心理及行为,促进人与自然协同、和谐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有序、持续进步。

温特从文化改造角度试图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另一位美国生态心理学家霍华德(G. S. Howard)则从人性的角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以此提出解决人类所面临危机的路径。他认为,气候日益变暖、物种不断灭绝、环境持续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等生态灾难,根源是人口不断膨胀、物质消费超出地球承载限度而致,其背后折射的是人性危机,是贪婪、无度的人性驱使人类为了自身的欲望和私利过度掠夺自然、开发利用自然造成的。为此,生态危机的解除也就在于人性的重建。他指出:“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反思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并进行具有建设性改变的探索,这些行为的改变将会促进我们与地球之间形成更具和谐的人性。”^{[4]1}他认为,只有改变人类贪婪、自私的人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才得以形成,生态环境问题才得以解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五条原则,即:保护、循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修复、人口控制。^{[4]40}这五条原则的基本出发点都在于扼制人性中贪婪的欲望,在满足人类生存需求限度内节约能源、减少消费、控制人口、循环再生,推进环境保护,最终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霍华德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归因于人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也就在于人性的改造,他试图从人与自

然在对立中形成的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而满足自身欲望的人性,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互利、协同相处的人性,形成尊重自然、注重节约、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等观念和行,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有序发展。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与温特、霍华德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扎克(T. Roszak)。他认为,生态危机源于人的精神危机,是人的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人的精神危机是人的心理与生态环境之间隔离和疏远导致的。因此,在他看来,“生态心理学”就是为了弥合人的心理与自然之间的裂隙,要“跨越心理学和生态学之间长期的、历史性的文化隔离”^{[5]14}。那么如何消除生态危机、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呢?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疏离,是因为人类生态无意识(ecologicalunconscious)受到压抑所致,解决方法就要唤醒生态无意识,重构生态自我(ecologicalego)。“生态无意识”“生态自我”,也就构成了罗扎克生态心理学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罗扎克的“生态无意识”,是借用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而来,他说:“集体潜意识在其最深层的层面上,蕴含着我们被压抑的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是我们自身对自然表露出来的稳定的类似于心灵的自我意识反映。”^{[5]302}在他看来,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在精神上、情感上的天然联系,是我们人类心灵的母体。他还进一步论及生态无意识,指出:“在一定程度上,生态无意识表征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宇宙进化的活的记录,可追溯到遥远的时间史的初始状态。”^{[5]305}因此,生态无意识则是指在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在与自然交互相处中,沉积在人的心理最深层的与自然相联系的部分。为此,生态危机的解决就要唤醒人与自然间的天然情感联结,重构自我,即生态自我,并依此促进人的精神完满及心理健康发展。他的“生态自我”概念,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不断向自然延伸、自然又参与到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建构,从而形成人类个体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的自我,即生态自我。

综上可知,生态心理学研究引入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其研究视域突破了原有心理学的藩篱,而将人的心理、行为置入人与自然关系之中,以此探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为生态危机的解除寻找出路。而生态心理学在探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案时,与生态批评的内涵揭示及建构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又为生态批评的深化与拓展提供支持。

二、可能与拓展:生态心理学介入文学生态批评的探索

生态心理学源于学科反思而诞生,又随着生态

危机的日益严峻不断推进。学者们立足于心理学,从社会、文化、精神层面等更广阔的领域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救路径。然而,生态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因生态危机而兴起的生态心理学,又为文学生态批评走向深入与空间拓展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一)生态心理学介入文学生态批评的可能

面对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从自身研究视野进行反思,以此解除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生态心理学家则深入人的心理世界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注重将人的心理及行为归置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以及人性欲望、社会持续发展等视角下进行考查,甚至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根底之中,去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除路径。然而,文学的生态批评在其旨归上与生态心理学具有内在同一性,同样立足生态学的原理、方法,聚焦人与自然关系,从文化领域、精神世界、哲学层面等对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揭示,因此,生态心理学介入生态批评也就成为可能。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温特从文化改造角度出发,将人的心理、行为归结到物理环境、精神层面以及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他认为,现存的西方文化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产生就是在人们不可持续的文化观念驱使下对环境的不当行为所致,而人的行为又与心理密切相关,因此,心理学家要参与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中去,承担起重构可持续性的文化责任,推进环境问题的解决。霍华德则从人性层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由于人口膨胀、消费过度导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但其根本原因是贪婪、盲目、自私的人性所致。因此,他主张要进行人性改造,在人与自然承载力之间达成平衡与适度,从而形成人的行为体现生态合理性的人性观。而罗扎克则借鉴荣格集体潜意识概念,提出了生态无意识(ecologicalunconscious)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无意识观念受到压抑,只有解除现代文明造成的对生态无意识的压制,唤醒潜藏在人类心底的生态无意识,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天然情感联结,形成人与自然友好相处。

还有一些生态心理学家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心理健康角度研究生态心理学。奥斯卡普·斯图尔特(O. Stuart)曾于2000年5月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组织系列文章,专门论述生态危机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社会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处于危险之中,其原因则是人

类自身行为造成的,而心理学家在促进人类不当行为的改变方面需要承担应有责任。同时生态心理学家还非常关注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揭示出生态环境对人的心理治疗价值。罗扎克就认为,面对生态危机,治愈地球与治愈人的心理是一个统一有机的过程,心理危机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加剧心理危机,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隔离与割裂,因此,生态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疗法与其他心理学的一般疗法不同,“生态心理学则希望治愈人与自然环境的基本疏离感”^{[5]320},以期唤醒生态无意识中人的心理与环境之间的互惠互利感,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从而治愈人的心理问题。其中,他们非常重视荒野(wildness)的心理治疗价值,认为荒野能够纾解人的心理压力,促进人的发展,还能治疗人的精神损伤,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以及实现人的精神自我满足等治愈作用。^[6]另外,他们还于1989年创办了专门将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放在生态环境中加以考查和研究的刊物——《生态心理学》,以此认识人类心理健康、文化特征和地球生态之间的关系,试图重塑现代心理学内涵,展现心理学研究不能离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只有建立起这样联系,才能促进人类精神和社会更好发展,作为个体的人和某个物种更是这样。

总之,在生态危机视域下的生态心理学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心理学学科的内部研究,而是不断拓展其外延,以极具张力的外向视角研究生态心理学。而文学生态批评,本身研究边界就极为广泛,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上,既体现特定的文化特征,也指向人类未来发展;既立足人类的生存困境,也敞开自身的精神场域;既潜入人性欲望的深渊,也彰显生存的道德伦理,体现了生态心理学与生态批评在研究指向上的交互性。因此,生态心理学的基本思想、理论介入文学的生态批评不仅可能,而且将不断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

(二)生态心理学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我国较早关注文学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之一鲁枢元先生曾指出,人们在揭示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忽视了“人的内在因素即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7]。可见,文学的生态批评亦不能缺失心理学参与,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向人的心理延伸提供了路径。

首先,拓展生态批评研究的认知边界。人类认识活动在于不断揭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从文化观念、生

产方式、人口因素以及现代科技进步等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无疑增强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也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断澄明。生态心理学,尤其关于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因其将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深入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去,从而为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也促使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更近一步。生态批评和生态心理学在面对生态危机时具有共同使命,都是为了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为人类生存探寻出路。因此,在生态批评研究中借鉴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思想、概念,进行互学互鉴,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拓展生态批评的边界,特别是生态心理学揭示的人性观、可持续发展观、文化观等,启示我们要深入人的心理空间检视自身,以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

其次,确立生态批评研究的“内向”视角。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的批评,还是生态文化的批评。然而,文化的多元性,必然体现生态批评研究的多元性,表现出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质。在生态批评中立足“生态性”,很多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文学、伦理学、性别学、语言学甚至地理学等方法路径开展研究,构建了生态诗学的跨学科性质的研究范式。然而,不同学者虽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态批评,但皆着力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视域,换言之,批评家们大多立于人自身并依此为出发点向外拓展、延伸,无疑丰富了生态批评的研究路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研究仅仅局限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浅层次的、“外向”揭示,因其缺失“向内”的深层发现而失之偏颇。因此,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还应不断深入人的心理世界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路径,这就意味着,生态批评不能缺失人的心理向度。生态心理学正为生态批评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路径——内向视角,启示我们要深入到人的心理世界、精神世界中加以揭示,以此拓展生态批评研究空间。

第三,构筑生态批评研究的心理场域。文学活动不仅揭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更是人类的一种心理活动、精神活动,就如勃兰兑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8]因此,文学批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学的心理批评。同样,生态批评虽揭示的是人与自然关系交互中的生态问题,但也不能缺失心理向度,特别是随着生态心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也必将不断推进生态批评走向深入,将生态批评延展至生态心理场域,促进人们从心理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上不断生成由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批评向人的心理延伸的生态批评,深入人的心理世

界、精神世界揭示和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既矫正人与自然的错置,也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归正。

三、启示与路向:生态心理学介入生态批评的实践思考

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启示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确立新的路向,要切入人的心理世界、灵魂深处,以人与自然关系重构为起点,唤醒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激起人们亲近自然的本性,从而生成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自我,在人与自然互相观照、相互生成中,不断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生存图景,推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一)唤醒人与自然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

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人与自然原本紧密相连、和谐共生,人栖息自然之中,自然为人提供居所,特别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的生产生活本质上是顺应自然的,按照自然运行秩序进行生产、生活,“自然在耕田人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模式”,“自然也成了具有秩序、和谐和美好的领域。自然一词也随之带有美好和高尚的感情色彩”^[9]。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社会科技进步,人不再按照自然模样生产、生活,也不再从自然那里获得自身存在和安全,从而颠覆了原本人顺应自然的存在论,演变成自然为人所有的生存论,实现了人对自然的祛魅,一跃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成为异于人的客体 and 对象,人与自然统一共生的关系演变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疏离感”由此形成。而在生态心理学家看来,这种疏离感在于现代社会对人的生态无意识抑制。为此,在生态心理学构建中,注重恢复受抑制的生态无意识,唤醒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意识和情感联结,以弥合它们的割裂与疏离,重新找回人类的自然本性,在亲近自然的体验中安顿心灵、守护家园。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我们要借鉴生态心理学的思想,唤醒潜沉在心灵深处的生态无意识,重新联结人与自然的情感,亦如罗尔斯顿阐述的那样:“我们在自然面前会表达出一种本源的、天然的情感,如凝望星空时的颤抖,或在和风吹拂的春天心跳加快。”^[10]其实,人类寄居其中的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浸润着、联结着、引发着人类的情感,唤醒人类的生态无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则是唤醒生态潜意识的重要途径。我们走进文学世界,也就在人与自然关系场域中得以敞开,重归人类心灵家园,其中随着自然盛衰荣枯而唤起的无论是惊叹、愉悦、陶醉,抑或是恐惧、伤感、卑微,都昭示着人

与自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沉积在心里深处的情感重现,也就是生态无意识的重现,生发人与自然之间与生俱来的相互依存或敬畏遵从的本性。

(二)建立人与自然交互合一的生态自我

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无论霍华德从完善人性出发修复人与自然的隔离,还是罗扎克注重生态无意识的唤醒,他们倡导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都在于重建生态自我。我们在生态批评中同样要注重促进人与自然的交融渗透,形成生态自我。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最早由阿伦·奈斯提出,他认为,生态自我应该被看作我们在自然中形成的自我的最初状态,社会和人际关系虽然很重要,但我们自身所组成的各种关系更加丰富,这些关系不仅包括他人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还包含我们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11]也就是说,生态自我是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基本、最普遍特征,生态自我的形成过程就是个体的自我认同(identification)过程,由个体自我与他人、他物的认同并不断拓展自我认同的边界,直至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形式,消除个体自我与他人、他物以及自然界万物的边界感,进而形成对整个生态系统中自然万物的整体认同。在生态自我观念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借鉴生态自我思想,促进人与自然万物同构、同质的全新自我观念的形成,在心理意向上则要做到生态认同。生态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是对人以外其他生命存在的认同,是在认知上接受其他生命体的存在,感受到它们与人的生命一样具有同等的生命意志,两者具有互通性、相似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仅对人自身、还要对自然界其他生命体的尊重、关怀与热爱的心理现实,感受到人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同一性,消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边界,在自然万物中观照自我,在自我中洞悉自然万物,形成人与自然之间彼此依存、相与为人的生命共同体,如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那样,物我两忘,心灵互通,倾心交流。

(三)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世界

米勒(G. T. Miller)指出,生态危机是人的心理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12]也就是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的精神危机,是人在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进程中把自身的存在、精神的追求归置到一个不可靠、不确定的绝对理性之中,最终致使人类陷入精神困境。生态心理学从其

诞生起,就肩负着弥合人与自然的裂隙、救治人的精神危机的使命。生态心理学(Ecopsychology)在原初意义上就是为人类的心灵找寻归属。国内学者吴建平在论述费希尔(A. Fisher)对“Ecopsychology(生态心理学)”一词考查后认为:“生态心理学可理解为使心灵靠近她自然的家和天生的住所,为心灵找到家园的心理学。生态心理学是关于‘心灵和家园’的研究。生态心理学是为了给我们的心灵找到家,这个家便是自然。”^[13]生态心理学将自然作为人类心灵家园的隐喻,其旨意在于促进人类心理健康和精神完善,同时将拯救生态危机与救治人的心灵、精神作为一个统一过程,在环境和心理的关联互动中揭示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心理根源,既探索解除生态危机的心理学途径,又促进人的心理健全和精神健康的良性生成。

在这个交接点上,生态心理学与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物的文学,以一种超越现实制约、突破世俗藩篱的品格,既体现人类生存的终极思考,也深入人性的根底进行探究。在文学的精神世界构筑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底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回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14]他所言的“大地”虽具有多重意蕴,但大地的自然属性是其基本内涵,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中挥之不去的情结。在文学中,通过呈现人与自然交往互生的历程,一方面解析了人与自然交往中互相依存的和谐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思了人类活动中破坏环境、毁坏自然而造成生态危机的不当行为,引导人们在文学体验中渗入生态体验,以此唤醒人与自然的天然情感,建立与生俱来的联系,表达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愿望,从而以一种精神富足感取代内心的物质渴望,在人与自然相与为之一的原乡中安顿灵魂,健全、丰盈人的精神世界。

四、结语

生态心理学虽起源于心理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反思,但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生态心理学家从学科视角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案,揭示出生态危机是人的危机,是心理、精神危机。为此,生态危机的解除还要深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之中,形成平衡、协调的心理状态,生态危机的最终解除才有可能。这既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也促进了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一方面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启示我们在生态批评实践中要借鉴生态心理学的思想和方法,重新审视生态危机的心理根源,引导人们

形成偕同共生的心理机制和生态观念,克制自身欲望,抗拒物质诱惑,以一种审美的、文化的、想象的方式,唤起隐匿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生态无意识,重归自然的“心灵母体”中获得精神主体的丰盈与富足,并取代对物质追求带来的焦虑、恐慌和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空间,在生态批评实践中,人们虽从多角度展开了探索和研究,但明显过于注重生态批评边界的拓展,而很少深入人的心理世界和精神视域中进行揭示,生态心理学的介入必将为生态批评“向内转”提供一个新的向度。当然,生态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就现有生态批评研究来看,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通过本文的梳理与探索,也期待越来越多的生态批评研究者注重将生态心理学的思想、理论及其观点引入生态批评,不断促进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参考文献:

[1]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导论[M]. 陈嘉映,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24.

[2]秦晓利. 生态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75.

[3]Deborah Du Nann Winter. Ecological Psychology: Healing the Split Between Planet and Self[M]. New York: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6.

[4]George S. Howard. Ecological Psychology: Creating a More

Earth – Friendly Human Nature,Notre Dame,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7.

[5]Theodore Roszak. The Voice of the Earth:An Exploration of Ecopsychology[M]. NewYork:Simon &Schuster,1992.

[6]刘婷,陈红兵. 生态心理学研究述评[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7]鲁枢元. 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17.

[8]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分册)[M]. 张道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

[9]汉斯·萨克塞. 生态哲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6.

[10]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荒野[M]. 刘耳,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60.

[11]Arnes Naess. “Self 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in Ecology of Wisdom,Alan Drengson and Bill Devall (eds.), Berkeley, CA: Counterpoint, 2008: 81 – 96.

[12]Tyler Miller G.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Principles, Connections and Solutions ,Belmont[M]. CA:Wadsworth,2002:1.

[13]吴建平. 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57.

[14]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全集(上)[M]. 孙周兴,选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48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of Ecocriticism Research
Through Ecological Psychology

QIN 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Yanche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00, China)

Abstract: Ecocriticism develops in response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study of ecocriticism, peopl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ethics, gender, race, region and so on, to build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radigm of ecocriticism, and to reflect its “outward”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t is a pity to neglect the deep discovery of “introversion” in order to emphasize “extroversion”. Ecological psychology, as a new subject,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in terms of cultural concept, human desire,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ven human spiritual world, so as to reveal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its s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sychology provides an introverted perspectiv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ecocriticism, and enlightens that the study of ecocriticism should go deep into people’s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world, so as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space of ecocriticism.

Key words: ecological psychology;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crisis

原生家庭理论视角下的孙犁

程 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作为一个用真性情写作的作家,孙犁及其创作受到了来自原生家庭的持久影响。父亲的温厚有礼,母亲的朴素热心,影响着孙犁谦和人格的形成;自幼体弱多病,幼年时父亲的不在场,以及成年后外部事件的刺激,催生并加剧了孙犁的忧郁气质,使他敏感内向、多愁善感,乃至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也正因了这种与文学紧密缠绕的忧郁气质,成就了“白洋淀派”清新柔美风格的著名作家孙犁。

关键词:孙犁;原生家庭;忧郁气质;谦和人格;婉约文风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18-05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以鲜明的异质性吸引了学界的多维关注。关于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荷花淀》《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为代表的作品文本分析、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文艺思想的倡导、“衰年变法”等方面,不同角度的论述与阐释,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作家孙犁。本文借助于心理学知识,以原生家庭理论视角作为切口,追寻孙犁在原生家庭环境中的成长经历,探析其“忧郁”气质、“谦和”人格及“婉约”文风的成因。

一、原生家庭理论阐释与孙犁的原生家庭解析

原生家庭是指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庭。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个体性格、行为习性等都会受到来自原生家庭教养模式的深刻、持久且顽固的影响,尤其是6岁之前的经历。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6岁之前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就已经基本完成;沟通分析理论认为,6岁之前的经历会成为他后来人生的剧情的脚本。^{[1]3}来自原生家庭尤其是童年的经历,会终生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一个人。美国著名的“家庭治疗的先驱”萨提亚认为,原生家庭像遗传密码,又像一个魔咒,潜移默化地塑形着每个生命的性格、情绪诸方面。

1913年农历四月初六,孙犁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孙墨池曾念过两年私塾,十六岁时就到安国县当学徒,粗通文墨,爱好字画,经常会从天津购买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让孙犁临摹,“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2]269},父亲颇有儒雅之风;孙父待人温和有礼,对儿子非常慈爱,从不责备打骂;母亲张翠珠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善良大方,古道热肠,经常救济村中穷苦之人和过往行人。“孙犁的母亲一生共生了七个孩子,只有孙犁一人闯过了生死关,他的五个兄姐和一个弟弟都不幸夭折。”^{[3]10}在《母亲的记忆》一文中,孙犁对此也有记载:“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2]47}爷爷是位慈爱体贴的长者,担心母亲悲伤过度,就劝孙犁母亲出去玩纸牌:“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3]10}孙犁不仅深为祖父、父母疼爱,也倍受叔父呵护关心。孙犁自幼体弱多病,当时患了一种“惊风疾”(俗称抽风),十岁时,其叔父连续三年带着他在清明节到滹沱河北岸的伍仁桥请人针刺耳腕治病。1946年冬天,孙犁在饶阳县一个农村编《平原杂

收稿日期:2023-10-11

作者简介:程燕(1976—),女,河南原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礼仪、中国现当代文学。

志》,“有一天,我的叔父有事找我去,见我一个人正蹲在炕沿下,烤秫秸火取暖,活像一个叫花子,就饱含着眼泪转身走了”^{[2]251}。看似日常生活琐屑之事,却折射出了叔侄之间的浓厚感情。

根据萨提亚的“家庭关系”理论,结合阅读孙犁相关文本中出现的家庭成员,笔者尝试绘制了孙犁的原生家庭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勾勒还原其家庭谱系,了解其成长过程中影响他的那些人与事。

孙犁原生家庭谱系图



图1 孙犁原生家庭谱系图

从孙犁的原生家庭图中,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息:1. 孙犁的原生家庭父亲虽然在位,但却常年退位缺席。2. 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均于幼年夭折,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孩子,可谓掌上明珠。3. 表姐寄居孙家,幼年孙犁,母亲、表姐陪伴时间较多。4. 叔父扮演了“代父”角色,参与孙犁的成长。

孙犁在原生家庭中的0-18岁简要年谱

1. 1913年5月11日(农历四月初六), 降生于一户农民家庭。
2. 1919年, 6岁, 开始于本村小学洋学堂读书, 引发对文学的兴趣。
3. 1924年, 11岁, 随父到安国县上高级小学, 开始接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
4. 1926年, 13岁, 投考保定第二师范学校, 未被录取; 投考保定育德中学被录取。
5. 1927年, 14岁, 订婚。
6. 1928年, 15岁, 因年幼想家, 休学一年。
7. 1929年, 16岁, 寒假后复学, 当年结婚。并发表小说《自杀》, 这是目前能查到的孙犁最早发表的作品。
8. 1930年, 17岁, 发表小说《弄儿》等作品。
9. 1931年, 18岁, 对文艺理论产生兴趣, 广泛接触马列经典著作, 大量阅读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及译注。

图二 孙犁在原生家庭中的0-18岁简要年谱

从图二“孙犁在原生家庭的0—18岁简要年谱”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年龄较小时,他即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6岁成婚,除了母亲与表姐外,又增加了发妻这样一个体贴他冷暖的女性;在原生家庭里,孙犁虽不缺乏来自家人的疼爱,但因为独子缘故,孤单之情在所难免。于是,原生家庭的那些生

活经验和记忆深深地镌刻于心间,日渐影响着他的气质与人格的养成,并以契合的文学风格遥相呼应。

二、忧郁——原生家庭对孙犁气质的影响

在西方,“忧郁”这一概念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体内的黑色胆汁比重过多时,忧郁便极易形成,忧郁之人通常表现为内向腼腆、多愁善感、小心谨慎。

除了在医学界外,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也涉及“忧郁”。谈及忧郁,它似乎天然地与文学是近亲,天然地与作家存在着亲密的联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忧郁是神圣的疾病,凡在哲学和艺术上出类拔萃者都有忧郁的特质,甚至有忧郁症。17世纪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伯顿曾说,忧郁是凡人之特性,芸芸众生天性中皆难免忧郁之情。忧郁既是一种精神疾病,也是一种气质。万千世界,一个人,一朵花,一棵草,一幅画,一篇文,各有其无可替代的气质。对于孙犁而言,忧郁是鲜明的标签,但不是消极遁世的态度,相反,它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感悟力。正如学者路文彬所言,“忧郁始终是一种主体在场的自觉意识,麻木永远与它无缘……快乐趋向于肤浅与遗忘,忧郁则趋向于高贵和救赎”^{[4]96}。

提及孙犁,无法略过以下众皆熟知的评价:1.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2. “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与代表作家。3. 文笔舒缓,文风清丽。大众视野中闪现的是一位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杰出作家,却鲜知他还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在近九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他一直在艰难地与抑郁症抗衡。孙犁的抑郁症,或许和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原生家庭父爱的缺失,二是自幼体弱多病的体质,三是外界事件的刺激。

孙犁的父亲16岁时就前往安国县“永吉昌”当学徒,从打算盘的学徒到管账先生,再到当上掌柜,“他在这里住了四十年,每年只回一次家,过一个元宵节”^{[3]7}。漫长的日子里,陪伴着孙犁的只有母亲。1924年,11岁的孙犁方跟随父亲前往安国县城读书。“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里,发生越早的动力,其影响力就越大。这种影响通常会有一个关键期,如1岁、3岁、6岁、12岁等。”^{[1]54}在原生家庭中,谁离孩子越近谁的影响就越大。在孙犁成长的关键时期,父亲几乎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母亲浇铸的是爱,父亲给予的是力量。父亲的陪伴可以帮助孩子塑造自信、勇气、决断力等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特征。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父亲扮演着鼓励者和支持者的角色,会给孩子带来积极的能量,帮助孩子克服胆怯、畏惧和焦虑的情绪。父亲的陪伴也能够直接

影响孩子的精神世界,决定其成年后是否健康。一项关于抑郁症的发病率研究发现,家庭中父亲参与度较低的孩子,发病率是和父亲关系好的孩子的3倍。孙父的缺席,使父子情感未得到有效链接,使成长期的孙犁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真切感受到父爱与支持,相应的,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忧郁之情累积于胸,进而外显于气质。

孙犁从小体弱多病,幼时即患有“抽风”,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时头部、下巴,不由自主地抖动,这种病现在归之为抑郁症。在保定上学期间,他又患上神经衰弱。后来,最严重的一次,是1956年3月的一天午睡起来晕倒,“跌在书橱的把手上,左面颊破了半寸多长,流血不止”^{[2]253},这对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养病生活。多年来,孙犁被神经衰弱所困扰,发病严重时会眩晕、跌倒,无法读书和写作。对于自己的状况,孙犁有着清醒的认知,在写给肖复兴及其他友人的信中,他曾坦然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情绪时常不稳定。天气的阴晴变化也会影响他心境的变化,孙犁曾自述:“如果是阴天,再下点小雨,我就有不想活的念头。”“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还是比较贫穷,从小我没有奶吃,很弱,弱了大概就很容易得这种病;另外,乡下不大讲卫生,脐带剪的时候,或者是营养不良,都可以引起小孩的抽风。这个病对我以后的神经系统可能留下一些毛病。所以,一九五六年就得过一次很严重的神经衰弱,在这以前,我就经常失眠,经常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症状,那年突然就重了。直到现在,我感觉,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病。它可能对写作也有些影响。生理上的这种病态,它也可能反映在我的写作上,好的方面它就是一种敏感,联想比较丰富,情绪比较激动。”^{[5]87}生理疾病影响的不仅是身体健康,更是心理和精神上的痛苦。长期饱受疾病的困扰,孙犁经常感受到莫名的苦闷与忧郁,性格也敏感内向、多愁善感。

此外,来自外部的其他诱因,催生并加剧了他的抑郁症。“1947年11月,中共冀中区党委召开土地会议。在本次会议上,孙犁的作品《一别十年同口镇》《织席记》《新安游记》同时受到批判;土地会议后,孙犁到饶阳县张岗小区搞土改。去时遇大风,飞沙扑面,俯身而行,到村后剪去长发,意思是剪去烦恼。”^{[6]3}同时,孙犁因家中被划为“富农”,影响到心情,每日穿着草鞋,在大街上来回走动,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1948年1月10日,《冀中导报》发表文章,对孙犁作品进行了不顾事实的无端

攻击,接二连三的遭际,几乎置孙犁于死地。此后屡年经历的种种不顺意,都使孙犁精神极度紧张、焦虑,严重到彻夜难眠,甚至有强烈的自杀念头与行为。晚年孙犁更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拒绝社交。“先天的气质类型、后天的生活遭遇再加上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诱发事件,所有这些都使得孙犁成为一个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尽管文学创作一度曾让孙犁求得解脱并得到人生升华,但他最终还是被抑郁症无情击倒、黯然谢幕。”^{[7]77}

在原生家庭中,倘若孙犁幼年时期能与父亲朝夕共同生活,来自父亲的爱能给他以阳刚之力,其气质也许会发生转化。但也正是因了这份与文学紧密缠绕的忧郁,成就了日后笔耕不辍、荷香四溢的孙犁。

三、谦和——原生家庭对孙犁人格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到:“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无论古今,来自原生家庭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与发展都息息相关,原生家庭中父母的言传身教都会在细水长流的日子中被子女模仿和习得,并养成相应的性格与人格。性格测试中,常以E、I、S、N、T、F、J、P这七个类型作测试,它们分别对应的含义为:E(Extraversion)外向、I(Introversion)内向、S(Sensing)实感、N(Intuition)直觉、T(Thinking)思维、F(Feeling)情感、J(Judging)判断、P(Perceiving)感知。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以上七个维度的呈现均不同程度地受着原生家庭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苏珊·福沃德在其著作《原生家庭 如何修补性格缺陷》中提及:“不健康的家庭体系,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其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8]5}有缺陷的原生家庭,对孩子的人格养成,将会是灾难性的,并会贯穿一生乃至代际传递。“父母在我们心里种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种子。它们会随我们一同成长。在有些家庭里,父母种下的是爱、尊重和独立,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则是恐惧、责任或负罪感”^{[8]5}。毫无疑问,孙犁的原生家庭给他植根的是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

“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心理共同体,每个家庭都笼罩着一种心理氛围。家庭的心理氛围体现着家庭内部的一种稳定的、典型的、占优势的情绪状态。”^{[9]68}不同的家庭氛围会塑造不同的个体性格,家庭氛围祥和、民主,孩子性格也会趋于平和、热情、易于接近;倘若家庭经常充斥争吵、打闹,孩子性格则会偏于暴躁、冷漠、喜怒无常。父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任老师,子女在这个场域中耳濡目染,这种习得的“烙印”会深入骨髓影响终身。孙

犁的原生家庭氛围、父母性格、教育理念、为人处世的方式对他的个体性格塑造都有极大关联。孙犁的父亲是乡村小知识分子,行为颇有古雅之风,当年在安国县当学徒,每年返回家中时,他总在出城以后才坐上家里人接他的牛车;沿途路过的村庄,他必定会下车和熟识的人们打招呼;他去当学徒是由本村的一位吴姓山西人介绍的,因而他对这位介绍人一直尊敬有加,每逢家里改善伙食,总会把他请过来,让在正座;他的脾气极好,从不打骂或指责孙犁。在孙犁很小的时候,母亲教导他“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到了晚年,他还对此记忆深刻,“我一直记着这两句话。自己一生,就是目前,也不能说没有冤苦,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告状,打官司”^{[10]77}。从孙犁父母身上,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作为农民的朴实、隐忍,还有燕赵之地人民的硬气。

父亲的温厚有礼、母亲的朴素热心,都影响着孙犁的人格形成。1972年夏天,孙犁女儿孙晓玲跟随他回了一趟河北省安平老家。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父亲就让停车,轻声对她说:“下来吧,走着去!”^{[11]59}谦和有礼,在孙家父子身上,代际传递。

生活中,孙犁恪守传统道德精神:孝顺父母、忠于妻子、淡泊名利。父亲去世时,他还想过要为父亲立碑,并请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简短的碑文;个人情感上,他和发妻相敬如宾,虽然他有几次不期而遇的心动,但他都运用理智及时地将其止于萌芽状态,以发乎情、止于礼的方式对待;交际上,他恬淡平和,沉默寡言,不喜热闹,他曾说:“我不善于谈话,见面恐使你失望,写信最好”^{[10]345};对待名利,淡然处之,不争不抢,孙犁说:“我有个难改的毛病,什么事都不愿往上挤,总是靠后站。”^{[12]50}这也使得他能够以清醒和独立的态度审视世间百态,不盲从潮流,以极具魅力的谦和人格感召着一批批文学爱好者及作家。

四、婉约——原生家庭对孙犁文风的影响

对于作家而言,原生家庭的形态、模式会影响着其记忆,并在创作中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迹。孙犁幼年,陪伴他更多的是母亲。此外,还有一个幼年丧母的表姐随同他们生活,由孙犁的母亲将其抚养成人。11岁这年,因为读书,孙犁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为了照顾孙犁,母亲和表姐在半年以后也到了安国县。他们一家借住于一户胡姓人家闲置的院子,胡姓男女主人是孙犁的干爹干娘,当时干爹已去世。干娘家有一位女儿,这位干姐给孙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皮肤白皙、容貌秀丽、性格开朗,擅刺绣和画桃花,对孙犁既热情又爱护。在男权话语主导的乡村家庭结构中,作为男性代表“强者”的父亲形象缺

失,而作为“弱者”一方的女性在操持着家庭的运转,在如此偏女性的家庭环境中,较易助长孙犁形成阴柔大于阳刚之气的性格。

刘勰认为,作家才情受“血气”影响:作家“俊发”故“文洁而体清”,“傲诞”故“理侈而辞溢”,“沈寂”故“志隐而味深”,“简易”故“趣昭而事博”,“气褊”故“言壮而情骇”,“隽侠”故“兴高而采烈”,“矜重”故“情繁而辞隐”^{[14]479}。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论及“文以气为主”。两位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气”与创作的关系,气指作家的个性,也指个性在创作中的表现,作家先天的气质、性格、秉赋与他的审美情趣及其风格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不难推断,原生家庭影响了孙犁的气质和人格,进而影响到了他的整体创作风格。早在1929年,16岁的孙犁就开始创作,10月份,他的小说《自杀》发表于《育德月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日寇烧杀抢掠,人民流离失所。彼时,更多的文人选择了宏大主题叙事去表现战争,表现战士与民众同仇敌忾、大无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而孙犁却从一条幽林小径,以别样的视角实践文艺的民族大众化。

孙犁的小说多以短篇为主,创作背景几乎都是围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军民艰苦的斗争生活展开。他用异于主流叙事的笔触,刻意规避战争的腥风血雨,淡化苦难和重负,从日常事、儿女情展现了乡土中国滹沱河畔人民保家卫国的乐观与大无畏精神。民族战争的音谱,弹奏出的不仅有苍凉悲壮的号角之音,还有孙犁的悠扬清婉牧笛之音。孙犁以独具个人特质的诗意抒情音调,吟唱出了一曲同样动人的弦歌,他“将通俗和优美、简练和细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15]403}。“大江东去浪淘尽”是一种豪放之美,“春花秋月何时了”是一种婉约之美,孙犁创作的婉约之美在战时背景之下,或许有些落落寡合,但又于不经意间开辟出另一种文学叙事空间,摆脱了当时的既定程式化的写作,赢得文人与大众读者的青睐。丁玲在给孙犁的一封信中曾经说:“你的文章我是喜欢的,含蓄、精炼、自然、流畅。人物、生活,如同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带着淡淡的颜色摆在读者面前。”^{[15]106}这样一幅跨越百年的清新风景画,历久而弥新。

孙犁生活在一个没有禁忌和约束的家庭中,在民主氛围中,他的思想得以充分自由的发展。孙犁几乎是由母亲一手带大,深得母亲宠爱。“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道村边的场院小屋里。

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2]48}摘花,表现了女性对美的先天热爱;送花,反映了母亲对孩子的舐犊情深,母亲在用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早年生活中,因身边更多的是女性亲属的陪伴,故当他投身革命时,在戎马征战岁月中,他的先天气质似乎也天然地与处于弱势一方的女性相投合,因之他把较多的笔墨集中于女性人物的塑造与刻画上。孙犁有一支擅写女性的魔法笔,在他的笔下,徐徐展开一组组个性迥异而鲜明的女性人物画卷:有宛如荷花仙子温柔多情、体贴细致、识大体的水生嫂们,她们不仅主动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又积极参与战斗,充分彰显出了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时期的新型女性之美,她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清新柔美,生动传神;有如罌粟花般妖娆妩媚的小满们,她们相貌姣好但作风不端,她们能言善辩、聪明有余但智慧不足,不能以单一的价值标准评判这些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女性。“《铁木前传》中的小满这一形象内涵复杂,远非传统乡村伦理可以涵盖。它体现了孙犁对乡村文化的超越,是现代精神对乡村文化的投射。”^{[16]63}

五、结语

被频频用于心理学领域的原生家庭概念,为疗愈心灵创伤提供了新思路。在原生家庭理论视角的观照下,孙犁的研究也许可寻觅到一种新路径,以此探寻出他忧郁气质、谦和人格、婉约风格的源起。正是他的这种颇具“异质性”的作家主体性表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烽烟四起到和平年代,他手执现实主义之笔,传承深厚的传统和本土文化底蕴,跨越了不同的时期,从历史深处向我们缓缓走来。

参考文献:

- [1] 沈家宏. 原生家庭:影响人一生的心理动力[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2] 孙犁. 孙犁全集(第7卷)[M]. 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3] 郭志刚,章无忌. 孙犁传[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
- [4] 路文彬. 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忧郁气质问题[J]. 天津社会科学,2002(2).
- [5] 孙犁. 孙犁全集(第9卷)[M]. 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6] 段华. 孙犁年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 [7] 史飞翔. 忧郁的孙犁[J]. 民主与科学,2018. 4.
- [8] 苏珊·福沃德,克雷格·巴克. 原生家庭 如何修补的性格缺陷[M].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 [9] 李宜英,牛余凤. 浅析原生家庭之伤[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9,28(10).
- [10] 孙犁. 孙犁全集(第8卷)[M]. 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11] 王锦慧. 父亲的作品里有母亲的身影:访孙犁女儿孙晓玲[J]. 党建,2012(2).
- [12] 孙犁. 孙犁全集(第5卷)[M]. 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13] 周勋初. 文心雕龙解析[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 [1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5] 孙犁. 孙犁全集(第6卷)[M]. 修订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16] 贺仲明. 孙犁:乡村心灵的无声浸润[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1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Viewing Sun L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al Family Theory

CHENG Yan

(College of Media,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na 453007, China)

Abstract: As a writer who writes with a true feeling, Sun Li and his works are under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his native family. His father's gentleness and his mother's enthusiasm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Sun Li's humble personality. The weakness and sickness of his childhood, the absence of his father in his youth, and the stimulation of external events after his adulthood, generated and intensified Sun Li's melancholy feeling, shaped his sensitive nature, and even plagued him with depression for a long tim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melancholy feeling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literature, Sun Li became a famous writer in the fresh and gentle style of "Baiyangdian".

Key words: Sun Li; original family; melancholic temperament; humble personality; gentle writing style

社交媒体环境下 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认同和叙事传输的双重视角

纪 炆¹, 常泽辉¹, 邵丹萍²

(1. 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2. 湖北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0)

摘 要:在社交媒体成为企业主流沟通媒介的背景下,依据社会认同和叙事传输理论剖析 CSR 叙事影响组织吸引力的作用机制及情境条件。通过试验设计,以中部 5 所高校毕业生为调查对象,采用 Bootstrap 中介检验方法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CSR)叙事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正向影响,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且当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时,CSR 叙事会增强求职者组织认同和心理传输,进而提高组织吸引力。这也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实施更有效的 CSR 沟通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叙事;组织吸引力;社会认同;叙事传输;社交媒体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4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23-07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并用“八个坚持”精辟概括了党和国家在人才工作方面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其中之一就是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如何汇聚高素质人才以建立竞争优势就成为新时代企业面临的重大议题。组织吸引力是指求职者将组织视为理想工作场所且期望与其建立关系的意愿程度,是组织成功吸引人才的关键^[1]。为了提高组织吸引力,企业必须通过特定渠道将自身信息传递给求职者^[2]。在企业众多信息传递活动中,企业社会责任(CSR)沟通受到学者的持续关注。对于 CSR 沟通,信息内容的选择与信息建构方式都至关重要^[3]。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 CSR 沟通的内容层面探讨其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缺乏对 CSR 信息建构方式的考察。

叙事,亦称“讲故事”,是对一段时间内相关事件的系列描述,是沟通过程中基本的信息建构方式^[4-5]。传播学和心理学文献指出,叙事可以使受众与故事主角建立情感联系从而产生认同,还能够使受众沉浸其中引发传输效应,由此促发受众转变态度与行为^[5-6]。在公共关系领域,企业叙事沟通在吸引受众、构建关系和塑造声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6]。叙事也成为 CSR 沟通的有效方式^[7]。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逐渐演变为企业招聘和 CSR 沟通的主力工具^[3,8]。且相较传统媒介,社交媒体具有互动示范性,有助于信源和受众的双向沟通,而信源的对话导向决定了该潜能的现实运行^[4]。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社交媒体环境从信息建构层面深化了 CSR 沟通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研究,拓展了企业叙事沟通的研究领域,从社会认同和叙事传输两个视角探究社交媒体中 CSR 叙事对

收稿日期:2023-10-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动动机模型的正念对员工韧性影响机理研究”(72102065)
作者简介:纪炆(1984—),男,湖北十堰人,博士,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吸引力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所起的调节作用,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实施更有效的 CSR 沟通提供了新思路。

一、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一) CSR 沟通对求职者的影响

CSR 是企业在考虑利益相关者期望和经济、社会、环境绩效三重底线的基础上所付诸实施的特定行为与政策^[9]。根据内容不同,学界通常将 CSR 划分为内部 CSR(员工关怀、员工多样性等)和外部 CSR(社区关系、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等)。Turban 等^[10]最早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员工关怀和产品维度的 CSR 会增强组织吸引力。此后,学者们分别从 CSR 总体表现或 CSR 具体内容如雇员、顾客、社会公众福利等两个角度肯定了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11-13]。其中有少数学者还进一步分析了两者间的作用机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张麟等^[14]试验研究表明,CSR 沟通会增强求职者的预期自豪感进而吸引求职者应聘。依据信号理论,Albinger 等^[15]研究指出,公司声誉在 CSR 沟通与组织吸引力间起中介作用。^[11]此外,有研究从人与组织匹配的视角发现,CSR 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正向关系在就业选择多的人群中表现得更强。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对有志愿者经历的求职者更具吸引力^[1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传统媒介下 CSR 沟通内容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对沟通过程中的社交媒体运用及其他因素关注甚少。同时,尽管绝大多数研究证实了 CSR 沟通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但也存在不一致结果。Story 等^[17]就发现,外部 CSR 沟通并不会影响求职者对该公司的申请意愿。Dawkins 等^[18]跨国比较研究还表明,黎巴嫩、美国的 CSR 沟通会对求职者产生吸引力,在中国却并非如此。

(二)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

叙事主要包含人物、情节、背景、事件、时间顺序等结构性要素^[19]。在形式上,CSR 叙事也涉及这些要素,但对它们的呈现存在详略差异。同时,出于自利动机,企业会倾向于传递积极的 CSR 信息。信号理论认为,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信息劣势。在进入企业前,它们对目标企业知之甚少,因而会依赖可得信息来推断企业未知特征。CSR 叙事向求职者至少传递了两方面信号,并且 CSR 叙事越详细,其向求职者传递的信号也就越强烈。一方面,企业对员工、社区、环境等承担的多种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赢利能力。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企业创建诱人的工作条件和薪酬福

利的前提,这会极大增强求职者在丰厚物质回报层面的期望^[10,12]。另一方面,CSR 也彰显了企业信奉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尤其是企业在员工关怀方面的内部责任会使求职者认为员工在企业是被善待和尊重的^[13]。现有研究发现,期望的高物质收益和人道性对待均会对求职者产生更强吸引力^[20]。

此外,CSR 叙事还增强了 CSR 信息的可靠性。叙事会借助令人信服的情节使受众沉浸其中,从而降低了受众对叙事要素的审查与质疑。Xu 等^[7]研究表明,CSR 叙事会降低公众对 CSR 信息的怀疑。由此,更详细的 CSR 叙事对求职者的判断决策影响更大。不仅如此,Boukes 等^[6]还发现,CSR 叙事越详细,公众就越会对企业表现出与叙事一致的态度。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1:

H1:CSR 叙事越详细,其对组织吸引力的正向影响就越大。

(三) 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在个人与认同对象建立联系并以其特征来定义自我的过程中,认同主要源自不确定性缩减、自我提升以及亲密与归属 3 方面需求动机。^[21]CSR 叙事有助于求职者对目标企业产生认同。首先,CSR 叙事越详细,CSR 信息包含的人物、背景、行为等要素就越丰富,求职者依此来正确推断企业其他特征的可能性就更大。其次,越详细的 CSR 叙事越能够塑造良好的企业声誉,这会提高求职者进入企业后获得的积极自我概念的预期。张麟等研究发现,CSR 沟通会增强求职者的预期自豪感^[14]。最后,员工关怀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叙事也增强了求职者进入企业后会被尊重和重视的预期^[13,15]。

由上可知,求职者对目标企业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基于 CSR 叙事而对企业产生的良好预期。为了维持这种认同,求职者必须要向企业申请职位。Araujo 等^[4]指出,CSR 叙事能够提高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水平。而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购买意愿与忠诚度会随着组织认同的增强而提高^[22]。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者类似于消费市场中的消费者。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

H2:CSR 叙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正向影响。

(四) 求职者传输的中介作用

传输是指个体沉浸于故事情节而忘掉了周围世界的状态。叙事传输包括情绪反应、心理意象和放弃获取真实世界的信息^[5]。越详细的 CSR 叙事越能够使求职者产生传输反应。首先,根据扩展的传

输—意象模型,清晰逼真的故事情节可以使受众与故事中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23]。其次,心理意象是个体对感知到的信息在头脑中视觉再现的过程。以往研究表明,叙事和更具体的信息内容可以提高受众的加工流畅性^[24],而更高的加工流畅性会触发更强的心理意象^[25]。最后,Xu等^[7]认为,CSR叙事让受众在认知和情感上都沉浸于故事,而不会去额外寻找证据。显然,CSR叙事越详细,受众就更能被故事情节所吸引。叙事传输理论指出,当受众沉浸于故事时,他们的态度和意愿就会向叙事期望的那样转变^[26]。Boukes等^[6]研究发现,越详细的CSR叙事会使社会公众产生更强的传输,进而促使受众对企业的态度与企业预期一致。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CSR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正向影响。

(五)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作用

与传统媒介相比,社交媒体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互动示范性,即它可为沟通双方提供对话的机会^[4]。然而,由于存在信息失控、资源约束等顾虑,企业通常还是以单向沟通为主。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是企业在利用社交媒体沟通的过程中愿意同他人交流观点和意见的倾向^[27]。社交媒体对话沟通有助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构建^[27],也改进了CSR叙事对求职者组织认同的影响过程。一方面,企业与求职者进行在线对话有利于求职者获得更多具体信息,这也是求职者辨识其接触到的CSR信息真伪的途径,由此求职者推断企业其他特征的不确定性降低。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回应求职者,这显示了企业对求职者的尊重与重视,从而满足了求职者亲密与归属的需要。同时这也更加强化了求职者通过CSR叙事产生的员工关怀方面的预期。

企业通过社交媒体与求职者保持对话沟通也强化了CSR叙事对求职者传输的影响。第一,企业与求职者在线对话有助于提高求职者对企业及其信息包括CSR信息的关注。且受众关注有助于叙事传输的产生^[23]。第二,企业在线对话使求职者更易沉浸于CSR叙事。Yang等^[28]认为,组织在危机沟通中与公众在线对话可以降低公众的负面情绪,也提高了公众的信息卷入水平。此外,Araujo等^[4]指出,社交媒体对话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CSR沟通的信任感。对求职者而言,企业在线对话提高了CSR叙事在求职者眼中的可靠性。根据以上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在CSR叙事与组织

认同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5: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在CSR叙事与求职者传输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6: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组织认同在CSR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作用。

H7: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求职者传输在CSR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的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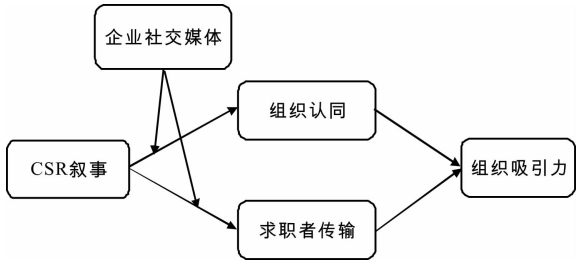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二、研究方法

(一)试验设计与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2×2组间因子试验来获取数据。试验对CSR叙事(详细vs.简略)和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对话沟通vs.非对话沟通)进行操控。试验通过问卷星平台完成。试验对象由来自华中地区5所本科院校的大四和研三学生构成。在有关院校多个辅导员的帮助下,研究共招募学生志愿者465名,继而借助QQ、微信向志愿者随机发送试验二维码。志愿者在扫描二维码后首先是要确认试验参与意愿,不愿意参与的直接结束试验。同意参与的则先填写基本信息,而后接收到一则虚拟的企业微博CSR叙事帖文截图。阅读之后,志愿者进行量表作答。为抑制问卷调查中的晕轮效应,问卷将因变量量表排列在前,其他变量量表放置在后。问卷中还包含一个注意力核查项即“你是否记住了刚刚浏览的微博信息的主题”。最后,剔除16份核查回答为“否”的问卷和前后填答完全一致的27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422份。其中:男生193人(45.73%);平均年龄22.83岁;本科毕业生308人(72.99%);有3个月以上实习经历的354人(83.89%);理工类专业学生178人(42.18%),文史类学生215人(50.95%),其他类学生29人(6.87%)。4种试验场景中的志愿者人数分别为105人(详细+对话沟通)、112人(简略+对话沟通)、98人(详细+非对话沟通)、107人(简略+非对话沟通)。

(二)试验刺激材料

为保证外部效度,CSR叙事主题和要素取自农

民日报社发布的《2022 中国企业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年度案例》。试验材料展现了东部某企业助力西部某乡村发展特色种植并引导产业形成、村民就业和参与村貌改造的故事。为降低干扰因素,材料对企业名称作了虚拟化处理。CSR 叙事详细版和简略版在主题上统一,而在要素描述上存在差异。详细版中有该村村情的描述、村民代表的身份信息、代表性事件的关键过程等,而简略版中对村情和代表性事件仅概括性提及,同时还省去了村民代表的身份信息。

为了操控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我们在 CSR 叙事帖文后附了 3 个用户的评论内容,内容涉及种植品用途、产业潜力、地理交通路线等。在对话沟通的材料中,企业对这些用户的问题都做了认真回复;而对话沟通的材料中并没有企业回复的内容。

(三) 操控检查

参考 White 等^[29]研究,采用 3 个题项对 CSR 叙事进行操控检查,代表性题目如“帖文对企业行为做了具体描述”。参考 Yang 等^[28]研究,使用 2 个题项对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进行操控检查,代表性题目如“企业在努力回应用户感兴趣的问题”。题项均为 1~5 级李克特式(1 表示强烈不同意,5 表示强烈同意)。运用 SPSS 25.0 进行两轮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CSR 叙事的分析结果显示,志愿者对两种版本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F(1, 420) = 107.53, p < 0.001, \eta^2 = 0.49$),且详细版 CSR 叙事得分均值更高($Mean_{\text{详细}} = 4.17$ vs. $Mean_{\text{简略}} = 2.06$);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分析结果显示,志愿者对两种版本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F(1, 420) = 88.25, p < 0.001, \eta^2 = 0.36$),且对话沟通得分均值更高($Mean_{\text{对话沟通}} = 4.03$ vs. $Mean_{\text{非对话沟通}} = 1.94$)。因而,研究对两个变量的操控可靠有效。

(四) 变量测定

1. 组织吸引力。该变量的测量采用 Highhouse 等^[30]开发的总体吸引力量表,共 5 个 1~5 级李克特式题项(1 表示强烈不同意,5 表示强烈同意),代表性题目如“对我而言,该公司将是一个工作的好地方”。量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 0.91$, 均

值(Mean)为 3.30,标准差(SD)为 1.29。

2. 组织认同。参考 Yang 等^[28]研究,使用 4 个 1~7 级李克特式题项(1 表示强烈不同意,7 表示强烈同意)测量该变量,代表性题项如“我认为在该公司工作能让我成为理想的自己”。量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 0.92, Mean = 4.58, SD = 1.64$ 。

3. 求职者传输。参考 Green 等^[5]研究,该变量采用 4 个 1~7 级李克特式题项(1 表示强烈不同意,7 表示强烈同意)测量,代表性题项如“在我阅读帖文时,我没有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量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alpha = 0.87, Mean = 4.37, SD = 1.85$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主效应

以组织吸引力为因变量,CSR 叙事为因子,ANOVA 结果显示: $F(1, 420) = 95.62, p < 0.001, \eta^2 = 0.35$ 。这表明 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详细版 CSR 叙事场景下组织吸引力均值为 4.33,而简略版 CSR 叙事场景下组织吸引力均值为 3.08,这进一步说明越详细的 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正向影响越大。由此,H1 获得支持。

(二) 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的中介效应

为检验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使用 Hayes^[31]开发的 SPSS - Process 3.3 程序的 Model 4 进行分析。表 1 展示了经 Bootstrap 抽样 5000 次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CSR 叙事对组织认同($\beta = 0.452, p = 0.001$)和求职者传输($\beta = 0.387, p = 0.000$)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Bootstrap 抽样的间接效应结果显示,CSR 叙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0.273,置信水平 95%的置信区间为[0.082, 0.495];CSR 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0.187,置信水平 95%的置信区间为[0.048, 0.526]。因此,H2 和 H3 得到证实。由于 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主效应为 0.084($p = 0.452$),故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 1 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组织认同				求职者传输				组织吸引力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CSR 叙事	0.452(0.126)	0.001	0.259	0.591	0.387(0.104)	0.000	0.252	0.476	0.084(0.097)	0.452	-0.045	0.183
组织认同									0.603(0.175)	0.001	0.374	0.866
求职者传输									0.484(0.202)	0.008	0.296	0.635
	$R^2 = 0.28$				$R^2 = 0.23$				$R^2 = 0.31$			
	$F(1,420) = 68.44, p < 0.001$				$F(1,420) = 53.82, p < 0.001$				$F(3,418) = 108.47, p < 0.001$			

注: β 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下括号内数值为系数标准误。Bootstrap 抽样量为 5000。

（三）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作用,研究使用 Hayes^[31] 开发的 SPSS – Process 3.3 程序的 Model 7 进行分析。表 2 展示了经 Bootstrap 抽样 5000 次的回归结果。从中看出,CSR 叙事与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对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352 ($p = 0.001$)、0.229 ($p = 0.003$),这表明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在 CSR 叙事与组织认同,以及 CSR 叙事与求职者传输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H4 和 H5 得到证实。Bootstrap 抽样的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在对话沟通情景下,CSR 叙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表 2 关于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因变量											
	组织认同				求职者传输				组织吸引力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β	p	LLCI	ULCI
CSR 叙事	0.427(0.134)	0.001	0.233	0.558	0.351(0.109)	0.001	0.225	0.434	0.084(0.097)	0.452	-0.045	0.183
对话导向	0.204(0.081)	0.011	0.097	0.386	0.158(0.067)	0.014	0.085	0.301				
组织认同									0.603(0.175)	0.001	0.374	0.866
求职者传输									0.484(0.202)	0.008	0.296	0.635
CSR 叙事 * 对话导向	0.352(0.106)	0.001	0.216	0.497	0.229(0.078)	0.003	0.102	0.425				
$R^2 = 0.37$				$R^2 = 0.34$				$R^2 = 0.31$				
$F(3,418) = 81.76, p < 0.001$				$F(3,418) = 70.65, p < 0.001$				$F(3,418) = 108.47, p < 0.001$				

注: β 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回归系数下括号内数值为系数标准误。Bootstrap 抽样量为 5000。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和叙事传输理论,本研究探讨了 CSR 叙事影响组织吸引力的双重路径,并考察了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的调节作用。以毕业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试验设计共获得 3 方面结论。第一,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产生正向影响。CSR 叙事越详细,企业就越能够吸引求职者前来应聘。第二,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第三,企业社交媒体导向在 CSR 叙事与组织认同以及 CSR 叙事与求职者传输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当企业表现出较高的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时,CSR 叙事会增强求职者组织认同和心理传输进而提高组织吸引力。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 3 个方面。首先,从信息建构方式的角度验证了 CSR 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正向影响,这是对 CSR 沟通与组织吸引力关系研究的深化,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以往国内外研究均是从 CSR 沟通的内容方面探讨其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但并没有关注 CSR 信息的建构方式。而且,已有研究对中国情境下 CSR 沟通

1.441,置信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为[0.798, 2.035];CSR 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0.700,置信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为[0.367, 1.054]。而在非对话沟通情景下,CSR 叙事通过组织认同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0.379,置信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为[-0.102, 0.614];CSR 叙事通过求职者传输对组织吸引力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值为 0.308,置信水平 95% 的置信区间为[-0.088, 0.571]。综上说明,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组织认同和求职者传输在 CSR 叙事与组织吸引力间的中介作用。于是,H6 和 H7 也得到证实。

与组织吸引力的关系探讨还存在结论不一致。本研究为两者关系提供了更多中国素材。其次,从社会认同和叙事传输两个角度揭示了 CSR 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机制。以往研究主要从社会认同视角考察 CSR 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还基于叙事传输理论发现求职者传输是 CSR 叙事影响组织吸引力的另一机制,这是对现有研究的拓展。最后,着眼于社交媒体环境并从互动示范性的角度探究了企业社交媒体对话导向所起的作用。以往研究聚焦传统媒介环境下 CSR 沟通对组织吸引力的影响,并没有关注数字技术对 CSR 沟通的影响。社交媒体不仅成为企业沟通的重要工具,也极大地塑造了企业 CSR 沟通实践。本研究是对企业 CSR 沟通新变化的一个很好的理论关照。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改进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 CSR 沟通效果有一定的启发。一方面,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存在正向影响。要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企业需要将 CSR 行动与沟通机制加以融合。在 CSR 沟通活动中,企业不仅要重视 CSR 沟通的内容选择,还要注重 CSR 内容的信息建构方式。叙事是 CSR 沟通值得采用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企业社

社交媒体对话导向调节了 CSR 叙事对组织吸引力的作用机制。企业日益倚重社交媒体进行内外部沟通。然而,企业在经营实践中更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单方面发布信息。我们的研究提示企业及其管理者: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 CSR 沟通时,企业应该以开放的姿态与用户保持对话,这样方能更好汇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 [1] Aiman – Smith L, Bauer T N, Cable D N. Are you attracted? Do you intend to pursue? A recruiting policy – capturing study[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01 (2) : 219 – 237.
- [2] Hoye G V, Lievens F. Recruitment – related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Can something be done about negative public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 2005(3) :179 – 187.
- [3] Wang R X, Huang Y. Communicat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on social media [J]. *Corporation Commun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8(3) :326 – 341.
- [4] Araujo T, Kollat J.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about CSR on Twitter[J]. *Internet Research*, 2018(2) :419 – 431.
- [5] Green M C, Brock T C.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persuasiveness of public narrative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5) :701 – 721.
- [6] Boukes M, LaMarre H L. Narrative persuasion by corporate CSR messages: the impact of narrative richness on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via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message credibility [J/OL].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21 (5) .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21.102107>.
- [7] Xu S F, Kochigina A. Engaging through stories: Effects of narratives on individuals’ skepticism towar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fforts [J/OL].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21 (5) .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21.102110>.
- [8] Johnson A F, Roberto K J, Hartwell C J, et al. A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framework for applicant attraction and retention [J]. *Social Media Congruence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2023(1) :104 – 122.
- [9] Carroll A B, Shabana K M. The business case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review of concep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12) : 85 – 105.
- [10] Turban D B, Greening D W.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to prospective employe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 : 658 – 672.
- [11] Tien Thanh P, Thu Ha N, Thi Hong Ngoc P, et al. Corporate

-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intention to apply for a job: Evidence from student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J/O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Analysis*, 2023.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IJOA-11-2022-3484/full/html>.
- [12] Lin C P, Tsai Y H, Joe S W, et al.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rceived corporate citizenship, firms’ attractiveness, and career success expecta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2(1) :83 – 93.
- [13] Zhang Q Y, Cao M, Zhang F F, et al.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A signaling perspective [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2019(1) :20 – 34.
- [14] 张麟, 王夏阳, 陈宏辉, 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求职者会产生吸引力吗?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5) :116 – 130.
- [15] Albinger H S, Freeman S J.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attractiveness as an employer to different job seeking popul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0(3) :243 – 253.
- [16] Choi B K, Moon H K, Joo Y R. Who is attracted to socially responsible organizations? Roles of job applicants’ volunteer experience and motives [J]. *Balt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5) :817 – 836.
- [17] Story J, Castanheira F, Hartig 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Implications for talent management [J].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2016 (3) : 484 – 505.
- [18] Dawkins C E, Jamali D, Karam C, 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job choice intentions [J]. *Business and Society*, 2016(6) :854 – 888.
- [19] Lundqvist A, Liljander V, Gummerus J, et al. The impact of storytelling on the consumer brand experience: The case of a firm – originated story [J].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 2013(4) :283 – 297.
- [20] 包美玲, 卢谢峰. 组织吸引力研究述评 [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22(9) :553 – 563.
- [21] Ashforth B E, Schinoff B S, Rogers K M. “I identify with her” “I identify with him”: Unpacking the dynamics of personal identif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6(1) :28 – 60.
- [22] 史敏.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对消费者品牌认同的影响机理研究 [J]. *现代经济信息*, 2019(9) :150 – 151.
- [23] Van Laer T, Ruyter K D, Visconti L M, et al. The extended transportation – imagery model: A meta – analysis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s’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4 (5) : 797 – 816.
- [24] Chang C. Imagery fluency and narrative advertising effects

- [J].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013(1): 54 – 68.
- [25] Huang R, Ha S. The role of need for cognition in consumers' mental imagery: A study of retail brand's Instagra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21(2): 242 – 262.
- [26] 李启毅, 胡竹菁, 王鑫强, 等. 叙事传输理论与说服机制: 以叙事型公益广告为例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11): 2001 – 2008.
- [27] Liu W L, Xu W A, Tsai J Y. Developing a multi – level organization – public dialogic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to assess social media – mediated disaster communication and engagement outcomes [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20(4). <https://doi.org/10.1016/j.pubrev.2020.101949>.
- [28] Yang S U, Kang M, Johnson P. Effects of narratives, openness to dialogic communication, and credibility on engagement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through organizational blog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0(4): 473 – 497.
- [29] White K, Simpson B. When do (and don't) normative appeals influence sustainable consumer behavior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3(2): 78 – 95.
- [30] Highhouse S, Lievens F, Sinar E F. Measuring attraction to organizations [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2003(6): 986 – 1001.
- [31] Hayes A F.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CSR Narrative on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Identity and Narrative Transmission

JI Yang¹, CHANG Zehui¹, SHAO Danpi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8,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identity and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heories,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SR narratives on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and its boundary condi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ocial media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media fo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Through an experimental design, a bootstrap method i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graduates from 5 universities in central Chin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SR narrativ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and applicant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transportation fu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Moreover, CSR narratives are able to strengthen applicant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transportation, and in turn enhance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firms to engage in more effective CSR communic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Key words: CSR narrative;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social identity;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social media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郭正杰, 栗肖寒

(中原工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7)

摘要: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借助文本分析法实证讨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并且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发现,对于非国企、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影响更为明显。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制造业;文本分析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5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30-06

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当前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企业数字化是构建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数字化发展能够优化企业流程,达到降本提质的效果,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1]。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2],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3],提升内部控制质量^[4],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5]。创新是企业进步的源泉,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但现有学者对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机制研究还不太常见。尤其针对制造业而言,核心技术匮乏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解决“卡脖子”核心问题,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当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2015—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管理效率三个角度探究二者之间的机制黑箱。希望研究结论能丰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理论研究,同时为制造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进行升级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在信息技术爆发的今天,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许多企业降本增效的利器。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也进行了界定。Verhoef^[6]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把具体的数据通过处理,加工成有用的信息,为企业创造价值。Gilch和Sieweke等^[7]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市场环境做出反应,以此调整企业的业务模式等。钱晶晶和何筠^[8]认为企业可以将战略模式等与数字技术重构结合进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整合企业数据资源,协调各种活动,使整个企业处于一种更加灵活高效状态的变革。

(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以及业务流程等各方面进行改进调整,帮助企业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赋能运营管理,整合信息资源,从而强化企业创新^[9]。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和管理效率三个层面来实现。

第一,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的研发创新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

收稿日期:2023-09-28

作者简介:郭正杰(1967—),男,河南济源人,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公司治理、公司理财与管理会计。

的影响,有较高不成功的概率^[10],需要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提供保障。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处理大量编码数据以及各种信息,加快信息的沟通流转^[11],能够有效地向企业与企业外部相关者传输有效信息,提高双方之间的信息透明度,缓解企业外部融资困难的现象。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拓展销售渠道,促进企业的营收^[12],改善财务状况,从源头上缓解企业出现的融资问题。以此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创新,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

第二,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提升创新绩效。企业的数字化升级需要高技能人才作为软支撑,而高技能人才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源泉^[13]。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简单重复的工作将会被人工智能所代替,低技能人才将会被逐步淘汰,而这也倒逼企业加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14]。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将不断得到优化。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结构会提高企业员工的认知能力与创新意识,从而带动企业研发技术的发展,激发企业的潜力,加速企业的创新。总之,企业数字化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为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积累资源。

第三,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进而提升创新绩效。首先,数字化改革能够优化组织结构,消除各层级之间的信息隔阂,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提升信息传递速度,实现更加扁平高效的管理模式。例如,企业可以通过OA系统以及钉钉等办公软件的使用优化企业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管理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重要的事情。其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提高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互动,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另外,企业还可以运用数字化方式打造智慧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组织协同管理^[15],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最后,企业可以通过数据处理以及数据分析系统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产生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16],挖掘数据背后的信息,为管理者战略规划提供依据。数字技术还能够对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错误以及不合理操作进行提示,降低失误和犯错的风险,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科学的内容,提高管理效率。企业管理效率的提高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假设2:数字化转型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假设3: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人力资本结构,进

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假设4: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管理效率,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21年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2012)的A股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删除严重缺失数据的观测值以及ST和*ST公司,最终得到7847个观测值。数字化转型指标数据通过搜集样本企业年报,根据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对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得到,所使用数据来自CSMAR与CNRDS。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双边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企业创新可以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部分,因为本文主要研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所以从研发产出角度选择代理变量。本文选择上市公司当年独立专利申请量,由于许多企业专利申请量可能为0,本文对专利申请量加1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本文借鉴吴非等^[17]的方法,通过构建能够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层与应用层的特征词谱,并利用Python爬虫技术提取统计2015—2021年样本企业年报中出现的有关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的频数。为了避免右偏性,采用词频数加1再取对数的方式作为衡量指标。

3.控制变量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规模(Size)、独立董事比例(Ind)、股权集中度(Top1)、审计意见(Audit)、现金流(Cf)作为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绩效	<i>Inn_per</i>	Ln(企业当年独立申请的专利数+1)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i>Dt</i>	Ln(数字化转型词频数+1)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总资产收益率	<i>Roa</i>	净利润/总资产
	企业规模	<i>Size</i>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Ind</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股权集中度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审计意见	<i>Audit</i>	标准无保留意见为1,否则为0
	现金流	<i>Cf</i>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营业总收入
	行业	<i>Industry</i>	虚拟变量
	年度	<i>Year</i>	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运用基准回归构建如下模型:

$$Inn_per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创新绩效(*Inn_per*),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t*)。系数 α_1 表示 *Dt* 的回归系数, $\sum Controls$ 表示本文涉及的控制变量, $\sum Industry$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sum Year$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创新绩效(*Inn_per*) 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9.048,说明样本企业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均值为 3.507,整体来看,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企业数字化转型(*Dt*) 最小值和最大值为 0 和 5.737,说明企业间数字化程度不同步,有些企业甚至还未开始实施数字化。均值为 1.416,整体来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还处于较低水平。

表 2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N	Mean	P50	Sd	Min	Max
<i>Inn_per</i>	7847	3.507	3.584	1.571	0	9.048
<i>Dt</i>	7847	1.416	1.099	1.268	0	5.737
<i>Lev</i>	7847	0.391	0.386	0.179	0.014	0.989
<i>Roa</i>	7847	0.042	0.04	0.069	-0.847	0.379
<i>Size</i>	7847	22.341	22.205	1.17	19.612	27.547
<i>Ind</i>	7847	0.377	0.333	0.057	0.2	0.8
<i>Top1</i>	7847	32.671	30.84	13.979	2.43	89.09
<i>Audit</i>	7847	0.018	0	0.135	0	1
<i>Cf</i>	7847	0.100	0.093	0.118	-0.265	0.446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模型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表示只有自变量数字化转型(*Dt*)对因变量创新绩效(*Inn_per*)的回归。可以看出,回归系数为 0.3317,且在 1% 水平下显著,初步判断假设 1 成立。列(2)增加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结论依然成立。列(3)在列(2)的基础上控制行业和年度,可以发现,结果依然在 1% 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假设 1 成立。

2. 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数字化水平可能也会更强,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可以有效地缓解内生性带来的

干扰。因此,本文参考沈国兵等^[18]的做法,把企业所在省份的互联网化水平设为工具变量。地区互联网水平能够反映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且互联网水平与企业数字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而地区互联网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并无直接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本文用企业所在省份域名数取对数的方式来衡量地区互联网水平。本文在引入模型(1)中的所有控制变量后进行 2SLS 回归,从表 4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区互联网水平对数字化转型在 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工具变量满足要求。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C - D Wald F 与 K - Prk Wald F 统计量分别为 27.88 和 128.36,大于 Stock - Yogo 弱工具变量 10% 的临界值 16.38。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且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 1.5918,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 3 回归结果检验

Variable	<i>Inn_per</i>		
	(1)	(2)	(3)
<i>Dt</i>	0.3317 *** (24.38)	0.2637 *** (22.49)	0.1333 *** (10.79)
<i>Lev</i>		0.6230 *** (5.69)	0.1807 * (1.78)
<i>Roa</i>		0.8176 *** (2.80)	1.5409 *** (5.66)
<i>Size</i>		0.6379 *** (40.32)	0.7249 *** (48.02)
<i>Ind</i>		-0.6934 *** (-2.61)	-0.7712 *** (-2.99)
<i>Top1</i>		-0.0039 *** (-3.61)	-0.0031 *** (-2.86)
<i>Audit</i>		-0.3209 ** (-2.92)	-0.2960 *** (-2.61)
<i>Cf</i>		-0.6890 *** (-5.14)	-0.5438 *** (-4.27)
<i>_cons</i>	3.0386 *** (118.14)	-10.9288 *** (-32.39)	-13.2252 *** (-39.58)
<i>Industry</i>	No	No	Yes
<i>Year</i>	No	No	Yes
<i>Adj. R2</i>	0.0703	0.3247	0.4633
<i>N</i>	7,847	7,847	7,847
<i>F</i>	594.47	472.54	169.33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首先,替换被解释变量,利用上市公司当年独立获得的专利数作为创新绩效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基准回归。如表 5 中列(1)所示,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其次,替换解释变量,借鉴何帆和刘红霞^[19]的做法采用数字化转型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模型(1)重新进行

回归。列(2)显示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更换回归模型,将基准回归模型变更为较严格的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回归,从列(3)可以看出结果仍然成立。

表 4 工具变量回归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被解释变量: <i>Dt</i>		被解释变量: <i>Inn_per</i>	
IV	0.0663 *** (11.33)	<i>Dt</i>	1.5918 *** (12.88)
<i>_Cons</i>	Yes	<i>_Cons</i>	Yes
<i>Industry</i>	Yes	<i>Industry</i>	Yes
<i>Year</i>	Yes	<i>Year</i>	Yes
C-D Wald F		C-D Wald F	27.88 [16.38]
K-Prk Wald F		K-Prk Wald F	128.36 [16.38]
<i>N</i>	7,847	<i>N</i>	7,847

注:[]中的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水平上。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2) 替换解释变量	(3) 更换模型
<i>Dt</i>	0.1425 *** (12.37)	0.2110 *** (6.74)	0.0468 *** (3.49)
<i>_Cons</i>	-12.8049 *** (-39.54)	-13.5016 *** (-40.08)	-9.5345 *** (-10.6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i>F</i>	196.75	164.66	104.87
<i>N</i>	7,847	7,847	7,847
<i>R</i> ²	0.4951	0.4585	0.3408

(三) 机制识别检验

前文通过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证明了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但是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没有检验,为了识别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传导路径进行检验,从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结构以及管理效率三条渠道构建模型,其中 $Mediator_{i,t}$ 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与模型(1)相同。具体模型如下:

$$Inn_per_{i,t} = \alpha_0 + \alpha_1 Dt_{i,t} +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varepsilon_{i,t} \tag{2}$$

$$Mediator_{i,t} = \beta_0 + \beta_1 Dt_{i,t} +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varepsilon_{i,t} \tag{3}$$

$$Inn_per_{i,t} = \gamma_0 + \gamma_1 Dt_{i,t} + \gamma_2 Mediator_{i,t} + \sum Controls_{i,t} + \sum Industry_{i,t} + \sum Year_{i,t} + \varepsilon_{i,t} \tag{4}$$

1. 融资约束
企业的成长需要资金,融资是企业取得资金的

重要来源。企业借助信息技术等数字手段缓解融资压力,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动力。本文通过计算 SA 指数,因为 SA 指数为负数,本文采用 SA 指数的相反数来衡量融资约束。如表 6 列(1)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抑制融资约束。将融资约束带入模型(4),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绩效都通过了在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假设 2 成立。

2. 人力资本结构

企业数字化能够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能够采用多元化用工模式,获取高科技人才,为企业创新能力提供智力保障。本文借鉴付剑茹^[9]的做法,选择研发人员数量占比来衡量人力资本结构。如表 6 列(2)所示,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将人力资本结构带入模型(4),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假设 3 成立。

3. 管理效率

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优化组织结构,能够使外界更加了解企业的经营产品,降低各种交易成本,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选择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二者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管理效率。如表 6 列(3)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效率的影响在 1% 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且将管理效率加入模型后,数字化转型仍然对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效率也对创新绩效在 1% 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假设 4 成立。

(四) 异质性检验

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为进一步保证结论的真实性从产权性质、地区属性和要素密集度分样本来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

由表 7 列(1)和列(2)所示,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在非国企中更明显。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国企而言,非国企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大,对创新的投入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21]。非国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强融资的效果也越强。另外,由于国企的特殊性,对人才的吸引以及对资源的获得并不完全依赖于数字化转型,而非国企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大大改善人才匮乏与资源不足现象。

由表 7 列(3)和列(4)所示,相对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原

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健全,高端人才聚集,有利于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以及创新实践的

落实。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弱,且对新技术的应用相对比较保守。

表 6 机制识别检验结果

Variable	(1)			(2)		(3)	
	<i>Inn_per</i>	<i>SA</i>	<i>Inn_per</i>	<i>Human</i>	<i>Inn_per</i>	<i>Manage</i>	<i>Inn_per</i>
<i>Dt</i>	0.1366*** (11.10)	-0.0061*** (-2.67)	0.1321*** (10.71)	1.7269*** (15.77)	0.1083*** (8.62)	0.0112*** (10.63)	0.1262*** (10.06)
<i>SA</i>			-0.1873*** (-3.05)				
<i>Human</i>					0.0145*** (9.98)		
<i>Manage</i>							0.6328*** (3.19)
<i>_Cons</i>	-13.1940*** (-39.16)	4.1692*** (53.92)	-12.4444*** (-30.31)	24.9050*** (10.49)	-13.5854*** (-40.96)	0.5288*** (11.28)	-13.5598*** (-39.5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Adj. R²</i>	0.4621	0.1863	0.4639	0.2930	0.4694	0.3712	0.4658
<i>F</i>	169.74	68.69	167.32	72.38	172.23	143.66	166.74
<i>N</i>	7847	7847	7847	7847	7847	7847	7847

由表 7 列(5)至列(7)所示,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三种密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提升。列(6)显示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在 5% 水平上显著,弱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可能原因在于,

技术密集型企业较重视技术创新,从而加强技术研发应用;资本密集型企业借助资金优势,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对创新的应用;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利用低端劳动力且用工模式单一,数字化转型难度大。

表 7 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6)	(7)
	国有	非国有	东部	中西部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i>Dt</i>	0.104*** (4.30)	0.144*** (9.93)	0.144*** (9.96)	0.108*** (4.69)	0.136*** (9.23)	0.075** (1.98)	0.137*** (5.16)
<i>_Cons</i>	-14.417*** (-28.08)	-12.247*** (-26.55)	-14.124*** (-34.22)	-11.539*** (-20.21)	-14.208*** (-26.89)	-11.996*** (-11.05)	-10.367*** (-16.48)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265	5,582	5,553	2,294	4,438	1,175	2,234
<i>R²</i>	0.5481	0.5481	0.4620	0.4975	0.5058	0.3543	0.3968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结论

本文以中国 A 股制造业 2015—2021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明显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并且结论通过了内生性与伦健性检验。(2)数字化转型可以从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提高管理效率三条路径提升创新绩效。(3)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非国企以及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高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二) 启示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重压力,中国企业

特别是制造业需要数字化转型来转换动能,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制造业企业应该加强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企业在数字化过程中,应该融合企业管理,改善融资环境,构建人才培养系统,全方位多维度进行数字改造,发挥放大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针对不同企业的发展模式以及市场战略,结合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精准地进行数字化改革。东部地区可以对核心技术进行突破,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建设,并与东部地区进行深度交流合作,非国有企业更应该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增强企业创新,促进企业营收。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要结合自身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数字化改革,借助信息技术,增强企业创新力度,实现高质量

发展。

第三,政府应该加大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制定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化等普惠政策来激励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革。对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指导,帮助企业解决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化转型的监管制度,防止部分企业借助数字优势进行垄断。

参考文献:

[1]张娟.行业数字化转型:谁先转?怎么转?[N].人民邮电,2020-12-15(5).

[2]黄大禹,谢获宝.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市场价值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亚太经济,2022(6):93-104.

[3]王会娟,陈新楷,陈文强,等.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吗?[J].财经论丛,2022(12):70-80.

[4]张钦成,杨明增.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基于“两化融合”贯标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审计研究,2022(6):117-128.

[5]刘梦莎,邵洪,阮青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3(1):63-72.

[6]Verhoef P C, Broekhuizen T, Bart Y, et 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2: 889-901.

[7]Gilch P M, Sieweke J. Recruiting digital talent: The strategic role of recruitment in organizatio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 Germa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21, 35(1): 53-82.

[8]钱晶晶,何筠.传统企业动态能力构建与数字化转型的机理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1(6):135-143.

[9]付剑茹,王可.企业数字化发展何以促进创新[J].产业

经济评论,2022,52(5):51-69.

[10]解维敏,方红星.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J].金融研究,2011(5):171-183.

[11]祁怀锦,曹修琴,刘艳霞.数字经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视角[J].改革,2020(4):50-64.

[12]高文鞠,蔡良群.科技人才、全要素生产率与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中国科技论坛,2020(9):84-95.

[13]姜兴,张贵.以数字经济助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J].人民论坛,2022(6):87-89.

[14]张叶青,陆瑶,李乐芸.大数据应用对中国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1,56(12):42-59.

[15]王文华,周立姚.物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财务绩效:基于融资成本与管理效率的双重路径[J].财会通讯,2022(20):44-48.

[16]许宪春,任雪,常子豪.大数据与绿色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9(4):5-22.

[17]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

[18]沈国兵,袁征宇.企业互联网化对中国企业创新及出口的影响[J].经济研究,2020,55(1):33-48.

[19]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改革,2019(4):137-148.

[20]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21]姜英兵,徐传鑫,班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二元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22(3):187-19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GUO Zhengjie, LI Xiaohan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7,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sample,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th the help of textu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enhance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optimizing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meanwhil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higher in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enterprises than in labor-intensive enterprises.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manufacturing; textual analysis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践与思考

杜良莉,曹伟,冯国伟
(郑州市中心医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结合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现状及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在公立医院实施的情况及效果,分析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历程存在的问题,国内外医疗服务价格情况等,提出调整必须以项目成本为基础,真实反映医务人员知识技术劳务价值,价格回归成本,财政政策补偿到位,更好地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和知识价值,为公立医院创造更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价格调整;成本核算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6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36-06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是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任务,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旨在调整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核心目标是建立合理、透明、可持续的医疗服务价格机制,使得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能够依靠自身劳动得到合理收入补偿,体现自身价值。提高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解决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破除“以药养医”引发的乱象。2017年8月31日,河南省郑州市以“药品零差价销售,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为突破口,启动郑州市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2019年12月31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对2642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调整,推动了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化和规范化。随后,河南省进一步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等措施,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2022年6月29日,河南省医保局会同省卫健委、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河南省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实施意见(试行)》,进一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政策的理性化。这一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河南省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有助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解决医疗资源不均衡、医疗费用过高等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节约医保基金,减轻患者负担,提高人民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平、优质的医疗服务,为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为充分了解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在公立医院实施的情况及效果,结合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2016—2022年间相关运行数据,对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同时分析价改成效,为价改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一、郑州市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情况

河南省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则,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并调整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用医院医疗服务实际工作量和加成收入数据为测算基础,实行“平移式调价”“精准调价”^[1]的策略,这意味着在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时,以体现技术劳务的诊疗、手术等临床诊疗类项目和依赖医用设备检查的医技诊疗类项目为主要调整对象,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通过引导医疗机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化和规范化。

(一)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调整的服务项目

郑州市在2017年8月31日取消药品加成,调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项目:郑州市2023年度社会科学调研课题“基于精细化管理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践研究”(ZSLX20230471)

作者简介:杜良莉(1972—),女,河北安国人,郑州市中心医院正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医院财务管理。

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3712 项,调增 2904 项,调减 808 项,调价率 74.63%,2019 年 12 月 31 日取消医用耗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2642 项,调增 1717 项,调减 925 项,调价率 51.65%。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调整服务项目类别见表 1。

表 1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调整医疗服务项目 单位:项				
价格调整	2017 年取消药品加成		2019 取消耗材加成	
	调增	调减	调增	调减
综合医疗服务类	65	0	27	10
医技诊疗类	110	807	25	785
临床诊疗类	2612	1	1625	126
中医及民族	117	0	40	4
调整项目合计	2904	808	1717	925
调价率	74.63%		51.65%	

(二) 价格补偿

一直以来,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延续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药品加成取消后,公立医院的补偿转变为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2017 年郑州市在药品加成取消时,明确提出公立医院因药品零差价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 90%,财政按照原供给渠道补偿 10%;医用耗材加成取消,由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政策带来的亏损。通过郑州市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药品、耗材零加成,调整价格后连续五年的运行数据监测,价格调整的补偿率分别为:2018 年,71.37%;2019 年,76.16%;2020 年,76.01%;2021 年,81.70%;2022 年,75.12%。药品、耗材零加成补偿见表 2。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能弥补医院实施药品和耗材零加成后的政策性亏损,对医院医疗收入影响较大。

表 3 医疗服务量及次均费用								
量/费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门急诊量	人次数	1633350	1815722	2152859	2587733	2164452	2683439	2930889
	增减率(%)	—	11.17	18.57	20.20	-16.36	23.98	9.22
出院量	人次数	94788	108356	127833	147029	129710	149137	134305
	增减率(%)	—	14.31	17.98	15.02	-11.78	14.98	-9.95
门诊次均费用	次均费用(元)	214.11	174.32	180.57	183.96	212.61	206.03	178.96
	增减率(%)	—	-18.58	3.59	1.88	15.57	-3.09	-13.14
住院次均费用	住院次均费用(元)	12056	14360	15248	16419	16793	17755	17885
	增减率(%)	—	19.11	6.18	7.68	2.28	5.73	0.73

(四) 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结构

全面实施价格改革后,公立医院收入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医疗收入结构折线见图 1。药品收入从 2016 年的 42.23% 下降到 2022 年的 29.84%;检查检验项目调减较多,但收入占比从 2016 年的 29.19% 到 2022 年的 30.90%,仍小幅上扬;卫生材料收入占比和医务性收入占比均呈上升趋势,年均分别增长 1.05 和 0.72。

表 2 药品、耗材零加成补偿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指标	药品、耗材零加成数据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	调整价格医疗收入增长收入	9406	11761	10979	13557	11825
2	药品零加成减少的收入	13178	15444	11426	14134	13484
3	耗材零加成减少的收入	-	-	1748	2459	2258
4	补偿净额	-3773	-3682	-2195	-3036	-3917
6	补偿率%	71.37	76.16	76.01	81.70	75.12

(三) 医疗服务量及次均费用

医疗服务量。2017 年、2019 年两次医疗服务价格大调整后,门急诊人次呈持续增长趋势(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现波动),年均增长 5.95%,出院人次亦呈增长趋势(2020 年、2022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波动),年均增长率 6.95%。具体情况见表 3。2020 年至 2022 年,三年疫情对医院门急诊就诊人次,住院人次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不能对医疗服务量产生显著影响。

次均费用。医院的门诊次均费用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仍有波动,具体情况见表 3。如 2020 年门诊次均费用增长 15.57%,与当年疫情管控相关,不是万不得已患者不去医院就诊,所以当年门诊患者相对往年门诊患者症状相对较重,费用有所增加;2022 年疫情管控特点是大量症状相似患者涌向医院开药,门诊人次量增加,次均费用出现下降。在住院次均费用方面,6 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除 2017 年递增幅度较大外,其他年份递增的幅度并不大,特别是 2019 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 2022 年开始实施 DIP 支付方式改革,对患者次均费用增长起到明显遏制作用。说明医改政策叠加对次均费用有影响,单纯价格改革调整并不能影响到次均费用。

医务性收入结构:具体数据见表 4。床位费价格多年来一直未作调整,而住院患者次均费用逐年增长,导致医务性收入占比中床位费占比逐年下降;诊察费占比由 2017 年的 3.74% 增长至 2018 年的 5.70%,主要原因是“住院诊查费”由 2 元/日调整为 17 元/日;护理费在调价过程中虽然进行过调增,但护理类收费项目只有 15 项,而且此类项目成本与价格的比价关系明显倒挂,所以即便护理人员在临

床上忙得不可开交,但护理费在医务性收入结构中的占比并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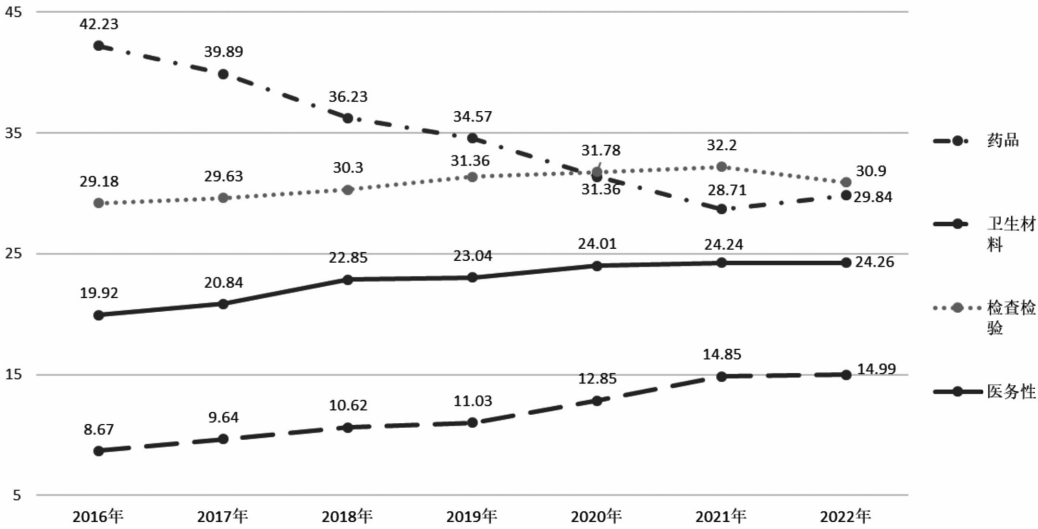


图1 医疗收入结构(%)

表4 医务性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占比%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挂号费	0.16	0.14	0.07	0.10	0.09	0.08	0.08
床位费	9.76	8.21	6.68	5.83	5.58	4.95	4.73
诊察费	2.35	3.74	5.70	5.25	5.12	4.61	4.44
护理费	4.94	6.17	7.75	8.06	8.47	7.48	7.49
治疗费	57.89	57.83	56.4	55.72	54.91	57.47	56.50
手术费	23.83	22.81	21.83	21.74	23.13	23.48	24.87
其他费	1.07	1.10	1.52	3.29	2.71	1.94	1.90

二、讨论与分析

(一)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历程存在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医疗服务价格领域持续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2016年开始,各地配合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控制公立医院药耗采购成本,稳妥有序地进行了多轮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优化,对推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转轨、促进医疗技术进步、支持医疗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2],但在实际开展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和提升医疗人员劳务费用这两者不能同频共振。国家的统计结果显示,医疗费用的增速通常快于物价的增速,这意味着医疗成本的上升压力较大。如果同时要求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可能会导致医疗机构利润下降、财务压力增加,从而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

(2)医疗服务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医疗服务价格比价体系不够完善,导致定价不够科学和公平。特别是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在市场化背景下,为了体现其公益性质,许多项目的定价被设置得低于其实际成本,这加重了公立医院的经济压力。

(3)医疗服务收费机制不健全。目前很多医院

按照项目收费,按项目付费可能会使得医院倾向于过度开展某些高价项目,而忽视其他低价但同样有效的治疗手段,这不仅带来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从而产生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医疗行为。

(4)政府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不健全。在药品加成的模式退出市场,财政补助的占比一直不高的情况下,医院为了增加收益而变相提高医疗服务价格。

(5)医疗服务价格制定重物耗轻人力的现象非常严重,医院更关注物耗的收入,可能会出现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同时,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可能会过重,影响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

(6)医疗服务价格一经制定往往很多年得不到调整,不能与社会同步发展,可能由多个因素导致,其中包括政策机制的僵化、信息获取困难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博弈等。

(二)国内外医疗服务价格情况

医疗服务价格情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制一直遵循“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价格水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立医院价格相对

较低,私立医院价格相对较高。医疗服务价格根据不同项目和地区有所变化,但普遍认为医疗服务价格相对较低。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相对较高,是全球最昂贵的之一,由于医疗体系的私有化、保险制度的复杂性以及药品等成本的上升,导致医疗服务价格居高不下。日本的医疗服务价格相对较高,但其医疗保险制度相对完善,患者需要支付医疗费用的一部分,而剩余费用由医疗保险承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水平、医疗体系、医疗保险制度等。因此,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三）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重要性

我国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体制一直遵循“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价格水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区域内实际情况确定,同时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福利性和公益性,医疗服务的价格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医疗技术劳务和知识价值没有在价格中充分体现,大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明显偏低。但社会经济一直在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日益丰富,在《2021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医疗服务总费用增加,人均卫生总费用以年均 14.16% 增长率持续上升,高于 GDP 年均 11.65% 增长率。在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医疗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医院规模快速扩增导致的医疗机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上涨、大型医疗设备检查治疗价格过高,药品收入成为各大医院的主要筹资渠道等,这一系列问题,使得政府、医疗机构对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体制,理顺比价关系,回归价格杠杆功能有强烈的诉求,因此改革医疗服务价格势在必行,具有现实意义。

（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尚不到位

郑州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主要考虑补偿药品和耗材零加成的政策性损失,在不增加患者总体医疗费用负担以及医保基金的可承受能力,为补偿而调价,没有从项目实际开展出发,考虑医疗服务项目的真实成本,技术风险、人力资源的消耗等因素,因此很多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仍然背离成本,医疗服务得不到合理补偿,医疗服务比价关系不合理依然存在。通过价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有一定提高,但仍远低于郑州市公立医院总体医务性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占比同比提高且≥35% 的要求。

例如:“一级护理”项目价格为 26 元/日,项目内涵“护士每小时巡视观察一次,观察病情变化,根

据病情测量生命体征,进行护理评估及一般性生活护理,作好卫生宣教及出院指导”。一级护理患者护士每日需巡视 24 次,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并做护理记录。在实际成本测算中,巡查一次时间消耗 3 分钟,72 分钟/日。按郑州统计局发布 2021 年全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0.74 元/分钟,仅巡查人力时间消耗成本就是 53.28 元,高于一级护理定价 26 元。且在实际情况下,医务人员的平均收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才合理。“一级护理”在医院连续两年实际成本测算中,成本为 86.4 元/日,相对于 26 元/日的价格,价格与成本明显背离,远不能体现医疗服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

（五）医疗收入结构与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

医疗收入中,药品收入从 2016 年改革前的 40% 以上降到持续改革后 2022 年的 30% 以下,说明“药品零加成”“集采”等医疗改革政策叠加成效显著;检查检验项目价格调整时,调减的项目较多,但收入占比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小幅上扬,关联医疗收入总量趋势和药占比、医务性收入占比相关数据,检查检验项目价格调整并没有影响到检查检验收入占比,没有达到改革时“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对检查检验项目的预期,仍然需要临床医护人员转变思想,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检查检验项目;医务性收入占比从 19.92% 增长到 24.26% 数据结果看,整体体现出“取消药品加成”和“调增临床诊疗项目价格,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价格改革大原则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逐步提高”指标导向。另外,因为“所有的卫生材料收费必须伴随着医疗服务项目开展而产生”,所以卫生材料占比与医务性收入占比的同步提升,与医院近几年着力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各专业技术能力,手术操作等技术性、劳务性项目逐渐增多有关。但耗材占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医务性收入占比的增长速度,所以耗材使用监管,对医院高质量发展,精细化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必须避免出现“支架集采降价后,使用价格更高的药物球囊来代替支架”的扭曲现象,控制耗材滥用,降低总体费用。

（六）医疗服务价格与工作量

医疗服务作为准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价格弹性较低^[3],对量的变化不敏感,与其他商品或服务不同,患者不会因为医疗服务价格的高低而减少基本医疗需求,另外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强、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叠加和医保的全覆盖,人们更加注重预防保健和早期治疗,以避免疾病的恶化或复发,更愿意应用医保基金的红利来支付医疗费

用,不会考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是否调整,而是将重点放在自身健康需求的满足上,所以价格调整不能影响就诊量和住院量。还有价格改革后,价格的补偿率仅有 76%,医护人员必须尽可能增加诊疗服务项目才能弥补药品、耗材加成的损失,以维持原有薪酬水平,而此时工作量是大幅增加的。医务人员体会不到价格改革的红利,不仅对价格改革关注度不高,同时还颇有微词,引发诱导需求^[4]。因此,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任重道远,需要政府打出医改的组合拳进行价改纠偏。

(七) 医改中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2022 年 6 月,郑州市全面启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所有公立医院实施 DIP 付费,从单纯按项目收费转向全面实施 DIP 付费,可以更好地与医疗服务的真实成本相符合,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和知识价值。这种付费模式更加注重医疗服务的综合性和效果,而非简单地以项目数量来衡量医院的收入。这对于推动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支付模式的改变,使医务人员更关注医保能够付多少,普遍认为价格改不改都没有实际意义。实际上无论支付模式如何改变,在价格基础上先有收,才有支,需要从根源上解决医疗服务价格比价关系的问题,建立科学、公正、可行的医疗服务价格制定机制,才能彻底解决医疗服务价格与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和知识价值不匹配的顽疾,调整医疗收支结构,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良性的、高质量的发展,摒弃“以药养医”“以耗养医”的观念,回归医疗本源。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医疗机构和相关利益方共同努力,以实现公立医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八) 动态调价机制的缺陷

近年来,医疗收费价格调整一直存在缓慢的问题,很多地区一直执行多年前的收费标准,如河南目前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是 2001 版基础上的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项目数量价格等未完全与 2012 版接轨。为解决这个问题,自 2019 年国家医疗保障局出台“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的文件以来,河南省医疗保障局、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先后印发“动态调价机制”的相关文件,逐步建立公立医院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近些年来,药品、耗材集采,一年一次或者数次不等,但动态调价“需要满足启动条件,并设立约束机制”,在这样的条件制约下,存在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周期可能较长,对价格反应不灵敏的缺陷。因此,“适度多次”甚至“小幅多次”将是未来价格调整的应有策略。

三、建议

(一) 价格调整必须以项目成本为基础,真实反映医务人员知识技术劳务价值

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需要经济保证和支撑,面对药品、耗材的零加成,政府财政补助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不到位,药品、耗材零加成使得医院无法通过销售药品等额外收入来弥补财务缺口,加上 DIP 支付方式改革给医院设置的费用天花板,限制了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空间,医院运营举步维艰,经济运行压力巨大,2022 年国家卫健委报表显示 43.5% 医院处于亏损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医疗服务项目成本为基准,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对于提升公立医院纯收入,改变公立医院收支结构,提高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理定价,能够更好地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和知识价值,激励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公立医院创造更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保证其可持续发展,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二) 价格回归成本

医疗服务作为一种高技术风险劳动,它的技术劳务价值难以度量,与一般商品和服务相比,其具有培训成本高、知识更新速度快、脑力消耗大、技术风险高等特点^[5]。因此与其他劳动测算方法不应该相同,医疗服务的价值包含物质消耗的价值和人力消耗的价值,当前很多医疗服务出现价格与价值倒置现象,技术含量越高的医疗服务越明显,对医疗服务项目建立更加科学、适用的成本核算方法,进一步提高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价格,让医疗服务价格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增强他们对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的投入,从而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和效果,实现技术劳务性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和医务人员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 财政政策补偿

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综合改革的实施,旨在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全面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并实施零差率政策。这意味着医院不再对药品和耗材收取额外费用,消除了过去由于加成导致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同时为了保障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补偿政策性亏损,一方面通过提高护理、治疗、手术等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并确保他们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样既能激励医务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又能促进医疗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无法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来进行补偿的情况,

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应建立统一的医院成本核算制度和核算方法。这将有利于准确计算医疗机构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设备投资、管理费用等。通过统一的成本计算方法,可以更加完整、真实地反映成本的组成,确保补偿的合理性。统一的成本计算方法将有利于完整、真实地反映成本的组成,不同医院医疗服务成本的对比性,确保各类补偿实施的合理性^[6],对政策性亏损部分予以兜底补偿,以维护医疗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四)动态调整机制触发条件、约束条件

动态调价机制的启动条件中的医疗费用指标、医疗机构运行指标、医保费用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及约束标准中的 GDP、CPI、年度医保基金结余等条件,必须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财政投入、群众费用负担等因素,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成本监测工作,监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成本、费用、收入分配和改革运行情况确定,综合分析现行比价关系,初步测算各项目目标价格、调价幅度范围,综合调价策略、时机和周期等因素,以现行价格项目设置、收入构成是否合理来确定启动条件,出台的价改政策必须符合地区实际经济发展,设定可操作、能落地的价改政策,助力卫生体制改革和医院高质量发展。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缓慢性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医疗保障机构需要进一步推动动态调价机制的实施,并确保其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此外,政府还需要加强监管,确保医疗服务价格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以推动医疗服务价格的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1]侯准科,王仲阳,刘强,等.河南省城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践与体会[J].中国卫生经济,2019,38(8):75-77.

[2]金春林,彭颖,王海银.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内涵与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22,39(1):7-9.

[3]王静,时涛,王爱敏.我国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值评估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11):92-93.

[4]黄辉,陈坚,单海华,等.某三甲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效果评价[J].中国医院管理,2017,37(9):25-27.

[5]袁汇元,曾岳兴,周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补偿机制存在问题及对策[J].中国医药指南,2009,6(1):157-158.

[6]张静,崔兆涵,王虎峰.“三医”联动视角下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J].中国卫生经济,2018,37(1):28-3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form of Medical Service Prices

DU Liangli, CAO Wei, FENG Guowei

(Zhengzhou Central Hospital,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medical service price reform in a certain tertiary – grade public hospital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in public hospitals,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medical service price reform , as well a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of medical service prices. It proposes that adjustments must be based on project costs, truly reflect the value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labor of medical staff, and ensure that prices are in line with costs. Adequat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policy should be provided to better reflect the labor value and knowledge value of medical personnel. This will create a better economic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public hospitals and ensur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medical service price reform; price adjustment; cost accounting

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的效力

——以《民法典》第419条为研究对象

王 杨,谢 彭

(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 要:《民法典》第419条中“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含义应该以“抵押权从属性说”为理论基础作解释。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债权不受法律保护,抵押权基于从属性同样不受法律保护,抵押权与主债权都保持存续状态。时效抗辩权应当包含在抵押权从属性的扩张解释范围内。抵押期间不是一种独立的期间,而是抵押权从属性特征的具体表现。为符合《民法典》第419条命令性规范的性质以及实现促进交易的目的,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不能自行约定抵押期间。《民法典》第419条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权、留置权。

关键词:抵押权从属性;时效抗辩权;抵押期间;类推适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7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42-0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为《民法典》)第419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条款沿袭了2007年《物权法》第202条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径,大致可以分为“抵押权消灭说”“抵押权存续说”和“抵押权从属性说”三种模式。除此之外,在理论层面,有学者提出“抵押人意思说”的观点,为抵押权效力问题的处理方式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

2021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出台以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44条是从抵押权从属性的角度解释抵押权效力问题,即由于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因此主债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而成为自然债权后,抵押权也无法通过人民法院予以保护。^{[1]395}至此,司法实践大多采纳了该观点。但

在实际运用中,各地法院对抵押权效力状态的理解大相径庭,有的法院只援引《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对抵押权效力状态做评价^①;有的法院认为抵押权应当消灭^②;也有法院认为抵押权应当继续存在^③。

可见司法实践对该问题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审判思路,究其原因是对《民法典》第419条的理论认知不清。明确抵押权的效力状态直接影响抵押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同时也间接影响衍生而来的抵押期间性质、抵押期间能否约定等问题的处理。因此,抵押权效力状态迫切需要一个清晰的定论,以督促抵押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方便抵押人明确义务范围,确保司法审判有章可循。

二、抵押权效力状态在我国的不同解释路径

如前所述,对《民法典》第419条“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解读,主要存在“抵押权消灭说”“抵押权存续说”“抵押人意思说”“抵押权从属性说”四种观点。结合《民法典》的立法意图以及现实需要等因

收稿日期:2023-10-12

基金项目:202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农地金融创新法律制度研究”(2020CX048)

作者简介:王杨(1979—),女,土家族,湖北长阳人,法学博士,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物权法、合同法。

素综合判断,“抵押权从属性说”应当成为解释抵押权效力问题最确切的观点。

(一)“抵押权消灭说”之否定

“抵押权消灭说”认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人未依法及时行使抵押权,不仅丧失人民法院的公力保护,而且会导致抵押权的消灭。“抵押权消灭说”主张抵押权经过一段时间后消灭,故抵押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依照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抵押权的适用规则,“抵押权消灭说”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1. 违反文义解释。“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指权利丧失司法保护,定然以权利存在为前提。若权利不存在,何谈保护?“抵押权消灭说”以抵押权消灭为结论,超出社会一般人的理解能力范畴,难以涵盖于“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应然之意。

2. 违反历史解释。《物权法(草案)》第199条规定,“担保物权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未行使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消灭”,表明立法者曾有表达抵押权消灭的立法意图。然而,最终出台的《物权法》第202条一改《物权法(草案)》的规定,采用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表述。继而,《民法典》第419条未对《物权法》第202条做任何改变,仍然延续“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的立法选择,这一系列的演变反映出立法者已经明确拒绝采用“抵押权消灭说”的观点。

3. 违反物权内容法定。物权内容法定是指各类物权的具体内容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创设与法定物权内容不符的物权,也不得自行约定物权的内容,不得作出与法律强行性规定不符的约定。^[2]对于抵押权消灭的立法规定,《民法典》第393条明确了四种情形,而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并不包含在已列举的三种情形中。同时,其他法律法规不存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权消灭的类似规定,所以难以将此情形包含在兜底“其他”条款中。因此,若承认抵押权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后为消灭状态,则与《民法典》第393条规定不符,违反物权内容法定。

4. 抵押权不符合除斥期间的适用条件。首先,以民事权利的作用为标准,可将民事权利分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各权利彼此互相独立、互不干涉。抵押权属于支配权,而我国除斥期间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形成权,排除了抵押权的适用可能。其次,形成权的权利主体能够依单方意思表示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行为一经作出即生效,具有极强的外部效力性;支配权从积极方面来说,涵盖着长期拥有或支配该物的含义。抵押权尤其是采取登记

生效要件的不动产抵押权往往因登记行为使得抵押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不存在抵押关系短时间内变更或消灭的现实紧迫需要。所以,抵押权适用除斥期间完全有悖于其根本性质。

(二)“抵押权存续说”之否定

“抵押权存续说”认为抵押权不随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届满而消灭,仅发生效力减损——丧失司法保护。^[3]抵押期间随着主债权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而相应变化,故抵押期间性质应为诉讼时效。但“抵押权存续说”同样存在规则适用上的硬伤,对抵押物的流转难以起到促进作用:

1. 抵押权不符合诉讼时效的适用条件。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主要为债权请求权,抵押权为支配权不宜适用诉讼时效。抵押权是绝对权,具有极强的排他性,排斥一切义务人对物上权利之行使的干涉。而诉讼时效存在意义在于督促权利人在法定时间内行使权利,否则权利人将丧失权利实现于法律层面的可能性。可见,诉讼时效制度将权利人禁锢在时效制度的牢笼之中,禁止其享有无期限的权利。因此,抵押权适用诉讼时效与其排他性的性质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2. “抵押权存续说”不符合经济效用。首先,难以发挥抵押物的价值。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是抵押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的后果,若仍坚持抵押权存在,是对抵押权人的过分保护,不利于抵押物发挥自身价值。^[3]其次,难以实现的抵押权存续现实会阻碍抵押物流转。抵押人自愿履行是抵押权罹于主债权诉讼时效后得以实现抵押权的唯一途径。然而抵押人与债务人意志相互独立,抵押人自愿履行后无法保证追偿权能够实现,尤其是在债务人主张时效抗辩的情况下,抵押人自愿履行行为无疑是“没有回报”的。因此抵押人自愿履行的可能性本身就极低,抵押权得以实现的概率大打折扣。继而,抵押物交易相对人必然会因物上抵押权存在而产生顾虑,抵押财产的转让、出租和再融资受到直接影响。^[4]

(三)“抵押人意思说”之否定

“抵押人意思说”一反“抵押权消灭说”和“抵押权存续说”对抵押权效力状态的唯一定论,而是将抵押权是否消灭委诸抵押人自己的意思,即在抵押人主张时效抗辩时,抵押权没有消灭;在抵押人主张抵押权消灭时,抵押权才真正归于消灭^[5]。“抵押人意思说”赋予抵押人较大的决定权,符合《民法典》从倾向于抵押权人利益保护逐渐转向抵押人利益保护的立法趋势。但是,该观点暂存于理论阶段,逻辑尚不完整,实际应用也较为困难:

1. 理论不完备,实践不可行。“抵押人意思说”的前提条件是抵押人作出主张时效抗辩或主张抵押权消灭的确定性行为,因此该理论并没有考虑到抵押人未作出任何主张时抵押权的默认效力状态。若认为,抵押权的默认状态为消灭状态,那与“抵押权消灭说”何异?若认为,抵押权的默认状态为存续状态,那与“抵押权存续说”何异?换言之,“抵押人意思说”从根本上并没有对“不予保护”进行解释,而是为了解决前两种观点的现实困境所选择的妥协方案。除此之外,为确保抵押人实现自己的意志,必须明确抵押人作出主张的期限限制。超出期限未主张时抵押权的效力如何也需要该观点进一步明确阐述。

2. 忽视对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保护。一物上若设定多个抵押权,依照《民法典》第414条的规定,抵押权的登记次序直接影响着各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所得,先顺位抵押权人相比后顺位抵押权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因为“抵押人意思说”给予抵押人较大的选择权,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抵押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抵押权是否消灭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抵押权消灭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抵押人的清偿义务直接归于消灭,抵押权人丧失请求实现抵押权的权能基础或者在“抵押权存续情形”下获得抵押人自愿履行的可能。因此,抵押人似乎处于一种强势地位,其不同主张对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债权能否实现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免怀疑,在先顺位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若抵押人与先顺位抵押权人达成某种不正当合意,使得抵押人故意主张先顺位抵押权不消灭,而后又故意自愿履行,甚至与先顺位抵押权人私下交易“自愿履行”的报酬,当然损害后顺位抵押权人的利益。正是因为抵押人存在可选择的空间,才使得抵押权实现的是“可商量”的,甚至对于整个抵押权实现体系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

3. 破坏交易秩序,影响相关制度实行。民法体系中具有诸多法律制度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抵押权实现制度只是其中一种,但同处于复杂现实交易活动,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赋予抵押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将严重损害交易秩序,甚至影响其他法律制度的实行,破坏民法体系一致性。例如,抵押人的决定将直接影响《民法典》合同编第535条抵押权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法律效果。假设抵押人主张抵押权存在,根据2023年12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3条的规定,抵押权人的债权人可以“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且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相对人主张其享有的债权或者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以致到期债权未能实现”为由主张行使代位权;假设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合谋而故意主张抵押权消灭,抵押人对抵押权人的时效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那么债权人将无法行使代位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抵押人的任意决定将直接影响抵押权人的利益乃至抵押权人的相关人的合法权益,这对于整个债权实现体系都存在不可忽视的隐患。

(四)“抵押权从属性说”之肯定

面对实务中对从属性理论不统一的解释,“抵押权从属性说”的确切理解应当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主债权成为自然债权不受人民法院保护,抵押权基于从属性原理同样不受人民法院保护。此时,抵押权不消灭,抵押人能够以主债务人可援引的所有抗辩事由对抗抵押权的行使,包括主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6]

虽然“抵押权从属性说”与“抵押权存续说”都以抵押权存续为结论,但是背后的理论逻辑完全不同。“抵押权存续说”以抵押期间的可变性以及“不予保护”的立法措辞等方面作为考量^[7],认为抵押期间应属于诉讼时效期间,进而主张抵押权置于抵押期间后处于存续状态并不消灭。“抵押权从属性说”以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为理论基础,主债权的存续状态、法律效力对抵押权的存续状态、法律效力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表现为:主债权经过诉讼时效期间后不受人民法院保护且继续存在,抵押权也经过该段时间后不受人民法院保护且继续存在,抵押期间应为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

三、关于“抵押权从属性说”相关争议的解释

(一)抵押权从属性的含义包括时效抗辩权

关于“抵押权从属性说”最大的争议在于,时效抗辩权是否包含在从属性的含义之中。抵押权从属性所表达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成立上的从属性、转让上的从属性以及消灭上的从属性。因此,反对“抵押权从属性说”^[6]的学者主要以从属性不能包括时效抗辩为由否定该说的合理性。然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纠纷案件时,可以适用《民法典》第701条等关于保证合同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认可保证与抵押之间在部分内容上的类推关系,参照第701条规定,抵押人可以主张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在制度层面首次肯定时效抗辩属于抵押权从属性范围。因此笔者认为,不必断定抵押权从属性内涵仅限于成立、变更、消灭三个方面,而应该

进行扩张解释,将时效抗辩涵盖于从属性范围之内,存在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理论基础存在不同解释。有学者认为《物权法》中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制度体系是不完整的,担保物权的从属性还包括范围上的从属性、抗辩上的从属性。^[8]还有学者认为从属性是一个开放的结构性质原则,基于从属性产生的系列规则在规范性上应属任意性规范,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可以突破从属性。^[9]基于理论学说的多样性,抗辩的从属性本就属于不同解释方法的一种,涵盖于抵押权从属性之内应属情理之中。

第二,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富有借鉴可能。从比较法视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80条规定,“以抵押权担保之债权,其请求权已因时效而消灭,如抵押权人,于消灭时效完成后,五年间不实行其抵押权者,其抵押权消灭。”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允许抵押权在被担保债权诉讼时效经过5年后消灭,放宽了抵押期间上的必须以债权消灭而消灭的从属性要求。^[10]引以借鉴,在确保抵押权从属性的现有理论基础之上,从属性内容也可以应实践和立法目的的需要而相应放宽。

第三,现行制度亦有例外情形。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早已出现了突破抵押权从属性标准意义上的规定,例如最高额抵押权和最高额质权制度的蕴意为未来债权尚未确定,抵押权就已经存在,显然突破了抵押权成立上的从属性原则。可见,立法者并不完全遵循严格解释之道,进行从宽解释才是顺应时代之举。

综上所述,抗辩的从属性包含在抵押权从属性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未超出合理预期。抵押权从属性的含义应当随着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发展的新需要而相应调整变化。

(二)抵押期间是抵押权从属性的表现

主张“抵押权从属性说”的学者认为,抵押期间不是一种独立的期间制度,仅仅只是抵押权从属性的体现,在主债权因罹于时效而无法获得人民法院保护时,抵押权也不再受人民法院的保护。^[6]由于从属性特质,抵押权与被担保的主债权关联紧密,故抵押权的存续必须要以主债权的存续状态为参照,即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与抵押期间同频共存。从“从属性”角度对抵押期间定性,既能回避一般时效制度的适用规则,又能契合抵押权自身的权利特征,显然是已有解释中最合理、最可取的一种。《民法典》第419条将抵押期间与主债权诉讼时效挂钩,只是遵循抵押权从属性的特性,并非刻意创造或适

用某一期间规则,这种摆脱常规期间规则的立法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创新之举。

(三)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不能约定抵押期间

《担保法解释》第12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民法典》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延续该规定,对于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是否可以约定抵押期间,尚未形成定论。

“肯定说”认为保证制度和抵押权都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职能,因此可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692条第2款关于约定保证期间的规定。^[11]“否定说”认为,物保与人保制度存在实际差别,物保以物的价值为保证,人保的核心是信用,^[5]不能仅因二者都具有担保功能而类推适用。由此可见,抵押权能否类推适用保证制度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成为抵押担保关系当事人能否约定抵押期间的重要争论点。

尽管在立法层面,《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0条通过列举加兜底的立法方式,明确抵押权类推适用的合法性;亦有观点指出,人保与物保并无本质差别,尤其是在主体、内容、目的、效果等方面相似,因此二者可以一体适用;^{[1]22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抵押期间的约定并不在第20条具体列举的七种类推情形之内,且对于“等”所包含的内容,《担保制度司法解释》也没有一个细致的说明,所以具体到约定抵押期间能否类推适用的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推敲。除了完成相似性的考量,进行体系上的检验也是必要的,即考察参照适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将其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进行检验,确保参照适用的价值判断结论不能与其他规定相冲突。^[12]应用到该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民法典》第419条属于命令性规范,“应当”二字将抵押期间限制在主债权诉讼时效范围内,也就排除了当事人之间约定抵押期间长于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可能。再者,若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间短于诉讼时效,即主债权诉讼时效未届满而抵押期间届满,抵押权实现的条件具备后,抵押物必须提前偿还债权,这样的约定排除债务人的首要义务,明显违背抵押权设立的目的,对抵押人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至此,依照简单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抵押期间只能与主债权诉讼时效同步,当事人的约定行为不具有理论可行性。除此之外,因为抵押担保的信赖取决于抵押物的价值维系,若允许当事人约定抵押期间以限制抵押权的效力,将使抵押物的价值受损,进而降低抵押担保的诚意,甚至可能以一方强势地位造成显失公平的法律后果。所以,禁止当事人约

定抵押期间是平衡双方利益之举也是逻辑必然。

四、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对抵押关系产生的具体影响

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按“抗辩权发生说”的主流观点,债务人获得时效抗辩权,抵押人基于抵押权的从属性同样享有债务人的时效抗辩权以对抗抵押权人的权利请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间进行了时效化改造的背景下,抵押权人未在法定执行期间内申请执行,即使该债权已经人民法院确认,同样丧失法律强制力保护^{[1]395},即抵押人可以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或抵押权执行期间届满后作出援引或放弃时效抗辩的行为。并且,按照《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20条担保物权参照一般保证制度的规定,即使债务人放弃时效抗辩,抵押人也能自行主张抗辩。

(一)抵押人援引主债务人时效抗辩权后的效力

1. 对抵押人来说,抵押权不受人民法院保护,意味着排除法院强制执行,抵押物不会被折价或拍卖、变卖以抵偿债务。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59条的规定:“……抵押人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请求涂销抵押权登记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抵押人可以通过请求注销抵押权登记,排除因物上抵押权登记阻碍对抵押物利用的限制,防止抵押权人以物上登记的存在作为主张抵押权的理由。同时,注销抵押权登记亦会导致抵押权丧失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抵押权登记注销的理论依据在于抵押权罹于抵押期间会导致抵押权对抗第三人效力的丧失。登记公示方式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手段,旨在使第三人知晓,保持抵押权稳定。因此,注销抵押权登记是抵押权丧失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外在体现。^[7]

2. 对债权人来说,其无法通过法律强制性手段主张抵押权实现。若债务人同样主张时效抗辩,则债权彻底失去法律意义上的实现可能性。

3. 在第三人提供抵押担保中,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抵押物不再遭受被强制执行的风险,进而恢复到稳定状态。抵押人本因物上抵押权的存在而使得物权受到限制,若申请注销抵押权登记,则抵押人享有完全物权。抵押物消除物上限制,更加便于发挥其经济价值。

4. 一物上设立多个抵押权的,各个抵押关系互不影响。按照《民法典》第414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因登记时间或是否登记而产生抵押权先后清偿顺序的,若先顺位抵押权到期产生时效抗辩,先顺

位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并不影响后顺位抵押权效力;按第3款的规定,若多个抵押权均未登记,不存在清偿先后顺序。其中某一未登记抵押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而被主张时效抗辩的,不影响其他未登记抵押权获得清偿的效力。并且,因抵押人对该未登记抵押权主张时效抗辩,该抵押权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实现可能,该未登记抵押权也不应当参与按债权比例分配清偿数额的环节,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仅由其他未登记抵押权按债权比例清偿。

(二)抵押人放弃主债务人时效抗辩权后的效力

1. 对抵押人来说,放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产生的抗辩效果意味着自愿履行担保义务。参照《民法典》第192条第2款的规定,抵押人不得再以诉讼时效经过为由主张时效抗辩。同时,因主动放弃主张时效抗辩的权利,抵押人也不得请求抵押权人返还已经取得的抵押财产。

2. 对债权人来说,因抵押人自愿履行抵押义务,抵押权重新受到法律保护,债权能因抵押物价值抵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债权人获得利益具有合法基础,不构成不当得利,对于抵押人返还抵押物及折价金额的请求可予拒绝。

3. 在第三人提供抵押担保中,抵押人与债务人的行为意志相互独立,其自愿履行行为仅代表抵押人自身愿意以担保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等方式抵偿债务,与债务人意志无关,因此抵押人不得向债务人追偿损失利益,除非债务人也自愿履行自然债务。

五、《民法典》第419条类推适用问题

关于《民法典》第419条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权、留置权的问题,《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44条第2、3款依据不同的公示方式作出不同解释: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类推适用第1款关于抵押权的规定;留置权、动产质权和以交付为公示方式的质权不受主债权诉讼时效的影响,但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有权请求拍卖、变卖留置财产、出质财产以清偿债务。笔者认为公示方式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区别适用的理由,相反,《民法典》第419条规定应当类推适用于质权、留置权,原因如下:

第一,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留置权人、质权人的占有状态并不代表持续行使权利,也不意味着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权人、出质人自愿履行。留置权和质权(排除以登记为公示方式的质权)均以转移占有为特殊要件,留置权人、质权人占据财产的法律意义在于成立留置权或质权,以担保债务履行。若留置权人、质权人占有留置物、质物的

状态代表持续行使留置权、质权,则其怠于行使债权请求权而导致债权无法实现的不利后果将完全可以转嫁于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承担。这样的做法明显逃避债权时效制度的惩罚,对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来说是极其不公的。此外,占有行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早已发生,行为成立之时并不具有清偿时效届满之债务的目的。^[11]留置权人、质权人持续占有状态同样不能成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自愿履行的默示表现。

第二,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应当可以行使返还原物请求权。首先,基于上述分析,占有行为并非债权人持续行使权利的表现,留置权人、质权人行使留置权、质权应当以主债权诉讼时效为界,时效届满后丧失留置物、质物占有的正当理由,属于无权占有。其次,赋予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返还原物请求权,有利于财产充分利用和再流转。最后,财产脱离留置权人、质权人占有,使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所有人、出质人享有无负担的完全物权,其效果相当于抵押人请求注销物上抵押登记,两者应属同一法政策效果。^[4]

第三,类推适用于留置权、质权具有正当性。在实务中,司法实践为了方便类案处理通常采纳同意类推适用的做法,例如,“天津市肉类协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白堤路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关于质权诉讼时效问题应该参照适用抵押权行使期间的法律规定。^④理论上,有学者认为抵押权、质权、留置权都属于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三者应该同等适用规则,保证担保物权的内部和谐。^[3]因此,留置权、质权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19条具有实务便捷性和理论合理性。

六、结论

《民法典》第419条“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的含义,依照“抵押权从属性说”解释可以理解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主债权因时效抗辩不受法律保护,抵押权基于从属性同样不受法律保护。主债务归于自然债权不消灭,抵押权同样不消灭。本文以“抵押权从属性说”为理论基础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抵押权从属性应当进行扩张解释,时效抗辩包含在从属性内涵之中。第二,抵押期间性质只是抵押权从属性的体现,不是一种独立的期间。第三,当事人不能够约定抵押期间。第四,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若抵押人援引时效抗辩权,债权人无法因抵押关系受偿,抵押人可以申请注销登记,物上保证人

因登记注销享有完全物权。一物上设立多个抵押权的,各个抵押关系互不影响。若多个抵押权均未登记,其中某一未登记抵押权因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而被主张时效抗辩的,不影响其他未登记抵押权获得清偿的效力,且不参与按债权比例分配清偿数额的环节;若抵押人放弃援引时效抗辩权,债权人因抵押人自愿履行而不构成不当得利,同时,抵押人不得请求债权人返还抵押财产。物上保证人抵偿后不得向债务人追偿损失,除非债务人也自愿放弃时效抗辩。第五,《民法典》第419条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质权、留置权。

注释:

- ①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民终4610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1民终7355号民事判决书。
- ②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4民初6475号民事判决书;参见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0民初20814号民事裁定书。
- ③参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26民终2136号民事判决书。
- ④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1民终42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

-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
- [2]王利明. 物权法研究:上册[M]. 4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44.
- [3]孙雄. 论主债权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抵押权效力:以《民法典》第419条为分析对象[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9):91-96.
- [4]高圣平. 论时间的经过对抵押权行使的影响:基于民法典实施之后的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J]. 比较法研究,2023(2):44-59.
- [5]徐方亮. 民法典第419条:抵押权存续期间的解释论[J].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08-119.
- [6]邹海林. 抵押权时效问题的民法表达[J]. 法学研究,2018(1):52-66.
- [7]郑永宽. 论抵押期间的性质与效力[J]. 法学家,2022(3):160-172.
- [8]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435.
- [9]李运杨. 论担保从属性的类型及其突破[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53-164.

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与实效提升

李德恩

(九江学院 法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助力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第三人的诉讼担当、形式当事人概念的提出为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的分离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为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检察环境公益诉讼成为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演进在中国的实践成果。为了提升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实效性,立法应该基于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补充性、修复性等特点进行完善;检察机关需要更加重视支持起诉工作,更加重视审判程序、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加强对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使用效能的监管。

关键词:诉讼担当;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检行协同;实效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8

中图分类号:D92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48-07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降,科学技术的发展巨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大自然提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以毁坏环境资源为代价,将产生灾难性后果。1972年6月5日,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会议将6月5日确定为世界环境日,呼吁各国政府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公约和行动计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既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履行环境保护国际义务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绿色发展以协调、环保、可持续为目标,强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强调资源利用的永续性以及发展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绿色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加

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加大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仅积极开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且大力支持依法享有诉权的社会组织开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助力绿色发展、护航绿色发展。环境的司法保护需要整合司法机关、相关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力量,多方协同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2023年9月7日公布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检察公益诉讼法》被列入一类项目,《公益诉讼法》也一并考虑。在此背景下,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原告资格的法理依据

(一)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的演进

无救济则无权利,诉至法院的能力乃是法治的基石。^[1]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赋予民事实体权利关系主体的诉讼资格,诉讼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资格的统一是民事诉讼最理想的当事人格局。这是因为民事诉讼程序只有在当事人积极参与的基础上,法院

收稿日期:2023-10-03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人民为中心视阈下司法公信力系统提升研究”(21FX07D)

作者简介:李德恩(1969—),男,四川隆昌人,法学博士,九江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

才能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裁判。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自身与纠纷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最有意愿、最有动力寻求诉讼救济并且提供证据用于证明其主张,说服法官支持其主张。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加诉讼是诉权行使的表现,将实体意义的诉权与形式意义的诉权结合在一起,具有保护权利的正当性与推进诉讼的实效性,更能妥当保护民事实体权利,得到了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认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的起诉条件首先就对原告提出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立法在普遍承认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当事人能力后,自然人的两种资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在普遍承认法人的目的范围内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普遍的当事人能力后,法人的两种主体资格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统一。^[2]假设工厂排污导致鱼塘的鱼大面积死亡,鱼塘主得因对鱼的所有权或对鱼塘的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鱼塘主集权利主体与诉讼资格于一身无疑应该得到法律的支持。

但是,严格的实体当事人理念对应的是私益诉讼,并不能对所有民事权利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提供理论支持。民事主体与诉讼资格实现完全统一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民事权利主体都愿意而且有足够的财力与能力提起诉讼保护自己的权利;二是实体权利和权利主体恒定,并且都得到了立法的确认。^[3]遗憾的是,两个前提都难于成立。民事主体缺乏诉讼能力或怠于行使权利的情形比比皆是;新兴权利、权利主体不明确分散权利不断产生,立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成为常态。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得实体权利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使得个体对社会的依赖性增加,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处于变动不居的模糊状态,变得难于准确界定。对分散权利的保护已经对人类进步,也许人类生存变得至关重要。^[4]墨守实体当事人的理念,只有实体法律关系人才行使诉权将使得诉讼解决纠纷、保护权利的功能受到巨大限制。诉讼程序应该走在实体法律之前给予新兴权利、分散权利予以保护。如果工厂排污导致大面积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受害人从具体的类似于鱼塘主之类的个体扩展至抽象的国家、社会公众,环境私益受损可以由鱼塘主提起侵权民事诉讼,环境公益谁来保护?谁是权利主体,谁有资格提起诉讼呢?实体当事人概念的诉讼理论显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该实现扩展,诉讼担当、形式当事人概念的提出推动了诉讼资格理论的发展,诉讼资格不再完全依附于实体权利而存在。早在

19世纪末,德国学者考拉已经对实体的当事人概念提出了异议,并试图以形式当事人的概念取而代之。一方面,考拉肯定了第三人的诉讼担当,另一方面,以“以其名义进行起诉或被告之人”之定义对当事人的概念进行形式化把握,与实体的当事人概念相对,这就是所谓的形式当事人的概念。^[5]²⁰⁸形式当事人不再强调当事人就是实体权利主体,与诉讼代理人不同之处在于以自己而非被代理人的名义起诉或应诉。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外的第三人的诉讼担当在很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日本学者高桥宏志给出了诉讼担当的明确定义,第三人替代诉讼标的之权利义务主体(或与权利义务主体同时)持有当事人资格,并且该当事人承受的判决效力也及于权利义务主体的情形,就被称为第三人的诉讼担当。^[5]²¹⁶日本立法也对诉讼担当的当事人进行了相应规定。《日本民诉法》第115条第1款第2项规定,“当事人为他人利益而做原告或被告的情形下”,判决效力及于“该他人”^[6]。

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的演进具有重大的程序法价值,破除了检察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和有关组织等非权利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障碍。民事诉讼正当当事人理论的演进与实践还具有发展实体法的功能——在新兴权利得到立法确认之前,首先赋予相关主体的诉讼资格而予以司法保护,司法对新兴权利的普遍保护又为立法确认新兴权利创造条件、产生倒逼。名誉权、采光权等权利的产生都经历了从司法保护再到立法确认的过程,而数据权、环境权等正在经历这一过程。因而可以说,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的分离不仅是特殊的权利保护机制,而且成了一种权利发展机制,促进国家立法不断扩大民事权利的范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样可以发挥权利保护和权利发展的功能。我们有理由期待,不仅环境私益、环境公益都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得到保护,环境权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进入实体法律规范之中。

当然,形式当事人、诉讼担当的概念并非意味着放开诉讼资格的限制。民事主体都能够为他人利益而成为当事人的诉讼担当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否则难免出现滥诉的情况。任意的诉讼担当需要得到实体权利人的授权方可为之。美国的集团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都是任意的诉讼担当。我国《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如果众多的鱼塘主因为工厂排污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代表其他鱼塘主主张权利,是诉讼的当事人而非代理人身份。法定的诉讼担当一般基于对他

人权利和法律关系拥有管理权而产生,比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等。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检察机关的诉权需要法律加以规定而不是取得权利人的授权,下文将聚焦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进行论证。

(二) 检察机关原告资格的立法演进

如果说正当当事人理论演进奠定了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那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则成为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依据以及现实逻辑。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资格。该规定并没有明确机关和有关组织的具体指向,而是相当于一个授权性规范,授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标志着我国在诉讼法层面首次实现了对传统原告起诉资格制度的历史性突破。^[7]随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相继修订,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协会以及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被确认,成为《民事诉讼法》第55条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专门针对审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了安排布置。这一时期,虽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破冰和尝试早已开启,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仍然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规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不仅是检察制度改革,也是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民事诉讼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将有望扩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除了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外,还要以当事人或支持起诉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出现。不出意料,201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专门针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即在第55条内增加一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该规定在2021年修

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8条中得以保留。2018年《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扩展至英雄烈士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保护,起诉条件是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此后5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逐年大幅增加,2018年为10万件,2019年为11万余件,2020年为15万余件,2021年为16.9万件,2022年为19.5万件。在检察机关办理的公益诉讼案件中,很多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最近5年共计39.5万件,2022年已经达到9.5万件。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单独提起,也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提起。司法实践中,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更多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提起,这是由检察机关同时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不论何种诉讼形式,在检察机关和其他环保组织同时拥有诉权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起诉的条件下,检察机关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止一个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5条的规定其可以作为共同原告。

二、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省思与完善

(一) 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兜底地位的维系

虽然《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并不高。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人员配置专业性不强,经济实力弱小,导致证据收集能力不足,无力承担诉讼费用等。在环境破坏、环境污染行为发生后,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机关和组织或者符合条件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仍然不介入的话,就意味着环境公共利益得不到保护。因此,《民事诉讼法》规定在此种情形下,检察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拟制的程序利益主体获得原告资格,打破了实体当事人理念下原告资格制度的局限性,明确了检察院适合作原告,以发挥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和参与诉讼方面的优势。^[8]“可以”一词蕴含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并非必须承担的法定职责,而只是允许处分权利之意,可能导致环境公共利益遭受损害而无人保护的局面,客观上导致对损害环境行为的纵容。

一般而言,诉权既然是民事主体的权利而非义务,当然应该允许权利人选择放弃。但是,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应该受到一定限

制,尤其是对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机关而言。原因在于公益诉讼的原告并非实体权利的主体,享有完整的实体权利处分权以及直接影响实体权利实现的程序权利处分权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笔者建议将《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中的“可以”修改为“应该”,使得检察机关在履行督促和建议的职责后,在仍然没有机关和组织起诉的情况下,必须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兜底起诉人,担负起民事诉讼中维护公共利益最后防线的重任。

(二) 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反思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已经得到立法确认,但其实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制度以及实践层面加以改进,以彰显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预设功能。

第一,能够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范围过窄。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市(分、州)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第一审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将基层检察机关排除在有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之外。对于基层检察院而言,如果在其办案过程中发现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需要提起公益诉讼的,只能报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办理。上级检察院认为应该提起公益诉讼,还要依法公告30日,在没有法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的条件下,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在经历漫长的上报、审核以及公告时间后,证据的收集固定受到影响,损害环境行为的危害程度可能进一步加大,非常不利于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当前赋予基层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权利迫在眉睫。^[9]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或许是考虑到公益诉讼案件社会影响大而且数量不多的特点。但是,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数量急剧增长,全国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市级检察机关分别只有三百多个,办案压力越来越大,很有必要做出改变了。改革应该从法院对案件的级别管辖开始,或许尝试允许公益诉讼数量多、人员配备充足的基层法院受理公益诉讼的案件,对口设置的区县级检察院则相应具有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第二,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对当事人平等的民事诉讼结构产生影响。学界对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最为担忧的是其“多重身份”的问题。^[10]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既包括刑事诉讼公诉权,也包括法律监督权。在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又增加了原告身份。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会一定程度破坏当事人地位平等的诉

讼结构。我国立法规定起诉优先权的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同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是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承担起尽量督促机关、建议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并且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当事人身份参加民事诉讼的职责,确保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一定能够得到落实。也就是说,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最适宜的身份是支持起诉人,而不是原告。另外,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该谨慎行使提出检察建议、提起抗诉等法律监督权,以避免对法院公正裁判形成不当压力。此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督企业承担环保义务、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自身职责上,甚至可以针对拒不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第三,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出现变异。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没有法定的机关和组织或法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时,人民检察院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换言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补充性。这种补充性要求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须经历诉前程序。2015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必经的两道诉前程序,即依法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和建议辖区内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设立增强了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者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发挥了诉前程序的分流作用。^[11]诉前程序的设立还可以激发社会组织公益保护的热情。经过诉前程序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检察院才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将诉前的督促和建议程序改为了公告形式,使程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人民检察院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环境公益诉讼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明确规定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方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在司法实践中,环境保护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例很少,检察机关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案件。《202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最近5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39.5 万件,年均上升 12.5%。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优先权,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具有补充性。一个本应“补位”的原告主体资格却成了最主要的原告主体资格,其合理性值得思考。^[12]只有充分发挥相关行政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检察机关才有可能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真正退居补位位置,切实发挥环境司法保护补位、兜底的功能。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采取两项措施以鼓励检察机关之外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首先,应该允许社会组织提起诉讼所产生的合理费用从环境损害赔偿金中得到弥补;其次,检察机关应主动加大支持起诉的力度和广度,增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职能的效能^[13],贯彻环境保护中的多元共治理念。

三、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检行协同

(一) 审判程序中的检行协同

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使得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成为必然要求。诉讼程序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程度、范围等事实的认定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环保、农业等相关行政机关拥有比司法机关更为专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和更为先进的技术装备,有能力为司法机关提供专业帮助。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过程中,在收集证据、起诉和举证环节要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展开合作,以准确认定事实、判断法律责任。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被告行为的违法性、主观过错程度、损害赔偿的幅度以及生态环境修复效果等的认定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都会影响被告最终承担的法律后果。相关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对诉讼程序的运行非常重要,有责任参与到诉讼之中,协助检察机关完成诉讼程序。

行政执法以及公益诉讼都需要确实充分的证据。检行协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证据收集与运用的衔接。一般而言,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承担,当事人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才能申请法院调取或者法院依职权调取。《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第 4 条规定,人民法院因审理案件的需要可以调取涉及被告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环境许可和监管、污染物排放情况、行政处罚及处罚依据等证据材料。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对外提供的材料外,环境保护部门应该向人民法院提交。检察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乃是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拓展而产生,其诉前程序设计是为了贯彻环境保护中的行政优先原则,提高环境保护、环境纠纷解决的效率。检察机关在获取相关

行政机关的支持上比社会组织更具有优势,不存在不能自行收集证据而需要法院调取的情况。检察机关应该在诉前调取需要的证据,以准确判断案情,依法提出诉讼请求,顺利推进诉讼。检察机关如果认为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履行监管职责,放任环境违法行为发生的,可以制发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执法行为,争取在诉前解决环境纠纷或为诉讼收集证据,以实现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中行政执法与司法协同机制的建立。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第 16 条要求,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再次提出加强生态环境修复与损害赔偿的执行和监督,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这些规定将检察机关置于国家的环境治理体系之中加以定位,为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加强与相关行政部门的协同提供了保障。

(二) 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

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实效性不仅体现在是否获得了胜诉的结果,更体现在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上。案件胜诉只是救济合法利益之路的开始,倘若裁判得不到执行,即使获得胜诉,也是一场尴尬的胜利。^[14]在执行阶段司法机关明显存在专业性缺陷、整体性考量不足以及人员配备不充分等问题,无法有效组织生态环境修复。^[15]如果缺乏各方合作,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因为胜诉得到改观,环境公益诉讼的胜诉真有可能成为尴尬的胜利。司法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修复监督主体不明、生态环境修复后续跟踪不力、监督机制缺乏,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修复的成效差。^[16]政府主导的生态环境修复存在效率不高和违规使用的问题。修复费用进入财政账户后,资金使用申请程序烦琐、易进难出,绝大多数都是“沉睡”在账户上。^[17]沉睡账户的生态环境修复资金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采用信託管理的生态环境修复方式则因为信託公司的经营性和盈利性,存在职业道德失守和资金滥用风险。作为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资金使用及时性、合规性、有效性的监管,重视与行政机关在执行环节的合作。

生态环境修复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机关都无法单独完成。由于生态环境修复所具

有的专业性以及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使得生效裁判中有关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往往需要依赖行政权。^[18]环境等相关行政机关在能动性、灵活性、效率性以及专业性方面具有优势,介入裁判执行阶段可以保证环境修复的最佳效果。2022年4月,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6条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是国务院授权的省级、市地级政府(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以指定有关部门或机构负责具体工作;并在其中第13条和第14条对有关行政机关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的任务分工作了安排,确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分工指导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该规定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出台,但其对相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分工,尤其是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修复方案编制等任务分配的规定,依然能够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处理类似事项提供依据。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要追求胜诉的结果,还有责任积极参与判决的执行,发挥诉讼对环境损害的补救修复功能,防止判决成为法律白条。由于环境修复的方案制定、效果评估等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检察机关在判决执行阶段同样应该加强与人民法院、相关行政机构的合作,必要时可以通过政府协调或通过人民法院商请相关行政机构介入判决执行程序。

各地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方式不一,对修复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西省的检行合作多以检察机关、相关行政机关共同作为环境修复监察人的形式出现。2022年6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六起环境公益诉讼涉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典型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法院委托江西思华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会等生态环境修复专业机构承担环境修复工作成为常态化模式,检察机关与环保、林业、农业农村等相关行政机关共同作为监察人,对环境修复以及修复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相关行政机关负责环境修复、检察机关承担监督职责的检行合作方式也很常见。安徽淮南市潘集区检察院在当地人大常委会、政府的支持下,设立了生态环境专项账户,将收缴的公益诉讼环境赔偿金上缴财政,专款用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检察院则负责全程监督环保局、水利局等相关行政机关对环境修复资金的使用。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的密切协作,环境修复工作更能取得良好效果。

但是,执行程序中的检行协同仍然需要进一步

规范。由于《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资金的监管,致使司法实践中对于修复费用的管理和监督使用呈现多种监管主体乱象。^[19]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生态环境修复资金越来越庞大,其使用以及监管主体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一规定,以明确各方职责,发挥协同效力,避免出现推诿扯皮、资金滥用甚至中饱私囊的情况。

参考文献:

[1] 巴拉克. 民主国家的法官[M]. 毕洪海,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78.

[2] 肖建华. 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3.

[3] 李德恩. 诉讼担当的理论推演与现实环境[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87-92.

[4] 莫诺·卡佩莱蒂. 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M]. 徐昕,王弈,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376.

[5] 高桥宏志. 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念的深层分析[M]. 林剑锋,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 中本香织,陈俊达. 诉讼担当概念的比较法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3(2):30-48.

[7] 黄金荣. 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中的进步与局限:评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J]. 法治研究,2014(2):102-110.

[8] 黄亚洲,孔金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破与立:法律拟制的程序中利益主体[J]. 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555-560.

[9] 珠勒花. 对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定位的浅析[J]. 环境保护,2023,51(Z1):74.

[10] 白彦.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研究[J]. 浙江社会科学,2016(2):145-149.

[11] 于文轩,杨胜男.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J]. 中国应用法学,2019(1):68-80.

[12] 张楠,朱祥贵.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研究[J]. 绥化学院学报,2022(6):39-41.

[13] 吴海伦. 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制度[N]. 检察日报,2021-11-11(7).

[14] 严仁群. 民事执行权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2.

[15] 杨昌彪. 反思与重构: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裁判执行机制探析[J]. 青海社会科学,2022(1):155-163.

[16] 李先波,胡惠婷.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修复的困境与应对[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76-86,112.

[17] 竺效,蒙禹诺. 论生态损害赔偿资金的信托管理模式:以环境公益维护为视角[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3-93.

[18] 杨雅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3):110-120.

The Legal Basis and Effectiveness Improvement of Prosecutorial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LI De'en

(School of Law,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China)

Abstract:Prosecutorial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support green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third-party litigation undertaking and formal parties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eparation of civil subjects and litigation subjects. The revision of relevant laws such as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in China provides a leg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rosecutorial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s become a prac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ory of legitimate parties in civil litiga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legisl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based on the public welfare, supplementary, and resto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rosecutorial organ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pporting prosecution work,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secu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s in trial and execution procedure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funds.

Key words:litigation undertaking;prosecutorial organs;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secutorial organs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s;effectiveness

(上接第 47 页)

83-91.

[10]张永.抵押权法定存续期间效力及性质的二重性分析:以《物权法》第 202 条为中心[J].政治与法律,2014(2):106-122.

[12]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5 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94.

[11]孙鹏.论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J].现代法学,2007(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f the Validity of Mortgage Rights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Limitation Period for the Principal Claim

——On the Article 419 of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WANG Yang, XIE Peng

(Law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The meaning of “the people’s court does not protect” in Article 419 of the Civil Code should be interpreted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mortgage subordination theory”.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limitation period of the principal claim, the principal claim is not protected by law, and in the meantime, the mortgage right is not protected by law based on the subordination. The mortgage right and the principal claim remain in existence. The defense of limit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exten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mortgage. The mortgage period is not an independent period, but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rtgage subordinate property.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nature of the instructive norms of Article 419 an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acilitating the transaction, the parties to the mortgage-secured relationship cannot agree on the mortgage period on their own. Article 419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that it can be applied by analogy to pledges and liens.

Key words:subordination of mortgage; defense of limitation; mortgage period; analogy applies

20 世纪初期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成因的社会学分析

郭 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20 世纪初期的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可以分为外生型和内生型革命根据地。内生型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主要是鄂豫皖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内生型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成因有多种解读。利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值数累加理论”解读鄂豫皖苏维埃革命的爆发成因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土地革命不是单一因素的作用,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在鄂豫皖根据地革命爆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长时段多维度研究土地革命,对于客观公正看待中国革命很有必要。

关键词: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成因分析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09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55-06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陆续在多个地区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些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大的革命力量由外入内建立起外生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另一类是地方积蓄革命力量引发革命起义,建立起内生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些苏维埃根据地都有着“富而不庶”“偏而不远”的共同特征,但社会结构特征却千差万别,因此很难用一种理论解释土地革命的成因。本文以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爆发为例,运用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理论,分析这一问题。

一、引言

对于鄂豫皖苏区的研究,学术界着重从鄂豫皖苏区的党建、执政经验和历史过程方面进行探究,从中寻求土地革命爆发的成因和经验。学术界对土地革命爆发的共性因素阐述的较多,而对各个革命根据地个性因素研究较少,但广大农村社会巨大的差异性导致土地革命爆发成因的诸多不同,这些差异是不同地区土地革命成败的关键。随着社会史和新革命史研究的兴起,从新的角度和综合多学科方法

研究革命成为新的热点,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土地革命背后的社会因素,思考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比如土地革命时期的赣南、闽西固然环境封闭、经济落后,但维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区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心态,而地权更是属于分散地区,从经典的思路中很难找到其成为革命中心的缘由。^[1]不少学者认为鄂豫皖地区的革命爆发是土地兼并过度,但这样的苏维埃革命成因分析略显简单,难以阐明革命成因的复杂性。也有学者认为鄂豫皖地区革命是早期共产党人利用“社会资本”在鄂豫皖地区人为制造出来的。^[2]但这过度强调了主观性,忽略了地区多种差异。也有学者认为,在大别山地区,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并不代表着这一地区就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复杂的环境使得中共不可能仅仅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就能动员农民为其所用。^[3]海外学者对鄂豫皖地区革命爆发的原因多归结于集体记忆、历史意识及其他日常文化实践。^[4]这些结论多倾向于某一因素主导鄂豫皖土地革命的爆发。实际上苏维埃革命的爆发是诸多因素在复杂机制运作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解

收稿日期:2023-06-19

基金项目:2023 年度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市发展治理研究”(232400410267)

作者简介:郭凯(1979—),男,河南新密人,历史学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社会史。

读难以阐述苏维埃革命的复杂性。本文借鉴社会学中的“值数累加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分析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爆发成因，探究共性背后的个性。

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 1962 年提出了“值数累加理论”，他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一是结构性有利条件；二是结构性紧张；三是概化信念的形成和传播；四是诱发因素；五是对参与者的行动动员。这五个因素是推动社会运动进行的因素，属于促进因素。而第六是社会控制的运作，而社会控制的运作可以发生在五个促进因素的任何环节，属于阻碍因素。斯梅尔塞进一步强调，前五个因素存在着递进关系，并且对集体行为发生的促进作用也是递进排列，只有在前一个因素具备的前提下后一个因素才可能发生。在斯梅尔塞看来，只有五个因素同时具备，并在与第六因素社会控制的角力中胜出之后，集体行为才可能发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六个因素都是集体行为（或社会运动和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5]这一理论着重在于分析社会结构和事关集体运动的因素，将诸因素分为促进和阻碍因素，以促进因素与阻碍因素的互动角力为运作机制，阐述社会运动的发生逻辑。革命本质上也是社会运动，也遵循社会运动的某些规律。因此用“值数累加理论”阐释鄂豫皖地区的苏维埃革命，或许对我们审视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根据地社会有另一番景象。

二、鄂豫皖地区土地革命爆发因素分析

斯梅尔塞将前五个促进因素以递增的数列排序，他认为这些因素的作用是促进作用，并且以此递进推动社会运动发展。但“值数累加理论”是基于分析规模形式不一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而革命是由多种形式、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运动组成，五个因素显然不可能机械地按顺序发生作用，而是与社会控制因素相互交织角力共同起作用。

（一）鄂豫皖地区社会经济危机重重

结构性有利条件主要是指鄂豫皖地区地处偏远山区，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容易产生大量的贫农雇农等贫困人口。20 世纪初期的鄂豫皖地区正是处于经济危机加剧、乡村社会日益穷困的境地。清末的中国农业经济就已经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气候、世界性经济危机、国际战乱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农业经济。受农业经济危机的影响，中部地区农村社会土地不断集中，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如豫东南的信阳县，从 1921 年到 1926 年，自耕农由占农户的 39% 下降到 32%，佃农则由 40% 增加到 52%。光山县“大半自耕农不得不另外租种别人的田地变

为半自耕农，最不幸的甚至于积债累身，逼到卖掉自己所有的田地，还清债以外，剩余的只够租种地主田产的押金，而变成完全的雇农”^[6]。到 1935 年，潢川县佃农雇农占总数的 75.8%；罗山佃农雇农户数占总数的 37.45%；光山佃农雇农户数占总数的 55.2%；经扶（新县）占佃农雇农户数占总数的 58.1%。^{[7]154-155}这表明 20 世纪初期的豫南，大多数农民长期处于无地和少地境况。湖北情况也较为类似，从 1931—1936 年间，全国自耕农比例在 45%—47% 之间浮动，而湖北则是 28%—33% 之间，自耕农比例湖北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范围内佃农的比例在 29%—31% 之间，而湖北则是 38%—42% 之间，佃农比例湖北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湖北半自耕农的比例则稍高于全国平均比例 3 到 7 个百分点。^[8]但农民中自耕农的比例多少并不意味着有革命意愿和渴求土地的群众的多与寡，只是表明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比如在江西，革命组织发展很好的万安县是自耕农占多数；在鄂西、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等县革命势力发展很快，这几县也都是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在这几县的割据区域，分不清地主与佃农，以致土地问题无从解决。^[9]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能说明自耕农较佃农有更强的革命意识，而是在当时“实际上一家种很少的自田而必须外出当雇工的自耕农，比起一家租种很多农田而大批地雇工来耕种的佃农，还要贫穷得多”^[10]。但无论如何，自耕农的减少表明当地土地兼并的增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种生活水平的下降，将农民不断陷入绝对贫困之中，雇农已经很难翻身立足。如 1935 年豫南潢川、商城、息县三地的土地价格约为上等水田最高价为 40—30 元，普通 30 元，最低 10 元；旱田最高 15 元，普通 10 元。而粮食中高产的稻谷产量也只是一石到四五斗之间。^{[7]475-477}再以 1935 年豫南地区雇工的工资为例，1935 年农业工资长工（年）工资最高为潢川 25 元，罗山 25 元，光山 25 元，息县 40 元，经扶（新县）12 元；经扶县（新县）列河南最后一名。^{[7]158}以此数据类推，一个豫南雇工若想买一亩中等水田，要耗时 3 年多的时间，那么按照人均 5 亩地为最低的生活标准计算，一个雇工要想从无到有置办好家业，需要 15 年以上的积蓄，所以只是依靠雇工工资不大可能实现。显然，在南京民国政府所谓的最好十年时间（1927—1937）中，鄂豫皖地区的农民生活依旧困苦，依旧是贫穷的代际传递，赤贫人口不断增多。

（二）租佃关系紧张，贫富差距加大

结构性紧张因素主要是指在鄂豫皖地区由于农

业生产力的不同,容易产生巨大的贫富差异和相对剥削感。实际上鄂豫皖地区的农业土地兼并过度并不足以完全引起革命。1950年初在对湘、赣、鄂、粤、豫五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江西和河南一起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11]地权的集中程度只能代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还要取决于土地的生产力,取决于地主与佃农的租佃关系。^{[7]476}据1931—1934年统计,湖北主要的农作物大多数在播种面积、总产量、亩产量上均位于全国前列,据时人估计这一时期湖北省的土地生产力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土地生产力高和土地收入的增加,使得湖北省的佃农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兼并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三分之二的农民都要依靠租佃生活,租佃关系的稳固与否直接决定着农民的生与死。租佃关系中地主阶层的经济状况和剥削程度决定着农民与地主两个阶层的关系紧张与否,而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地主是否主要依靠土地营生。鄂豫皖山区大多数地主依靠地租为生时,租佃关系就容易紧张。比如鄂北地区的农户,尽管可以从农业生产中有所得,甚至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因地租比重高,仍难改变寅吃卯粮的苦难生活。大冶农家负债是普遍现象,负债农家占到了全县的2/3,其幸不负债者,也非将生活费用降低至极少的程度不可。^[13]在黄安成庄村,20家农户有12家负债,平均每户负债43.75元。而当时一家4口人每年的最低消费需要137.75元,至于教育、医药、婚丧、房屋修缮等费用还不计算在内。^[14]鄂豫皖交界的鄂北地区尽管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土地生产效率有所增加,但地租比例高,土地兼并的趋势未有改变,农民生活依然困苦,多数农户苦苦挣扎在破产的边缘。豫南农村也是如此,对于农民最致命的是“因受土劣之剥削,军队之骚扰,土匪之抢劫,益以频年荒旱,已达十室十空之景象,其真正痛苦,即在于此”。商城县农民“丰年可享农村之乐。唯近年,雨遭凶荒,农村破产,一般农民,多不能聊生”^[15]。农民生活贫穷的原因除去地租之外,高额的赋税也导致农民收入入不敷出。南京民国政府从1927年开始田赋制度改革,但始终难以遂愿,湖北省的限制田赋附加,因各县积习太深难见成效,终至1936年,全省各县附加总数仍平均超过正税的3倍。暴涨的地方赋税和难以控制的支出,加之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在天灾人祸的情形下地主阶层就变为贪婪的唯利是图者,租佃关系异常紧张导致农民难以生存,租佃关系就成为结构性紧张因素。

鄂豫皖地区也并非全部落后于其他地区,在这个狭小地区内还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地区,而这种相对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共存的现象,造成了鄂豫皖地区社会的“断裂”状态。比如麻城和黄安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比如湖北麻城距离武汉较近,20世纪30年代后期,麻城宋埠已经有800余家商业企业。清代黄安的商人曾经遍及上海、武汉、沙市、襄樊、重庆等地,被当地称为“黄帮”。甚至出现黄安县南部地区的一个佃农的收入水平与北部地区的一位私塾老师收入水平大抵相当的情况。在一个小区域有如此之大的贫富断层,会让普通民众产生因贫富差距过大的被剥削感。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这一段历史时就敏锐指出:“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16]也就是说,如果贫富之间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的话,这样的贫富差距就是革命爆发的动力之一。在同一地区出现巨大的社会贫富差异,给社会造成强烈的相对剥削感,极易产生革命思想的火花和暴动的民众。

(三) 共产主义信念的有效传播

概化信念在于为集体行动提供意义,引导人们对当前形势的评估、解释和反应。尽管鄂豫皖地区生存条件恶化,阶级矛盾尖锐,阶级压迫虽可以引发农民的反抗行动,却并不能激发民众形成鄂豫皖地区的革命运动。英国历史学家E. P. 汤普森在研究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强调,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的重要性,强调非经济因素在形成阶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阶级在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被塑造后又能主观地形成。^[17]单纯的经济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在鄂豫皖地区的革命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也只是革命爆发的诸多元素之一,真正让民众走上革命道路还是共产主义以“概化信念”的传播,以更为简洁明了的形式内容被民众所理解。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继续原有的政治主张,进一步提出要在各地广泛建立土地政权,在革命暴动的初期宣传口号多为“打倒欺骗和屠杀民众的国民党政府!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归农民!建立土地政府!”^[18]从这些宣传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共产党人仍把20世纪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矛盾集中在土地和地主之上,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是一劳永逸解决压迫的根本办法,而改善农民生活的办法就是平分土地和不缴纳赋税,但这种一言概之的论断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普通民众对此的理解仍旧停留在土地革命就是“杀富济贫”的层面之上。显然民众并不能理解共

产主义信念与自己身边生活究竟有何不同,“概化信念”只能被民众简单化理解,而将农村的矛盾聚集在豪绅和土地两个方面并不是共产党宣传的本意,但却是最能唤起普通民众参与革命的“概化信念”。而在实际革命中,仍需将其具体化,“红军标语打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须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19]。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道理难以通过说理的形式被广泛接受,反而具体到人、具体到某一事件才是概化信念真正可以传播开来并被民众所认可接受的方式,并且要采用更为简单的传播方式。在鄂豫皖地区歌谣更为方便快捷。比如与“建立土地政府,杀尽一切反动派,杀尽土豪劣绅”等标语口号来比,因为识字者少,而农民最喜欢唱歌,歌谣的宣传效力更大。现在赤色区域所有农民都唱尽革命歌,妇女小孩没有一个不记得一两首来唱。^[20]尽管是这种带有“仇视”和“价值导向型信念”的概化信念,还是极大地促进了革命的爆发,“那时的革命运动是半自发性的,……群众对党不太认识,有人说共产党是穿红衣服的,就真有人相信,所以党完全起领导作用不可能,只能起一部分领导作用。总而言之,半自发性,不完全是党领导的”^[21]。这种概化信念并不准确清晰,却因明确的目的性使得普通民众将自己融入到概化信念所描绘的愿景中去,并从中获得“愿望实现”的概化信念的承诺。

(四)土地革命暴动的突发性

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往往是集体行为的诱发因素,在“值数累加理论”中起到的作用最为突然。在集体行动中往往起到的是将客观社会条件转为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但对于革命这样大规模连续性的社会运动,突发性事件作用并没有集体行动中的关键转化作用,但却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1927年到1930年代初期,鄂豫皖地区连续发生规模不一的旱灾,豫南地区信阳县“自是十六、十七等年皆旱,十八年大旱,民国二十年四月,晡雨地震。民国二十一年旱荒,秋收十之三”^[22]。鄂北和皖西亦是如此,特别是皖西的农民暴动,就是发生旱灾最为严重的1929年。灾荒也极大地激化平时艰难维持的阶级矛盾,已经被水淹没到脖子之处的中国农民,灾荒下的暴动便成为农民求生存的唯一选择。灾荒也是苏维埃革命爆发的主要诱因之一。

对于大范围的革命而言,尽管偶尔的时机不足以影响革命的爆发,却能提升革命爆发的突发性。

以黄麻起义为例,1927年11月,宁汉军阀战争中,驻守黄安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团被调守黄陂,黄麻一带暂无正规军驻守。11月10日,农民武装在黄安七里坪撵走了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不战而胜地占领了七里坪,并组织了万人游行示威。士气高涨的革命力量,又拥有相当数量的军事武装,并且有强敌驻守,在这种有利的时机下黄安的共产党人果断地发动了黄麻起义,并获得成功。而在同年的九月的暴动中,尽管共产党人也组织武装力量打击土豪劣绅,占领集镇,但很快在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回击中停顿下来。再以商南起义为例,1928年豫南大旱,商城一带粮食收成暴减,驻军、地主和农民的矛盾空前紧张,各类小规模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在商南起义中由于上级派来的领导人的意外牺牲,商城民团武装加紧清查可疑分子,起义由原定的中秋节提前到5月发动。又比如1929年11月的六霍起义,起义前夕,共产党人就认为六安秋收不好,经济不好而民众多有抱怨;军阀忙于征战,驻地客军人少;又有快枪百余只,干部40余人,可组织3000人的赤卫队,可以领导农民由一个群众示威的形式,转变为一个地方暴动。^[23]但真正引起六霍起义时机则是1929年11月7日晚,六安三区二乡的农民协会常委兼秘书长何寿的突然被捕,导致农民协会名单和秘密文件的外泄,11月8日晨独山周围15个乡的数千农民包围独山镇敌军,解救被捕人员并占领独山镇,六霍起义全面爆发,此后又在西镇、霍山、霍邱等地爆发几十处武装起义。鄂豫皖地区的多次武装起义的爆发都有类似点,都有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且多数都因突发事件而提前发动。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暴动并非都是合适机会,但共产党人的意外被捕和敌对势力的突然进攻往往成为革命暴动的突发因素。诱发因素出现的时机往往决定着单次革命暴动的成败,也是集体行动中的关键性因素。但在革命这一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中,诱发因素并不带有决定性,在革命这类高级的社会运动中,会连续出现诱发因素,甚至是人为制造诱发因素,因此诱发因素有不确定性,不是每次革命爆发都有关键作用。

(五)共产党人对民众广泛的革命动员

“值数累加理论”认为对于集体行为发生作用最大的是对运动参与者的动员。这一因素不仅重要,更是保证由农民发起的暴动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不是旧式农民起义的关键因素。196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霍夫海因茨发表《中国共产运动成功的生态》,便提出:为什么在中国一些地区更适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使其在1949

年最终取得政权?^[24]尽管作者提出部分地区的苏维埃革命有其独特性,但他更认为地区的社会生态与是否接受共产思想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革命成功的区域多是党组织活动卓有成效的地方。

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要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思想武器,才能保证中国革命脱离旧式的农民运动,避免农民运动变成改朝换代的旧式暴动。从1922年春陈潭秋在黄冈成立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个党小组,到1927年鄂豫皖地区多数已经建立起党支部或党小组。革命思想在鄂豫皖地区传播后,鼓舞了大量贫苦出身的农民参加革命活动。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不同的是,鄂豫皖地区的知识分子对革命思想传播和发动群众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黄麻地区群众生活与穷的地方比较并不很苦,革命却搞起来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要发动农民。……一个重要的条件是革命知识分子多,农民就容易发动。”^[21]早期鄂豫皖地区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动知识分子参加党组织,成为鄂豫皖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如商城地区发动群众主要是依靠共产党员创办的商城书社,发动群众的方式主要就是吸收培养乡村知识分子成为地下党员。“工作对象是中、小学教员和中学、师范班的学生,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25]1927年10月皖西六安县有44名党员,其中42名为知识分子;霍邱县有6名党员,全为知识分子。^[26]到1930年左右,皖西的霍邱、霍山、寿县、六安、英山和合肥的共产党人共有1500人左右,其中知识分子就占到75%。^[23]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动群众,实行“以点带面”的革命思想宣传方式,共产主义思想在鄂豫皖地区迅速传播开来,随之鄂豫皖地方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底层民众也大量加入党组织。1929年5月,黄安县党员发展到800余人;麻城县党员发展到700余人;黄陂县党员发展到180余人;商城县发展党员373人;到1929年10月,皖西六霍山县发展党员207人。^[27]相比其他地区而言,鄂豫皖地区党革命宣传和动员中的中小知识分子成为鄂豫皖革命动员宣传的主力,发挥知识分子在群众的号召作用,并非常有效地动员了基层民众参与革命。鄂豫皖地方党组织的主力逐步从地方精英转变为底层民众,革命思想才能在鄂豫皖地区广泛传播起来,加之鄂豫皖地方党组有效动员底层民众参与革命组织和宣传活动,使得鄂豫皖地区产生大量的革命火种。

三、结论

作为社会运动阻碍因素的社会控制贯穿社会运

动的全过程,鄂豫皖地区的社会控制因素则主要是体现在国民党对于偏远地区发展的忽略和对于地方治理的失控。在农村陷入重重危机之下,乡绅劣化,社会秩序严重失控。20世纪初期的鄂豫皖地区社会控制的阻碍因素并没有起到控制和阻碍社会运动的作用。

复杂的社会及更为复杂的社会运动,决定我们不可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模型,并据此对任何一种集体行为、社会运动或革命给予指导性解释。^[28]20世纪初期的土地革命爆发的成因显然不是一套理论所能概括解释的,各地的苏维埃革命爆发成因各有特点,但仔细分析各地苏维埃革命成因,多少都有这六个方面的因素。因此用“值数累加理论”对苏维埃革命做静态结构性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揭示苏维埃革命爆发的成因。但这一理论的缺点也较为突出,它乐观地估计六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认为是递进增加地发挥作用,这显然不可能成立。这一理论将六因素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因其作用客观存在而可以被一定程度上地人为预测。主观因素则为对参与者的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这些条件来自革命参与者人为的作用,是参与社会运动者的主观作用,则是难以准确估计和控制的,因其作用因主观存在而难以被人为地估计和影响。换言之,客观因素可以被认为干扰,但主观因素则难以估计和影响,主观与客观因素的作用机制则更是不可测。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与因素作用机制的不可测,则是哲学意义上的弱决定论。

土地革命已经离我们远去近百年,从“长时段”和“中时段”来看,现在就“告别革命”还为时尚早,多维度认识苏维埃革命,对每一次革命作出个案研究,才能全面地看待这场改变中国和世界走向的社会革命。

参考文献:

- [1] 黄道炫. 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6.
- [2] 黄文治. 革命播火: 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 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J]. 开放时代, 2011(12): 5—6.
- [3] 陈耀煌. 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 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 [D].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 2002: 3—5.
- [4] 罗威廉. 红雨: 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M]. 李里峰,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2—4.
- [5] 冯仕政.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3—69.

- [6]曾鑑泉.各地农民调查:光山[J].东方杂志,1928(24):136-137.
- [7]河南省统计学会.民国时期河南省统计资料[Z].内部刊物,154-155.
- [8]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144-145.
- [9]万涛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11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Z].湖北省档案馆,1985:138.
- [10]陈翰笙.陈翰笙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63-64.
- [11]张根生.新区土地改革前的农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26-28.
- [12]萧铮.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M].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21079.
- [13]张培刚.成家村的农家经济调查[J].经济评论,1935:(2)10号//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M].北京:三联书店,1957:765.
- [14]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情报告[Z].1935(3):8.
- [15]贾士毅.湖北省财政史略[M].武汉:湖北省档案馆,LS2.1-1.
- [16]黄仁宇.黄河青山[M].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291.
- [17]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2.
- [18]鄂东北特委何玉林给中央的报告.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M].中央档案馆等,1985:65.
- [19]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762.
- [20]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8日)[M].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85:115.
- [21]郑位三.郑位三谈话录[Z].湖北省档案馆,GB-83.
- [22]河南省信阳县志总编辑室.重修信阳县志·点注本(1934年)[Z].内部资料,1936:751.
- [23]巡视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工作报告(1930年1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四册)[Z].中央档案馆等,1989:
- [24]王笛.寻找中国革命的历史土壤[J].中国图书评论,2008(1):91.
- [25]中共商城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商城革命史资料(4)[Z].内部资料,1989:138-139.
- [26]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2)[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8-19.
- [27]中共河南省、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359.
- [28]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5(1):20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Hubei, Henan and Anhui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UO Ka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oviet revolutionary bases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out China one after another. These bas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xogenous type and the endogenous type, and the Hubei - Henan - Anhui revolutionary bas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dogenous type. The “value - added theory” in the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 can better interpret the cause of the outbreak of the Hubei - Henan - Anhui Soviet revolution,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role of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outbreaks of revolutions in the Hubei - Henan - Anhui base areas. The theory is essential for study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over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and for view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bjectively and fairly.

Key words: Hubei - Henan - Anhui region;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cause analysis

1941—1942 年中共河南省委“撤干”始末

郭晓平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194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中央组织部和陈云部长直接领导下,河南省委紧急撤退豫西、豫中、豫西南和豫南地区区委以上干部和过“红”的党员,史称“撤干”。“撤干”的直接原因是河南党组织面临被破坏的危险;“撤干”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得经过党的公开机构;未能撤离的干部立即实施隐蔽,长期埋伏。至1942年底,河南省委共计向延安撤退干部100余名,向豫鄂边区及其他地区撤退干部300余名。河南“撤干”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取得了白区党的工作经验。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延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0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61-06

1941年初,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紧急部署,河南省委向延安以及豫鄂、豫皖苏边区等地撤退干部,史称“撤干”。被撤退者包括省委成员以及省委直接联系的部分党员干部,豫西、豫中、豫西南、豫南等地方组织区委以上干部,以及部分可能暴露的党员。至1942年底,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工作基本结束。撤至延安的干部随后参加整风学习,后期经历了错误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由于史料的缺乏,学界并未对此进行专门考察,仅见河南及相关市(地)县(区)党史基本著作概述属区“撤干”情况。^①因此,“撤干”的缘起与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撤干”的部署与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撤干”的过程、结果以及后续影响等,相关史实语焉不详。河南“撤干”缘于党的白区历史上的一次突发事件,但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以及对白区历史的评价,都有着直接关系与重要影响。本人曾参与对“撤干”时期河南省委主要领导王志杰等以及政治传达员苗树棠等的调访工作。现以历史文献和亲历者的回忆为依据,对“撤

干”始末进行梳理。

一、“撤干”起因

1938年,豫北、豫东以及豫南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河南省委所属地方组织分布于豫西、豫中、豫西南和豫南。1940年4月前后,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组织部部长危拱之、统战部部长王志杰,豫中地委书记张维桢、灵宝地委书记苗树棠、洛宁地委书记邵文杰等作为河南选派的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子久离任期间,省委宣传部部长郭晓棠代理省委书记。由于七大延期召开,刘子久、张维桢返回河南,危拱之在中央组织部地方工作科协助工作,王志杰、苗树棠、邵文杰分别在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2月,王志杰、苗树棠、邵文杰和省委交通员杜征远到中央组织部接受向河南省委传达与撤退干部的任务。对于在中组部接受任务的情形,王志杰与苗树棠、邵文杰、杜征远的回忆有一定出入。

王志杰:1941年2月初,中央组织部地方科通知我和危拱之等,陈云部长邀我们研究有关河南党

收稿日期:2023-07-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史研究”(20BDJ056)

作者简介:郭晓平(1955—),男,河南洛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河南地方史研究。

的紧急情况。陈云在办公室拿出一份电报,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我党和进步势力进攻。这份电报是刚刚破译的,从内容上看,河南党组织及一些主要负责同志似已暴露,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陈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为防止河南地下党遭到大的破坏,立即组织撤退党的负责干部。^{[1]164}

苗树棠:1941年2月20日晚,突然通知我立即到中央组织部,同去的还有王志杰等同志。在中组部地方科,我们看到破译国民党的电报,注着当天日期,表明紧迫性和严重性。从电报上看,是埋藏在河南党内的国民党奸细向其上级报告我豫西党组织内部详细情况,可以看出是潜藏在省委一级的内奸。奇怪的是,只有省委郭晓棠和洛办秘书实有其人,豫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没有一个和实际对得上号。21日,陈云和我们谈了话。下午我接到调令,晚上就搬到中组部住,同时还有王志杰、邵文杰、杜征远。第二天,中组织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2]36-37}

邵文杰:1941年2月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一个夜间我和王志杰、苗树棠忽然被叫醒,说是陈云要我们马上到中组部去,并且把行李都带上;杜征远也被从中央党校叫来了。第二天天一亮,陈云把我们叫到他的窑洞里,先传看了破译的电报。电报很长,内容是河南的国民党特务向西安特务机关报告河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情况。里面提到的人名,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是编造的。陈云说,为了避免河南地下党被破坏,中央决定撤退河南地下党干部。^{[3]177}

杜征远:1940年12月,组织上派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数十天后,陈云找我谈话,叫我停止学习,出来担任交通工作。交代的任务是下去传达指示,豫西地下党发现有内奸,撤退河南省委。^[4]

综上所述,“撤干”是中央在河南省委及所属地方组织面临危急情势采取的紧急措施。亲历者所述时间分别为1941年2月初、2月20日。据《陈云年谱》记载,1941年1月17日,陈云“同李富春致电伍云甫、李华即转张维桢、郭晓棠,告以国民党特务已知刘子久、郭晓棠和洛阳、郑州地委负责人情况,请他们查明叛徒并注意干部与组织的安全”。1月21日,陈云“致电刘子久,告其我后方干部一般均应由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同时须在适当时机内把这批干部撤退,更应当撤退已暴露的干部”。1月25日,陈云“同李富春致电彭雪枫转刘子久,说:河南

党内藏有内奸,此人已获河南省委信任,担负重要工作,去过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知道洛办情形,此人已供出省委、地委、县委主要领导人的姓名、职务等,请迅速查明此人是谁,电复应对方案”。2月23日,陈云“同王稼祥、李富春致电彭雪枫转刘子久,就预防中共豫西组织遭内奸破坏的工作作出指示”。2月26日,陈云“致电杨清,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帮助中共河南省委撤退已暴露的干部”^{[5]357-362}。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机关侦悉河南省委所属地下组织部分情况,中共中央早在1月中旬已经获知,并且至少在1月下旬致电河南省委负责人,要求查出叛徒,撤退干部。为加紧落实撤退干部的工作,中组部部署在延安的部分河南干部立即返回河南,联系省委,组织撤退,因此回忆中2月初的记述更切合实际。

河南省委领导成员及所属地委的主要负责人在“撤干”之前并无被捕事件发生。1938年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撤销河南省委及豫西特委,建立豫西省委;1939年9月,撤销豫西省委,重建河南省委。1940年初,擅自离职躲避在西安的原密县县委书记武宪周,被国民党中统西北督导区负责人、偃师同乡张炎茂策反,秘密从事特务活动。武宪周1938年曾任河南省委所属豫西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部长,此时已与河南省委和豫西地方党组织中断联系。张炎茂要求武宪周“继续打入共产党内部,盗取消息”,“找刘子久,恢复党的关系”。武宪周回河南后,没有获得刘子久和省委线索,省委也未因其叛变遭受损失。1940年12月,国民党地方当局在偃师逮捕武宪周,得悉其中统秘密身份后释放。张炎茂认为武宪周身份暴露,将其调入陕西省党部调查统计室,公开从事特务活动。1958年5月,武宪周交代这段历史时说,“到这时我才向张炎茂承认了,我当过豫西特委组织部长”,暴露了豫西特委领导成员情况,以及所知道的县委书记名字。^{[6]45}由此可见,武宪周虽于1940年初秘密叛变,但直至1940年底叛变身份被公开时,才供出原豫西特委及所属县委情况。以武宪周之前在共产党内的任职,和他从秘密到公开的叛变过程,可以解惑两个疑问:一是中央考虑河南省委“撤干”的时间始于1941年1月,缘于所属豫西组织此时面临暴露危险;二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获得的情报不准确,缘于武宪周与省委及地方组织中断联系已逾一年。1983年王志杰回忆说,中央截获国民党的情报中,干部名单多是豫西的,估计省委内部可能有问题。“我认为这份情报很可能就是武宪周叛变时向敌人提供的”。^{[7]276}这个判断与武宪周的交

代相吻合。

二、“撤干”部署

同样作为亲历者的回忆,王志杰、苗树棠、邵文杰、杜征远在中共中央提出“撤干”时间、地点和相关人物方面虽有出入,但在中央指示精神和陈云所做部署方面,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王志杰:陈云决定这么几条措施:(一)豫西、豫西南、豫中党的区委以上干部全部撤退。(二)开辟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不准经过洛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三)负责干部撤退之后,党组织停止活动,个人利用社会关系找职业,长期隐蔽,以待时机,也可以转到外省隐蔽。(四)做上层统战工作的、红的、已暴露有被捕危险的也撤退。(五)豫西、豫中的干部撤退到延安,豫西南、豫南的干部撤退到豫东或鄂中^②新四军中去。(六)由延安派出政治交通员,只准作口头传达,不许带组织介绍信。河南撤退干部的工作,中央决定由陈云亲自领导、亲自布置;具体由我和危拱之负责执行。^{[7]277-278}

苗树棠:中央决定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中央的紧急决定,我记得最重要的几条:(一)豫西地区区委以上干部撤退到陕北,豫南地区县委以上干部撤退到豫东或鄂中新四军去。(二)各县党的组织停止活动,每县指定一人进行联络;留下的党员谋取公开职业掩护起来。(三)此事不经过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中组部要求,不带党的组织关系,凭个人过去工作关系及威信取得当地党组织的信任。王志杰传达陈云的话:皖南事变后,国内形势很紧张。如果国共合作破裂,大打起来,你就在河南谋个职业,例如做个小买卖。等解放河南时,党一定设法找到你。这次任务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你要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2]37-39}

邵文杰:陈云说撤退的原则是: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尽可能撤退到延安来;区以下党员尽量想办法隐蔽,如实在不能隐蔽的也可以撤退到延安。领导机构撤退后,继续隐蔽下来的党员暂时不要向上找党,将来形势变好时党找他们。陈云作了具体指示,并指定王志杰具体领导撤退工作。^{[3]177-178}

杜征远:王志杰、危拱之做了布置:不能经过洛阳办事处,要直接找人;豫西党与豫南、豫西南党不能发生任何横的关系。撤退的去处有三条,一是上延安,二是去豫东彭雪枫部队,三是去鄂中李先念部队。对于留下不走的同志,要做好隐蔽。陈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作到“白皮红心”。^[4]

此外,在河南主持工作的省委书记张维桢^③、负责豫西工作的省委宣传部部长郭晓棠,也回忆了听取传达中央关于撤退干部的指示。

张维桢:1941年4月,中央派交通员杜征远从延安来到舞阳梁八台找到我,说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这个人是豫西的,到过豫中。为了安全,中央决定撤退河南区委以上干部,由我负责撤退豫中和豫西南的干部,豫西的由中央直接派人去撤。^[8]

郭晓棠:苗树棠传达了中央撤退的指示和重要情报。中央关于“精干隐蔽”的政策我们正在贯彻执行,还没有发现严重的暴露情形,所以对撤退工作没有下决心,想请示中央后再作最后决定。请示电文大意是:关于河南党组织机构和各级负责人名单,我们看了,组织机构和人员都不符合事实,断言是一个假情报,是否可以通融,灵活办理。中央很快回电,大意是:坚决执行命令,不要犹豫。^[9]

陈云代表中央所做的部署,概括起来为以下方面:(一)河南省委及所属地方党组织区委以上干部全部撤退;(二)撤退方向为延安和相近的敌后根据地;(三)撤退线路不得通过党在国统区公开办事机构;(四)撤退工作必须迅速、无条件执行;(五)未能撤退的干部利用社会关系隐蔽,组织停止活动。

1941年3月至5月间,陈云会同李富春致电王志杰,通报豫中、豫南部分组织被破坏情况,继续对河南党组织的应对措施和撤退干部工作提出要求,“告之豫西南干部可撤来陕北”^{[5]366-370}。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指示》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地方党必须立即决心调动已经暴露的干部和党员,把他们送往新四军区域和延安,或其他能够立足的安全地区。即使暂时牺牲若干地方工作,亦必须这样做。但据最近桂林转来郭潜关于江西及湘鄂赣的报告以及刘子久等来此谈话情形看,好些地方党部并未认真执行这一指示,以致干部和工作仍处在暴露或半暴露的状况。这种情形有使南方、东南及华中各地党遭受极大破获的危险。中央要求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再次严重地讨论这一问题,严格督促所属各地党部坚决、敏捷、镇静地执行中央对这一问题的历次指示。^[10]这是中共中央对撤退干部工作的明确要求,也显示出中原地区撤退工作的紧迫性,从而成为河南省委“撤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三、“撤干”过程

按照陈云和中组部提出的原则,河南省委在延安的领导成员首先制定传达部署“撤干”工作方案,确定政治交通员的人选。1939年重建的河南省委主要由原豫西省委和鄂豫边省委成员组成,筹划“撤干”组织工作的王志杰、危拱之分别曾任豫西省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部长,即选定原在豫西任职的苗树棠前往豫西,并联系郭晓棠;河南省委交通员杜征远前往原属豫鄂边省委的豫中、豫西南地区,并联系张维桢。

“撤干”工作通过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为政治交通员由延安到河南,联系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宣传部长郭晓棠、组织部部长张旺午,并通过以往的组织关系传达部署“撤干”。这个阶段的分工:在陕西旬邑、耀县交界处的照金镇设立交通联络站,迎送撤至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由王志杰负责;政治交通员进入河南联系党的组织,由苗树棠、杜征远等执行;在延安的中组部机关接收审查撤退回来的干部,由危拱之负责。1941年2月下旬,王志杰与政治交通员在中央社会部护送下前往照金。王志杰、邵文杰在照金建立交通联络站;苗树棠、杜征远穿过国民党军队封锁进入河南,分别向豫西、豫西南进发。

苗树棠进入豫西、豫中后,向灵陕县委书记苗化铭等传达中央“撤干”指示。省委宣传部长郭晓棠通过洛办电台向中央询问。苗化铭于4月撤到照金后,作为“撤干”工作联络员返回豫西、豫中,督促加快“撤干”进程。苗化铭带回中央新的指示“是非常坚决而严厉的,简直就是命令”。主要内容为:(一)仍按原决定撤退干部,坚决执行,不得再犹豫;(二)从接到传达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同洛办发生关系。苗树棠、苗化铭立即部署洛阳以西地委迅速撤退。郭晓棠接到中央复电,也加紧部署洛阳以东地委的撤退工作。“从这时起,才真正开始全面进行撤退工作”,时间是5月底或6月初。部署工作初步完成的时间为6月下旬,因为苗树棠所看到报纸上“登载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2]56-59}苗树棠、郭晓棠与洛宁、灵宝地委部分干部,以布贩装扮辗转到达照金,7月抵达延安。

4月,杜征远到达镇平县,与豫西南地委取得联系,传达中央“撤干”指示和中组部的部署,而后到豫中舞阳面见省委书记张维桢。张维桢按照中央指示做出三项决定:“第一,豫中的干部向延安撤,豫西南的干部拟向鄂中新四军五师撤;第二,各级党的

组织一律暂停活动;第三,凡一时撤退不了而又有暴露危险的干部,要立即动员他们离开家,离开职业,投亲靠友,另找职业分散隐蔽起来,便于隐蔽的尽可能就地隐蔽,以等待时机。”^[8]5月,张维桢及部分区委以上干部与杜征远撤至延安。

第二个阶段为中组部与河南省委向河南派出政治交通员、传达员,加大力度撤退区以上干部和有可能暴露的党员。1941年6月,中央在延安任命河南省委新的组成人员,张维桢仍任书记,张旺午调豫鄂边区。为全面贯彻中央“撤干”指示,尽最大可能保存力量,省委接连向河南派遣交通员、传达员,督促和协助各地加紧“撤干”工作。至1942年春,杜征远数次被派往豫西南、豫中地区,联系省委原组织部部长张旺午和豫中地委所属党员,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向延安、豫鄂边区撤退。张旺午和汝南地委及所属各县,在新四军五师和地方武装配合下,陆续撤至豫鄂边区;少数未能到达豫鄂边区的干部改撤陕北。形势相对稳定、斗争环境较好以及交通受阻的部分县、区,党员干部采取投亲靠友或异地隐蔽的方式。

1942年2月,中央调整河南省委领导机构,王志杰任省委书记,危拱之任组织部部长,郭晓棠任宣传部长,苗化铭任秘书长。5月,省委机关驻陕西旬邑县马栏镇,继续派干部做好“撤干”工作。省委在派出政治交通员返回河南的同时,挑选5名政治传达员,派往豫西、豫中地区传达和组织“撤干”工作。政治传达员出发前,省委进行三个方面的培训:“一、进行整风学习,做好思想准备”;“二、学习中央关于河南工作的方针,做好政治准备”;“三、熟悉所到地区的材料,做好组织准备。”^{[7]412-413}省委同时向豫西南派出政治传达员,联系部署豫西南地委所属各县“撤干”工作。1942年7月起,政治传达员陆续进入河南。政治传达员对豫西、豫中地方党组织进行系统考察,向负责人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针对地方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麻痹思想、糊涂认识和少数干部的消极立场,政治传达员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取得较好效果。部分政治传达员在护送干部撤退到陕北后,再返河南,继续执行传达、部署与督促“撤干”任务。至1942年12月,撤退干部的工作基本完成;豫西、豫西南地区部分干部延至1943年春到达延安。

四、“撤干”评析

豫西突发事件只是“撤干”实施的发端。在国民党统治区撤退干部,是此时党的组织建设的一

个重要环节,是进入相持阶段白区工作的重要内容,河南“撤干”也是中原、华中抗战形势下的重要部署。

抗战爆发以来,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大量发展党员”“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④的组织建设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河南作为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最前沿,迅猛开展的救亡运动和准备游击战争,为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形成有利条件。党的组织在抗日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党员干部过“红”的情况也开始出现。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前,河南省委及所属组织领导机关“都是半公开的”,“秘密工作教育不够,许多新同志无意中暴露自己”^[11]。1940年5月,中央要求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发事变”^[12]。中央强调对有被捕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干部进行撤离、调换或隐蔽。7月,中央决定刘子久、张维贞回河南开展“审查干部、隐蔽精干”工作。河南省委对所属地、县负责干部进行审查,调换工作地区,建立秘密机关,实行长期隐蔽。这项工作的原则和目的,与“撤干”是一致的。所以在“撤干”之前,河南省委已在贯彻中央白区工作方针,实施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并且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1942年初,陈云召集河南省委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制定了《关于今后河南省委工作方针的决定》。《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主要精神是贯彻白区工作方针,反对急性病,做长期打算。陈云强调要坚持“少而精”“小而高”“广而深”,勤学、勤业、广交朋友的原则。^{[7]280}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和陈云的要求,省委明确规定组织撤退后留在原地的党员停止组织活动和组织联系,言行要符合隐蔽的要求。河南省委在马栏镇参加整风运动,开展调查研究,继续做好撤退干部的工作。省委派出的政治传达员分别在豫西、豫中、豫西南传达省委的工作方针,在继续督促撤退干部的同时,指导未能撤退的干部做好长期隐蔽的工作。

河南“撤干”与中央对中原、华中抗战形势的预判直接相关。“由于河南省委所处的位置,南、东、北三面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随时都有敌人到来的可能”^{[7]40}。1941年2月6日,中央书记处致电豫皖苏、豫鄂边区领导人并转河南省委和洛办:敌向河南大举进攻,洛阳、南阳可能失守,敌可贯通平汉路。

在此情况下,地方党应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动员民众搜集国民党军溃散的枪支,组织抗日游击队。凡敌可能占领的地方,如洛阳及陇海路等地,党除留极少数党员开展敌占后的秘密工作外,大批干部及党员均应撤退到农村中去组织武装。^{[13]305-306}5月17日,陈云、李富春致电陕西、河南省委:敌人现集中七个师团兵力于晋南,有先肃清豫北及中条山一带之中央军,然后进攻洛阳、西安之势,但其演变如何,约半个月后,方可看清楚。因此,撤退豫西干部的办法,应看形势演变进行:敌人来时即不撤退,全部到敌后发动民众捡国民党军丢下的枪支,组织武装,配合彭雪枫、李先念部创立根据地;如敌人进而又退时,即全部撤退到豫东、鄂中等根据地内。为预防敌人进而又退,所以敌人来时,不应全部组织公开,应保存一部分,绝对秘密,准备于敌人退后能坚持该地工作。^{[13]319}中央的这个预判和思路,也直接指导着河南“撤干”的部署和方向。

毗邻豫鄂边区的豫南、豫西南是国民党制造摩擦的重点地区。1939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竹沟惨案,豫南、豫西南政治形势趋向恶化。豫鄂边区为竹沟组建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等部开辟,与汝南地委及豫西南地委“撤干”有着“地利”“人和”之便。早在1941年2月前,汝南地委根据竹沟事变后的形势和敌后斗争需要,已开始向豫皖苏(豫东)、豫鄂(鄂中)边区撤退干部,累计输送30余人。豫西南地委根据日军进犯、自治派向国民党妥协的情势,有计划地向鄂中转移过“红”的干部。中央部署“撤干”后,汝南地委建立工委,开辟秘密交通线,保证“撤干”工作顺利进行。至1941年冬,汝南地委撤退干部任务基本完成,地委及所辖县委组织撤销,地委负责人的组织关系由张旺午移交给豫鄂边区党委;同时地方党组织向豫鄂边新四军输送了几千名新战士。^[14]

1941年至1943年间,中央组织部对撤退到延安的河南干部进行审查,然后安排工作或学习。撤退干部回忆,审查非常严格,对所有干部的政治历史都做了详细记录;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数次向陈云汇报河南工作,并且写出《撤退工作》的书面报告。^{[8]86}只是相关文献尚未在档案中发现,亲历者也只了解所联系的党员,因而“撤干”人数散见于不同的记录中。河南以及相关市(地)部分党史基本著作依据当事人回忆,对各区划内“撤干”情况有做初步统计:河南省委管辖区域的干部撤至延安总人数为100余人,主要来自豫西、豫中以及豫西南地区

大部;撤至豫鄂边区的干部主要来自豫南地区,包括安徽临泉、阜阳过境人员,总人数为300余人。以上合计为400余人,另有少数干部撤至豫皖苏边区及向其他地区转移。^⑤

也有部分县区未能落实“撤干”任务。灵陕县委除苗化铭最先撤至照金外,其他干部未能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转而实行异地隐蔽;^{[2]68}洛阳地委书记傅希晨(后叛变)受郭晓棠委派,向登封县委传达上级指示,但只传达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工作原则。除县委书记外,“登封党组织始终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撤退的具体指示,所以,登封包括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在内的区以上干部均未及时撤退”。在1943年2月国民党制造的摩擦事件中,县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3名区委书记被捕。^[15]因此,王志杰在1983年的回忆中说,“中央采取快刀斩乱麻、实行坚决撤退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撤退干部过程中,从个别地区发生的若干破坏事件中,愈加感到中央实行坚决撤退方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英明的”^{[7]279-280}。河南省委坚决、迅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撤出大批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取得了巩固白区党的工作经验”^{[1]166}。

河南省委和所领导的各级组织坚持白色恐怖下的斗争,取得了出色成绩。然而由于白区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使撤退干部在整风后期的审干阶段遭遇曲折。1943年,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河南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红旗党”,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和撤至延安的部分干部,以及执行“撤干”任务的杜征远、苗化铭等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中央在审干后期确定“红旗党”纯属错案,河南撤退干部的问题陆续得到解决。1944年豫西沦陷后,中央部署开辟豫西敌后根据地,得到“撤干”阶段隐蔽的共产党员配合与支持。“各地地下党即所谓‘红旗党’,纷纷起来支援部队、参军,积极参加抗日”,实施“以待时机”的任务。^[16]198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对这一事件作出全面结论。^[17]

注释:

①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并洛阳、三门峡、郑州、

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等市及所属县(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基本著作。

②1939年11月,中原局撤销鄂中区党委,辖区归属豫鄂边区党委。

③1940年12月,刘子久调任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张维桢继任河南省委书记。

④《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39年8月)——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⑤数字依据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河南历史》第1卷和洛阳、三门峡、郑州、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市及所属县(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基本著作整理统计。

参考文献:

- [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怀念危拱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2]中共灵宝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峭函火炬[G].1988.
- [3]邵文杰.征途[M].郑州: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0.
- [4]杜征远.对1941年至1942年底三次到豫西南撤退地下党干部的回忆[G].1981-11-25.
-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6]中共偃师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偃师党史资料:7[G].1988.
- [7]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8]中共漯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漯河党史资料:2[G].1989:73-74.
-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洛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洛阳文史资料:6[G].1989:13-14.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1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4-315.
- [11]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2[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40-143.
-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56-757.
- [13]《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政协确山县委员会.确山文史资料:3[G].2002.
- [15]中共登封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登封历史:1[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62,204.

(下转第73页)

八路军115师入鲁后医疗卫生工作探析

刘志鹏, 齐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八路军115师入鲁后的医疗卫生工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密切了军民关系,发展了山东医疗卫生工作。入鲁初期,八路军115师在经费供给上转向以自筹自建为主,在战场救护、伤员治疗护理、药品获取方面积极依靠自身和紧密联系群众,与地方密切配合,建立隐蔽医院救治伤病员。在疫病防治上,注意部队卫生防病的同时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与卫生知识宣传,军民防治同步开展。入鲁后期,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成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向着正规化与地方化发展。

关键词:八路军115师;医疗卫生;山东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1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67-07

部队医疗卫生工作是关乎部队成千上万战士生命健康和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工作。八路军115师继承了红军时期优良的医疗卫生工作作风和制度,入鲁后因因地制宜改善部队医疗卫生工作,治愈了数万名伤病员,为保障山东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抗战时期各根据地与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学者从医疗救护角度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精神的党政军民关系以及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疫病防治的成因、防治措施以及成效等。针对山东抗日武装的卫勤工作,于宁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共山东抗日武装医疗机构发展变迁、医护人员来源培养以及药品获取问题。学界对八路军115师医疗卫生工作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八路军115师入鲁后的战时医疗卫生救护、部队的卫生防病工作以及统一领导下山东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等方面进行研究,试图清晰考察八路军115师入鲁后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

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贡献,以期丰富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一、战时八路军115师医疗卫生救护

(一)战地救护与伤员运送救治

八路军115师是一支由红一方面军改编而来的有着优良作风和作战经验的主力部队。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继承了红军优势,相较于刚成立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来说,有着比较正规的医疗卫生制度。入鲁前,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部队战时的医疗卫生工作便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和流程。在战场作战中,战地救护分为火线抢救组、急救治疗组、后送组、烈士埋葬组。^{[1]330}作战开始前,师动员各团勤杂人员及随营学校学员,配合各营连卫生人员,组织战场抢救,“首先将伤员运出火线,安置在隐蔽的处所,而后再向团和师的卫生机关转送”^{[1]320}。同时师派人员做好当地的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当地群众,协助团和师的卫生机关迅速后送伤员。八路军115

收稿日期:2023-10-19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文献整理与研究”(21BDJ021);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重大项目“山东抗日根据地核心区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1KZD001)

作者简介:刘志鹏(1980—),男,山东博兴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齐晓燕(1999—),女,山东昌邑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师入鲁后,与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在115师积极影响下,山东纵队和山东军区的战时医疗卫生工作得到了很大提高。1941年9月27日,山东纵队第五旅下发《战地救护暂行工作条例》规定,“连、营、团要加强救护组织,以便尽快将伤员从火线抢下,送往医疗单位,进行早期治疗;同时,提出了‘医院要更接近火线,以便缩短后送距离’”^{[2]141}。1944年,山东军区还明确规定了伤员后送的分工,“团以前由前向后逐级后转”,火线搬运由连炊事员、文书等组成担架组,负责将伤员搬下火线,以后再由民工担架后送。^{[2]142}

八路军115师入鲁后,战地救护工作继承了老红军的优良传统,发挥了医护人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业务精湛和耐心负责的革命精神。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部队随军野战医院一所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刘家湖村安置下来。战斗时,一所除少数同志留在刘家湖收治伤员外,绝大多数同志跟随部队执行战地救护任务。战时环境条件艰苦,一所医护人员在战场上选一个隐蔽背风的地方,放上几副担架,就建成临时包扎所。从火线送来的伤员,在临时包扎所经过包扎处理后,立即送往刘家湖进行救治和护理。^{[3]431-432}

伤员的救治与护理主要收治在部队的后方野战医院和隐蔽卫生所。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后,以师卫生部为中心,吸收招纳地方青年学生以及有一定医学基础的战士干部成立医护人员训练排。经过一定阶段的医学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以医护人员训练排为主组建扩大部队随军野战所和卫生所。后方野战医院、卫生所的选址以安全性为第一原则,以隐蔽保密为主要特点。115师入鲁后,在鲁西、鲁南地区建立了一批野战所和隐蔽卫生所,它们多分散开设在老百姓家中,或山洞、地洞、地窖、芦苇荡里,或在海滩、渔船上收治伤病员^{[2]132}。陆房突围中,115师从战场上下来一批伤员,急需在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中救治。115师野战医院二所所长黄一民与二所护理员七人在泰肥山区岈山的五埠村组成115师挺进山东后的第一所隐蔽医院。陆房突围中受伤的七十多名伤员分别隐蔽在五埠村、岈山和牛山庄,为了不暴露伤员,隐蔽医院人员在村外的梯田下、地堰上挖洞,伤员隐藏在地下洞内治疗。115师隐蔽医院在治疗方式上,坚持中西医结合。西药在当时是奇缺紧俏的物资,特别是消炎、退烧、止痛的奎丸宁、福白龙(奎宁制剂)、青霉素、高锰酸钾、碘酒、碘片等管制药品。为了更快医治好伤兵,115师

野战医院二所护理人员一方面乔装打扮潜入敌占区购买紧缺的西药品,另一方面向当地群众学习土方偏方,“采集中草药为伤员治疗,还向老百姓学习了针灸,在治疗打摆子、止痛等方面,效果也很好”^{[4]84}。

战后伤员的转移与救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配合帮助。战斗中受伤的战士多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中进行救治与护理,部队的后方医院或隐蔽所多设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或地区。八路军115师入鲁后,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老百姓看到“陕北的老红军来到山东打鬼子,保卫老百姓安宁”,自然而然地去爱护主力、帮助主力。有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主动腾出新房屋给部队卫生所做手术室。^{[3]431}1940年春,白彦战斗结束后,鲁南野战医院第一所接收了一批伤员,当时医护人员少,伤员较多且分散安置在群众家中,因此除了换药、服药、打针治疗由一所医护人员主管外,其他做饭、喂饭、看护料理等大量的工作都被群众主动承担了。同时八路军115师取得战斗胜利时,群众还积极热情慰问伤病员,“抬着整猪、整羊、鸡、蛋和当地盛产的山果慰问伤病员,积极主动地为部队医疗工作提供方便,使不少伤病员很快痊愈”^[5]。

(二)药品采购与来源

八路军115师入鲁时,国共关系开始走向紧张,国民政府时常停发八路军军饷。八路军115师入鲁后几乎再未从国民政府手中领过军饷经费,在经费供给方面115师转为以自筹自给为主,包括药品采购补给等方面。在药品获取上,八路军115师主要通过卫生部门组织采购、战斗缴获和自己开办药厂等方式,还辅以募捐捐献以及山东分局提供经费支持等渠道。

由于没有国民政府拨发军饷经费,八路军总部经费预算也有限,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后吃住困难,随着部队发展和战斗的消耗,部队财粮也逐渐消耗待空。因此,八路军115师每到一地便积极与当地群众、士绅、地方抗日武装以及国民党进行统战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从而缓解115师财粮供给的困难。其中,稀缺的药品是最为紧缺的。1939年冬八路军115师进驻鲁南时,在师后方政治部负责统战工作的靳怀刚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为115师搞到了一批价值四千多元的药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部队急缺药物的困难。^[6]当地民间医生亦积极援助115师医疗卫生工作。115师入驻鲁南后,当地颇有声望的陈信亭老先生主动为抗战服务,多次协助

115 师野战医院一所收治八路军伤员,并将自家的陈家医院以及治疗骨折外伤的中医秘方捐献给八路军 115 师部队。^{[3]440}

随着 115 师在山东逐渐扎根,115 师在药品采购方面也逐渐展开。115 师的药品采购工作主要由部队各旅团卫生部门组织采购,多由商人送到部队。1942 年一年来,八路军 115 师购买药材及医疗器械共“182341066 元西药,1595386 元中药,103099205 元材料”^{[1]187}。除了通过采购获取药品,115 师还自己开办药厂进行制药工作。1942 年一年便制出了四千余磅成品药材,供给前后方部队之需。^{[1]187}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有时药品无法获得又无法生产,115 师鲁南隐蔽所一所便学习地方土验方,自制药品,“把猪骨头和干馒头烤糊压成面,让伤员冲服,治疗消化不良,后来同志们就把这种自制药品取名叫‘消化散’”^{[3]436}。医疗器材缺乏,便自制竹镊子代替铁镊子、用土织粗布代替纱布等方式,缓解药品器械短缺问题。

由于部队中专门研究药物生产和开发的技术人员较少,多数制药人员和卫生工作人员医学水平不高导致制药厂产量和质量与部队实际需求有不小差距。针对部队采购能力欠缺、采购方式不完善以及制药人员医学、药学基础薄弱等问题,师卫生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几点建议。首先,必须大批地派人赴敌占区,进行统一的购买,这样才有可能大批购买到省钱便宜的药材,而不是之前被动地接受由商人送往部队的药材。其次,针对采购人员以及医疗卫生人员医学基础薄弱问题,各旅团应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医学教育培训,同时扩大抽调各旅团有医务知识的人才汇集起来,虚心研究,提高整体的药材生产开发水平和技术。^{[1]189}如此,提高部队药品采购能力和生产制药水平。

战斗缴获与山东分局提供经费支持。八路军 115 师在山东境内作战勇猛,仅 1941 年一年大小战斗共计 1418 次,缴获一批军用物资与武器弹药,但药品器械相对来说较少,主要有“防毒器材 568 具,注射器 8 副,药品 11 担”^[7],虽然药品器械通过战斗缴获并不能大量补充部队医药所缺,但战斗缴获的日伪军药品器械多较为先进,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部队药物仿制、研发以及救治水平的提高,比如 115 师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一套手术器械,除开颅手术外,其他手术都能做。陆房突围后,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使用这一套手术器械成功完成了在山东的第一例截肢手术,手术后伤员的伤口很快就愈合

了。^{[4]185-86}。进入抗战反攻阶段后,山东军区不断攻占主要城市、交通线和据点,医疗物资的缴获随之增多。除此之外,八路军 115 师入鲁后,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山东分局在财政经济上给予八路军 115 师极大帮助。^[8]

二、八路军 115 师卫生防病工作

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常年流行多种传染病,主要有疟疾、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痢疾、黑热病、流感、疥疮、霍乱等多种流行疫病。^{[2]138-141}八路军 115 师进驻山东后,多与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如果当地疫病流行,很容易传入部队,造成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降低部队战斗力。因此,八路军 115 师进入山东后非常重视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了一系列医疗卫生工作。

(一)建立各级卫生委员会,开展卫生宣传工作

115 师入鲁后,各级单位相继建立了卫生委员会,专门负责卫生宣传工作。同时在基层建立“卫生委员会”、卫生宣传小组等群众性组织,开展各种卫生宣传活动。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八路军 115 师在宣传内容和方式上各有侧重。在卫生宣传工作中,各级部队把炊事员和伙食管理人员作为重点宣传教育对象,把住病从口入关,“针对炊事员、司务长和管理员着重向他们讲解食物烹调对营养素损失的影响,提高烹调技术,注意食品卫生,防止发生营养缺乏病和肠道传染病”^{[2]136}。1942 年,115 师师直及各旅,利用战斗间隙还举办了炊、管人员训练班,提升炊事员和伙食管理人员的卫生文化水平和重视卫生防病意识。除此之外,115 师入鲁后,从师到各旅团领导都十分重视对卫生防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在 1940 年至 1945 年期间,旅(支队)以上军政首长签发有关卫生防病的指示、命令、通令、训令就有 40 多件次。进入冬季,战士多有冻伤、眼疾问题,115 师教导二旅下发《冬季卫生防病工作》训令,给战士宣传讲解如何预防和治疗冻伤、眼疾等问题,并给部队配发油膏,战士洗脸后用于擦手、擦脸;要求战士严格分盆、分水洗脸,不合用毛巾,来防止和治疗冻伤、眼疾等问题。^{[2]135}

115 师在宣传方式上,除定期上卫生课、讲解战伤自救互救、卫生防病知识外,还根据战士和群众情况采取多种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卫生宣传。一是使用标语口号宣传,通俗易懂,传播范围广,深入人心。如夏季行军时,在水井旁写上“井水虽然凉,病菌里面藏”;冬季行军时则在沿途休息地点张贴“为了防感冒,不要随便脱衣帽”等标语。^[9]

还发动战士编写有关卫生防病知识的黑板报或墙报;进行化装宣传或演出活报剧以及举办实物展览等。^{[2]136}二是创办卫生报纸报刊进行卫生知识宣传。1941年,115师和山东纵队印发了《卫生管理规则》,胶东军区编印了《夏季卫生常识》《大练兵卫生教育参考资料》《冬季防病常识》。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山东军区卫生部印发卫生资料3000多份(册)。^{[2]136}三是设卫生月,集中宣传卫生知识。1943年开始,山东军区将每年的4月12日至5月12日作为卫生月,每年集中开展一次卫生月宣传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卫生防病工作的深入开展。^{[10]228}

(二)完善卫生制度,开展卫生运动

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单靠卫生宣传是不长久、不扎实的,在卫生宣传基础上不断健全卫生制度,以行政手段推进部队卫生管理,形成一套规范有效的卫生制度,是推进115师和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强有力的措施。八路军115师继承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各项卫生制度比较健全,但115师入鲁后在以往卫生制度基础上,结合山东战场实际情况进行了部分修订。1942年,115师343旅下发《关于夏季整军中卫生工作》训令,对公共卫生、个人卫生等做了详细规定,要求战士“每周洗澡一次、烫洗衣服一次、剪指甲一次;每日刷牙一次;每月理发一次”^{[2]136}。115师和山东纵队还先后建立了体检制度以及干部保健制度,加强对部队干部、战士的健康检测和管理。1945年,山东军区正式颁发了《部队暂行卫生制度》,对环境、厨房、室内外,个人、马厩、病人等卫生管理都做了详尽规定。从八路军115师入鲁至取得抗战胜利期间,115师、山东纵队、山东军区出台颁发了一系列部队卫生制度规定,115师及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在战火中逐渐规范、科学,一步步向着正规化发展。规范化的山东部队医疗卫生工作延长了战士的生命、减轻了伤员的痛苦,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保障了山东革命的胜利。

开展卫生运动是部队进行卫生防病的重要手段。部队中的卫生运动主要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展开个人卫生、公共卫生运动。部队中卫生运动一般在春季举行,这个时候气温回暖,是细菌最易增生活跃的时候。在春季卫生运动中,师后勤部对各旅团营连提出要做到“挖厕所要一米九深,一米宽,每人都要洗澡,拆洗棉衣,剪头,要特别注意厨房卫生”^[11],师部还发出“关于部队健康运动的指示”,动员全师做好战士健康卫生运

动。115师开展卫生运动时,师旅团各卫生机关的卫生人员积极动员驻地群众,与驻地群众一同开展卫生运动。部队每到一地,即帮助驻地居民打扫庭院街道、整顿驻地环境卫生,同时深入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卫生防病知识,为贫苦抗日军人家属和群众诊治疾病。同时,还帮助驻地群众扑灭传染病疫情。1941年至1942年,鲁南爆发疟疾,115师驻鲁南部队立即组织医疗组,帮助群众治病防病,很快控制住了疫情。

(三)积极防治流行性传染病,改善战士给养

针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流行性传染病,115师积极从预防和治疗两方面入手解决传染病对部队战士健康的影响。首先,对患有强烈传染性疾病的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对病人住房进行卫生整顿,有条件的进行环境消毒。如防治回归热及斑疹伤寒时,“用蒸笼蒸汽灭虱,衣服烫洗”;防治疥疮时,“将疥疮患者与健康人分开睡,不合盖被子,不互相换穿衣服”;预防天花及水痘时,“按时种痘是最好的预防办法”,除此之外,部队每到宿营地以后及时进行本村及附近居民的卫生调查,如发现有传染病流行应迅速通知卫生机关,并告知各单位负责同志,可建议上级于可能范围下转移驻地。^[12]其次,在治疗上中西医结合,由于西药紧缺,更多是使用中药治疗。1942年至1943年间,115师部队中流行疟疾,115师686团将疟疾病人集中于团卫生队或营卫生所,用中药常山、柴胡煎剂治疗。部队治疗痢疾则由于缺少磺胺药物,多用黄连、黄柏、白头翁水煎剂;也有用马齿苋蒸煮和大蒜一起食用或单用蒜泥治疗。^{[2]139-140}除了使用药物治疗传染病,许多部队还采用针刺疗法治疗疟疾和痢疾等传染病,也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在中西医结合下,部队在传染病救治方面取得了不错效果。

传染病和各种疾病在山东部队中流行,一方面是当时卫生条件差,战士卫生意识弱造成的,另一方面当时抗战条件艰苦,战士给养很差,“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13],导致战士营养缺乏和免疫力低,更易遭受疾病侵袭。因此,部队中除了进行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外,还应该积极改善战士给养,增强战士免疫力。115师入鲁后,一直致力于改善后勤供给工作。后来115师号召部队各旅团进行生产节约运动,1941年5月,师首长号召全师鲁南部队生产节约一

百三十万元(从1941年5月到1942年春)^[14],鼓励部队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搞合作社、发展贸易,拓宽经济来源,自力更生努力改善供给。经过1942年、1943年的生产节约运动,115师部队后勤供给和战士给养得到了明显改善,到1943年部队供给标准达到“菜每人每日十二两至一斤,油盐各五钱,猪肉每人每月十二两,住院之休养员、学校学员每人每月一斤半;麦子,机关每人每日二斤六两,战斗部队每人每日二斤半。杂粮,机关二斤四两,战斗部队二斤六两”^[15]。

针对改善战士给养问题,部队除了增加菜金、粮食供应数量,还注意到如何让战士更好地吸收菜、粮中的营养。师管理处的同志想出将豆子磨成豆汁给战士们喝,将“三分之一的黄豆和三分之二的小米分别泡好,再分别磨成糊浆,用布过滤好,然后将豆浆煮开再放米糊”^[16],增加战士的营养。有的营部还对粮食吃法上进行调剂搭配,使营养更加丰富,“教导团一营营部在地瓜干多的时候,就设法从菜金上少买菜,多买点猪油加菜喝油肉菜汤或鸡蛋汤”^[17]减少部队患病人数。大部分营连成立给养合作社,专门负责改善给养。战士给养的改善以及食物营养的增加,增强了战士抵御疾病的能力,促进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

三、统一领导下的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

1943年3月,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改为山东军区司令部(115师、山东纵队名义仍保存),各司、政、供卫机关与(军区)军分区合并^[18],二者卫生机关合并为山东军区卫生部。统一领导下的山东军区卫生部进一步促进了115师及山东军区卫生医疗工作的发展。

(一) 医护培训与医护救治的正规化

山东军区成立前,八路军115师的医训班与山东纵队的卫生教导队举办过多期医护培训,为部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但培训班的举办较为分散,培训内容多以应急救护为主,缺乏系统化。山东军区成立后,将115师的医训班与山东纵队的卫生教导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卫生学校,使得山东军区的医护训练逐渐走向正规化。山东军区卫生学校校长由卫生部副部长刘放兼任,邓太山任教务主任,邱国光为队长。山东军区卫生学校建立后,共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培养学员380余人^{[10]227}。学校培训课程内容主要有:麻醉学、外科学、诊断学、药理学、战地卫生勤务、检验学等,还根据不同批次学员情况有针对性补习文化、军事政治等内容。^[19]此外,还举办过

短期专题训练班,如滨海军区卫生部举办了内科医生、化验、调剂班,为期15—60天,其他军区也举办过类似短训班。^{[2]145}1943年,奥地利籍著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20],帮助山东军区开展卫生工作。罗生特看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专业医护人员紧缺,积极帮助山东军区卫生部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护人员,并亲自担任学校讲师到卫校讲课。罗生特向军区的医务人员讲解了大量的医学专业技术知识以及指导学员进行医学临床实践,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医务工作人员,使军区卫生工作有了很大提高。

山东军区成立后,各战略军区以及下属军分区经过精简合并以及对医护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山东军区医疗救治和卫生工作各方面都有了明显改善。1944年2月10日,滨海军区召开卫生干部会,总结一年来卫生工作,卫生处长黄平和政委刘代均一致表示滨海军区卫生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和成绩,这表现在“部队病员减少,治愈期缩短;残废者减少,四二年残废者伤员占18%,四三年占9%,减少一半;死亡率大为减少,全年死亡率为0.2%”^[21]。同时各战略区都涌现出不少卫生模范工作人员和模范事迹,如“自己生疟疾还积极照顾伤病员的鲁中三所看护员张甲门,在战场冒着炮火进行战场救护的滨海模范卫生员郑辉增,熟悉全营战士的胶东军直医生姜铁川,一边救治一边战斗的鲁南医护人员”^[22]。除此之外,山东军区战场救护体系和救护组织也更加完善。在胶东军区讨赵战役中,进行了充分的战前救护准备工作,“各兵团、连队补充足够药品敷料以备战场救治使用;对各兵团卫生人员进行‘急救教育’培训,提高卫生人员战场救护技术;对伤员进行突击治疗,减少病员,保障各所收容能力”^{[1]339-340}等措施,努力保障战场救护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二) 加强卫生部门思想整风,完善卫生部门建设

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十分重视山东军区的卫生工作,关心伤病员的情况,时常到医院慰问伤病员,检查医院卫生工作并具体指示医院改进问题^[23],进一步提升医院医疗卫生服务和质量。在山东军直卫生工作人员开会纪念国际护士节时,罗荣桓一再强调要有群众观念,不能只做医疗工作还要做好护理工作,指示医生、所长、院长、一切医务卫生人员都要作护理工作,照顾好战士伤病员。^[24]1944年冬,山东军区集合各战略区的卫生干部召开了全军区卫生工作会议。会议上,罗荣桓指出卫生工作

是有成绩的,治愈了大批伤病员,连队的卫生工作也开始活跃。特别是在卫生干部很缺乏、技术低劣,药材又困难情况下,治愈了2万以上的伤病员,这是一件大事情,可以说是护理与治疗工作上的奇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医疗卫生工作上还存着强调客观困难,单纯的医务观点与脱离群众的现象。^{[1]161}针对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罗荣桓从干部思想、卫生部门的组织领导、行政工作、党政工作、医务教育工作等方面深刻分析了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存在的问题,并强调加紧医务干部的整风学习,反对医务干部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单纯的技术观点。

为进一步规范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山东军区司令部下发《关于医务工作人员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训令》,对所长、医生、看护长、药剂长做出工作规范条例,严格医务工作人员工作职责,并对医务人员失职等行为做出奖惩条例。1945年,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卫生部门今后建设方针指示,要求卫生部门建设要做到“行政工作与医疗工作结合起来;医疗与护理结合起来;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坚持预防在前,治疗在后,急救在先,手术在后原则,积极开展部队卫生工作;重视材料工作;开办和加强卫生训练队;适当开展社会卫生工作”^{[1]169-170},努力提升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水平,保障军区部队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在组织建设方面,至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卫生部门组织建设更加完善,“鲁中、鲁南、胶东、滨海、渤海军区卫生处升级为卫生部,8个师均编设卫生处,各辖一个休养所,12个警备旅亦编设卫生处,各军分区编设卫生处或卫生科。团设卫生队,营设卫生所,连配卫生员”^[25]。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建设的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山东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四、结语

总的来说,八路军115师入鲁后在财政经济供给困难情况下,积极发挥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部队每到一地积极与地方合作,吸收地方医护人员参与伤病员救治,紧密联系群众。在医药紧缺的情况下,使用地方土方、验方,积极自制药物与医疗器材。山东军区成立后,115师从独立的医疗卫生系统融入到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系统中,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115师政委罗荣桓成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一定程度上标志着115师医疗卫生工作在山东军区中处于领导地位。在整个山东军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山东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进一步向着正规化与地方化发展,既朝着正规化方向

发展又兼具地方特色。

参考文献:

- [1]陈孝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3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
- [2]《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 [3]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鲁南分会.鲁南抗日根据地·回忆史料1(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4]中共肥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肥城党史资料(第7辑)[M].内部出版,1986.
- [5]中共费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费县党史资料(第2辑)[M].内部资料,1987:302.
- [6]政协曲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曲阜文史(第3辑)[M].内部刊物,1984:12.
- [7]一九四一年我师战绩[N].战士,1942-02-14(2).
- [8]黎玉保存历史资料.未刊.
- [9]刘树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疫病防控[J].解放军健康,2020(2).
- [10]八路军第115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编辑室.八路军第115师暨山东军区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
- [11]各兵团积极进行春季卫生运动[N].战士,1943-03-30(1).
- [12]春天的病疫:天花及水痘[N].战士,1942-02-28(2).
- [13]李文.八路军115师征战实录(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68.
- [14]师直教二旅抗大一分校六个月生产节约四十三万元[N].战士,1942-01-26(1).
- [15]后勤部关于今年供给生产连队管理工作的几个规定[N].战士,1943-02-10(2).
- [16]这样吃豆子营养多又好吃[N].战士,1943-04-10(2).
- [17]从夜盲谈到改善给养[N].战士,1943-04-10(2).
- [18]黄瑶.罗荣桓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0-293.
- [19]王冠良,高恩显.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教育史[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1:36.
- [20]黄瑶,张惠新.一个大写的人:罗生特在中国[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67.
- [21]滨海军区卫生工作有进步,部队病员减少伤员残废减少一半[N].大众日报,1944-02-27(4).
- [22]为战士为伤病员服务 卫生工作涌出模范[N].大众日报,1944-05-07(1).
- [23]罗司令关怀伤病员亲临医院慰问[N].大众日报,1944-06-01(1).
- [24]山东省卫生史志办公室.山东卫生历史报刊资料选编(第一辑)[M].内部资料,1986:36.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after the Entry of the 115th Division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to Shandong

LIU Zhipeng, QI Xiaoy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

Abstract: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of the 115th Division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Shandong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dong Base Area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It closely linked the military with the people, and develope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Shandong. At the early stage of its entering Shandong, the 115th Division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hifted to self – financing and self – constructing as the main sources of funds, and actively relied on itself and closely contacted the masses in the battlefield rescue, treatment and care of the wounded, acquisition of medicines, and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to establish hidden hospitals to rescue and treat the wounded and sick.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s, the army paid attention to the troops’ hygiene and disease prevention while carrying out mass health campaigns and hygiene knowledge propaganda, and synchronize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late stage, the 115th Division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Shandong Column merged into Shandong Military Region, and the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further developed towards form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Key words:115th Division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medical health; Shandong Base Area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上接第 66 页)

[17]吕枫.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全书[M].沈阳:白山出版社,1996:697.

[16]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刘子久纪念文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7 – 1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Cadres Retreat ” by the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1941 to 1942

GUO Xiaoping

(Research Office of Party History and Local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engzhou, Henan 450003, China)

Abstract:In early 1941 the He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Minister Chen Yu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rgently evacuated the cadres above the district level party committees and the “red” party members in western Henan, central Henan, southwestern Henan and southern Henan, known as the “cadres retreat”.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retreat was that the Henan Party organization faced the danger of being destroyed; The “retrea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secret and should not pass through the open organs of the Party. Cadres who failed to evacuate immediately carried out concealment and long – term ambush. By the end of 1942, the Hena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had evacuated more than 100 cadres to Yan’ an, and more than 300 cadres to the Henan border regions and other areas. The “cadres retreat” in Henan effectively preserved the backbone of the revolution and gained further working experience in consolidating the Party in the White Area.

Key words: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eriod; CPC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cadres retreat; Yan’ an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的基本脉络与展望

——基于 CSSCI 期刊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方 黎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文章以十八大以来 CNKI 数据库中 CSSCI(含 CSSCI 扩展版)期刊发表的 2857 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以 CiteSpace 为研究工具,绘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对十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年度发文量有两个突出的高增长期;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发文量居高,师范类高校的发文量具有显著优势;思想政治教育类期刊与教育学类期刊是重要理论阵地;核心作者的学科归属多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重点研究论域聚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条件、路径选择、重要成就等方面;研究热点的战略矩阵分布清晰。研究发展分为概念形成与研究扩散期、研究增强与能力提升期、经验总结与研究深化期三个阶段;前沿突现鲜明。后续研究需要站在新的时代变局背景中,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机制。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基本脉络;展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2

中图分类号:G206;G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74-08

“教育引导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作”^{[1]108}。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内容,成果丰富。追踪既有研究脉络,挖掘重点论域与热点走势,提出研究展望,既是方便学界更清楚地把握十年来的研究态势,实现后续研究继往开来的现实需要;又是在新的时代变局中,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之需。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择取

为了让分析样本既可靠又能代表性地反映研究内容,分析数据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类型定为 CSSCI(含 CSSCI 扩展版),时间段设置为 2012 年

至 2022 年。在样本择取中,采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并列主题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出期刊论文 3330 篇,剔除新闻报道、书评、人物访谈、会议综述、重复文献,以及 2012 年在十八大之前发表的成果等共计 473 篇后,剩余 2857 篇,以此作为研究样本。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与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法,并对可视化分析结果进行文献溯源与归纳,尽可能丰富地呈现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发展脉络,提升文献分析的科学性。分析工具选择 CiteSpace 5.8. R3,它以一种动态、多元、分时的可视化语言,将特定研究领域研究进程、节点文献、共引聚类等热点与前沿知识进行自动标识。

研究锁定四个目标:一是整体把握研究概况,对

收稿日期:2023-10-26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智媒空间青年亚文化的价值冲突研究(AHSKQ2022D009)

作者简介:方黎(1986—),女,安徽霍邱人,博士,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青年文化。

主题研究的年度发文分布、核心作者、发文机构、理论阵地进行分析。二是发掘文献经久不衰的核心,进行关键词共现研究;分析关键论域的注意力分布,进行战略矩阵图研究。三是描绘既往研究的演进历程;捕捉文献中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瞬态趋势,对关键词时间线图与关键词突现图进行分析。四是针对性地提出研究展望。

二、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发文分布与核心作者

(一)文献发表年度分布与趋势

十八大以来,该主题研究出现两个高速增长期:首个高速增长期是在十八大召开之后,经 2013 年(122 篇)和 2014 年(286 篇)研究成果高速递增,在 2015 年达到峰值,发文量为 428 篇。关联时政分析发现,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多次做出强调,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落实与理论研究。同时,在 201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政策保障。

第二个高速增长期是从 2017 年(402 篇)起,发展至 2018 年(422 篇)。期间,党的十九大召开,在政策推动下,教育引导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路径,也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内容。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呈现出显著的与“策”同行性,高质量研究成果锐增,反映出学界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及引导的责任担当。

(二)文献发表学科机构分布与来源

本主题研究占比前 5 的代表性学科为教育学(61.51%)、马克思主义(19.89%)、政治(7.44%)、文化(2.23%)和新闻传播(2.05%),教育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该主题研究中的学术影响较大。同时,如表 1 所示:其一,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发文量居高。其二,师范类高校因其特有的学科优势与发展定位,在 CSSCI 刊(包括 CSSCI 扩展版)的发文量上具有显著优势,在本主题的学术研究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在期刊来源方面,表 2 说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的发文均在 200 篇以上,《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的发文均在 100 篇以上,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类期刊成为该主题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阵地,教育学类期刊紧随其后,期刊分布情况与该主题研究的学科分布相呼应。

表 1 代表性发文机构

排序	发文机构	发文量/篇
1	东北师范大学	107
2	北京师范大学	77
3	西南大学	64
4	武汉大学	60
5	中国人民大学	51
6	南京师范大学	44
7	华中师范大学	43
8	华东师范大学	32
9	清华大学	30
10	吉林大学	30

表 2 代表性发文期刊

排序	发文期刊	发文量/篇
1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34
2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32
3	思想教育研究	215
4	中国高等教育	157
5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14
6	思想理论教育	109
7	黑龙江高教研究	66
8	人民论坛	60
9	江苏高教	53
10	广西社会科学	49

(三)核心作者与成果影响

研究利用 Citespace 做样本文献的作者共现图,结果如图 1 所示,图中字节的大小代表该领域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如表 3 可直观观察样本文献中被引量前 15 的作者及其发文量。核心作者的抓取显著反映了两个学术现象:其一,绝大多数核心作者的学科背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本主题研究的旗帜导向与学术引领;其二,核心作者中不乏常年深耕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关注领域往往代表了本学科的研究热点,进一步反映出本主题研究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



图 1 作者共现图

表 3 代表性发文作者统计			
排序	作者	共被引/次	发文量/篇
1	冯 刚	878	14
2	黄蓉生	607	13
3	沈壮海	546	7
4	刘建军	459	6
5	骆郁廷	370	6
6	陈延斌	337	8
7	李忠军	325	10
8	余双好	228	9
9	石中英	213	9
10	杨晓慧	211	4
11	刘新庚	202	6
12	李 艳	167	10
13	郑永廷	146	5
14	杜玉波	93	4
15	柳礼泉	92	5

三、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走势

(一)主题识别与重点论域

为了尽可能多地呈现出实际的研究主题,分析时隐藏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搜索干扰的“教育”“培育”“价值观”三个关键词,如图 2 显示,关键词节点的形状大小与色彩浓烈度与其出现频次、中心性正相关。进一步量化图 2 的数据,对样本文献中出现频次前 10 的关键词(表 4)与中心性排序前 10 的关键词(表 5)进行统计与文献溯源,归纳出四个重点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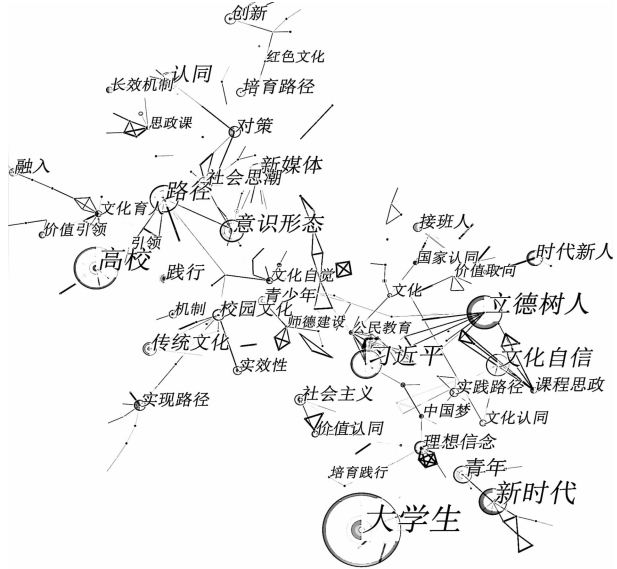


图 2 关键词共现图谱

1.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高频、高中心词“习近平”的研究成果主要指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表 4 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次
1	大学生	425
2	新时代	140
3	高校	132
4	立德树人	112
5	习近平	91
6	文化自信	66
7	路径	65
8	意识形态	56
9	青年	42
10	新媒体	42

表 5 高中心性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中心性
1	大学生	0.5
2	立德树人	0.21
3	新时代	0.17
4	高校	0.17
5	习近平	0.14
6	文化自信	0.06
7	路径	0.06
8	意识形态	0.06
9	社会思潮	0.04
10	文化育人	0.04

第一,研究其精神内涵。一部分成果整体把握其精神内涵,研究其战略意义、实践路径,并阐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路径选择等^[2]。较多成果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为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具体路径,如教育引导重“全程”、舆论宣传重“榜样”、文化熏陶重“传统”、行为实践重“养成”、制度保障重“法治”^[3]。

第二,阐述其鲜明特征。深远的战略性、浓郁的民族性、广泛的实践性、丰富的国际性^[4]体现了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论述的特征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论述所展现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理论思维、以青年为本的情怀、促进青年全面发展的落脚点^[5]等特征也受到学界关注。

第三,关注其价值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指导和示范,更是对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特别关注,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标定青年成长的价值目标、确定青年成长的价值取向、锁定青年成长的价值准则^[6]。

2.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条件研究

学界围绕高频、高中心词“新时代”的历史方

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背景条件进行研讨,内容高度关联“立德树人”“文化自信”“意识形态”“新媒体”“社会思潮”“青年”等高频、高中心词,凸显出新的时代背景中,整合价值取向、引领社会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第一,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可行性与紧迫性。学界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建设先进文化指明方向,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为中华儿女提供共同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性时,也不乏从历史维度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小学价值观教育演进,并学习借鉴国外民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教育方式等。但学界也指出,新征程更需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集聚强大正能量^[7]。

第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迎来新机遇与新使命。在新的起点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条件更加有利、群众基础更加坚实、社会主义属性更加彰显、世界意义更加深远,但要求也更高,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高质量发展^[8]。同时,如何处理一元主导与多样价值追求协调新常态的问题,以及对新历史方位的把握,育人的历史使命与重要责任等引发关注。

第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新挑战与新课题。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价值激情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等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以及价值观教育中的“一”与“多”之争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课题。其中,学界尤其关注到新媒体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性研究较多。

3.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选择研究

第一,重视国民教育的融入。“大学生”“高校”成为教育融入的重点对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融入教育教学、融入研究宣传、融入社会实践、融入校园文化和网络文化建设”^[9],既与大学生成长中所需的价值引领密切相关,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要求。此外,中小学分类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大中小一体化问题也吸引了学界关注。

第二,关注舆论引导和宣传。一批研究围绕“新媒体”“青年”“青少年”展开,强调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网络科技是密不可分的”^[10],积极关注在新媒体中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话语权,以及青年在新媒介空间的价值

意识演变等问题。

第三,研究以文化人的熏陶。研究从“文化自信”“文化育人”两个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展开溯源,归纳出以文化人的育人路径。学界提出,以文化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提出的新要求^[11],要“运用文化的方式”“实现坚定文化自信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向协同发展”^[12],对化人之“文”的先进性达成共识。

第四,建设实践养成的载体。学界尤为重视价值观教育中的知行合一,在载体建设方面,学界围绕探索建立常规性实践活动,尝试运行实践活动新形式,优化完善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个人融入的整体性实践活动联动机制^[13]等方面研究。

第五,讨论制度建设的保障。制度保障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制度化长效化的科学路径”^[14],学界通过整体性把握与逐词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多角度研究制度保障的具体机制,其中,尤以对“诚信”教育的制度保障研究居多。

此外,生活化教育理念、滴灌式教育方法、体验式教育模式等也受到学界关注。

4.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成就研究

第一,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普遍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人民群众通过“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的感知而逐步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15],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实际发挥出的凝聚、整合、号召等价值引导力,都反映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了可依赖的群众基础。

第二,发挥显著育人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了人民共同价值梦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强化了群众的理想信念,为学校立德树人“赋予了新内涵、新任务和新要求”^[16],发挥显著的育人成效。

第三,产生重要的凝心聚力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挥出了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有利于促成“全党全社会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动力和基本道德规范”^[17],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供给重要的精神支持。

第四,巩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价值维度,“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18]。

(二) 战略矩阵与注意力分布

为排序前10的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绘制战略

矩阵坐标图,获得本主题研究的重点、热点词分布的直观印象。其中,X轴代表频次,Y轴代表中心性,原点为频次和中心性的均值,通过合并排序前10的高频词与排序前10的高中心性词中的相同项后,获取12个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象限分布如图3所示,关键词序号对应的具体内容如表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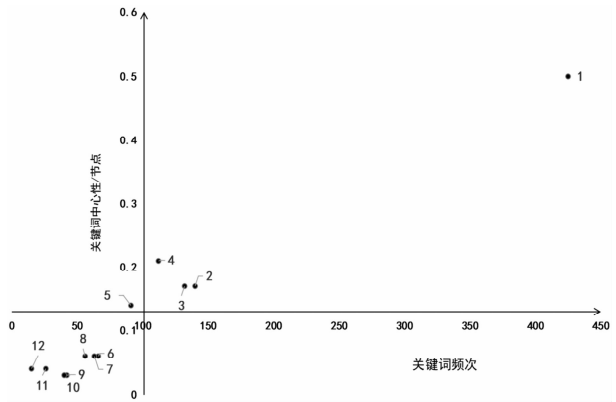


图3 战略矩阵图
表6 战略矩阵图关键词序号信息

序号	关键词
1	大学生
2	新时代
3	高校
4	立德树人
5	习近平
6	文化自信
7	路径
8	意识形态
9	青年
10	新媒体
11	社会思潮
12	文化育人

第一象限代表主流研究领域。大学生、新时代、高校和立德树人四个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性均高,为本主题研究的主流领域,其中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极大地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

第二象限代表高潜研究热点。此象限的关键词往往中心度高,与本主题其他热点关键词的研究关联性强,在频次上处于发展期,后续学术价值高。习近平属于此类热点,反映出学界需要跟进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论述。

第三象限代表孤岛研究领域。本象限分布的关键词虽然在整体的样本文献中热度较高,但是,相对于其他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而言,它们尚未形成成熟的交叉分析关系与强影响力的规模效应。文化自信、路径、意识形态、青年、新媒体、社会思潮和文化

育人属于此列。这些关键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常规性研究趋于饱和,创新性研究有待加强。如文化自信、路径、文化育人,后续同质性研究价值不高,创新性研究的空间较大。另一种是时代特征鲜明,但交叉研究不够,如意识形态、青年、新媒体、社会思潮,这类关联研究不仅需要更多注意力分布,更需要多学科的交叉分析与多方法的综合研究,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形成合力。

第四象限代表边缘研究地带。本象限的关键词有自说自话的情况,与其他关键词研究的交流不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学术开放性较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等学科的引领下,不断吸引新闻传播、文化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的注意力,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边缘化的可能性较低。

(三) 演进路径与前沿突现

演进路径与前沿突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动态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时间线图可在时间的纵向维度把握每一阶段研究热点的动态演进;通过突现词探测可度量阶段性主题研究的聚焦点,捕捉研究主题的前沿动态。

1. 演进路径

图4展示了对高频、高中心性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并形成的关键词时间线图。图5展示了每个时间段兴起或突现的新理论趋势或研究取向,表达了某一热点在某个时间段的暂时性或经典性地位。综合考虑图4、图5,以及十八大以来发文趋势,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概念形成与研究扩散期(2012—2017年)。自十八大正式提出“三个倡导”之后,学界一方面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内涵阐发,明确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形成较为清晰的研究概念,通过对图4中关键词“立德树人”“意识形态”,以及“认同”中关联的“内涵”“价值认同”,与图5关键词突现首位的“社会主义”等词的溯源发现,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观”的具体内涵、逻辑结构、独特性,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所担负的立德树人、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使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同时,为了落实《意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落细、落小、落实,学界迅速展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价值认同、路径探索等方面的研究,本土研究与发达国家价值观教育借鉴的研究并进,其中重点关注的育人机构与教育群体分别为“高校”和“大学生”;“文化育人”“校园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中的热度凸显。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2012 - 2022
社会主义	2012	3.46	2012	2015	
大学生	2012	8.64	2013	2014	
全球化	2012	3.4	2013	2015	
践行	2012	10.16	2014	2015	
培育	2012	9.08	2014	2015	
中国梦	2012	4.24	2014	2015	
新媒体	2012	6.13	2015	2017	
路径	2012	3.94	2016	2017	
文化自信	2012	5.13	2017	2020	
改革开放	2012	3.19	2017	2018	
新时代	2012	33.88	2018	2022	
立德树人	2012	12.41	2019	2022	
时代新人	2012	8.57	2019	2022	
重要论述	2012	3.27	2019	2022	
课程思政	2012	8.78	2020	2022	

第二阶段:研究增强与能力提升期(2018—2020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育新人的使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一方面,“新时代”的中心性增强、突现度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时代新人”培育的接榫受到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立德树人”的关联性研究持续增强,“立德树人”在样本文献的研究中出现强突现度,进一步反映出价值观教育在教育对象“德”性培养中的引领地位。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风险社会危机实践中的价值引领(如重大疫情)的研究热度增强,显示出新的时代挑战中学界研究能力的提升;“微时代”“网络文化”“网络育人”“网络舆情”等成为这一阶段关键词聚类中的子关键词。

第三阶段:经验总结与研究深化期(2021年起)。这一阶段常规性内涵解读、机制路径类的研究式微,但在延续“新时代”“立德树人”等时代热词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研究增长点,显见的是“新时代”聚类下的“伟大成就”“主要成就”和初显的“基本经验”;“立德树人”聚类下的“时代使命”;“文化育人”聚类下的“法治”等。这种演进路径一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性,经历某一领域初起、扩散、增强的研究轨迹后,经典的学术研究一般需要总结回顾,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实践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与成效性均进一步显现,2021年9月,《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协调机制的意见(试行)》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制度与机制保障得以提升的同时,面临的是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与之相应,学术研究需要在既有成果基础上,走向研究深化的新阶段。

2. 前沿突现

图5呈现出延续到2022年仍然保持热度的突现词,除了“新时代”(2018年热度突现)、“立德树人”(2019年热度突现)和“时代新人”(2019年热度突现)三个关键词之外,还有两类关键词值得注意,一是指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重要论述,这一突现既呼应了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主题,又反映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论述的发展是动态演进过程,需要学界的跟进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进行深入分析。二是“课程思政”。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化、细化,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将成为必须。单就学校教育而言,各个课程都要不断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课程思政”这一关键词突现显示出学术研究的使命担当。

除此之外,图4显示的2021年以来“新时代”中的“伟大成就”“主要成就”,以及新兴的“基本经验”,反映出了学界总结经验、深化研究的又一趋势,未来或将成为新的前沿突现词。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前景展望

(一)学术维度: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经验总结”基础上的“规律探索”需要学界加强关注

既有研究展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十年间的经验总结也十分必要,这样有助于我们把握新的历史阶段、面对新的历史方位,更为精准、有效地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此基础上,迎接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要求、新挑战,开展再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机制研究。

(二)研究维度: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战略规划”与“机制深化”的学理建构值得深入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项关乎“立德树人”的系统工程,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任务和实践发展要求的变化持续深入地推进。如何在科学研判时代变局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任务与新挑战基础上,积极构建一个完整的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战略规划、体系完善、方法改进、机制优化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质量发展,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三)对象维度:分众化教育基础之上多样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亟需针对性分析

既有成果中大量研究注意力分布在学生群体中,尤其是大学生,对其他群体关注不足。如何在分众化教育基础上,研究多样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于有一定代表性的诸如城镇新产业工人、城镇失业群体等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亟需针对性分析,以此更全面地服务于育人实践的新需求。

(四)方法维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中的综合分析与交叉合作仍需持续加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需要服务于因时、因势、因事而新的育人实践需求。在研究方法上要继续推进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分析,及时有效获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联性数据,在此基础上做出研究判断与理论分析,增强科学研究的有效性。同时,还需尽可能地促成研究主体、研究学科、研究内容等方面的交叉合作,进一步提升研究的综合质量与学术价值。

五、结束语

在整个文献分析中,本研究一方面,提取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学术聚焦点、发文作者、文献来源等信息,在量化的数据输出中,展示了该主题研究在外部特征方面的活跃程度与演进趋势等信息;另一方面,借用可视化技术对样本内容的结构、规律及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科学知识图谱呈现,反映出特定主题的知识域、结构关系与发展历程。同时,辅之以重点论域的观点提炼,对学界代表性研究成果予以呈现。由此发现,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聚类,研究的时代感强、实践性导向鲜明。但同时,在经历了前期的研究发展与能力增强阶段后,学界需要站在新的时代变局背景中,深入思考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与机制优化,由此,更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深入推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 沈壮海,段立国.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战略思想研究[J].东岳论丛,2017,38(6):12-22.
- [3] 杨晓慧.习近平青年价值观教育思想论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124-133.
- [4] 黄蓉生,石海君.论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的鲜明时代特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16-21.
- [5] 杨晓慧.习近平青年价值观教育思想论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124-133.
- [6] 黄蓉生,崔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青年的战略意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话体会[J].思想理论教育,2016(9):17-22.
- [7] 吴潜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反思[J].北京社会科学,2021(6):15-18.
- [8] 刘建军,赵姗.新发展阶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 值观的新形势与新要求[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1, 7(4): 18-24.
- [9] 冯刚, 刘晓玲. 坚持以文化人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6(1): 96-99.
- [10] 韩震. 大学要创造性地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J]. 中国高等教育, 2015(5): 11-12.
- [11] 余双好. 以文化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培育的方法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15(12): 17-19, 23.
- [12] 冯刚. 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17, 3(6): 12-18.
- [13] 王学俭, 李东坡.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路径和机制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4(3): 80-84.
- [14] 韩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意义及其进路[J]. 行政管理改革, 2017(8): 4-6.
- [15] 刘建军, 赵姗. 新发展阶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形势与新要求[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21, 7(4): 18-24.
- [16] 靳诺. 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2016, 2(6): 5-11.
- [17] 卢黎歌, 吴欢, 兰美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探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8(6): 5-8.
- [18] 吴潜涛. 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在实践层面的紧迫性[J]. 中国高等教育, 2015(5): 13-14.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Basic Context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SSCI Journal Literatures

F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2,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A total of 2857 articles published in CSSCI (including CSSCI extended edition) journals in CNKI databas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re used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CiteSpace is used as a research tool to draw a visual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prominent periods of high growth in the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universities with Marxist theory and first-level doctoral programs in educ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journals and pedagogical journals ar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ositions. The subjects of the core authors belong to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s of Marxism. The strategic matrix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is clear.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concept formation and research dissemination period, research enhancement and capacity improvement period, experience summary and research deepening period. The leading edge looms large. Subsequent research needs to consider the practical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times.

Key words: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nowledge atlas; visual analysis; basic context; expectation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与品牌提升研究

刘桂兰,杨曜恺,唐 梦

(河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运用网络文本分析法收集红旗渠红色旅游区游客评论,借助 ROST - CM6 软件进行词频分析、情感分析以及语义网络分析,研究游客对红旗渠红色旅游区的形象感知,以提升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品牌形象。结果表明:游客以积极情感为主,且主要体现在资源特色、文化底蕴、红色精神等方面,少量消极感知因素来源于基础设施、结构创新、管理体系、文旅融合等。景区需要完善周边基础服务设施建设,优化产品结构,创新业态发展,注重人才培养,加强文旅融合,提升品牌形象,促进红旗渠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州市乡村振兴。

关键词:红旗渠;红色旅游区;网络文本分析;品牌形象提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3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82-06

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延安和林州市红旗渠考察并作重要讲话,指出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精神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总书记强调:“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1]总书记的讲话,为传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大众群体纷纷来到红旗渠研学考察,引发了红旗渠的研学旅游热潮。与此同时,也凸显了红旗渠旅游区在接待服务、产品创新、文旅融合、质量提升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从游客体验的角度,研究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形象的大众感知和情感评价,探究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品牌提升策略,以期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获取游客形象感知、情感评价的重要媒介。张高军等(2011)利用百度、Google 和各大旅游搜索引擎,对游客记述

在华山游览过程的网络日志和网络评论进行研究,认为华山的文化底蕴以及地质旅游资源可以使游客产生积极的形象感知,指出景区应对这两点深入挖掘^[2];王艳(2011)搜集了游客对湖南第一师范旅游景区形象感知的评价,认为旅游形象是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提出了景区营销方案^[3];付业勤等(2012)以鼓浪屿为案例地,基于携程网中游客游记以及评价作为样本,研究了旅游形象感知对鼓浪屿品牌质量提升的影响^[4];Marine - Roig E 等(2015)利用搜集评价软件得到了旅游者在社交平台上对巴塞罗那的旅游评论,总结了巴塞罗那目的地游客感知形象,指出该目的地应完善游客接待体系等^[5];孙霞等(2016)研究了石河子旅游形象传播的策略,指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石河子红色旅游应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参与新疆丝绸之路的共同建设^[6];王路平(2017)通过收集旅游网站游记,借助 Rost CM6 软件形成对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的形象感知,提出丰富展示手段、分众化服务、深入挖掘文化内涵等策略提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形

收稿日期:2023-07-26

基金项目:2022 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2022XWH110);2023 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23-195);2018 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8B119)

作者简介:刘桂兰(1965—),女,河南太康人,河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红色旅游。

象感知^[7];周亚等(2021)搜集了马蜂窝网站上 115 篇关于内江的网络游记文本,分析认为应该从历史人文角度提升内江旅游目的地形象,优化整合资源,满足潜在游客需求^[8]。纪听听等(2021)收集了查干湖景区的游客网络评价文本,借助 ROST CM6 软件及扎根理论得到游客对查干湖的印象集中在“冬捕”“渔猎”“古老”“寒冷”等方面^[9];李晓云等(2022)利用 ROST Content Mining 6 分析得到游客对信阳市的旅游感知形象以及投射形象,提出要强化信阳市地方性独特优势、建设多重反馈机制等优化信阳市旅游形象^[10];孔德晶(2023)对比了网络游记文本和当地宣传文本,得到了井冈山景区的核心形象特征,提出了井冈山革命老区旅游形象提升的路径^[11]。

综上所述,学者利用网络文本分析、扎根理论、调查问卷等不同的研究方法,获取了游客网络评价中的关键词汇和感知形象,分析了游客感知对品牌提升的影响和作用,研究了网络形象、形象传播及提升路径等。为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和品牌提升研究提供了借鉴。近年来,基于网络文本研究红色旅游目的地游客形象感知与品牌提升的文献还比较少,尤其对红旗渠红色旅游的网络文本研究少之又少。因此,利用研学旅游者的在线评论文本内容,研究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从游客视角观察景区发展问题,精准塑造旅游形象,提升红旗渠红色旅游品牌,显得十分必要。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概况

红旗渠红色旅游区地处河南省林州市,位于太行山脉东麓,群山争雄,风光秀丽。受气候、地形条件的影响,林州市历史上素有“十年九旱”之称。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数十万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凿渠开洞,修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把中华民族的一面精神之旗,插在太行之巅。红旗渠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起步,蜿蜒 1500 公里,红旗渠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54 万亩。在十年修渠过程中,削平山头 1250 座,挖砌土石 1515.82 万立方米,凿通了 211 个隧道,有效解除了林州水资源匮乏的困境。

1996 年红旗渠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青团中央、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命名为

“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6 年 10 月红旗渠获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17 年 1 月红旗渠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2021 年 10 月 8 日入选河南省中小学研学旅行实践基地拟认定名单^[12]。红旗渠每年吸引百万游客前来“打卡”,各地研学团队也纷纷而至,感悟红旗渠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红旗渠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世界奇迹。今天的红旗渠以其独特的红色文化底蕴,正从一个解决引水灌溉的水利工程,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文化景观、一幅独具山魂水韵的壮丽画卷、一尊活生生的红色精神雕像。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支撑来自携程网和马蜂窝网两大主流 OTA,通过收集相关游客点评文本数据,选取 2017 年至 2022 年为时间段建立基础信息数据库。利用八爪鱼采集器抓取红旗渠游客评论 587 条,约 30405 字。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以及研究的科学性,确保数据中评价文本主题紧贴红旗渠的同时筛掉无效文本,如景区自身对其旅游品牌、旅游产品的广告类营销评价,或重复评价。最终无效文本 35 条,筛掉重复评价 90 条,得到有效数据 462 条,有效字数共计 22074 字。其中 2 分评差 4 条,3 分中评 29 条,4 分好评 104 条,5 分好评 325 条。

(三)研究方法

ROST Content Mining 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设计的辅助研究数字平台,能够实现对网络文本的分析,支持分词、词频统计、聚类分析、情感分析、语义网络、社会网络等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网络文本内容。将红旗渠游客网络评价感知内容转化成定量、系统的数据,采用 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的功能性分析、文本处理、可视化等功能,对在携程网和马蜂窝网搜集的相关游客点评文本进行词频分析、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等。进行分词处理,对分词后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删去其中无效词汇(如“然后”“一路”等词汇),对文本处理后得到红旗渠评论内容中旅游形象感知排序前 45 名的高频词汇。再次,通过情感分析了解游客感知倾向,用语义网络分析,得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从而得到游客对红旗渠景区旅游形象详细感知。结合游客的形象感知得出游客对红旗渠的直观反映,从红旗渠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以及文旅融合程度做出总结,以此提出红旗渠品牌提升的思路建议。

渠建设的不足之处。在对积极情感的分段统计中,一般积极情感占比为 30.74%,中度积极情感占比 28.72%,高度积极情感占比 40.54%。可以看出,高度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其次是一般积极情感,说明游客对红旗渠游览的真实体验符合其对游览的预期。通过对原始网络文本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积极情感表现为“值得”“伟大”“震撼”“奇迹”等赞美词汇,此类情感表现归功于红旗渠景区独有的红色精神,大部分游客在游后印象中持积极态度,有重游和推荐意愿。例如,有网络文本中评价“红旗渠是非常好的红色教育基地,在这里可以设身处地感受老一辈建设者的艰辛历程”,“被不怕牺牲、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太行精神深深打动”。

中性词汇表现为“还行”“吐槽”;少部分游客体验低于预期,对游后印象持消极态度,消极情感表现为“不太清楚”“无语”“票价高收费多”等。这表明

红旗渠景区在景区宣传介绍、景区交通、景区服务、旅游吸引物和优惠政策等方面有待提升。景区管理者应及时了解游客的感受和建议,完善景区交通工具,增加游客游览便利性,加大对旅游吸引物的宣传,增加价格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游客的到来,丰富游客旅游体验。

(三) 语义网络分析

语义网络分析可使各词汇之间的关联性可视化地呈现出来,在语义网络关系图中可以看到由各词汇之间的连线,这些线条则可以映射出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14]。利用 NetDraw 生成语义网络关系图(图 2),在语义网络分析可视化图中,联系较为紧密的是“红旗渠”“青年洞”“纪念馆”“人工”“干渠”等热点词汇。结合语义网络分析可视化图可以看到,除了“红旗渠”,游客提及最多的就是“青年洞”,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洞是红旗渠景区最著名的景点之一,“纪念馆”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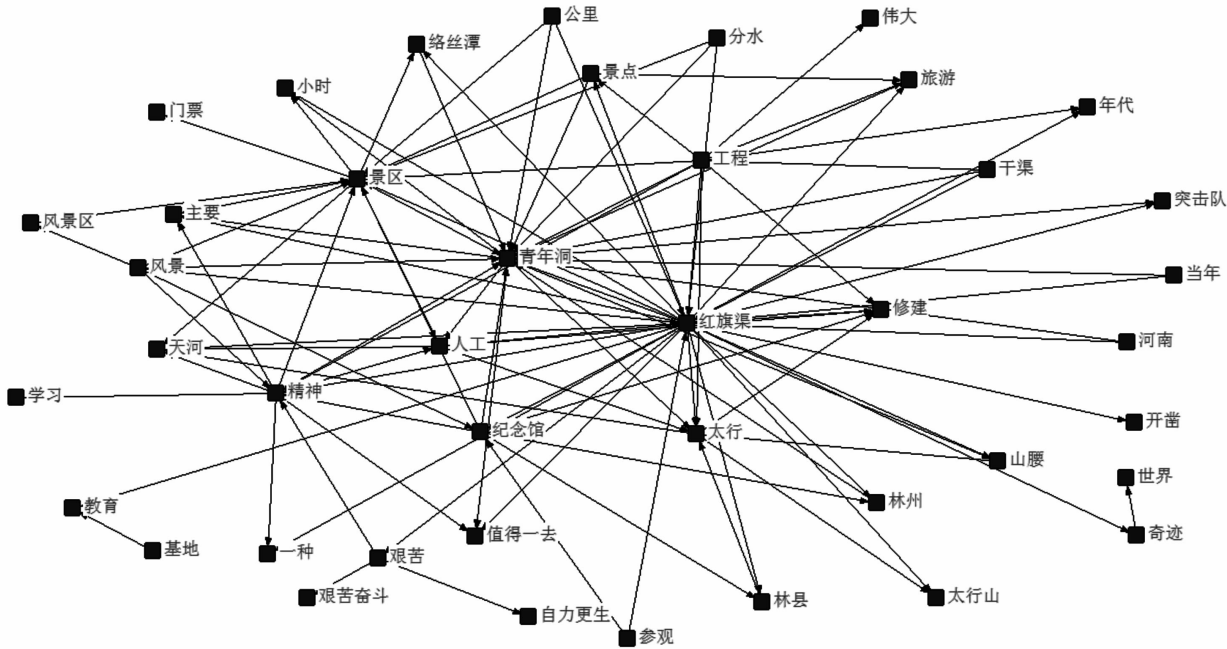


图 2 红旗渠红色旅游网络文本语义网络分析

以图 2 红旗渠红色旅游网络文本语义网络分析图结合红旗渠红色旅游形象感知高频特征词汇得出,游客在红旗渠、青年洞和纪念馆之间往来频繁,在未来旅游线路规划和旅游产品、形象设计上,应对以上旅游资源要素给予重视并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例如,可以考虑优化红旗渠和纪念馆景区的一票通玩制;在端午节、清明节、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假期或建党建军等重要的节假日,开通林州市红旗渠红色景区和纪念

馆之间的交通专线等。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通过采集游客在两大 OTA 对红旗渠的网络评论,对文本进行筛选处理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进行分析,得出红旗渠景区以其浓厚的红色精神文化背景给游客提供了独特的红色旅游形象感知,其中青年洞、纪念馆、人工天河是游客对红旗渠旅游形

象的基本认知。游客对于景区旅游资源、文化底蕴、红色精神的满意度较高,评价中以积极情感为主。但仍存在消极感知,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停车位紧张,景点导向标识少,游客游玩后对景区各景点特色不够清楚,不同景点之间没有短驳车需自行前往,缆车等待时间过长等方面。

第二,景区结构创新不足。有游客评论红旗渠景区太过依赖历史带来的价值,实用性强但观赏性不高,游玩后并没有带来切实体验感。

第三,景区管理体系不完整。有游客表示景区缆车是承包出去的,乘坐缆车前服务人员表示可以送至停车场,下缆车后无人接待,造成消费前后服务态度有所偏差;检票手续也较为复杂,多处地点均需要验票。

第四,景区文旅融合度较低。有游客表示沿着渠岸跟着水走会乏味,认为景区对红旗渠文化、红旗渠精神的挖掘不够,创新体验不够,希望游览时能看到一些文化景观,可以从内心深处对沿途红色精神、历史文化事迹形成认同。

(二)红旗渠品牌提升建议

旅游形象品牌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加强政府主导,同时联合当地村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共同建设^[15]。红旗渠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凸显,但品牌优势并不突出,游客在红旗渠的停留时间相对较短,在红旗渠的消费也比较少。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景区红色旅游产品构成较为单一。因此在保证红旗渠红色精神文化产品充分体现的前提下,要努力挖掘要素资源、环境资源,打造红旗渠红色旅游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品牌产品。

第一,完善景区周边基础服务设施。加强景区以及周边交通运输设施和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切实提升红旗渠景区的可进入性和接待能力,如扩大停车场规模,利用林桐高速、沿太行高速、林汝高速等,构建林州与景区之间的便捷旅游交通网络;完善景区周边住宿、餐饮设施和相应的服务;注重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根据红旗渠的特色,既要突出文化色彩,展现豫北地方特色,又要具有纪念意义,真正能够加深游客对红旗渠旅游的印象。同时,要加强红旗渠景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客运站、水利、公厕、垃圾中转站、供电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创新产品结构,增强吸引力。红旗渠景区在突出红色研学价值的前提下,发展智慧旅游,推动智旅融合。增加电子导游、数字旅游产品,开发虚拟

旅游产品,逐渐以虚拟旅游产品作为核心产品,景区现有的产品多为传统纪念品、旅游消费品。应创新产品结构,例如线上展示红色历史、红色故事,通过场景再现等不同形式的旅游产品展示,让游客感受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创新景区旅游吸引物,例如红色主题商业街、VR 仿真沉浸式体验、场景还原游客参与筑渠等旅游活动,使游客到景区后流连忘返,产生重游的意愿。

第三,注重人才培养,提升服务水平。提升红旗渠红色旅游品牌形象,离不开高素质的景区从业人员,高水平管理人员队伍为红旗渠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研究发现,红旗渠从业人员服务水平偏低,缺乏景区规划类的高素质人才。管理体系不完整的原因是人才队伍不完整,因此,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时刻学习国内外优秀景区的管理模式,着重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人才队伍,是红旗渠品牌提升的关键。加快旅游人才培养和引进,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机制,可通过与高等院校合作联培、人才引进等方式,提高从业人员管理水平,这对提升游客对红旗渠景区的红色旅游形象感知以及红旗渠自身品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加强文旅融合,塑造品牌形象。深挖红旗渠特色文化内涵,结合红旗渠纪念馆、红旗渠教育基地等具有教育意义的特色研学点,设计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和旅游纪念品^[16];打造主题鲜明的红色文化旅游街;结合地方历史文化如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节庆活动,挖掘文化内涵,开发体验项目,提升红旗渠红色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吸引力。通过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品牌形象,增强游客认同感,传承红旗渠精神。

参考文献:

- [1] 贾泽人. 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 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N]. 中国旅游报,2022-11-1(01).
- [2] 张高军,李君轶,张柳. 华山风景区旅游形象感知研究:基于游客网络日志的文本分析[J]. 旅游科学,2011,25(4):87-94.
- [3] 王艳. 旅游地形象的游客感知实证研究:以湖南第一师范旅游景区为例[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1,11(1):71-74.
- [4] 付业勤,王新建,郑向敏.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旅游形象研究:以鼓浪屿为例[J]. 旅游论坛,2012,5(4):59-66.
- [5] Marine - Roig E, S Anton Clavé. Tourism Analytics with Massive User-generated Content: A Case Study of Barcelona[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 2015,4(3):162-172.
- [6]孙霞,艾维依.石河子红色旅游品牌形象传播策略研究[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6,24(4):69-71.
- [7]王路平.网络文本分析方法在旅游形象感知研究中的应用: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7(2):44-51.
- [8]周亚,张科.基于网络游记文本分析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以内江市为例[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1,36(6):75-82.
- [9]纪昕听,董姝娜,陈曦.基于网络文本的查干湖景区旅游形象感知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1,40(12):102-107.
- [10]李晓云,苏婧.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信阳市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J].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22,32(2):35-41.
- [11]孔德晶.扎根理论视域下革命老区旅游形象提升路径:以井冈山市为例[J].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5(3):12-16.
- [12]张琳.红旗渠 文化遗产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EB/OL].(2019-02-27)[2023-11-11].<https://www.henan.gov.cn/2019/02-27/735743.html>.
- [13]刘力.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与游客旅游意向:基于影视旅游视角的综合研究[J].旅游学刊,2013,28(9):61-72.
- [14]方雨,黄翔.武汉市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研究:基于网络文本分析方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51(5):709-714.
- [15]朱虹.乡村振兴视域下宁德红色旅游品牌建设研究:以宁德市霍童镇桃花溪村为例[J].海峡科学,2021,000(12):96-99.
- [16]郭强,王晓燕.文旅融合助推海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J/OL].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0-1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tudy on Image Perception and Brand Promotion of Red Flag Canal Scenic Spot based on Web Textual Analysis

LIU Guilan, YANG Yaokai, TANG Meng

(School of Tour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The network textual Analysisis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comments of tourists in the red tourism area of Hongqi Canal, and the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 and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ROST – CM6 software to study the image perception of tourists in the red tourism area of Hongqi Canal, so as to improve the brand image of Hongqi Canal red tourism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ts mainly gave positive comments, which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heritage, red spirit, etc. , and a small number of negative perception factors come from infrastructure, structur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etc. . The scenic spot needs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surrounding basic service facilities, optimize the product structure,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formats, pay attention to talent training,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enhance the brand image, promote.

Key words:Hongqi Canal; red tourist area; web textual analysis; brand image enhancement

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和保护研究

王永杰,李刚*
(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大理671003)

摘要:阐述新媒体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新媒体传播效能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传承和保护。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媒体;传承与保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4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88-05

在当代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传承和保护面临两重困境。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变革,非遗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逐渐没落并与现代化社会脱节^[1]。另一方面,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非遗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人们现代审美情趣的改变,导致非遗社会需求不足,市场日益萎缩,甚至逐渐消亡,非遗的传承和发展陷入困境^[2]。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传媒行业不断变革,新兴媒体快速发展,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带来新的机遇。新媒体具有技术多样性、呈现方式多元化、参与方式交互性、服务模式个性化和传播范围跨区域性的特点,非遗通过新媒体传播,拓宽了传播路径^[3]。新媒体的高效率、碎片化传播的同时也唤醒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为非遗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为非遗传承和保护开辟崭新道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传播中的意义

(一)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通过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表达,因其“无

形”的存在形式,这些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主要依赖传承人口耳相传^[4]。另外,非遗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全面深入地了解非遗通常需要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地,这也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困境之一。新媒体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突破了非遗传统的传播方式,其交互性、便捷性等特点,打破了传播空间的限制。非遗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直播等多元的传播形式,让相隔千里的传统文化变得唾手可得。传承人通过直播、短视频或者非遗学堂向观众介绍和展示非遗,观众可以进行提问互动,实现了不必面对面也能即时沟通交流。

(二)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是某一群体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它的传承是活态的、发展的,也是不断演化的过程。因此,非遗的保护不能像保护文物那样放在博物馆里封存,而是应该促进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走进群众的生活,并引导社区民众积极参与保护非遗,为其创造社会需求和生存空间^[5]。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创新性传播传承非遗,也代表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融。传承人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合理开发利用文化资源,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吸

收稿日期:2023-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地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动力机制研究”(17BGL119)

作者简介:王永杰(1997—),女,河南周口人,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旅游经济。

通信作者:李刚(1975—),男,云南弥渡人,博士,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引更多的青年人留在乡村,守护传承优秀乡村文化,从而培育更多的传承人,打破传承困境。

(三)增强民众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通过新媒体平台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公众明晰传统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等,领会其中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等,在精神和行为上都认可我们的优秀文化,在民众间形成文化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众发挥文化主体的作用,积极主动参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建共享保护成果,增强文化自觉^[6]。除此之外,文化主体还需将传统文化外化于行,切实将非遗的文化内涵践行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文化交流,取长补短,适度拓展和完善,主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二、新媒体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现状

(一)传播渠道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赖传承主体的口传心授,传授范围也仅限家族内或师徒间,后来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传承人广收门徒,这也表明非遗受地域限制影响很大,可能只在一定的区域内散播和流传^[7]。其次是传播媒介的传播,主要是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简单且不系统的报道使非遗传播的深度和有效性不能得到保障。传统媒体表现形式单一,内容抽象概括,无法满足观众的更深层次的文化需求,特别是电视和广播,储存性较差,不能回放和保存。

非遗相关主体借助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的传播范围和提高传播速度,实现了跨时空多平台传播且受众广泛。新媒体传播具有时效性和互动性强的特点,观众对信息可以做出及时反馈和交流沟通,时间上具有留存性。目前对非遗进行传播的新媒体平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官方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平台、视频类平台和网络直播平台。传播主体利用新媒体技术,促进了非遗多渠道、全方位的传播。

(二)传播形式多样化

传统的媒体传播通过报刊书籍的静态描述、电视节目的无差别播送或是纪录片单调固定的叙事模式,这些并不能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但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具有不一样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第一,官方门户网站,主要对非遗进行分类、介绍、展示、数据统计和政策发布,网民可以登录国家或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快速检索来获取相关知识和信息。第二,是以微信和微博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这

类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使用频率高,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涵盖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是新闻资讯发布和活动宣传的重要平台^[8]。很多省份及州市都注册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也有非遗传承人用个人账号分享宣传自己的工作日常。第三,视频类平台,这类平台是最火热的平台之一,传播主体剪辑精彩的片段,搭配合适的背景音乐,带给观众多感官体验,引起人们的兴趣。第四,网络直播平台,通过直播,非遗可以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进行展示,内容直观深入,传播者与观众互动性更强更及时,在虚拟网络空间里,观众能获得更好的体验感。很多平台为了助力非遗的新媒体传播还推出了相应的策划,如抖音平台推出非遗合伙人计划、DOU 艺计划、DOU 有好戏等,快手平台推出的非遗带头人计划、快手非遗加速器、快手非遗学院等。

(三)传播主体扩大化

通常情况下,非遗传承人既是传承主体也是传播主体,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逐渐全面、系统,各级各类保护主体也加入非遗的宣传和保护之中。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主体大多是较为官方和专业的群体。

在新媒体时代,各类网络媒体发展迅速,人人都可以是故事的讲述者,所有人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传播主体。网络博主进入门槛低,利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即可进行直播、发布视频和推文,来分享照片和视频记录的生活日常。在新媒体平台里,传播非遗的博主大部分是非遗的传承人,但也有不少人是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他们从大众喜爱的角度分享所见所闻所想,以自己的专业和能力为非遗的传播贡献力量。像“李子柒”这类的创作者,深挖传统文化内涵,并以个性化的叙事方式复现、传播、宣传中国文化;还有各地传统文化的记录者,以不同的形式讲述每个技艺背后的故事。

(四)传播效果显著

比起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新媒体平台的互动性凸显出极大的优势,各平台都有相应的互动机制,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观众可以通过自己喜爱的方式和形式去查阅非遗信息,全方面多层次地了解非遗背后古人的智慧及宝贵精神,让观众感受到非遗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从精神层面产生共鸣,形成文化认同。传播主体也可以根据互动反馈调整传播的方式和内容,以期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可以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发表自己看法,也可以通过打赏激励喜欢

的博主,鼓励他们创作更好的作品,实现传播者和受众双向传播。利用新媒体传播非遗满足人们个性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再生和发展的文化空间和社会环境。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化内涵的缺失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其文化内涵的保存和延续^[9]。巧夺天工的手工艺品、精妙绝伦的演出以及百里异习的民俗都只是非遗的表现形式,新媒体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被这些物质载体吸引,忽略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这种现象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其一,泛娱乐化。泛娱乐化指人们以娱乐的价值标准衡量事物,新媒体平台作为大众打发时间、放松精神的娱乐方式,很多人只是为了追求简单的快感和浅层次的满足^[10]。而一般的传播主体为了满足观众娱乐化的需求,创作的重心将偏向包装、炒作、噱头,忽略文化内涵的表达。非遗变成简单的文化符号,无法实现真正的文化传播。其二,碎片化传播。碎片化的信息往往是被简化后的,缺乏内在的逻辑,只是片面的展示和解读,这与非遗的系统性相悖。非遗与其精神内涵、物质的载体、活态的技艺以及生存的环境都密切相关,而非简化、拆解和搬运到网络平台上转播,忽视文化内涵的表达。

(二)传承主体的技术困境

非遗的传承人是该项传统文化的代表,具有较高水平的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首先,这类技艺高超的手艺人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有限,接触到网络相对滞后,面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不高,仍然依赖传统的口传心授来传承和传播。其次,很多非遗账号不够重视运营,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和运营团队,没有专业的拍摄和制作,更新频率较慢、内容粗糙,难以吸引和留住粉丝,无法很好地运用新媒体平台,难以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最后,非遗传播需要整合利用多个新媒体平台,目前传承人大多集中在抖音和快手两大短视频平台,还有很多拥有大量优质用户的新媒体平台还未被很好地开发利用。如果传承人不能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不利于展示非遗多元化传播和展示,将阻碍非遗的进一步发展,无法吸引更多人来传承和保护,使非遗再度陷入传播困境。

(三)内容曲解的失真困境

非遗的传承过程是活态的、变化的,当社会文化变迁时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社会需求

的变化,正如非遗的新媒体传播现象也是活态传承的表现。但是在新媒体传播过程时,为了迎合受众的喜好,有时候非遗传播主体会过度解读、夸张和曲解非遗。其中有以下原因:一是新媒体语境下非遗的重构失真。当非遗从现实语境到新媒体语境,需要经历重组和重构,一些传播主体为了获得节目效果,在取材时往往会只选取最精彩的部分,甚至断章取义,忽略非遗的原真性和整体性。二是传播者媒介素养不高,平台缺乏监管。近年来传统文化大受观众喜爱,有的主播为了获取利益,随随便便就给自己的作品贴上非遗的标签,假非遗和伪民俗混淆视听,平台也缺乏对这类事情整顿和打击的举措。三是传播者为吸引眼球,夸张表现非遗。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特别”和“个性”更能吸引大家的目光,网络博主小潘潘用搞怪和庸俗的唱法魔改黄梅戏,赢得流量但让不了解黄梅戏的观众形成刻板印象。不严肃、不尊重,甚至污名化非遗,不利于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四)经济价值的变现困境

非遗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传承人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其经济收入,激发传承主体保护非遗的内驱力,同时也降低传承人对政府扶持的依赖,促进非遗保护工作良性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影响着非遗经济效益的实现。从消费需求的转变来看,消费者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更加看重商品的文化价值,而非遗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和文化价值恰好满足这一需求。非遗产品或服务一经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便深受观众喜爱,但也引来大批的模仿和抄袭,使非遗面临同质化的问题。一方面,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传承人维权困难,侵权行为经常发生,伴随着非遗商品的热销,市场上出现大量相同或相似的仿制品,非遗市场鱼龙混杂,低劣的商品会影响非遗在大众心中的形象,侵害非遗传承人的利益,阻碍非遗的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非遗新媒体创作模式化,作品雷同,久而久之的观众就会审美疲劳,丧失兴趣,降低消费意愿。从非遗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来看,对非遗价值挖掘不够深入,产品单一,缺乏创新,不能满足当下的审美需求;文创产品开发过程中,品牌化战略缺失,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市场竞争力不强,不利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

(五)茧房效应的传播困境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式增长,人们每天面对大量信息,但注意力是有限的。相较于传统媒体,新

媒体用户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来筛选感兴趣的信息。新媒体平台为了增加用户黏性,利用大数据算法,收集用户数据,预测用户偏好,向用户精准推送内容和服务。大数据推送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减少筛选和查找信息的时间,给用户带来很大便利。但这也让网络圈层化现象更加严重,久而久之,用户便会固化封闭在“信息茧房”之中,不利于用户接触多元化的信息,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和发展。

四、新媒体助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发展策略

(一) 注重文化内涵表达

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新媒体平台上,非遗传播和传承的核心是文化内涵的表达,是故事背后精神的传递,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传承者都要坚守非遗文化根基。在新媒体时代,非遗从传播形式到传播渠道都经历了巨大变化,让非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里,结合互联网传播的特点,适应碎片化和娱乐化的传播方式,但为了非遗的良性发展,始终要围绕文化内涵进行创新。首先,在传播过程中,增强非遗的可解读性,叙事可以更加场景化和情景化,加入更多的生活元素和历史故事。以具有文化感召力的人物或事件来展现非遗的魅力和当代价值,增强对非遗文化内涵的刻画,不用刻意搞怪和娱乐化也能引起观众共鸣,面向受众群体传播时更具文化信服力。其次,传播主体要兼顾非遗保护的整体性。新媒体平台以短时和高效为特点,非遗可以从以下角度来解决碎片化传播的弊端。对于注意力较短或猎奇的观众,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分类合集的功能,分期传播和介绍非遗,既迎合新媒体观众获取的信息的习惯,又满足非遗传播的整体性。对于非遗的爱好者,可以利用长视频和在线直播的方式直观系统地展示非遗。

(二) 加强线上保护工作

当前,一些运营良好的非遗账号新媒体传播效果显著,不仅收获大量粉丝和关注,还能得到不菲的收益。面对非遗互联网上传播的趋势,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引导,传承人积极入驻新媒体平台,促进非遗线上保护工作的进行。第一,为非遗传承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相关政府部门在支配和使用非遗保护资金时,适当分拨部分资金补贴传承人设备购买和运营费用,推进线上保护工作的开展。各地非遗保护中心可以增加或者开设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培训课程,指导传承人或者学徒使用新媒体技术,传授短视频及图片的拍摄方法,内容制作技巧,解决传承

人技术困境。第二,培养专业人才。当前,网红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相关部门可以从本地区非遗传承人、非遗爱好者以及新媒体博主中筛选较为有潜质的一部分人,并培养成为民族文化网红,比如四川甘孜理塘的丁真,走红之后,积极宣传家乡文化,助力甘孜的文旅发展。非遗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专业的非遗人才,进一步加大非遗的网络传播力度。第三,加强与新媒体企业的合作。政府可以举办新媒体创作交流会,传承人可以向优质博主学习新媒体日常运营的要点,确保更新内容的质量和更新频率的稳定;分拨专项资金,支持非遗传承人持续进行新媒体创作,对质量高的账号给予额外的奖励。第四,综合利用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平台。除了抖音、快手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外,还有很多优质平台,不同平台的用户类型和传播形式不同,传承人通过多平台投放非遗作品,能实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三) 营造良好的新媒体平台

非遗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已初见成效,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非遗可持续发展仍需要多方配合,形成合力,共同建设和谐的传播平台。对于传承人和传播主体,要保证非遗传播的真实性和严肃性。非遗的传播形式可以根据时代变迁进行创新,但不能夸大其中的价值,曲解文化内涵,传播主体应向大众展示真实且符合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满足当代人类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保障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对网络上污名化非遗的行为进行处罚;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将现有非遗的信息材料等数据整理上传到互联网,利用新媒体强大的分类、检索和储存功能,构建非遗数据库,形成立体传播体系;将有教育价值的非遗,录制成网络课程,提供给大众共享学习的机会。对于新媒体平台,要加强对作品内容的审核,删除低质量及同质化非遗作品,注销虚假非遗账号,优先推送高质量非遗原创作品,让非遗传播更加高效、畅通。对于大众而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发布不良言论;积极发挥社会监督功能,善于辨别虚假信息,勇于反驳和举报假非遗,净化网络空间。

(四) 健全非遗消费市场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对精神和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需要加快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各大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创新成果不受侵害,激发创作热情。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合理界定

非遗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保护传承主体创新成果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形成完善的保护体系。除此之外,还要加强传承人的普法工作,指导传承人利用法律应对侵权行为。其次,非遗传播主体要不断创新新媒体传播内容,增强非遗的可读性,激起观众的兴趣,增强粉丝黏性,为销售非遗产品积累稳定客户。非遗机构也可以通过和高校或者企业合作,充分调查消费市场的文化消费偏好和需求,设计高层次非遗核心技艺产品,占据高端消费市场,开发符合当下审美和需求非遗衍生品,满足大众市场多元化的需求,激发不同类型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然后通过抖音和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将非遗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最后,加快非遗品牌化建设。鼓励个体或者传承群体深度挖掘整合非遗文化资源,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良好品牌形象能极大提升非遗的新媒体传播效果,增强产品竞争力,提高非遗的盈利能力。生产性保护让非遗保护工作从输血式转变为造血式,真正实现保护和振兴非遗。

（五）加速非遗跨界融合

非遗标签在海量信息中传播能力有限,加强非遗跨界合作,有利于构建新媒体多角度、全方位的传播体系,扩大非遗品牌影响力。第一,非遗+旅游。文旅融合背景下,积极挖掘非遗和旅游的融合新模式。很多文旅局官方账户,拍摄宣传视频时,积极展示特色文化,引来游客前往打卡。第二,非遗+网游。在网游中加入非遗元素,可以实现销售与传播的双重效果,在这领域比较成功的游戏之一“王者荣耀”,在很多游戏皮肤设计中加入敦煌等元素,赢得很多网友的喜爱。第三,非遗+流行音乐。近年来,音乐人也加入传统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比如将戏腔唱法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武家坡 2021》,歌词描绘我国瓷器制作的《青花瓷》等,别具一格,极大地提高非遗文化的传播。

五、结束语

非遗的新媒体传播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传统文化通过新媒体进行再生产,对非遗保护工作来说是重大突破与创新。但非遗新媒体传播也要遵守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直面新媒体传播的挑战,打破困境,推动非遗保护持续健康发展,培养公众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保护传承,真正实现非遗全民共创共享。

参考文献：

[1] 萧放,王辉.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的路径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 70-77.

[2] 高小康.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J]. 文化遗产, 2009(1): 2-8.

[3] 周斐芳. 新媒体时代三明非遗文化翻译与传播对策[J]. 三明学院学报, 2022, 39(2): 35-40.

[4]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5] 刘魁立. 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河南社会科学, 2007(1): 25-34.

[6] 赵艳喜.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公共性及其发展方向[J]. 文化遗产, 2018(4): 24-30.

[7] 冯雪红, 向锦程. “人”造石刻: 和日村石雕传承的主体、方式与意义[J]. 广西民族研究, 2018(1): 81-88.

[8] 贺军. 非遗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 以江永女书为例[J]. 传播与版权, 2022(7): 89-92.

[9] 钟进文, 范小青. 新媒体视角下的“非遗”保护与传承观念新探: 以裕固族为例[J]. 西北民族研究, 2017(2): 175-182.

[10] 何志武, 马晓亮. 融媒体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微纪录片传播[J]. 中国编辑, 2022(9): 42-47.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Innovativ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Media Era

WANG Yongjie, LI G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 media to help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alyze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media era, and then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innovativ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ew media;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执政安全视角下的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

——深入学习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执政安全思想

安康¹,刘阳²,范茹平¹

(1. 中共濮阳市党校,河南濮阳 457000;2.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历史周期率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先后找到了“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两个答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质是实现长期执政安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历史周期率之问的是民主人士黄炎培,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是一个问题的内外两个方面,坚持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相互结合,把握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两答案的思想内核,坚决反腐败是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执政安全;民主新路;自我革命

DOI:10. 13783/j. cnki. cn41 - 1275/g4. 2023. 06. 015

中图分类号:D26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3715 (2023) 06 - 0093 - 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已走过百年。在百年奋斗中,如何使党永葆生机,并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相继找到了使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自身安全进而完成历史使命的两个答案。这两个答案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新路”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自我革命”。两个答案作用的是同一目标,那就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安全。在建功新时代的今天,用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课题,理论和现实意义都极其重大。

一、历史周期率由来及内涵

(一)黄炎培与历史周期率

历史周期率是指一个国国内政权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现象。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是特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它只可能出现在具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而且出现在三千

年未有之变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生在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间。创建这一术语的黄炎培,历跨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代,他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自封建社会的饱学之士,丰厚的文史知识、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山河破碎的旧中国迫使他思考: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出水火且长盛不衰。1945年7月,他以中华民国参政员身份去延安访问,当看到精神风貌迥异于国统区的延安军民时,他和爱国华侨陈嘉庚一样,认为“未来中国希望在延安”,但是他又担心,一旦环境好转,今日意气风发积极向上的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惰性发作”,重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老路,跳不出“人亡政息”周而复始的历史周期率。

(二)毛泽东的历史回声

面对黄炎培的求解,毛泽东同志回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收稿日期:2023 - 09 - 2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从建党百年视域看党防范化解风险维护执政安全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021BDJ022)

作者简介:安康(1984—),男,河南濮阳人,中共濮阳市党校统战理论教研室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刘阳(1995—),男,河南濮阳人,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范茹平(1968—),女,河南濮阳人,中共濮阳市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基本理论。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这一问一答,不仅创造了一段历史佳话,也使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张和建国方略为天下知,一时延安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圣地。

(三)“律”“率”之辩

“律”“率”,同音不同字,且含义迥异,“律”是规则,而“率”这里是概率。历史周期率之所以被称为“率”,而不是“律”,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虽然勃忽有必然,但其周期长短不一,既有一世、二世而亡的秦、隋,也有绵延数百年的汉、唐,这说明周期并不是不可撼动的“铁律”。长短可以干预,但是需要有效方法。近代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急之秋,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场,但其救国主张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只有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群众、发动革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此而扭转。

二、中国共产党跳出周期率的百年探索

(一)民主新路的求索与实践

1. 中国共产党竖起民主的旗帜

早在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蓬勃开展,青年毛泽东深受影响。多年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2. 民主新路的初步探索

八七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不论是在创建的工农红军内还是在开辟的红色根据地中,由于实行了民主的制度,在“物质生活如此贫乏,战斗如此频繁”,红军“仍能维持不散”,成了打不垮的军队。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民主集中制度”成为“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有利斗争的”的利器。^[2]这是党幼年时期民主新路的初步探索。

3. 民主新路的局部实践

延安时期,相对稳定的生活使毛泽东有时间研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对未来中国的名称(中华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方式进行了详尽描述,强

调“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而且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方向”。他庄严声明,谁能领导人民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3]。这表明,在黄炎培还没到延安的1940年,我们党已经将民主与党的执政联系起来了。我们认为,这就是未来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样子”。1940年3月各抗日根据地开始实施的“三三制”政权架构就是“民主新路”的局部执政实践。

4. 民主新路全面践行

1946年6月,蒋介石南京政权,撕毁同年1月国共两党签下的停战协议,我们党力推的和平建国梦破灭,国民党主导的战后“政协”名存实亡,筹备新政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便成为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必然选择。1948年5月前夕,中共中央向国内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力量竞相响应。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齐聚北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新的民主联合政府产生。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就此诞生。诞生的新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4]。新政权的建立,使历史周期率的破解有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正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所谓民主新路的践行,深受群众欢迎,巩固了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给出的“民主新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让人民监督,二是人人尽责。前者强调的是人民的民主权利,后者强调的是主人翁意识。让人民起来监督,党就要构建、创设人民当家做主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制度与体制,并且执政党必须有接受监督的意愿和态度;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实施权力监督提供了制度保证。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广泛利用媒体舆论、人民来信畅通人民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正确处理人民来信发表意见、作出指示。同时,党还不断强化党内监督,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等党内监督机构,使党内监督实至实归。

5. 民主新路深入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重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自我监督,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6. 民主新路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全方位接受人民的监督,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强调:“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可以说,所有民主和监督的举措都是对毛泽东破解历史周期率思想的发展,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

人民张开双臂拥抱新政权,感恩新政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忠实地遵循与践行在延安时期对人民作出的民主承诺,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交上了一份求解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满意答卷。

(二)自我革命新答案的思想哲理

1. 自我革命新答案

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使用“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在以后的论述中,总书记不断疾呼自我革命,要求全党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并两次发文,对自我革命进行系统诠释。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总结了自我革命的经验:如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从严管党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党内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等等,^[5]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自我革命的原则: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从四个方面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首先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其次健全监督体系;再次就是推进监督精准常态化;最后是用好问责,加大政治巡视。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

2. 苏联东欧国家教训

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关于政权建立者争取胜利和胜利后精神变化的陈述,描摹了政权建立者夺权过程中从勤勉奋进到安于现状的精神变化机理。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矛盾学说,政权被腐蚀掉的根本在于内部,外来诸因仅是表现形式,如果一个政权自身足够强大,任何外力都难能摧毁它。从哲学上说,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规避政权倾覆,取决于执政者有无强大自我的脱危战略谋划和应对危机的“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际共运史上发生了轰动世界的政治悲剧:拥有2000多万名共产党员、74年执政历史、88年光荣建党史的苏联共产党丢掉了政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覆亡。而这个被历史淘汰的政党,曾经在只有20万名党员、处于资本主义汪洋大海的包围中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只有200万名党员的时候,抗击了以整个欧洲力量入侵到莫斯科郊外的德国法西斯,她曾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被压迫民族向往的圣地,可是在拥有煌煌2000多万名党员时却轰然倒塌。这种极不合乎认知逻辑的事实表明:一个政权的兴衰更替与建立政权的政党组织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联。有关联的是党的理想信念是否丧失,党内有无特权集团,党的宗旨原则有无背弃,党的精神是否懈怠,治党管党力度如何,纪律是否废弛,组织是否涣散,理论是否僵化、政治是否堕落。若所列举各自身因素均是“是”,那必然走上导致江山易手、政权旁落的不归路。普京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俄罗斯丧失了23.8%的领土,48.5%的人口,失去44.6%的军事力量,丢掉了波罗的海的战略基地,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6]与苏联解体前后并行的是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夜“质变”,国际共运陷入低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机掀起一股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逆流,更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共产主义从此走向沉寂。问题是历史不会终结,历史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就在西方学者坐等“终结日”到来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踏步走在了时代前列,以创造的“两大奇迹”、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等耀眼成绩,“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7]。苏东剧变的根源是一些执政政党不修内里,不强身健体的结果。我们党吸取他们的教训,把党的执政安全提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动摇,不断加强内功修炼。

3. 自我革命新答案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我革命”基于我们党百年发展的历史底蕴,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血腥风雨的残酷环境,使党从成立那一刻起就重视通过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先后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第一个决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精神,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科学精准而又艺术地解决了党成立以来不同时期遗留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路线问题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不仅就诸多遗留问题作出了结论,而且用这些结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锻造了一个像钢铁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党。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显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得与失,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彰显了党自我修复能力。第三个历史决议侧重于成就和经验总结,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突出民族性和世界胸怀,把新答案“自我革命”提炼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经验之一,并要求全党坚持和发扬,这就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奠定了根本理论遵循,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彰显了“打铁还得自身硬”理论逻辑。

三、新时代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一) 坚持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相结合

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维护党的政治安全,实现长期执政,面对不同世情、国情、党情给出的针对性答案。但历经百年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着力点。在阐述二者关系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8] 习近平总书记进行的两个答案内外区分,告诉我们: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合力。只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才能不断实现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没有外力的监督,自我革命就不能走深走透,就实现不了自我革命的目标。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才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躯,跳出历史周期率。

(二) 把握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两个答案的思想内核

“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破解历史

周期率百年历程中的科学选择,二者之所以成为不可分离的一对范畴,原因在于两个答案的思想内核是完全一致的,作用靶向也是共通的,特别是在形成过程体现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民主新路是保障人民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自我革命的强身塑魂也是为了更好服务人民,同样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价值取向、立场高度一致,就是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一边”。“民主新路”答案侧重保障人民的权利,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的“为民情怀”是否“情深”,是否“情真”。自我革命侧重以自我净化、自我刮骨疗毒的“自律”来保证“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长期执政与人民利益想通,民主新路与自我革命相契。“自我革命”是在长期执政情况下面临各种诱惑可能“懈怠”时给予负重前行,是对可能对民主新路产生摧毁行为打下的“疫苗”。所以自我革命第二个答案找到,是党的忧患意识在治国治党上的体现,是党治国理政理念更加成熟表现。坚定“四个意识”,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三个务必”,保持“三个不变”(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做到“四个自我”,发扬斗争精神,是在自我革命征程上自始至终必须坚守的原则。

(三) 坚决打赢反腐败攻坚战,实施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反腐败。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当前产生腐败的土壤还没有彻底铲除,政治生态的净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滋生的唯利是图、自私自利,利益交换等错误思潮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干部,尤其一些意志薄弱者,更难抵御腐败的入侵。为此,一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二要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三要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四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五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总之,民主新路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立足国情党情,吸取国内外政党兴衰经验,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在新的赶考路上,坚持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自我革

命相结合,用好监督制度和问责利器,坚持真理,完善制度体系,修正错误,敢于善于纠偏,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力量,必将能使党的执政安全迈上一个新台阶,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赢得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刘明钢.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陈独秀的评价[J]. 党史纵览,2015(7).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71.
[3]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635.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27.
[5] 习近平.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J]. 求是,2019 (15).
[6] 科罗廖夫. 苏联解体的损失有多大[EB/OL] 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811A0566V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单行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33.
[8]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2.

(责任编辑 许峻)

A New Way of Democracy and Self –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ing Security

—In – depth Study of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Governing Security

AN Kang¹, LIU Yang², FAN Ruping¹

(1. Party School of Puy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Puyang, Henan 4570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m,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cyclical law is a unique political te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a century’ struggl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historical cyclical law, the CPC has found two answers: “a new way to democracy” and “self – revolution”. The essence of getting rid of the historical cyclical law is to achieve long – term governance security. It was Huang Yanpei, a democratic figure, who put forward the question of the historical cyclical law. The new path of democracy and self revolution ar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of the same problem.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ew path of democracy and self – revolution, grasping the ideological core of the new path of democracy and self – revolution, and firmly combating corruption is the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getting rid of the historical cyclical law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governing security; a new way to democracy; self – revolution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路径探究

何佳乐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改革不断创新紧密结合新时代国情,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纳入思政课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加快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培育生态新人的必然选择,思政课程改革迫切需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因此,要正确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内容,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等方面探析其融入思政课的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人与自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098-0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坚持“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推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基础,紧密新时代中国生态国情,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2]等基本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大学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后备军,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是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引导大学生成为新时代生态保护先锋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一)培育生态新人的必然选择

当前生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废气、废水和废渣严重影响区域环境发展,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产业链,对比其他国家我国经济生产总量较高,但这背后是以极高环境污染为

代价,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硫是美国的60倍。这些问题存在既有制度、政策和经济原因,也是思想意识落后导致,其中就有缺乏生态文明思想。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中,消费主义、金钱逐利和人类凌驾于自然等思想意识影响下,大学生在生态道德、生态法治以及生态行为方面缺乏了解。高校思政课旨在全面发展的人才,生态文明素质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时代发展趋势和人的全面发展都要求培育生态新人,大学生是民族复兴接班人和建设者,他们关于生态文明思想和素质高低关系到“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因此,必须加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重点学习和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培育生态新人。

(二)思政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

高校思政课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课程^[3],其中,涉及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有“原理”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容,“思修”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建设美好中国的内容,“概论”中些许生态相关思想。从总体上而言,生态文明思想在高校思政课程中内容较少,浅显,使得生态文明理念在大学生众多专业课程教育中属于空缺的状态。加快习近平生态文明

收稿日期:2023-07-20

作者简介:何佳乐(1999—),女,安徽芜湖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相结合,使之成为高校思政课创新点,传播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塑造正确价值导向,实现铸魂育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高校思政课的深度耦合在于政治引导、学理阐释和价值塑造三个方面。在政治引导中,高校思政课切合国家发展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民族复兴为目标,二者之间存在共同价值趋向,思政课堂自觉引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政治引导,努力塑造生态新人;在学理阐释中,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和观点解决现实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高校思政课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透,有助于真正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价值塑造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高校思政课都是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价值塑造是主要目的,前者传播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提升生态文明素质,后者铸魂育人,引导大学生树立真善美的价值理念,大学生全面发展必然离不开生态文明素质培育。

(三)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大肆使用自然资源,过度浪费,造成不可挽回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直接排放大量有害气体,开垦森林,乱砍滥伐,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遍布,这些情景触目惊心。只顾眼前利益,破坏环境生态平衡的现象,已达到必须要治理程度。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难以维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加之人民迫切需要更加美好生活,包括环境标准,这些都迫切需要国家加大对环境和生态采取保护性措施。而最为首先的是改变人们的生态观念,重点是在教育,从大学生开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生态文明重视达到新的高峰,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要也越来越强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这一科学理论紧密结合本国生态建设实践形成,将生态文明思想提升到新的阶段,提出许多新内容,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只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通过融入教育教学,转变价值观念,形成健康、绿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学生作为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肩负着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家园的重任。思政课的职责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中就包括生态道德观念。在思政教育理论课融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塑造科学的生态理念,引导热爱自然的生态观,这也是美丽中国目标所趋。只有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保护环境意识,人人充分认识到生态平衡重要性,健康美丽中国才能可持续发展,否

则无从谈起。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容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而产生的科学的价值观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提出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4],自然界是人类产生的基础。早期人类来自大自然,生存与生产活动依赖自然界,在自然中不断发展,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不能忘本,对大自然始终持有敬畏之心。当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时,人类首先做到的是尊重自然的本性,充分认识自然在人类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价值,尊重自然发展的规律,积极承担起维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建立起良好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人改变环境,环境也影响着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不仅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达到共生共荣,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5]生态环境优美,人类朝着美好未来发展;反之,一损俱损。“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6]明确指明了共生共荣,这也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目标指向,强调人类要以“共生”为追求,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要坚持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理念,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要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必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科学解读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绿色发展理念是在2005年首次提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从“承认自然价值(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本(生态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7]来深入探讨。第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人类在生产生活中要着重保护生态环境这一潜在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价值不仅是表面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即矿产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等,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内在的生态价值,生态环境影响着生产力的结构、布局,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率。

因此,建设美丽的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生产力。第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这对我们正确处理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开拓了新思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对立又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生态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将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潜在发展动力。这一科学理念突破了过去“唯生产力”错误思想,也标志了党对自然规律与经济认识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掌握,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治理观

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需要从全局、系统的角度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应该坚持正确的生态治理观念。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8]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这一思想发展成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首先,尊重自然是人类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学会因地制宜,根据地势和周围田草湖分布,恰当地、切合实际地开发,与自然、生物共同生存,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尊重动植物应有的生存权利,达到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其次,顺应自然是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比如:洼地开发鱼塘,山坡开垦梯田,山上的树林用于涵养水源等,这更是一种方法论指导,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自然变化来调整实际行动,顺应时节更迭组织人类生产活动;最后,保护自然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保护环境,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相结合,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手段来实现人与生物平衡发展,保护生态系统,比如生物栖息地、三江保护区的建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思想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我们在尊重自然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时因地开发自然,构建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保护和发展同等重要,在现今经济发展中,提倡保护性开发,保护生态平衡,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和水净的美丽家园。

(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为民理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最根源是如何满足人民对环境的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要求,形成了为民的生态文明思想。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经济水平高是生产力的体现,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则是用更高品质的生活惠

及群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人作为实践主体具有主体性和客体性特征,这表现为能动性和受动性。因此,要“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真正做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人民,坚持以人为本,时刻关注人民需求,为人民提供更优美、更宜居、更高质量的居住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得好不好,绿水青山能否守得住,关键在能否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环境发展好,人民生活质量更高。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适合自己的生态保护之路,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发达国家老路,更不能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不能只靠政府实施政策、采取措施,更重要的是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入心践行,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的责任。这正与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出发点相呼应,生态文明需要依靠宣传教育、理论引导。最后,生态文明成果由人民共享,将生态资源转化成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点,习近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9]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探析

(一)加强学术研究,提升教师的素质与能力

在高校思政课中,教师是教育者,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离不开教师这一重要支撑。这对思政课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生态文明思想掌握要透彻,深刻认识,这关系到二者之间的融合程度。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中,需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师资建设,形成一支业务精湛、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第一,加强学理研究,提升融入思政课程的理论性。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课堂,教师要深刻领会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内涵,研读经典文献,提升自身素养。第二,增强讲授针对性,提高融入的意识。思政课教师首先要树立融入意识,在传授过程中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精准理解和掌握生态文明思想,培养生态新人。同时,思政理论课改革要求结合社会实际案例,可探讨不同社会时期的生态理念的形成、发展和特点,有利于结合实际,提高教学效果。第三,强化知识交叉性,增进与其他学科、不同主体的交流沟通。一方面,通过不同专业之间的学术交流,增加讲授的不同知识的融合,扎实理论基础,在课程中结合不同学科背景来解读生态文明知识;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不同主体的优势,开设社会实践课程,促进学生

与政府、社区、企业的交流,在实践中思考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寓教于行。

(二)营造生态氛围,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受教育者,学生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文明意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需从两方面展开。其一,内省,增强青年使命担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1],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思政课中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促使青年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让学生清楚认识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责任与义务。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着社会主要矛盾,对建成美丽中国的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每个人的行动,要求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思政课程,不仅在于理论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激发内心,拔高思想,增强责任意识。其二,外修,形成自我教育。理论能够指引方向、凝聚力量,是在于是否掌握理论的“彻底性”。正确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思政理论课学习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科学内容和时代价值。通过思政课讲好,讲清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大学生的生态素养建设中一座灯塔。同样,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其解决方法也不是一方面的作用就可以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不是仅停留在思政课,更为相通的是通过大学生专业知识来解读。比如:生态系统可以结合生物与技术专业展开分析,生物圈和人类社会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由此来引入生态共同体文明思想^[10]。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成自我教育,以实践方式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上发起与生态文明相关的辩论赛、校园宣传日、地球一小时等活动,让学生亲身参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终促成自身发展。

(三)充实课程内容,促进全过程融入

思政课是大学生树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阵地,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知识,更是实现全过程的育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拥有深刻的内涵,蕴含丰富的哲学底蕴,这就更加需要将其融入到思政课的课程内容之中,结合教学目标,整合课程设计。首先,在“思修”课程道德教育专题中引入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升大学生生态素养,自觉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义务。在法律基础中延伸关于生态保护法律,强化有关生态法律的法治教育,了解中国生态环境的禁区和底线,践行生态环境的保护行为,树立大学生法律意识。其次,

在“纲要”中引入历史发展中生态环境变化及观念转变,因为在这门课程中涉及的生态知识几乎没有,而“纲要”特有的历史发展逻辑更吸引大学生,教师可在新中国史教学中,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历程,从宏观角度全面地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然后,在“原理”引入习近平生态语录,侧重运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中的辩证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视角分析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中蕴含的人民立场等,让学生认识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具有丰富的哲学蕴意。最后,在“概论”课程中可以直接引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习,因此课程教学更多的是关于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对现阶段实践的总结,是与时俱进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课程的学习。

(四)创新课堂教学,实现立体融入

首先,线上与线下联动。在思政课融入中,教学方法要因材施教,每种课程融入的切入点并不相同,恰当运用案例教学法、视频教学法、文献阅读法和专题教学法,创建思政线上课程,运用榜样示范,社会热点生态文明话题来吸引同学们参与。其次,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这也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律。在课内,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方式展示生态文明思想成果,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调整教学方法,设置专题讨论、演讲等活动,引导参与教学;在课外,利用校园内部资源,塑造良好的校园生态环境,保护学校的花草树木、设置警示标语,还可以通过实践和研究活动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积极开展“最美家园”、绿色志愿服务以及将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结合开展“三下乡”暑假实践等活动,既可以让学生锻炼实践和科研能力,又将生态文明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日常行为。最后,从点滴小事做起。生态文明思想的树立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行动高于一切,教育者要树立正确的榜样示范,从自身做起,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001).
- [2] 张云飞, 周鑫. 中国生态文明新时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下转第 107 页)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研究

——以Z学院为例

张长江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立足创新驱动背景,在梳理分析以往文献基础上,以Z学院为例,深入剖析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机制障碍,探索如何构建协同机制加强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并提出从体制机制、资金环境、人力物力等三个维度八个层面建立起协同机制的运行保障。

关键词: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7

中图分类号:G647.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102-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的新常态和新时代的新背景,都要求我国要大力提高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打造创新型国家,发展创业型经济,实现这些转变需要大量创新创业型人才。毫无疑问,大学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作为主阵地的高校,人才、资金、环境等资源有限,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兄弟院校等组织的大力协同以及学生本人的积极参与,各方之间形成合力,从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等维度构建政府、行业、企业、高校和大学生“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协同推进机制。

一、相关概念及内涵

(一)创新创业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实用教育,以培养具有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人才为目标,不仅仅是以培育在校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创新

创业能力为主的教育,更是要面向全社会,针对那些打算创业、已经创业、成功创业的创业群体,分阶段分层次进行创新思维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教育。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大学生群体的创新创业教育。

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始于20世纪末。1998年,清华大学举办首届创业计划大赛,成为第一所将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引入亚洲的高校。2002年,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正式启动,教育部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9所院校确定为开展创业教育的试点院校。20余年来,创新创业教育逐步引起了各高校的重视,一些高校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二)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亦称“协同学”或“协和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其创立者是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 Haken)。1971年他提出协同的概念,1976年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发表了《协同学导论》,还著有《高等协同学》等。

协同理论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各要

收稿日期:2023-09-3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科技厅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项目“创新驱动背景下河南省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研究”(232400410443)

作者简介:张长江(1982—),男,河南商水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教育管理。

素主体通过相互协调、互相作用,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推动系统不断地正向演变,实现系统设定的共同目标。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氛围,建设完善的创新创业培育体系,就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培育系统。这个系统包括高校、政府、企业、家庭、学生等多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构成一个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培育体系。

(三) 协同机制

所谓机制,是指协调事物各部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和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具体运行方式。具体来说,协同机制是指以切实可行的运行方式,协调各主体或要素向着同一既定目标,最终实现整体优化和效应发挥。研究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重在剖析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机理,搭建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拓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平台和资源,激发外部和内部动力等,进而构建协同机制的运行保障。

二、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机理

(一) 协同机制建构的必要性

1. 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国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对高等教育影响深远,要求高校在关注社会需求端和企业用人端的同时,必须关注学校供给端和人才培养端,而协同育人机制有助于高校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的办学优势,主动对接企业,了解企业的岗位设置和用人需求,合理调整学科和课程体系,逐步调整人才供给侧结构,最终实现与需求侧的良性互动。

2.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基于协同育人理念下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充分体现了育人主体的多元化,且不是以往校政、校企、校校之间的浅层合作,而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保障、企业的深度参与和主动协同、兄弟高校的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各方形成合力,并深度参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3. 促进学生素质能力提升

协同机制的建立,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改革,办好高水平、有特色、有深度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切实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可以发挥高校资源

禀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调动校内外各方力量,搭建各类孵化培育实践平台,营造创新创业良好氛围,促进学生素质能力提升,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成长。

(二) 协同机制的驱动机理

1. 外部动力因素

在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外部生态环境中,政府与企业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协同育人机制中与高校合作的重要主体,是协同育人机制得以建构的外部动力因素。

作为产业与高校的中间机构,政府以引导、协调、激励、监督等方式影响着高校协同育人机制的运行过程。因此,要构建常态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协同企业、产业、其他创新主体与高校之间人才、信息、资金、平台等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有力保障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外部运行环境。

作为将科研成果实现转化的有效载体,企业希望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吸引更多优秀高素质人才,利用高校的实验设备、人才资源、平台技术等优势,降低独立研发的风险,提升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效率,与高校实现合作共赢,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发展动力。

2. 内部驱动力因素

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学校通过开设各门专业和通识课程、课堂讲授和专家报告等,还需要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和舆论氛围上的积极引导,企业创新平台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兄弟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式的互相学习等,整合优势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分摊创新创业风险。协同机制的引入,使得培养主体多方性、培养过程协同性、培养模式多元性、培养路径多样性,因此,培养过程也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作为协同机制的各方主体,要根据自身职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分摊协同育人和创新创业过程中的风险,以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效益最大化。

三是降低高校育人成本。诸多创新主体的深度参与,让高校集中精力开展创新创业理论环节的教学与服务工作,大大降低了高校的育人成本,也加强了高校与各方创新主体的沟通与交流,使所培养的人才更易于与社会需求充分衔接。

三、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的构建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行业、高校、企业、学生等多方统筹、协同配合。将协同育人理念引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全过

程,加强各创新主体的深度协同,加强校校、校企、校地以及国际之间的协同育人,构建“五位一体三保障四贯通”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完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才能为党和国家输送高质量的创新创业人才。

(一)校校协同育人机制

即建构起高校与高校之间协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机制。我国高校之间的校园文化、特色学科、开设专业等各不相同,人才培养特色、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也参差不齐,应该改变以往趋同模仿的方式,充分发挥优势互补作用,加强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协同方式上,兄弟高校之间,尤其是地处同一区域或相邻区域的高校,可通过学分互认、课程互选、教师互派、学生互换、比赛互动、资源互享等方式,大力拓宽合作领域。一方面,整合共享兄弟高校在教育教学、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资源,提升本校的教学水平;另一方面,随着校校之间的深度合作,促使高校进一步提炼发展特色、明确发展方向,推进本校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协同互动,探索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新路径。

(二)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校企协同培养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措施。该机制即建立和完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协同,将双方的优势资源集中高效利用起来。高校可与企业共享科研攻关、知识创新、仪器设备等资源,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企业可以在资金、环境、技术转移和科研成果应用方面发挥自身优势,促进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此外,还可以搭建起学生创新创业和实习实践的平台,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校企协同需要转变育人观念、融合校企文化、完善协同渠道、设定评价标准,逐步建立起校企双方有效协同的长效机制。通过校企及时对接相关需求、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实现技术成果转化等方式,并在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推动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

(三)校地协同育人机制

即建构起高校与所在区域之间协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机制。首先,高校要加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使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区域战略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同步同频。地方政府要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政策引导、人才引进、资金保障等方面提供支持。其次,要加强高校与行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使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其协调各方的桥梁纽带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工作合力,高质量推动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

建议政府、行业、高校三方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达到加强沟通、促进合作、协调事务、解决问题的目的和作用,协调各方资源要素,共同助力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国际协同育人机制

即建构起我国高校与国际社会之间协同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机制。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协同机制、融资渠道、教育体系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and 借鉴,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拓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和渠道,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具体做法上,我国高校可通过与国外高校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教师互派、留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等多种形式,提升我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另外,还可通过参与国际性创新创业大赛等,全面提高学生的国际化水平。

四、Z 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及机制障碍分析

(一)Z 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现状

Z 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19 年 5 月,正式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下设双创实践基地服务部、双创竞赛部、双创教育部、大创计划项目部、创新创业协会指导管理部,是学校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组织管理服务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拥有 30 余名专兼职创新创业导师,已建成“众创空间”“大学城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媒体特色众创空间”“大学生创新创业协会”等双创实训基地和平台 4 个,这些双创实践平台已经成为 Z 学院各专业大学生开展双创教育与实践系列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前沿阵地。

Z 学院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深化改革,开设“互联网创新与创业”“创业基础”等课程,制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办法,探索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特色模式,开展“Z 学院创新创业政策宣传暨师生创业项目展示周”“创客沙龙”“创客集体生日趴”“创客项目路演”“大学生新创企业产品展销会”等系列活动,鼓励大学生携手开展创业行

动。先后荣获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首批大数据双创基地”,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创业教育示范高校”“众创空间”等荣誉称号。

Z 学院于 2016 年成立众创空间,目前入住创业团队 20 余家,每年开展新增待孵化项目 10 个,并在每个班级中设立了创新创业委员,积极支持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定期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每年吸引 100 多个项目参赛,支持立项 50 项,每个立项项目给予 5000—10000 元的扶持资金。近年来,在河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中,4 个团队获得二等奖,4 个团队获得三等奖;立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44 项、省级 53 项、市级 20 项。其中,2022 年,推荐 20 个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9 个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中 10 个项目获得国家级立项,20 个项目获得省级立项,9 个项目获得市级立项。积极组织参加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河南选拔赛,参赛项目 538 项,历年最多。

(二)Z 学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障碍分析

1. 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健全

当前,Z 学院主要通过开设课程、举办赛事、举行报告会、开展项目孵化培育等形式来实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总体来说,还处在探索阶段,协同育人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停留在仅仅依靠高校,缺少其他创新创业主体,诸如行业协会、风投机构、企业等的参与,人才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定向。只有构建并逐步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各创新创业主体的沟通交流与深度合作,将协同效应发挥出来,才能够实现教学、科研、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的互利共享,为高校培养具有开放视野、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提供重要保障。

2. 校内外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机制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需要政、行、企、校多方主动协同,以利于将各方资源进行有序重组和融合创新,才能充分发挥协同育人的强大作用。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和沉淀,Z 学院在教科研、实验设备、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而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掌握着主动权,企业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条件优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在协调优势资源、搭建合作平台等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因此,作为一所主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校,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及各创新创业主体的合作,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促进各方各取所长,合力共为。

3. 教师培训管理体系不健全

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除了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外,还要拥有一定的创新创业实践背景和经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和启发学生。但是,目前 Z 学院创新创业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专任教师数量有限,大多没有创业实践经验,选派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等实践机会较少,更缺乏支持力度和鼓励机制,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和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很难得到实质性提升。

4. 保障和激励机制不够到位

近年来,随着“双创”氛围的不断提升,很多学校相继成立了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创新创业学院等平台,Z 学院也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但学校的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仅仅出台了宏观政策,没有相应配套,不利于创新创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更不能充分调动创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再加上支持引进优秀创新创业教师或成功企业家的力度不够,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导致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

5. 教育管理体制有待优化

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在国家的号召下,Z 学院虽也建立了创新创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中心等常设机构,但教育管理体制有待优化完善,对内在隶属关系、业务范围、组织架构、权责界限等方面尚不规范,对外与行业企业的育人理念各自为政、育人方式各不相谋、育人机制各行其是。

五、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协同机制运行的保障

(一)体制机制保障

1. 思想保障

一方面,政府要高度重视,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从制度、资金等方面制定一系列鼓励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孵化和培育的政策。另一方面,高校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从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充分认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引导,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2. 组织保障

建立有效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服务机构,是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问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设立校企合作机构,改变以往高校关门教学、企业闭门生产的落后局面,充分调动高校的创新创业学院和研究中心、校内外各种孵化器和科技园、风险投资机

构等,形成高校、社会、企业良性互动式发展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3. 制度保障

一是建立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的沟通合作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及时反馈问题,协调解决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中的难题;二是建立兄弟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制度,通过多种渠道的合作,达到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目的;三是健全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人才共培等,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是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创业服务制度保障,如新媒体平台服务制度、创业团队登记注册一站式服务制度、创业辅导服务制度等。

(二) 资金环境保障

1. 资金保障

政府层面。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加大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营造全社会积极支持和参与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鼓励银行、风投机构、企业等主体加大对高校和学生的资助,畅通融资渠道。

高校层面。一方面要加大对创新创业教育资金的投入及合理高效使用;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通过设立基金会等形式,吸引社会组织、合作企业、校友等的积极参与。

2. 环境保障

社会环境方面。要大力鼓励创新、支持创业,为大学生这个有着满腔创业热情但经验相对不足的群体提供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包容的社会氛围。鼓励大学生勇于试错、敢为人先,培养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和勇往直前的创业品质。

舆论环境方面。政府要利用本地主流媒体,大力宣传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弘扬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精神内涵;高校要利用校内外立体化宣传平台特别是官微官博等各类新媒体资源,宣传创新创业成功人士、精英人物和典型企业,极大地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热情。

(三) 人力物力保障

1. 师资保障

一方面,加强创新创业专兼职教师的理论培训,并定期组织教师深入企业一线观摩学习、实践实训,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加大力度引进创新创业高端人才,聘请行业精英、业务能手等到校执教,组建多层次、有梯队、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讲述他们的创业历程,分享他们的实践经历,

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

2. 课程保障

第一,不同年级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有着不同的需求,高校不能同一而论,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需求,分层次设置针对性课程。具体来说,低年级重创新意识培养,中年级重实习实践指导,高年级重创业项目孵化。第二,高校要专创融合,即将创新创业与专业教育教学互相渗透、有机融合,全方位多角度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第三,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将敢闯的素质、会创的本领和家国的情怀融入高质量高品质创新创业教育中,引导学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在实践创新活动中敢闯、会创、有为。

3. 平台保障

协同机制视角下,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要依靠高校的理论教学平台,还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搭建起多层次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一是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为大学生提供从项目孵化到培育落地等一系列的指导和帮助。二是要搭建技能大赛平台,政府相关部门要作为主办方定期组织举办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实践平台。三是加强高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平台,双方均建立校企合作常设机构,形成长效培养机制,不断拓展校企合作领域,实现双方共赢格局。

六、结束语

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不仅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业型经济的内在生成力。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政、企、校等多方共同参与,因此,构建协同育人机制,让各方通力合作,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展望未来,还需要对协同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索,加强各创新主体的主动协同和深度合作,通过建立起长效机制,为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创业人才。

参考文献:

- [1] 张鹏飞,冷玲娜.协同创新视角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研究[J].就业与保障,2022(7):130-132.
- [2] 杨晓莉,徐磊.应用型本科高校“跨界融合”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大理大学学报,2022(11):92-97.
- [3] 薛雷雷.校企合作模式下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思考[J].才智,2022(5):177-179.
- [4] 林美爱,谢书铭.专创融合背景下师生协同创新创业人才

Research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Taking Z College as an Example

ZHANG Changj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Z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obstacl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It explores how to build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rom three dimensions and eight level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Key words: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universities; personnel training;cooperative mechanism

(上接第 101 页)

[3] 吴潜涛,徐柏才,阎占定.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9.

[4]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135.

[5]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17-01-20(002).

[6] 习近平.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J]. 党建,2020(4).

[7] 张云飞,任铃. 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和经验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7.

[8]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J]. 环境经济,2021(9):4.

[9] 李学仁.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J]. 海南人大,2013(5).

[10] 光明日报评论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N]. 光明日报,2018-05-20.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E Jiale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positions to train successors and builders in the new era.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new er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important value implications. Accelerating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ultivating new ecological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reform is an urgent need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y course; man and nature

黄河淤泥生态砌块试验研究

刘成才^{1,2}, 吕克恒¹, 任旭东¹, 范红军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1. 土木工程学院;

2. 土木工程评价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 对以黄河淤泥为主要原材料静压成型制作生态砌块进行试验研究, 分析黄河淤泥等原材料的特性, 研究原材料的最优配合比、生态砌块成型工艺、产品力学性能, 为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工程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 黄河淤泥, 生态砌块, 配合比, 试验研究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8

中图分类号: TU5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3)06-0108-05

1 概述

黄土高原区域水土流失严重, 使得每年多达 16 亿吨泥沙进入黄河, 其中约 4 亿吨淤积在下游河道, 导致黄河中下游严重淤积, 形成河床高出两岸地面的地上悬河。强烈的水土流失不仅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且造成这一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严重威胁着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极大地制约着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尽管黄河淤泥是一种有害的大自然遗弃物, 数量巨大, 分布极广,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果能在保护地区生态环境的同时, 将其资源化利用, 也会变成一种宝贵资源。

文献[1-4]系统研究了利用黄河淤泥制备烧结承重多孔砖方法、黄河淤泥砖墙体力学性能及应用前景。文献[5-6]分析黄河淤泥自身特性, 针对其活性较低的特点, 采取部分活化整体固结的方法, 利用黄河淤泥制备墙体材料。文献[7]利用郑州花园口、焦作孟州黄河泥沙, 掺入粒化高炉矿渣粉等掺合料, 并采用碱激发的方法制备防汛石材。

围绕黄河生态治理, 以黄河淤泥为主要原料, 适当加入一定量的胶结凝材料, 采用静压成型技术, 制作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利用此技术制作生态砌块, 不仅可以大量消耗黄河淤泥, 缓解黄河中下游地区“地上悬河”的生态危机, 而且可以减少传统建筑材料的用量, 改善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2 原材料

2.1 黄河淤泥

1) 黄河淤泥取样。试验研究所用黄河淤泥采自郑州南裹头区段。

2) 黄河淤泥粒度等分析。对取得黄河淤泥样品, 用 0.075—2mm 的标准检验套筛对其颗粒粒径分布进行分析, 结果如下表 1。

表 1 黄河淤泥取样颗粒级配分析表

取样地点	累计筛余量 (%)						细度
	≤0.075	0.075	0.25	0.5	1	2	模数
郑州南裹头	100	67.897	1.570	0.925	0.139	0.036	0.704

根据现行《普通混凝土用砂、石及检测方法标准》JGJ52 中方法, 对黄河淤泥的表观密度及含泥量

收稿日期: 2023-11-12

基金项目: 2023 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 (科技攻关) 项目: 黄河淤泥静压成型生态砌块性能试验研究 (232102321073); 2022 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技术研发推广与转化基金项目: 工程固废资源化利用制备生态砌块性能及应用研究 (zjz202204); 2022 年度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工程固废资源化利用制备生态砌块性能及应用研究 (202211068007)

作者简介: 刘成才 (1973—), 男, 河南柘城, 硕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绿色建筑材料、装配式建筑方面的研究及教学工作。

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如下表 2。表观密度为样品烘干后的测量值。

表 2 黄河淤泥表观密度和含泥量

取样地点	表观密度 (g/cm ³)	含泥量
郑州南裹头	1.15	2.33%

表 3 黄河淤泥化学组成(重量%)

取样地点	SiO ₂	Al ₂ O ₃	CaO	K ₂ O	Fe ₂ O ₃	Na ₂ O	MgO	TiO ₂	P ₂ O ₅	LOI
郑州南裹头	72.73	10.79	3.93	3.33	4.31	1.65	1.88	0.83	0.17	0.38

由表 3 可以看出,郑州南裹头区段黄河淤泥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SiO₂、Al₂O₃、CaO 和 K₂O,含量约占 87%—90%;除含有上述四种氧化物外,还含有少量的 Fe₂O₃、Na₂O、MgO、TiO₂、P₂O₅ 等。

4)黄河淤泥的矿物组成。采用布鲁克(D8 ADVANCE)X 射线衍射光谱仪对郑州南裹头黄河淤泥进行 XRD 测试,判断出它的主要矿物成分是石英、钠长石、钙长石和微斜长石等。

5)黄河淤泥的火山灰活性分析。黄河淤泥的火山灰活性分析采用文献^[7]的分析方法,计算郑州南裹头黄河淤泥的火山灰材料活性率 Ka 为 12.89%。

2.2 水泥

水泥为外购新乡某水泥公司生产的 P. 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化学成分和性能指标见表 4 和表 5。

表 4 水泥的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	SiO ₂	Al ₂ O ₃	Fe ₂ O ₃	CaO	MgO	Loss
P. 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	27.33	6.57	2.38	53.19	3.12	3.34

表 5 水泥性能指标

抗压强度/MPa		抗折强度/MPa	
3d	28d	3d	28d
15.3	45.7	3.5	7.3

2.3 其他材料

试验用水为一般生活用自来水。其他固化剂为市场采购工业用品,配比考虑固化剂纯度。

3 试验研究方案

3.1 试验方案设计

影响免烧生态砌块性能的主要因素包括原料种类、掺加料种类、胶凝材料种类、固化剂种类等以及其配和比,另外还包括水含量、施加压力以及操作工艺等。本文试验方案设计主要原材料使用郑州南裹头段黄河淤泥,胶凝材料使用 P. 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通过改变水泥配比、生石灰配比、混合料水分、加压压力等,制做试验样品,通过加压试验来分析试样抗压强度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

3.2 试件制作

试件制作使用 BJYS-200 型静压砌块成型试

3)黄河淤泥化学成分分析。黄河淤泥含水率约 10%—45%,变化较大。采用日本岛津 EDX-720 型 X 射线黄光光谱仪对黄河淤泥进行化学成分分析(XRF)。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验机。试验机带有标准砖、空心砖、小型空心砌块等模具,为了方便试验研究,试件制作采用标准砖模具,试件尺寸可控制在 240×115×53(单位:mm)左右。试件块数以及试验方法按现行混凝土砌块和砖试验方法 GB/T4111 要求进行。当砖试块养护达到一定强度以后,每块砖试件可以切割成 2 块 120×115×53(单位:mm)的试块,1 块用于做强度检验,1 块用于做冻融、耐磨试验或者微观分析。为真实反映静压成型砌块的力学性能,用作性能检验的试块在制作时成型工艺须与生产线保持一致,主要包括设计配料、计量、混合料拌制、试块静压成型、试块养护等。

3.3 试验过程

试块力学性能试验在 3000kN 的 YAW4306 型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上完成,荷载及其位移等数据由试验机自动采集。试块力学性能试验,以静压成型试块能承受的极限强度作为衡量标准,系统地研究固化剂、水泥与黄河淤泥等配合比、静压大小以及含水率等因素对抗压强度的影响。

4 试验结果分析

4.1 混合料最佳压强的确定

试验方案设计试样成型压力范围取为 5—30MPa,考虑到 BJYS-200 型静压砌块成型试验机压力不够,试验在 3000kN 的 YAW4306 型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压力试验机上完成,自制圆形试样模具。试样直径 D=110mm,成型高度 H=50mm 左右,横截面积为 A=9498.5mm²。按相同配合比(90%黄河淤泥,10%P. 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制作试样 6 组,每组 10 块,同条件(试样用塑料膜包好,放在 20℃恒温箱)养护 28 天后,在压力试验机上进行抗压试验,结果如表 6 所示。依据试样制作加压强度和试样抗压试验强度二者关系图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可以看出,试样抗压试验强度随试样制作加压强度的升高而先升后降,在试样制作加压强度为 20MPa 左右,试样抗压试验强度最大。可以得到静压成型制作生态砌块时,混合料的最佳加压强度在 20MPa 左右,压强过低,混合料不密实,但压强过高,

容易使砌块内部成型的黏聚力遭到破坏。

表 6 混合料最佳压强试验表

试样编号	施加压力 (KN)	试样横截 面积(mm ²)	施加压强 (MPa)	试样抗压 强度(MPa)
HHYN-1-1	50	9498.5	5.26	8.117
HHYN-1-2	100		10.53	10.197
HHYN-1-3	150		15.79	11.629
HHYN-1-4	200		21.05	12.056
HHYN-1-5	250		26.32	10.318
HHYN-1-6	300		31.58	9.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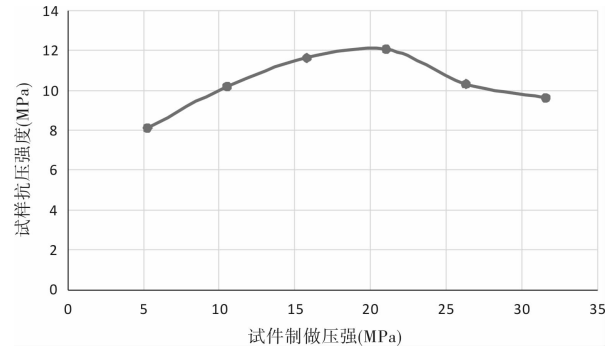


图 1 试样制作加压强度和试样抗压试验强度关系图

4.2 混合料最佳含水率的确定

制作生态砌块混合料的水分至少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使混合料保持一定塑性变形能力，保证生态砌块在压力的作用下成型并保持一定的形状；第二是保证砌块里原料、胶凝材料、固化剂等之间发生物理化学反应所需水分。水分过低，混合料塑性不够、拌和均匀会影响砌块强度，水分过高，静压成型时多余水分会被挤出，砌块里多余水分干燥后形成微气孔，反而会使砌块强度降低。试验方案确定时，先根据前面试验经验，选择一个较优成型含水率，在此基础上适当调整含水率制作试块进行抗压试验，研究含水率不同对试样抗压强度的影响。混合料初始较优含水率可以按手握成型，落地开花的经验确定，然后测出混合料的含水率在 17% 左右。试样制作加压强度为 20MPa，按相同原材料配合比（90% 黄河淤泥，10% P. O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含水率分别控制为 13%、15%、17%、19%、21% 制作试样 5 组，每组 10 块，同条件养护 28 天后进行抗压试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的试验结果绘制含水率和试样抗压强度二者关系图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以看出，试样抗压试验强度随混合料含水率的升高而先升后降，含水率为 15% 左右，试样抗压试验强度最大。但试样制作过程中发现，含水率 15% 时，虽然试样强度最高，但试样成型效果略差，混合料含水率大于 19%，静压成型时试样出水比较明显，而且最终强度有所降低，含水率 17% 时，虽然试样强度稍微降低，但试

样成型效果较好，所以后期试验过程中混合料最佳含水率确定为 17%。

表 7 试样含水率和抗压强度关系表

试样编号	含水率(%)	施加压强(MPa)	试样抗压强度(MPa)
HHYN-2	13	20	9.563
HHYN-3	15	20	12.086
HHYN-4	17	20	11.629
HHYN-5	19	20	10.126
HHYN-6	21	20	9.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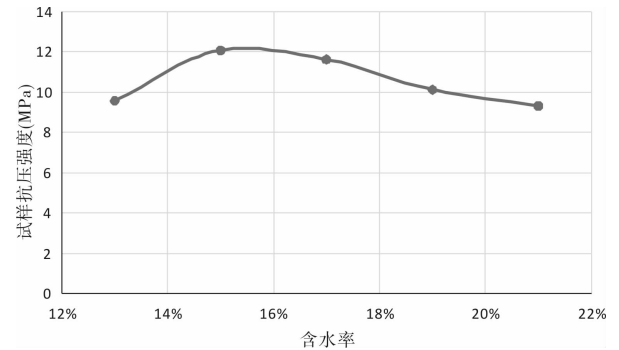


图 2 试样含水率和抗压强度关系图

4.3 水泥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的影响

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性能研究中，胶凝材料仍然优选水泥作为最主要的固化胶凝材料。为了寻找工程应用中的最佳配比以及强度变化规律，材料的配比选取试验范围较宽。试验水泥掺量取为 6%、8%、10%、12%、15%、20%、25%、30% 共 8 种。试块养护采用塑料膜包好，放在 20℃ 恒温箱内养护 28 天后进行抗压强度试验。水泥掺量 10% 测得试件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11.629Mpa，以此为基准，绘制出不同水泥配比条件下试件抗压强度比如图 3。由图 3 可知，随着水泥掺量的增加黄河淤泥试件抗压强度呈增加趋势。水泥用量 12%—25% 范围内，曲线斜率较大，说明强度增长率较大。当水泥掺量为 30% 时，试件平均强度最大值，是水泥掺量为 10% 时强度的 2.84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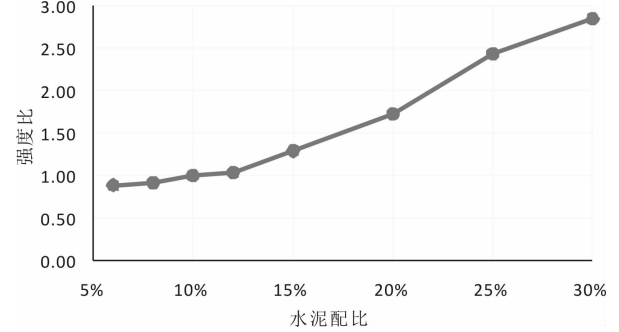


图 3 水泥掺量黄河淤泥试块抗压强度

4.4 Ca(OH)₂ 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的影响

制作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时掺加一定比例的

$\text{Ca}(\text{OH})_2$ 可以提高砌块的强度。另外,对于江河湖底的淤泥来说,富含一定的有机质,加入一定比例的 $\text{Ca}(\text{OH})_2$ 对于消除有机物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在黄河淤泥生态砌块中加入 $\text{Ca}(\text{OH})_2$,尤其以生石灰的形式掺加时,会因为生石灰遇水膨胀而影响砌块的性能。所以 $\text{Ca}(\text{OH})_2$ 加入时要考虑比例、熟化度、粒度等影响因素。为了研究 $\text{Ca}(\text{OH})_2$ 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的影响,分析黄河淤泥的固结胶凝性,采用郑州南裹头黄河淤泥,掺加425号水泥10%,最终混合料水分按17%,砌块成型压力为20MPa, $\text{Ca}(\text{OH})_2$ 掺量为0%、2%、5%、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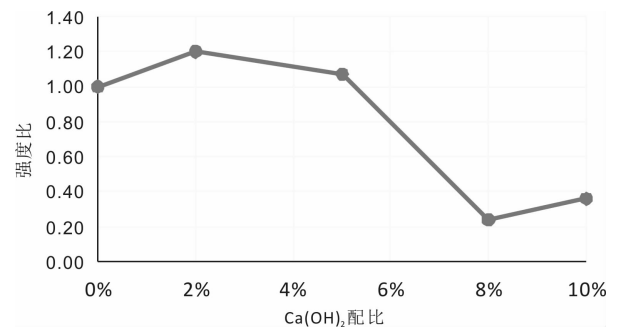


图4 $\text{Ca}(\text{OH})_2$ 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强度的影响

图4是 $\text{Ca}(\text{OH})_2$ 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比的影响图。由图4可见,加入 $\text{Ca}(\text{OH})_2$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抗压强度,当掺加2% $\text{Ca}(\text{OH})_2$ 时,相对于未掺加时强度可以提高20%,效果明显,掺加5%的 $\text{Ca}(\text{OH})_2$ 时,相对于未掺加时强度可以提高7%,效果已经下降,当掺加8%时,强度不升高,反而比未掺加时降低了76%,所以 $\text{Ca}(\text{OH})_2$ 掺加量存在一个最优范围。掺加过量的 $\text{Ca}(\text{OH})_2$ 会导致试块表面 $\text{Ca}(\text{OH})_2$ 吸收空气中 CO_2 反应生成 CaCO_3 ,引起体积膨胀而产生的裂缝导致强度降低。因此,黄河淤泥生态砌块中 $\text{Ca}(\text{OH})_2$ 掺量不能过量,过量的 $\text{Ca}(\text{OH})_2$ 将在一定程度上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强度产生劣化影响。

4.5 脱硫石膏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的影响

脱硫石膏是采用石灰-石灰石回收燃煤或油的烟气中的二氧化硫过程的副产品,价格很低,甚至不需要花钱购买,所以脱硫石膏资源化再利用的意义非常重大,考虑将脱硫石膏作为生态砌块的添加料进行试验研究。图5绘制了脱硫石膏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比的影响。由图5可见,随着脱硫石膏掺量的增加,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压强度持续增加,掺量从5%提高到15%这个范围,曲线斜率较大,说明依靠提高脱硫石膏配比来提高试样强度效果显著,超过15%以后,效果有所降低。从砖

试样抗压试验的过程发现,掺加脱硫石膏,可以提高试样延性,试样变形很大而不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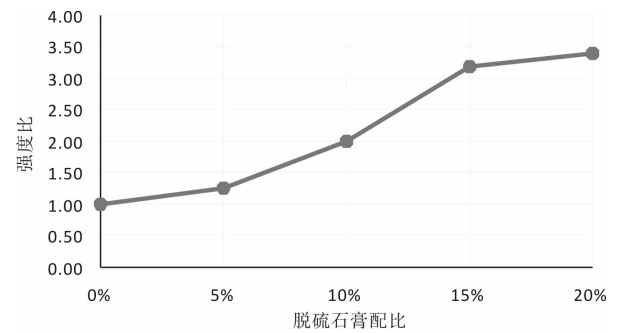


图5 脱硫石膏掺量对黄河淤泥生态砌块强度的影响

4.6 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冻融性能

选取2个型号的试样进行抗冻性试验,每个型号制作试件10块,将其中5个试件按照现行GB/T4111标准进行抗冻性试验,将另5块放置在 $20^\circ\text{C} \pm 5^\circ\text{C}$ 条件下做对比试验。每经5次冻融循环为一组,检查试样破坏情况,共做5组25次冻融循环。经过25次冻融循环后,试样没有出现明显的开裂、剥落、掉角等破坏现象。检验试件的单块抗压强度损失率、试件的平均抗压强度损失率和试件的单块质量损失率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经过25次冻融循环后,2组试件的质量损失率最大为4%,小于5%;试件的平均抗压强度损失率最大一组为3.1%,单块抗压强度损失率最大为11%,小于25%,满足现行《混凝土实心砖》GB/T21144标准的要求。

5 结论

- (1)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抗压强度随着水泥的添加比例的提高而提高,生态砌块在制作时存在最佳含水率、最佳加压强度等工艺要求。
- (2)黄河淤泥生态砌块抗冻融性能较好,经过25次循环冻融试验,试块的质量损失率很小,抗压强度下降率很小。
- (3)加入 $\text{Ca}(\text{OH})_2$ 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提高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抗压强度,当掺加2% $\text{Ca}(\text{OH})_2$ 时,相对于未掺加时强度可以提高20%,效果明显,并且,添加 $\text{Ca}(\text{OH})_2$ 可以消除黄河淤泥中的有机质。
- (4)通过掺加一定量的脱硫石膏,可以提高黄河淤泥生态砌块的强度和延性,也可以节省一定量的水泥等胶凝材料,降低成本,同时,又可以大量消耗脱硫石膏这种工业固废,保护环境,所以,脱硫石膏是黄河淤泥生态砌块一种理想的添加原料。
- (5)通过试验研究证明,利用黄河淤泥,添加一定量的水泥等胶凝材料,可以制作出一定强度的生

态砌块,具有强度高、环保、节省土地资源、降低成本 等特点,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表 8 试件冻融试验分析表

试样编号	m_3	m_4	f_f	f_i	f_R	$K_m, \%$	$K_i, \%$	$K_R, \%$
HHYN-10-1	3.023	3.068	11.629	10.606	11.268	-1.5	8.8	3.1
HHYN-10-2	2.988	3.167		11.236		-6.0	3.4	
HHYN-10-3	3.021	3.126		12.084		-3.5	-3.9	
HHYN-10-4	2.876	2.962		10.348		-3.0	11.0	
HHYN-10-5	2.984	3.133		12.066		-5.0	-3.8	
HHYN-11-1	3.110	3.079	23.179	22.545	22.591	1.0	2.7	2.5
HHYN-11-2	2.925	2.866		21.717		2.0	6.3	
HHYN-11-3	3.071	2.979		21.691		3.0	6.4	
HHYN-11-4	3.006	3.096		23.040		-3.0	0.6	
HHYN-11-5	2.979	2.860		23.964		4.0	-3.4	

注: m_3 、 m_4 —试样冻融前、后的质量,单位 kg;
 f_R $\sqrt{f_f}$ —5 个冻融、未冻融试件的抗压强度平均值,单位 MPa;
 f_i —单块冻融试件的抗压强度,单位 MPa;
 K_m —试件的(单块)质量损失率,%;
 K_i —试件的单块抗压强度损失率,%;
 K_R —试件的平均抗压强度损失率,%。

参考文献:

[1] 吴本英. 黄河淤泥承重烧结多孔砖的试验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4.

[2] 赵自东. 黄河淤泥承重多孔砖砌体的基本力学试验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6.

[3] 童丽萍, 赵自东, 贺萍, 等. 黄河淤泥多孔砖砌体的抗剪强度试验研究[J]. 建筑科学, 2006, 22(3): 45-47.

[4] 贺萍. 黄河淤泥废料资源化利用规划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6.

[5] 陈晓飞. 黄河淤泥制备黏土基墙体材料的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7.

[6] 杨久俊, 刘俊霞, 陈晓飞, 等. 黄河淤泥制备黏土基墙体材料性能研究[J].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2012, 42(Z1): 54-57.

[7] 郑乐. 利用黄河泥沙制作防汛石材固结胶凝技术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6.

[8] 孙书晶. 浅谈工业固体废弃物在建筑材料中的应用[J]. 科技资讯, 2017(9): 76-77.

[9] 陈家琬. 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与再生工艺[J]. 混凝土世界, 2010(9): 44-49.

[10] 罗博. 工业固体废弃物在建材中的应用研究[J]. 资源节约与环保, 2013(6): 130-13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xperimental Study on Yellow River Silt Ecological Block

LIU Chengcai^{1,2}, LYU Keheng¹, REN Xudong¹, FAN Hongjun¹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2. Civil Engineering Evalu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static pressure forming of ecological block made of Yellow River silt, the thesi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aw materials such as Yellow River silt, researched the optimal mix ratio of raw materials, the forming technology of ecological block and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product, provide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Yellow River silt ecological block.

Key words: Yellow River silt, ecological block, mixture ratio, experimental study

含氮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制备与稳定性研究

李玉玲¹, 乔翰东², 郭源彤¹, 李响¹, 方少明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采用单配体模式, 选用4-(1H-咪唑-1-甲基)苯甲酸作为有机配体, 分别与钴或镍的硝酸盐在溶剂热条件下, 制备出了两种具有不同结构的 MOFs 材料 ZZUT-6(Z6)和 ZZUT-7(Z7)。采用单晶衍射分析、X-射线粉末衍射分析(XRD)、热重分析(TGA)、扫描电镜(SEM)等分析方法对配合物的组成和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和表征, 并探究了该化合物的框架稳定性和热稳定性。

关键词:单配体; MOFs 化合物; 制备; 热稳定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19

中图分类号: O6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3)06-0113-06

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MOFs)具有无机物的刚性以及有机物的柔性, 不仅拥有超高的比表面积, 优良的孔隙率, 清晰的孔径分布, 而且在结构上具有有机物的灵活性, 具有优良的可设计性以及可修饰性, 应用广泛^[1-8]。由于 MOFs 在制备过程中往往受到温度、溶剂和 pH 值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其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不稳定, 因此构筑结构和性能稳定的 MOFs 化合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选用4-(1H-咪唑-1-甲基)苯甲酸作为有机配体, 与 Co(II) 和 Ni(II) 的硝酸盐在溶剂热法条件下, 构筑出两种结构全新的 MOFs 化合物 ZZUT-6(Z6)和 ZZUT-7(Z7)。采用单晶衍射分析、X-射线粉末衍射分析(PXRD)、红外光谱分析(IR)、热重分析(TGA)和扫描电镜(SEM)等分析测试手段对 Z6 和 Z7 的结构及性能进行表征和探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4-(1H-咪唑-1-甲基)苯甲酸, N,N-二甲基甲酰胺(DMF), N,N-二甲基乙酰胺(DMA), NiSO₄·7H₂O, CoSO₄·7H₂O, 甲醇, 均为分析纯。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DHG-9070A 程序控温烘箱, 太仓精宏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SOPTOP 显微镜, 宁波舜宇仪器有限公司; D8 Venture 型 X 射线单晶衍射仪, 德国 Bruker-AXS 公司; TG-203 热分析仪, 梅特勒公司; D8 ADVANCE 型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德国 BrukerAXS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配合物 Z6 的制备

将 8.08 mg 的 4-(1H-咪唑-1-甲基)苯甲酸的配体加入到 2 mL N,N-二甲基甲酰胺(DMF)和 2 mL 甲醇的混合溶液中, 然后超声 2 min, 溶解后, 加入 11.20 mg 的 NiSO₄·7H₂O 和 1 mL 蒸馏水, 再超声 2 min, 随后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玻璃瓶密封, 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 设置三段控温程序。第一段程序为烘箱以 10℃/h 的升温速率, 在 600 min 内升温至 90℃, 第二段程序为烘箱在 90℃ 的温度下保温 4320 min, 第三段程序为烘箱在 600 min 内缓慢冷却至温度为 30℃, 得到浅蓝色块状晶体。

1.3.2 配合物 Z7 的制备

将 7.27 mg 的 4-(1H-咪唑-1-甲基)苯甲

收稿日期: 2023-10-25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2B150021); 2022 年度河南省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2110680015); 2021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就业创业教育指导类 2021SJGLX1035)

作者简介: 李玉玲(1979—), 女, 河南信阳人,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 MOFs 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酸的配体加入到 2 mL N,N - 二甲基乙酰胺 (DMA) 和 2 mL 甲醇的混合溶液中,然后超声 2min,溶解后,加入 11.00 mg 的 $\text{CoSO}_4 \cdot 7\text{H}_2\text{O}$ 和 1 mL 蒸馏水,再超声 2min,随后将装有该混合溶液的玻璃瓶密封,放入程序控温烘箱中,设置三段控温程序。第一段程序为烘箱以 $10^\circ\text{C}/\text{h}$ 的升温速率,在 600 min 内升温至 90°C ,第二段程序为烘箱在 90°C 的温度下保温 4320 min,第三段程序为烘箱在 600 min 内缓慢冷却至温度为 30°C ,得到紫色块状晶体。

1.3.3 配合物 Z6 和 Z7 的晶体测试实验

为了研究配合物 Z6 和 Z7 的晶体结构,需要利用 Bruker D8 ADVANCE^[9] 单晶衍射仪在 293 K 温度下进行晶体结构测试实验,并使用经过石墨单色化的 $\text{Mo}-\text{K}\alpha$ 射线($\lambda=0.71073\text{\AA}$)作为衍射源来收集衍射数据。然后需要使用 SHELXS-2014 软件通过直接法解析晶体结构,采用 SHELXL-2014 程序进行修正,包括使用全矩阵最小二乘法调整各向异性温度因子和非氢原子坐标。原始数据需要通过 SAINT 程序还原,并使用 SADABS 程序进行经验吸收校正。最终使用 Fourier 合成法确定所有非氢原子的坐标,在全矩阵最小二乘法的修正下得到最终修正后的晶体结构。对于配合物 Z6 和 Z7 中坐标带有氢原子的配位水,可以从差值傅里叶图上找到它们的位置。使用 Diamond 软件生成配合物 Z6 和 Z7 的金属配位环境图、一维链状结构图、二维平面结构图和三维框架结构堆积图。

1.3.4 配合物 Z6 和 Z7 的框架稳定性测试条件

采用 X 射线粉末衍射仪 (PXRD) 进行配合物 Z6 和 Z7 框架稳定性测试实验^[10]。室温下用 $\text{Cu}-\text{K}$ 射线($\lambda=1.5418\text{\AA}$)作为 X-射线衍射源,用 origin 软件绘制 XRD 谱图,然后与晶体测试数据导出的标准 XRD 谱图进行比对。

1.3.5 配合物 Z6 和 Z7 的热稳定性测试条件

采用热重分析仪(TGA)进行配合物 Z6 和 Z7 热稳定性测试实验^[11],实验条件是 TG-203 同步热分析仪,氮气气氛,升温速率为 $10^\circ\text{C min}^{-1}$,用 origin 软件绘制 TGA 图。

2 结果与讨论

2.1 配合物 Z6 和 Z7 的晶体学数据

配合物 Z6 和 Z7 的晶体分析数据见表 1。配合物 Z6 晶胞键长 $a=8.972(9)$, $b=15.014(16)$, $c=15.324(16)$,键角 $\alpha=90^\circ$, $\beta=90.10(2)$, $\gamma=90^\circ$,属于 P21 空间群。配合物 Z7 晶胞键长 $a=10.880(10)$, $b=8.785(8)$, $c=11.166(10)$,键角 $\alpha=90^\circ$, $\beta=92.195(17)$, $\gamma=90^\circ$,属于 P21 空间群。根据配

合物 Z6 和 Z7 部分键长和键角数据,配合物 Z6 中 Co 周围的 Co-N 键长范围在 $2.007(8) \sim 2.018(9)$,Co-O 键长范围在 $1.964(7) \sim 2.383(7)$,均在正常范围;配合物 Z7 中 Ni 周围的 Ni-N 键长范围在 $2.0623(15) \sim 2.078(8)$,Ni-O 键长范围在 $2.055(5) \sim 2.095(5)$,均在正常范围。

表 1 配合物 Z6 和 Z7 的晶体分析数据

	Z6	Z7
Formula	$\text{C}_{22}\text{H}_{20}\text{CoN}_4\text{O}_5$	$\text{C}_{22}\text{H}_{22}\text{Ni}_4\text{NiO}_6$
Formula weight	479.35	497.14
T (K)	296(2)	296 (2)
Crystal system	monoclinic	Monoclinic
Space group	$P 21$	$P 21/c$
$a(\text{\AA})$	8.972(9)	10.880(10)
$b(\text{\AA})$	15.014(16)	8.785(8)
$c(\text{\AA})$	15.324(16)	11.166(10)
$\alpha(^{\circ})$	90	90
$\beta(^{\circ})$	90.10(2)	92.195(17)
$\gamma(^{\circ})$	90	90
$V(\text{\AA}^3)$	2064(4)	1066.4(17)
Z	4	2
$D_{\text{calc}}(\text{Mg cm}^{-3})$	1.542	1.548
$F(000)$	988	516
θ for data collection ($^{\circ}$)	$1.329 \sim 29.013^{\circ}$	$1.873 \sim 28.628^{\circ}$
Reflections collected	12329	5828
Goodness - of - fit on F^2	0.952	1.067
$R^{1a}, [I > 2\sigma(I)]$	0.066	0.088
$wR_2^b, [I > 2\sigma(I)]$	0.1202	0.2187

^a $R_1 = \Sigma \| F_o | - | F_c \| / \Sigma | F_o |$.

^b $wR_2 = [\Sigma w (| F_o |^2 - | F_c |^2)^2 / \Sigma w (F_o)^2]^{1/2}$, where $w = 1 / [\sigma^2 (F_o^2) + (aP)^2 + bP]$. $P = (F_o^2 + 2 F_c^2) / 3$

2.2 配合物 Z6 和 Z7 的结构分析

配合物 Z6 和 Z7 中配体 4 - (1H - 咪唑 - 1 - 甲基) 苯甲酸的配位模式如图 1 所示。图 2 所示为配合物 Z6 的金属配位环境图。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Z6 的晶体单胞中存在着 1 个 Co(II) 离子,与 Co1 配位的三个氧原子来自配体中的羧基,与 Co1 配位的两个氮原子来自于配体中的咪唑,Co(II) 离子所采用的是五配位的四方锥构型。配合物 Z6 沿 a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如图 3 所示,配合物 Z6 沿 a 轴方向的三维(3D)平面图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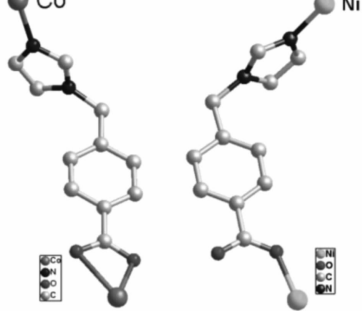


图 1 配体在配合物 Z6 和 Z7 中所呈现的配位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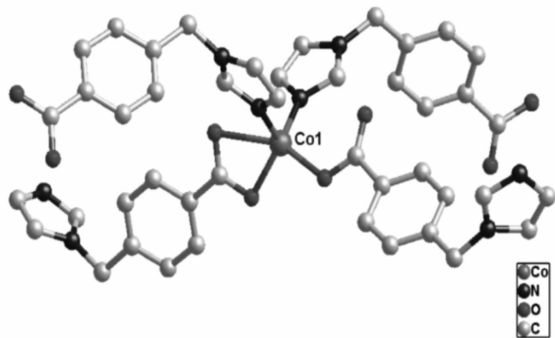


图2 配合物 Z6 的金属配位环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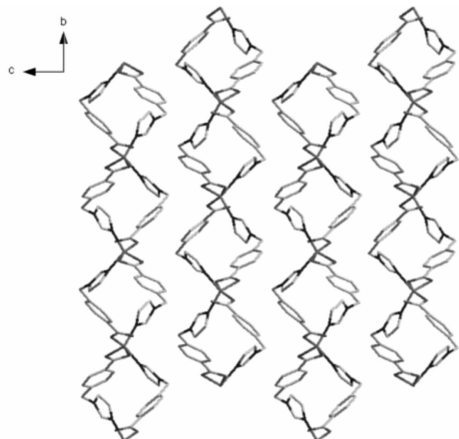


图3 配合物 Z6 沿 a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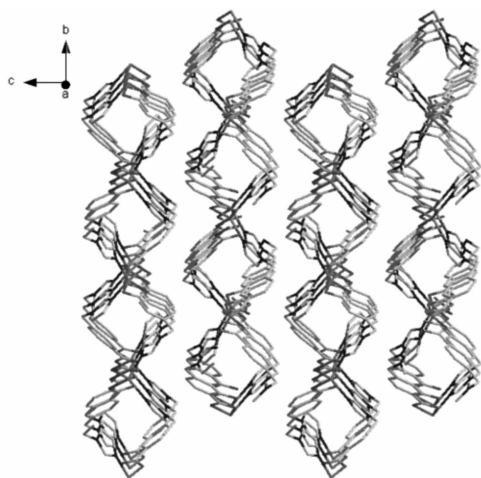


图4 配合物 Z6 沿 a 轴方向的三维(3D)平面图

配合物 Z7 的金属配位环境图如图 5 所示。晶体结构分析结果表明,配合物 Z7 的晶体单胞中存在 1 个 Ni(II)离子,与 Ni1 配位的两个氧原子来自配体中的羧基,另外的两个氧原子来自溶剂中的水,与 Ni1 配位的两个氮原子来自配体中的咪唑。Ni(II)离子采用的是六配位的八面体构型。配合物 Z7 沿 b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如图 6 所示,配合物 Z7 沿 b 轴方向的三维(3D)堆积图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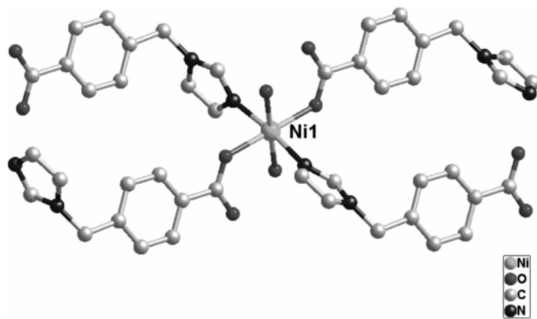


图5 配合物 Z7 金属配位环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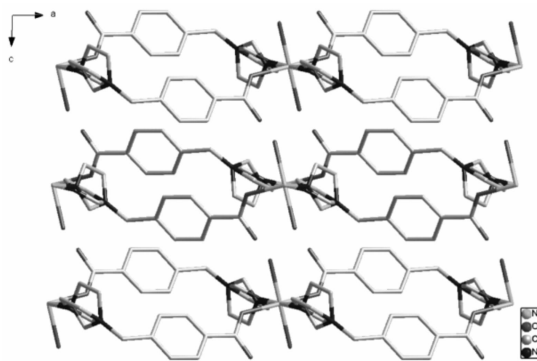


图6 配合物 Z7 沿 b 轴方向的二维(2D)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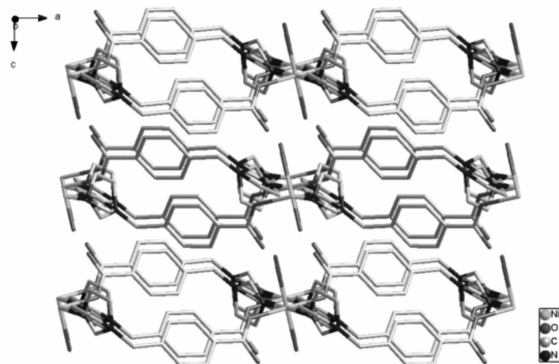


图7 配合物 Z7 沿 b 轴方向的三维(3D)堆积图

2.3 配合物 Z6 和 Z7 的 XRD 结果分析

将配合物 Z6 和 Z7 进行粉末衍射(XRD),检验其晶体纯度。如图 8 和图 9 所示。可以看出,实验测试峰型与单晶结构数据(通过晶体解析得到的 CIF 文件)所模拟的衍射图峰型(2 θ)基本吻合,这说明合成的晶体 Z6 是纯相,结晶性良好,其骨架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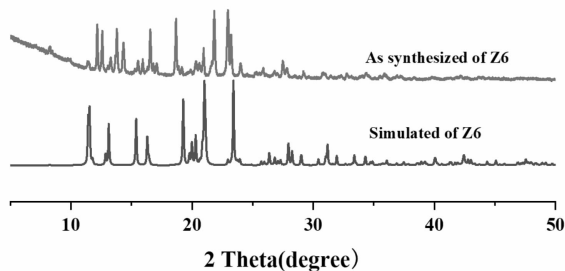


图8 配合物 Z6 的 X - 射线粉末衍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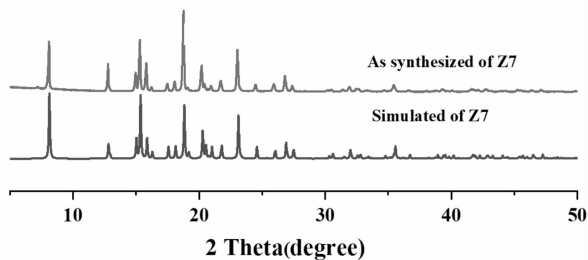


图9 配合物 Z7 的 X-射线粉末衍射图

2.4 配合物 Z6 和 Z7 的 TGA 结果分析

对配合物 Z6 进行热重分析,如图 10 所示,配合物 Z6 的框架结构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大致可以稳定在 440℃ 左右。在 440℃ 之前晶体的重量基本没有减少,而水和有机溶剂的沸点远远小于 440℃,在温度达到 440℃ 时已经挥发,由此可知,该晶体孔道当中结晶水和有机溶剂含量很少,晶体较为纯净。当温度超过 440℃ 时,晶体的重量迅速下降,此时晶体结构开始迅速坍塌,温度达到 441℃ 时,晶体结构完全塌陷,此时剩下的产物应为氧化钴。紧接着随着温度的上升,产物重量缓慢下降,当温度达到 800℃ 时,氧化钴转变为金属钴。

对配合物 Z7 进行热重分析,如图 11 所示,配合物 Z7 的框架结构大致可以稳定到 397℃,配合物的框架结构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当温度超过 397℃ 时可以发现晶体结构开始发生塌陷。由于在标准大气压下,纯水的沸点相较于有机溶剂 DMA 的沸点较低,因此第一个拐点出现的原因是晶体孔道内的结晶水先挥发;当温度达到 173℃ 左右时,孔道中的有机溶剂开始挥发,此时晶体重量下降得比较缓慢,由此可以得出晶体孔道中的有机溶剂含量较少。晶体在 397℃ 开始出现坍塌,到 452℃ 坍塌结束,此时剩余产物应为氧化镍,从 452℃ 到 800℃,产物质量缓慢下降,此时剩余产物有氧化镍逐步转化为金属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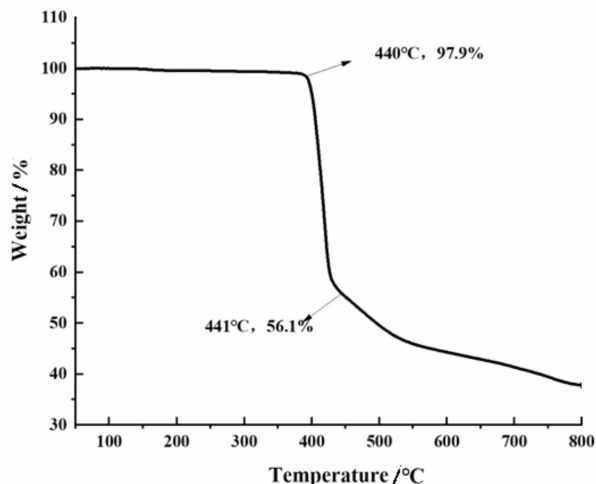


图10 配合物 Z6 的 TGA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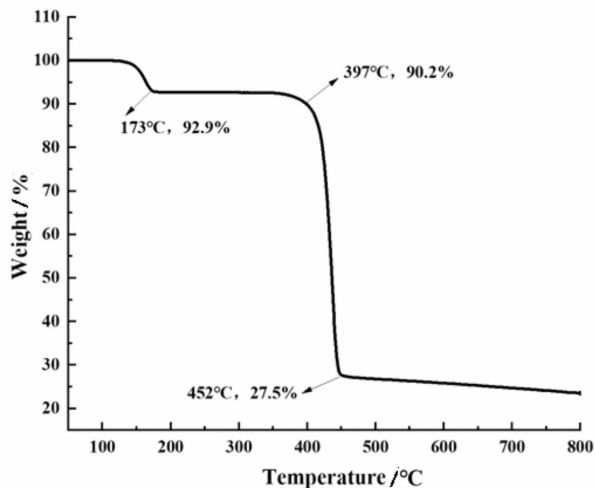


图11 配合物 Z7 的 TGA 图

由 Z6 和 Z7 的热重分析图可以看出,这两种晶体的热稳定性较好,骨架基本可以稳定在 400℃ 左右,合成这两种晶体的有机配体中含有含氮咪唑,由此可以看出,本文制备的两个含氮有机配体的 MOFs 化合物都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2.5 配合物 Z6 和 Z7 的 SEM 结果分析

将合成的配合物 Z6 进行电镜扫描(SEM)观察,图 12 所示为 30 μm 下 162 倍和 300 倍下的配合物 Z6 的 SEM 图,配合物 Z6 为规则块状晶体,直径大约为 30 μm,表面上有簇状小颗粒,由此可以推测该晶体有良好的吸附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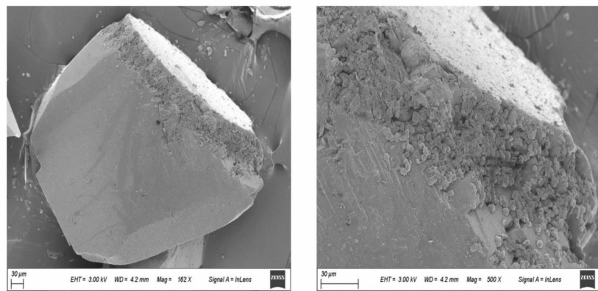


图12 配合物 Z6 的 SEM 图

将经过 800℃ 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Z6 进行电镜扫描,如图 13 所示,可以看出,经过 800℃ 高温灼烧的配合物 Z6 的骨架结构基本完全塌陷,但值得注意的是,配合物 Z6 表面上的簇状小颗粒并没有消失,由此可以推测该配合物可能具有优良的吸附热稳定性。图 13(a)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100 μm 下 1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3(b)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20 μm 下 2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3(c)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20 μm 下 3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d)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20 μm 下 5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3(e) 和图 13(f)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10 μm 下 10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3(h)

和图 13(i)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100 μm 下 100 倍的电镜扫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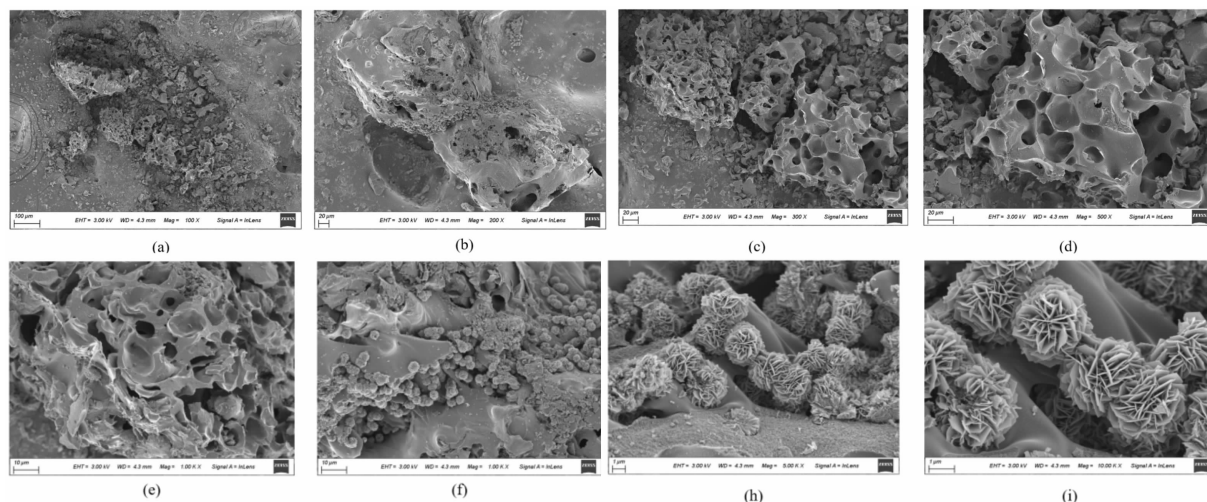


图 13 800 $^{\circ}\text{C}$ 高温灼烧后的 Z6 SEM 图

具有良好的框架结构。

将经过 800 $^{\circ}\text{C}$ 高温灼烧的配合物 Z7 进行电镜扫描,如图 15 所示的可以看出,经过 800 $^{\circ}\text{C}$ 高温灼烧的配合物 Z7 的骨架结构并没有完全塌陷,依然保留原来的构型,由此可以推测出该配合物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图 15(a)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100 μm 下 100 倍的电镜扫描图,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20 μm 下 3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5(c) 和图 15(d)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20 μm 下 5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5(e)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20 μm 下 300 倍的电镜扫描图,图 15(f) 是高温灼烧后的配合物 10 μm 下 1000 倍的电镜扫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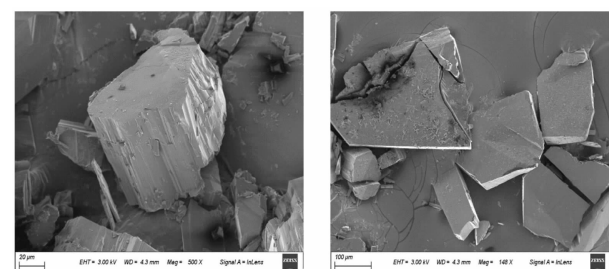


图 14 配合物 Z7 的 SEM 图

将合成的配合物 Z7 进行电镜扫描(SEM)观察,如图 14 为配合物在 20 μm 下 500 倍和 100 μm 下 148 倍的电镜扫描图,可以看出,配合物 Z7 为规则块状晶体,直径为 20 ~ 50 μm 左右,晶体表面光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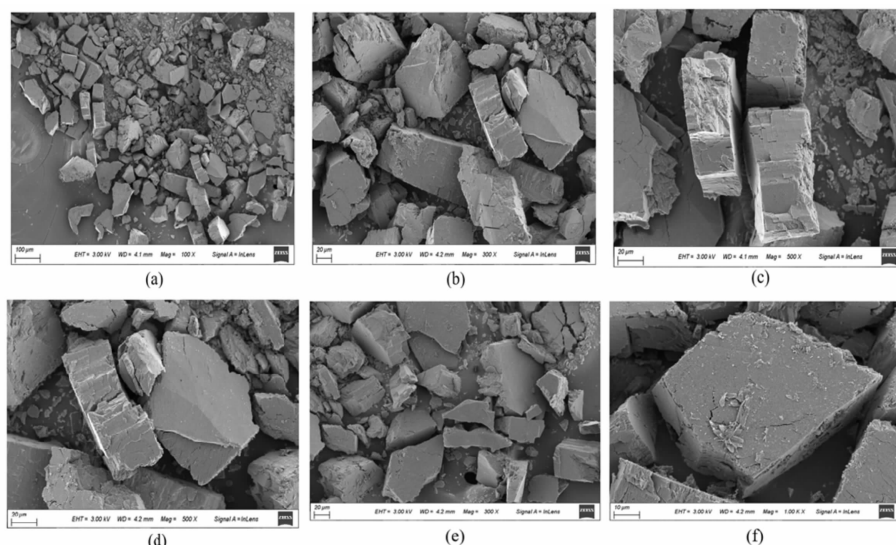


图 15 800 $^{\circ}\text{C}$ 高温灼烧后的 Z7 SEM 图

3 结论

本文主要对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MOFs)进行了研究,以晶体学理论为指导,从合成 MOFs 的有机配体出发,选用含氮有机配体,选择具有可修饰性的

金属离子,用溶剂热法合成了具有新颖结构和功能性的 MOFs。通过单晶衍射分析,XRD,TGA 和 SEM 等手段对其结构、组成及热稳定性和形貌进行了表征和探究。结果表明,配合物 Z6 和 Z7 的 XRD 实验

测试峰型与由单晶结构数据所模拟的衍射图峰型(2 θ)基本吻合,说明本论文所合成的样品是纯相;配合物 Z6 和 Z7 的热重分析(TGA)均表明其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由 Z6 和 Z7 进行热重分析前后的 SEM 对比图可知,晶体具有良好的骨架结构,本文制备的两个含氮有机配体的 MOFs 化合物都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

参考文献:

- [1] LI Y L, ZHENG L P, NIE H, et al. Synthesis, structure, sorption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one dual functional Zn(II)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J]. Journal of Molecular Structure, 2020, 12(4): 427 – 434.
- [2] SHI X, XU H, WU Y, et al. Two – Dimension(2D) Cu – MOFs/aptamer Nanoprobe for In Situ ATP Imaging in Living Cells[J]. Journal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2021, 5(2): 165 – 173.
- [3] ZHU J Y, XIA T F, CUI Y J, et al. A Turn – on MOF – Based Luminescent Sensor for Highly Selective Detection of Glutathione[J]. 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2019, 270(5): 317 – 323.
- [4] LUANG Z, XANG H Y, Hun S J, et al. High – gain signal – on PEDOT: PSS organic photoelectrochemical transistor biosensing modulated by a MXene/MOFs/NiO Schottky heterojunction[J].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2023, 66(2):

578 – 585.

- [5] 李玉玲,李靖靖,王宇飞等. 含 N 和羧酸混合配体构筑的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应用研究进展[J]. 化学研究与应用, 2019, 31(12): 2031 – 2036.
- [6] 李玉玲. 基于 1 – 咪唑基和联苯多羧酸混合配体的金属 – 有机框架化合物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 2017.
- [7] 李玉玲,刘滢洁,苏梦宇,等. 混合配体构筑的 MOFs 化合物的制备与结构表征[J]. 中州大学学报, 2022, 39(6): 115 – 120.
- [8] 廖学巍,刘旸,王琛,等. 纳米尺度 MOFs 在肿瘤及肿瘤标志物生物学成像中的研究进展[J]. 分析测试学报, 2022, 41(4): 476 – 485.
- [9] 盛道鹏,陈兰花. Bruker D8 Venture 型 X – 射线单晶衍射仪使用及维护[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 380(38): 84 – 86.
- [10] 王新,徐捷. 晶体的 X 射线衍射物相分析方法研究[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21, 38(3): 29 – 33.
- [11] LI C Q, XIANG L, LIU W G, et al. MOFs with acs and Nbo topologies using flexible diisophthalate ligands: influence of dihedral angle between phenyl rings on the crystal structure[J]. Inorganic Chemistry Communications, 2021, 12(9): 1 – 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the Preparation and Stability of Metal – organic Framework Compounds Containing Nitrogen

LI Yuling¹, QIAO Handong², GUO Yuantong¹, LI Xiang¹, FANG Shaoming²

(1.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wo MOF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ZZUT – 6 (Z6) and ZZUT – 7 (Z7) were prepared with 4 – (1H – imidazol – 1 – methyl) benzoic acid and nitrate of cobalt or nickel under solvothermal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two MOFs were analyzed and characterized in detail by single crystal diffraction analysis, X – ray powder diffraction analysis (XRD),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TGA), electron microscopy scanning (SEM) and other methods, and the framework stability and thermal stability of the two MOFs were explored.

Key words: MOFs; preparation; stability study

5-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工艺研究

张峻炜,李琼,王佳琦,陈帅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5-单硝酸异山梨酯主要用于预防心绞痛、治疗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持续性心绞痛,适宜的结晶工艺是药物生产的关键。采用动态法测定了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使用Apelblat model, Van't Hoff model对溶解度数据进行了拟合,采用降温结晶法研究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结晶介稳区和诱导期,考察了初始浓度、搅拌速率、降温速率、终点温度和晶种加入量等因素对5-单硝酸异山梨酯降温结晶收率的影响,并进行了工艺条件优化。结果表明,适宜的操作条件为初始浓度1.797 mol/L,搅拌速率400 r/min,降温速率0.9 K/min,终点温度273 K,晶种加入量为溶质质量的0.5%,在该条件下收率为33.2%。该研究为5-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新工艺的开发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5-单硝酸异山梨酯;冷却结晶;介稳区;诱导期;工艺优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20
中图分类号:TQ 0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119-05

5-单硝酸异山梨酯易于吸收,是预防和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心梗的最常用的药物之一,鉴于其药物效果快、作用力强、疗效确切的特点,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结晶法是药物生产的常用方法,目前对于5-单硝酸异山梨酯基结晶纯化研究不足,是制约结晶工艺开发的瓶颈问题。结晶是一种重要的提纯工艺^[1],结晶方式的选取对提高产品收率和纯度有较大影响。降温结晶是通过降低溶液温度的方法使结晶体系达到过饱和,该方法适用于温度与溶解度呈正相关的结晶体系,使用该方法结晶收率不高,但是能耗较小。本文采用动态法测定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2],采用降温结晶法测定结晶介稳区和诱导期^[3]。考察搅拌速率、降温速率等因素对结晶介稳区宽度的影响^[4];并对结晶工艺进行优化^[5];考察降温速率、搅拌速率^[6]及晶种加入量^[7]对结晶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5-单硝酸异山梨酯,用化学命名法可表示为1,4:3,6-二脱水-D-山梨醇-5-单硝酸酯,分

子量为191.13,分子式为C₆H₉NO₆,CAS为16051-77-7,结构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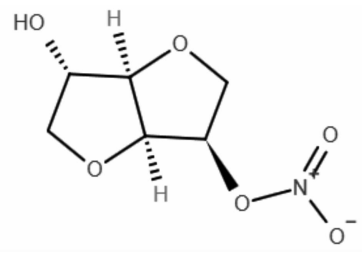


图1 5-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构式

1.1 实验试剂

乙二醇,纯度98%;罗恩试剂;5-单硝酸异山梨酯,纯度98%,上海阿拉丁有限公司。

1.2 实验仪器

DCW-0506 低温恒温槽:上海比朗仪器制造有限公司;500 mL 夹套结晶器:定做;BSA223S 电子分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有限公司;JJ-1 精密定时电动搅拌器:常州荣华仪器制造有限公司;SHZ-D 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河南佰泽仪器有限公司;120 mL 溶解釜:郑州玻璃仪器厂。

1.3 实验方法

1.3.1 溶解度的测定

采用动态法对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进行测定。连接实验装置,称取一定量的乙二醇置于溶解釜内;待釜内温度稳定后,称量一定量的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加入釜内,并搅拌至完全溶解,再次称量并加入釜内,直到体系达到饱和状态;记录加入的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的质量,计算出在此温度下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的溶解度;每个温度下进行 3 次重复实验,溶解度取其平均值。

1.3.2 介稳区的测定

于结晶器中加入一定量的乙二醇和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连接实验装置;开启低温恒温槽,升高温度确保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全部溶解;将搅拌速率调整至实验所需,并调节低温恒温槽的温度使体系降温;当观察到有结晶生成时,停止实验,记录此时溶液的温度;改变搅拌速率、初始浓度和降温速度,重复试验,记录不同结晶条件下得到的超溶解度数据,结合溶解度数据确定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介稳区。

1.3.3 诱导期的测定

于结晶器中加入一定量的乙二醇和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连接实验装置;开启低温恒温槽,升高温度确保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全部溶解;调节低温恒温槽温度至设定值,将搅拌速率调整至实验所需,开始计时;当观察到有结晶生成时,停止计时,此时记录的时间即为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结晶的诱导期;改变搅拌速率和温度,重复试验,记录不同结晶条件下的诱导期。

1.3.4 结晶工艺实验方法

称取一定量的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样品,将其放于夹套结晶器中,量取一定量的乙二醇倒入结晶器。使溶液充分搅拌一定时间并控制搅拌速率。升至适宜温度使其充分溶解后控制低温恒温槽降温速率使其结晶,记录降温至出现结晶的时间。待溶液略微出现结晶时,加入一定量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作为晶种,养晶一段时间,使温度降至设定值后进行抽滤,结晶干燥后对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样品称重,计算收率。收率计算式为:

$$\eta = \frac{(m_1 - m)}{m_2} \tag{1}$$

式中, η 为收率; m_1 为降温结晶后所得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产品质量; m_2 为称取的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质量; m 为称量纸质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溶解度数据

使用 Apelblat model, Van' t Hoff model 对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进行拟合,模型参数列于表 1,溶解度实验值与模型预测值列于表 2。计算式为:

$$x = \frac{\frac{m_2}{M_1}}{\frac{m_2}{M_1} + \frac{m_3}{M_2}} \tag{2}$$

式中, x 为溶质的摩尔分率; m_2 为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的质量; m_3 为溶剂的质量; M_1 为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的相对分子质量; M_2 为乙二醇的相对分子质量。

$$\ln x = A + \frac{B}{T} + C \ln T \tag{3}$$

$$\ln x = A + \frac{B}{T} \tag{4}$$

$$RD = \frac{x - x^{cal}}{x} \tag{5}$$

式中, A, B, C 为模型参数; T 为温度; x 为实验值, x^{cal} 为计算值。

表 1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拟合参数

参数	A ^{apl}	B ^{apl}	C ^{apl}	A ^{van't}	B ^{van't}
拟合值	-745.71	29381.24	113.17	11.47	-4102.97

A^{apl}, B^{apl}, C^{apl} 为 Apelblat model 的模型参数, A^{van't}, B^{van't} 为 Van' t Hoff model 的模型参数。

表 2 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数据

T/K	x	x^{apl}	RD	$x^{van't}$	RD
277.9	0.0427	0.0439	-0.0281	0.0369	0.1339
282.9	0.0515	0.0509	0.0113	0.0480	0.0689
287.9	0.0591	0.0609	-0.0303	0.0617	-0.0433
292.9	0.0794	0.0749	0.0566	0.0787	0.0088
297.9	0.0966	0.0944	0.0226	0.0995	-0.0301
302.9	0.1153	0.1219	-0.0580	0.1249	-0.0839
307.9	0.1635	0.1610	0.0154	0.1557	0.0479

2.2 降温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降温速率与介稳区宽度的关系如图 2 所示,随着降温速率增大,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溶液中的介稳区宽度变宽,因为溶液体系内时刻存在分子热运动,当降温速率比较低时,5 - 单硝酸异山梨酯的分子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碰撞和聚集,便于形成晶核,因此介稳区较窄;而当降温速率加快时,晶核难以形成,需要更低的温度才能形成晶核使晶体析出,因此介稳区变宽。5 - 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溶液体系中介稳区宽度与降温速率成正相关,这符合 Nyvlt 理论^[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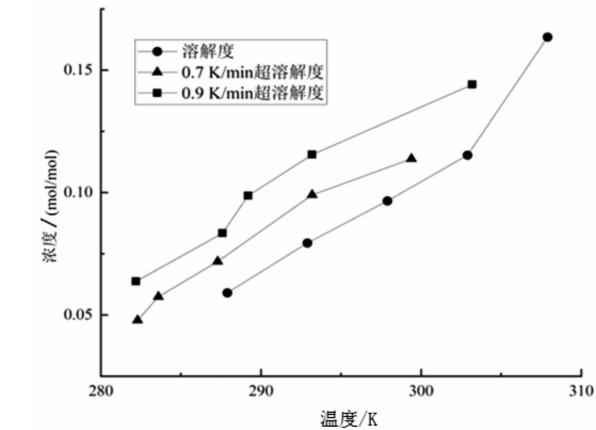


图2 降温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2.3 搅拌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搅拌速率与介稳区宽度的关系如图3所示,搅拌速率增大,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溶液中的介稳区变窄。在较高的搅拌速率下,结晶器内的溶液体系流动的更加剧烈,溶液混合得更加均匀,同时分子间碰撞概率上升,有利于体系内质量和热量传递。因此在冷却结晶过程中,团簇结构更易形成,进而促使晶核更易形成,最终导致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溶液中介稳区变窄,但介稳区变窄的程度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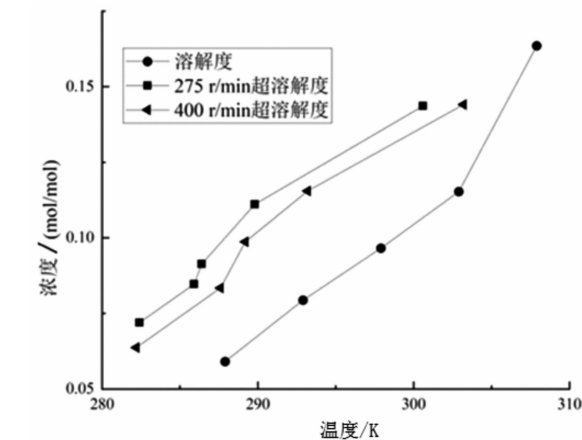


图3 搅拌速率对介稳区宽度的影响

2.4 不同搅拌速率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

不同搅拌速率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如图4所示,搅拌速率降低,5-单硝酸异山梨酯溶液在相同过饱和度时结晶所需时间增加,二者呈负相关。当搅拌速率较低时,结晶器内的溶液流动速率缓慢,分子间碰撞概率较低,不利于体系内质量和热量传递,因而难以形成晶核。

2.5 不同温度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

不同温度下过饱和度与诱导期的关系如图5所示,随着过饱和度的增加,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结晶的诱导期有较为明显地减少趋势,说明

增加过饱和度有利于产生晶核,且相同过饱和度下结晶温度高时,诱导期较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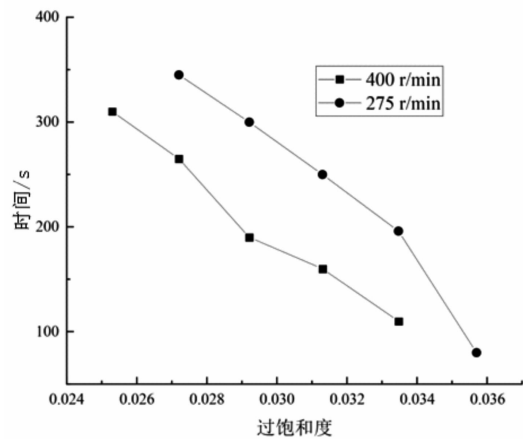


图4 搅拌速率对诱导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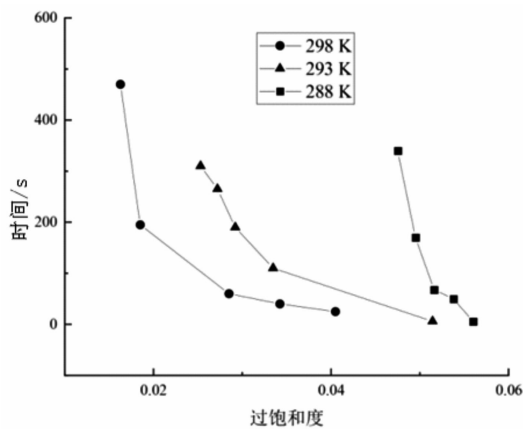


图5 温度对诱导期的影响

2.6 5-单硝酸异山梨酯降温结晶工艺优化

2.6.1 降温速率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搅拌速率400 r/min,初始浓度2.072 mol/L,终点温度278 K,晶种加入量为0的条件下,考察降温速率对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

图6为降温速率与收率关系图,降温速率分别为0.58,0.72,0.90,1.10,1.20 K/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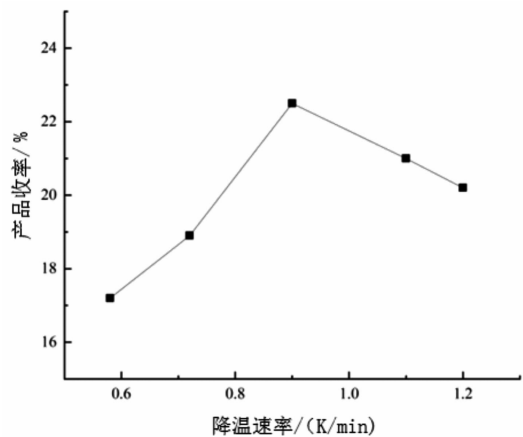


图6 降温速率对收率的影响

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的收率随着降温速率的增大而先增大后减小,是由于当降温速率达到一定数值时能够使体系形成饱和溶液的过程均匀,但当降温速率过快,使得溶液体系的温度不均一,溶液不同区域的晶核在生长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先后顺序,从而导致粒径分布不太均匀。由于降温速率过快,很快地就会进入不稳定区域,因此产率不如晶体均匀时高,结合数据分析选择降温速率为0.9 K/min。

2.6.2 搅拌速率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初始浓度 2.072 mol/L,降温速率 0.90 K/min,终点温度 278 K,晶种加入量为 0 g 的条件下,在搅拌速率分别为 246,289,315,350,400 r/min 的条件下,探究搅拌速率对 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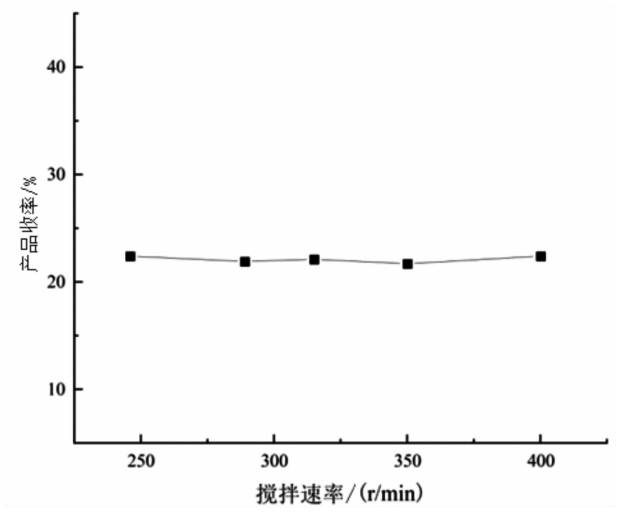


图 7 搅拌速率对收率的影响

可见,搅拌速率在所考察的范围内,采用降温结晶,产品的收率在22%附近浮动,无较大差异,搅拌速率对形成晶体时间有影响即对晶核的生长速度及均匀程度有影响,但搅拌速率过快会破坏晶核的正常均匀生长,因此选择搅拌速率为400 r/min。

2.6.3 初始浓度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搅拌速率 400 r/min,降温速率 0.90 K/min,终点温度 278 K,晶种加入量为 0 的条件下,探究初始浓度对 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

图 8 为初始浓度与收率关系图,5-单硝酸异山梨酯溶液的初始浓度分别为 1.316,1.514,1.797,2.042,2.508 mol/L。

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的收率随着初始溶液浓度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由于溶液体系的浓度加大,溶质的含量增加,溶液饱和的程度越大,随着温度降低析出的晶体就会增多。当溶液浓度过大形成过饱和溶液,溶质无法正常溶解,不仅会使溶液质量

受损而且成本增加。浓度过小无法达到过饱和,无法析出结晶。综合考虑选择浓度为 1.797 mo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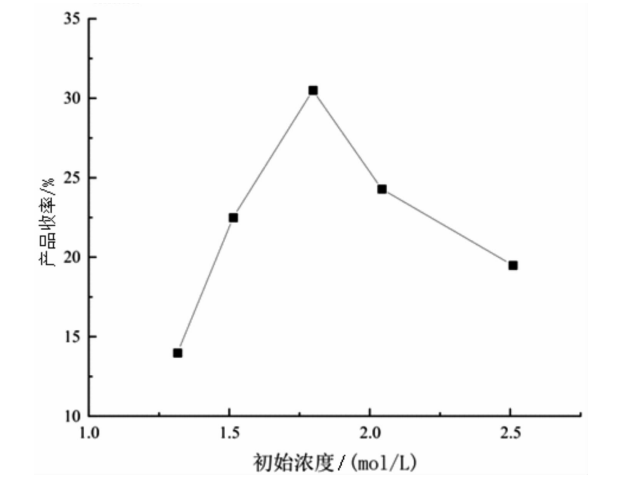


图 8 初始浓度对收率的影响

2.6.4 终点温度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初始浓度 1.797 mol/L,降温速率 0.90 K/min,搅拌速率 400 r/min,晶种加入量为 0 的条件下,考察终点温度对 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终点温度分别为 273,275,278,280,283 K,结果如图 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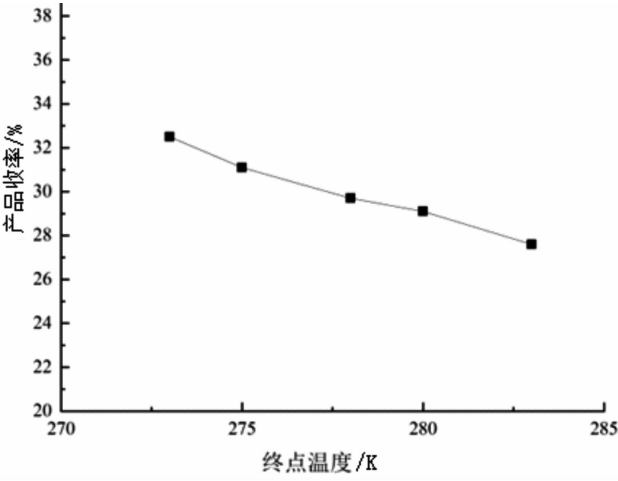


图 9 终点温度对收率的影响

可见,在所考察的温度范围内,终点温度对 5-单硝酸异山梨酯收率影响较小,由于 5-单硝酸异山梨酯在乙二醇中的溶解度数据与温度呈正相关,综合考虑选取终点温度为 273 K。

2.6.5 晶种加入量对结晶收率的影响

在初始浓度 1.797 mol/L,搅拌速率 400 r/min,降温速率 0.90 K/min,终点温度 273 K 的条件下,考察晶种加入量对 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收率的影响,晶种加入量分别为 0,0.5%,1%,1.5%,结果如图 10。

随着晶种加入量的增加,5-单硝酸异山梨酯晶体的收率先增大,但当晶种加入量达到一定值时,急

需增加晶种量,收率变化不大,是由于晶种的加入为晶体的生长提供生长点,一定量的晶种可以加快晶体析出的速率,但过量的晶种会加快溶液饱和从而抑制晶体正常析出,出现晶种过剩的现象,也可能会破坏晶核的完整程度同时也提高了操作成本,结合数据分析,选择晶种加入量为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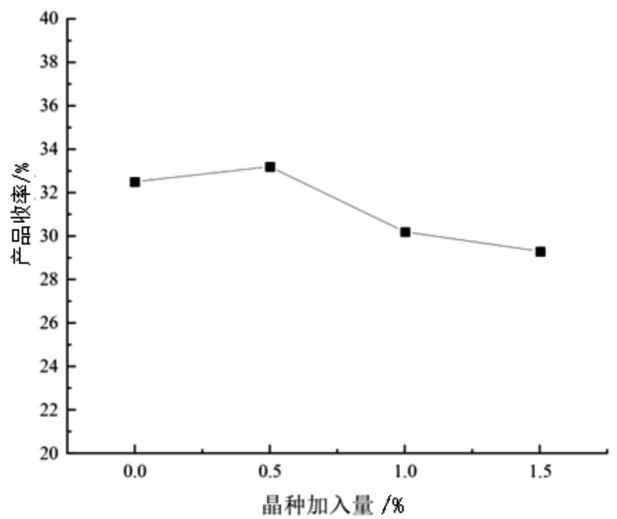


图 10 晶种加入量对收率的影响

3 结论

通过对 5-单硝酸异山梨酯结晶介稳区、诱导期和结晶工艺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 (1)降温速率增加使介稳区宽度变宽;搅拌速率增加则使介稳区宽度变窄。
- (2)过饱和度增加使诱导期缩短;相同过饱和度和下,搅拌速率增加会使诱导期缩短,温度升高也会

使诱导期缩短。

(3)较优的结晶工艺为初始浓度 1.797 mol/L,搅拌速率 400 r/min,降温速率 0.90 K/min,终点温度 0 K,晶种加入量为溶质质量的 0.5% 时得到收率为 33.2%。

参考文献:

[1] 申艳敏,刘文学,任保增. 泰乐菌素结晶工艺研究[J]. 化学工程,2017,45(11):39-44+54.

[2] 郝红英,田恒运,任凯文,等. 5-磺基水杨酸固液相平衡研究[J]. 化学研究与应用,2021,33(9):1660-1665.

[3] ZHOU T, TU C Z, SUN Y, et al. Determination of the metastable zone and induction time of thiourea for cooling crystall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2021, 31(3):164-168.

[4] 梁玺,赵改菊,路春美,等. 葡萄糖酸钙结晶的热力学特性[J]. 化学工程,2021,49(3):22-27.

[5] 熊开斌,阮金兰. 合成龙脑制备片状冰片的结晶工艺研究[J]. 化学工程,2019,47(3):36-39.

[6] 李曼曼. 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结晶过程研究[D]. 北京:北京化工大学,2020.

[7] 朱丽慧,刘伟,李太昌,等. 片状氧化铝晶种加入量对氧化铝陶瓷组织和性能的影响[J]. 材料工程,2007(12):44-47.

[8] ZAUNER L R, JONES A G. Determination of nucleation, growth, agglomeration and disruption kinetics from experimental precipitation data: the calcium oxalate system[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 2000, 55(19):4219-423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Crystallization Process of 5 – mononitroisosorbide

ZHANG Junwei, LI Qiong, WANG Jiaqi, CHEN Shuailong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5 – mononitroisosorbide is mainly used to prevent angina and treat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appropriate crystallization process is the key to drug production. The solubility of 5 – mononitroisosorbide in ethylene glycol was determined by dynamic method. The solubility was fitted by Apelblat model and Van’t Hoff model. The crystallization metastable zone and induction period of 5 – mononitroisosorbide in ethylene glycol was studied by cooling crystallization method. The effects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stirring rate, cooling rate, terminal temperature, and seed addition on the cooling crystallization yield of 5 – mononitroisosorbide were investigated. The process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operating conditions are as follows: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is 1.797 mol/L, the stirring rate is 400 r/min, the cooling rate is 0.9 K/min, the end temperature is 273 K, and the seed addition is 0.5% of the solute mas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yield is 33.2%.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rystallization process of 5 – mononitroisosorbide.

Key words: 5 – mononitroisosorbide; cooling crystallization; metastable zone; induction period; process optimization

葡萄糖糖基化改性乳清蛋白成膜性研究

宋彦显, 李胜强, 闵玉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化工食品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以乳清蛋白为原料,葡萄糖为修饰剂,进行湿法糖基化改性,制备葡萄糖糖基化乳清蛋白可食性膜,以成膜难易程度、膜厚度、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考察指标,研究配方比例、起始 pH 值和温度对膜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pH 值、温度及葡萄糖浓度对葡萄糖-乳清蛋白膜厚度影响非常小,pH8.0 提高至 10.0,膜透光率不断下降,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不断提高;温度 70℃ 升高至 90℃,膜透光率不断下降,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增大;葡萄糖浓度从 0 提高至 4.0%,膜透光率不断下降,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增大。葡萄糖-乳清蛋白膜制备的最佳工艺为:pH10.0,90℃,4.0% 葡萄糖,8% 乳清蛋白,甘油 1.5 g,此条件下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是原乳清蛋白膜的 1.72 和 1.91 倍,葡萄糖糖基化修饰可显著改善乳清蛋白膜的机械性能。

关键词:乳清蛋白,葡萄糖,糖基化,可食性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3.06.021

中图分类号:TS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3)06-0124-05

可食性薄膜由多糖、蛋白质、脂质或它们的混合物制成,相比多糖或脂质基薄膜,蛋白膜的功能特性更加广泛和多样。乳清蛋白具有较好的凝胶性,其成膜性能也比较好,且可生物降解,在生物基食品包装材料中应用广泛,但由于乳清蛋白中含有较高比例的亲水基团,单一乳清蛋白膜的机械强度较低,水蒸气阻隔性能较差,限制了其在食品包装领域的应用。蛋白质糖基化改性可强化分子间的作用力,促使其形成更致密均匀的网络结构,天然蛋白的溶解性、流变性、乳化性、起泡性、凝胶性、成膜性、热稳定性、抗氧化活性、致敏性和抗菌性等功能都得到改善^[1-3]。因蛋白质糖基化产物可赋予新性能,也常用于改善蛋白膜性能。^[4-8]本文以乳清蛋白为原料,以葡萄糖为修饰剂,对其湿法糖基化改性,并制备葡萄糖糖基化乳清蛋白可食性膜,对膜的透明度、厚度、机械强度进行表征,以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考察指标,优化糖基化工艺,以期蛋白基薄膜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乳清分离蛋白(WPI,蛋白质>90%):美国 Hilmar 公司;葡萄糖: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丙三醇、氢氧化钠: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与设备

TA.XT PLUS 物性测定仪:英国 Stable Micro Systems 公司;0-10X30 数显千分测厚规:浙江德清盛泰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Ci7600 色度仪:美国爱色丽(上海)色彩科技有限公司;S-3400N 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CS-820 分光测色仪器:中国杭州彩谱科技有限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乳清蛋白-葡萄糖糖基化可食性膜的制备

取一定量乳清蛋白、葡萄糖,加至 50 mL 蒸馏水,充分搅拌均匀,特定温度下加热 60 min,再加入甘油,混合均匀,取 10 mL 于平板上流延成膜,30

收稿日期:2023-9-27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1A550012);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2018 年度科技创新团队培育基金(CXTD2018K3)

作者简介:宋彦显(1979—),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天然产物化学,功能性食品。

℃恒温箱中保温 24 h 后,揭膜,放入 58% 湿度的恒温箱中回软备用。

1.3.1.1 甘油用量的优化

在 pH 9.0, 90 ℃, 9 % 乳清蛋白, 3.2% 葡萄糖条件下, 反应 60 min, 分别添加甘油 1, 1.5, 2g, 混匀, 取 10 mL 于平板上流延成膜, 通过对膜的性能评价, 选择出最适的甘油用量。

1.3.1.2 乳清蛋白浓度的优化

在 pH 9.0, 90 ℃, 9 % 乳清蛋白, 3.2% 葡萄糖条件下, 分别取 8%, 9% 的乳清蛋白, 反应 60 min 后, 分别添加 1.5g 甘油, 混匀, 各取 10 mL 于平板上流延成膜, 通过对膜的性能分析, 选择出最适的乳清蛋白浓度。

1.3.1.3 葡萄糖浓度的优化

在 8% 乳清蛋白, pH 9.0, 90 ℃ 条件下, 葡萄糖的浓度分别取 3.2%, 4.0%, 4.8%, 反应 60 min, 分别添加 1.5g 甘油, 混匀, 各取 10 mL 于平板上流延成膜, 通过对膜的性能分析, 选择最适的葡萄糖浓度。

1.3.2 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成膜工艺优化

8% 乳清蛋白, 1.5g 甘油条件下, 对比分析 pH、加热温度、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性能的影响, 优化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成膜工艺。

1.3.3 可食性膜的性能测定

1.3.3.1 可食性膜厚度的测定

选取完整均匀的可食性膜, 电子厚度测量仪测量厚度。根据薄膜样品中 5 个不同位置处的测量值计算平均厚度。

1.3.3.2 可食性膜水溶性的测定

取可食性膜 0.500g, 置于 40 mL 蒸馏水中, 24 h 后用布氏漏斗抽滤, 然后干燥至恒重, 按式(1)计算乳清蛋白 - 可溶性淀粉可食性膜的水溶性。

$$S(\%) = \frac{m_2 - m_1}{m_0} \times 100\% \quad (1)$$

式中, S 为乳清蛋白 - 可溶性淀粉可食性膜的水溶性, %; m_0 为可食性膜的质量, g; m_1 为滤纸的质量, g; m_2 为滤纸和未溶解可食膜的质量, g。

1.3.3.3 可食性膜透光率的测定

将可食性膜裁为 40mm × 10mm 的矩形, 紧贴在比色皿的一侧, 以空比色皿作对照, 在波长为 500 nm 处测定吸光度值, 每种膜测 3 条取平均值。

1.3.3.4 可食膜机械性能的测定

参照穆凯宇等^[9]的方法, 略作改动。选取厚度均匀的膜样品, 裁成 1cm × 6cm 的长条。质构仪的初始夹距设定为 45 mm, 拉伸速率设定为 1 mm/s,

测定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拉伸强度按式(2)计算, 断裂伸长率按式(3)计算。

$$T_s = \frac{F_m}{F_T \times w} \quad (2)$$

式中, T_s 为拉伸强度, MPa; F_m 为试样断裂时承受的最大张力, N; F_T 为膜厚度, mm; w 为膜宽度, mm。

$$E = \frac{(L - L_0)}{L_0} \times 100\% \quad (3)$$

式中, E 为所测膜的断裂伸长率, %; L_0 为初测膜的长度, mm; L 为膜断裂时的长度, mm。

2 结果与分析

2.1 甘油用量及乳清蛋白浓度的优化

通过比较揭膜的难易程度, 发现不加甘油, 膜在平板上呈碎片式掀起。甘油用量为 1 g 时, 形成的膜过薄, 揭膜时容易破碎; 甘油量为 2 g 时, 容易黏平板, 膜不易揭下; 当甘油量为 1.5 g 时成膜性最好, 能形成完整均匀的膜, 且易揭, 因此最优甘油用量为 1.5g。8% 和 9% 乳清蛋白制备出的膜的机械性能几乎一致, 乳清蛋白浓度为 8% 时, 膜的厚度较薄。因此, 选择 8% 乳清蛋白制备可食膜。

2.2 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成膜工艺的优化

2.2.1 pH 值对膜性能的影响

2.2.1.1 不同 pH 值对膜厚度的影响

8 % 乳清蛋白, 1.5 g 甘油, 膜液总体积 50 mL, 90 ℃ 条件下, 考察不同 pH 值对可食性膜厚度的影响。结果可得, pH8.0 时膜厚度为 0.134mm, pH10.0 时膜厚度为 0.128mm, pH 在 8.0 ~ 10.0 之间时, 随着 pH 值的增大, 膜厚度略有下降, 但变化不大。pH 值可改变蛋白质的结构, 影响蛋白质的稳定性, 对膜厚度一定影响。

2.2.1.2 不同 pH 值对膜透光率的影响

8% 乳清蛋白, 1.5 g 甘油, 膜液总体积 50mL, 90℃ 条件下, 考察不同 pH 值对可食性膜透光率的影响。结果可得, 随着 pH 值的增大, 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透光率逐渐降低, pH 8.0 时, 透光率最高为 97.83%, pH10.0 时为, 透光率最低 93.53%。美拉德反应 pH 值越低, 溶液中蛋白质分子的质子化氨基越多, 因此获得的蛋白质 - 多糖美拉德缀合物在初始阶段越少, 美拉德反应的中间体和最终产物随反应 pH 增加而增加^[10]。反应程度越高, 最终产物越多, 透光率越低。随着 pH 值的增大, 膜的颜色加深, 且有白色物质附着在可食性膜表面, 导致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透光率下降。

2.2.1.3 不同 pH 值对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8% 乳清蛋白, 1.5 g 甘油, 膜液总体积 50 mL,

90℃条件下,考察不同 pH 值对可食性膜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以 pH 值为横坐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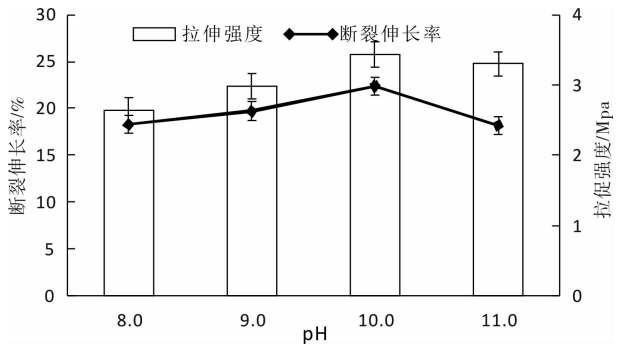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 pH 值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pH 值对葡萄糖接枝乳清蛋白膜机械性能影响效果显著。随着 pH 的增大,拉伸强度逐渐增加,断裂伸长长的先减小后增加。pH10.0 时,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达到最大。增加 pH 有利于网络结构的形成,在 pH8.0 - 10.0 范围内,蛋白膜的拉伸强度随着 pH 的增加,从 2.63 MPa 提高至 3.43 MPa;断裂伸长率也随着 pH 增加而有所增加,并在 pH10.0 时达到最大 26.1%。蛋白质碱性条件下巯基和疏水基团更多暴露,有利于新化学键的形成,蛋白膜的溶解度增加,膜的强度和延伸性均显著增加。此外,pH 的增加使美拉德反应加强,也使蛋白膜的机械性能增强^[11]。但当 pH 进一步增加至 11.0,延伸性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因为 pH 过高时会导致分子间产生的过度交联,使蛋白网络变得紧密,延伸性急剧下降,同时,交联过度会限制蛋白分子的活动性,导致蛋白膜的延伸性下降^[12]。

综合考虑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厚度、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选择 pH10.0 较为合适,在此条件下可食性膜的厚度为 0.128mm,透光率为 94.1%,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3.43 MPa 和 26.1%。

2.2.2 温度对膜性能的影响

2.2.2.1 不同温度对膜厚度的影响

8% 乳清蛋白,1.5 g 甘油,膜液总体积 50 mL, pH 10.0 条件下,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厚度的影响。结果可知,70 ~ 90℃ 范围内,膜厚度从 0.134 下降到 0.128mm,随温度的增加略有下降,但影响不大。

2.2.2.2 不同温度对膜透光率的影响

8% 乳清蛋白,1.5 g 甘油,膜液总体积 50 mL, pH 10.0 条件下,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透光率的影响。可知温度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透

光率的影响显著。温度越高,膜的颜色越深。随着温度的升高,透光率逐渐减小,温度为 70℃ 时,透光率最高为 93.4%;温度为 90℃ 时,透光率最低为 90.5%。反应温度升高,底物溶解度提高,反应速率加快,反应程度提高,美拉德反应产物增多,从而影响膜的透光性。从 70℃ 升高到 90℃ 的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升高,蛋白质结构改变,适当变性,稳定的网状结构被破坏。

2.2.2.3 不同温度对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8% 乳清蛋白,1.5 g 甘油,膜液总体积 50mL, pH10.0,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以温度为横坐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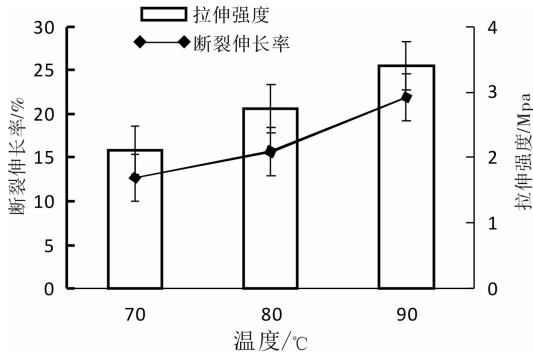


图 2 温度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由图 2 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逐渐增大。加热温度过低,不易成膜,无法形成均匀且完整的薄膜。加热温度超过 70℃ 时,随着温度的升高,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不断升高。升温使蛋白质内能增加,且有利于蛋白质分子的伸展。蛋白质结构改变,变得松散且没有秩序,分子内部的疏水性氨基酸侧链残基暴露出来,蛋白质分子通过二硫键、疏水键相互连接形成坚固的网状结构,膜的机械性能增强。同时,温度升高有利于美拉德反应的进行,从而进一步增强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蛋白膜的延伸性能得到提高。前期实验表明当温度为 100℃,成膜性差,有很多颗粒,可能是高温导致蛋白发生聚集所致。因此,选用 90℃ 为最适温度,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3.4 MPa 和 21.1%。

综合考虑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厚度、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选择 90℃ 为最适温度,在此条件下可食性膜的厚度为 0.128 mm,透光率为 90.5%,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3.4 MPa 和 21.1%。

2.2.3 葡萄糖浓度对膜性能的影响

2.2.3.1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膜厚度的影响

8% 乳清蛋白,1.5 g 甘油,膜液总体积 50 mL,

pH 10.0,90℃ 条件下,考察不同葡萄糖浓度对可食性膜厚度的影响。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可食性膜厚度为纵坐标作图,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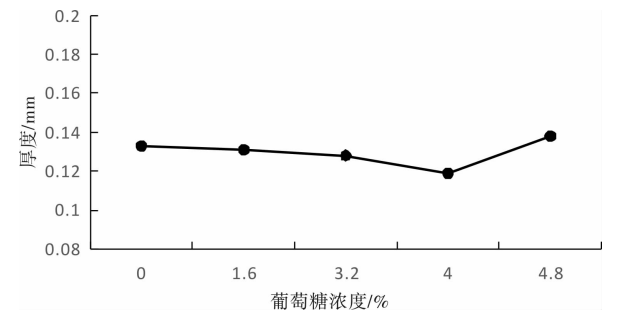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厚度的影响

由图 3 可得,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最厚为 0.138 mm,最薄为 0.119 mm,由此可知,葡萄糖浓度的大小对可食性膜的厚度影响不大。葡萄糖分子较小,在乳清蛋白 - 葡萄糖美拉德反应体系中一般处于饱和状态,对反应产物的形成影响不大。

2.2.3.2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膜透光率的影响

8% 乳清蛋白,1.5 g 甘油,膜液总体积 50 mL, pH 10.0,90℃ 条件下,考察不同葡萄糖浓度对可食性膜透光率的影响。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可食性膜透光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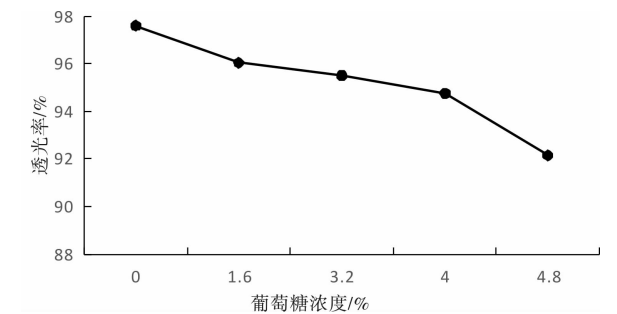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透光率的影响

由图 4 可得,透光率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大而减小,膜透光率与美拉德反应的程度有关,一般来说,反应程度越高,透光率越低。不添加葡萄糖时,透光率最高为 97.6。葡萄糖浓度为 4.8% 时,透光率最低为 92.15%。此结果与膜颜色有关,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加,美拉德反应产物越多,膜的颜色越深,导致膜的透光率越低。

2.2.3.3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8% 乳清蛋白,1.5 g 甘油,膜液总体积 50mL, pH10.0,90℃ 条件下考察不同温度对可食性膜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影响。以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为纵坐标作图,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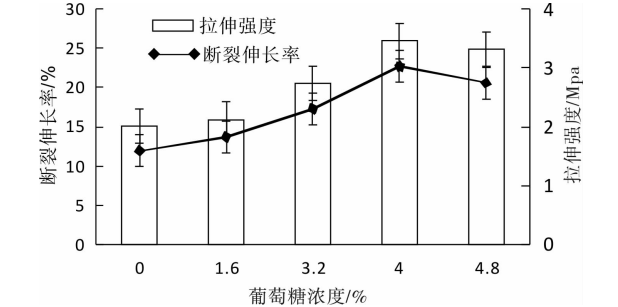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葡萄糖浓度对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机械性能的影响

由图 5 可知,断裂伸长率随葡萄糖浓度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葡萄糖浓度为 4% 时,断裂伸长率最大为 22.7%。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升高,反应体系中蛋白质与葡萄糖相互碰撞的几率增大,两者接枝度增大,膜结构更加紧密,断裂伸长率也随之升高。但葡萄糖浓度进一步提高,蛋白和糖分子过度的交互作用反而限制了蛋白的流动性,致膜的延伸性下降。葡萄糖对乳清蛋白糖基化改性后,拉伸强度随着葡萄糖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葡萄糖浓度为 4% 时拉伸强度最大为 2.76 MPa,这是由于在糖基化反应过程中,蛋白质分子链上的氨基与还原糖的醛基接合,逐渐形成了更加稳固的网络结构^[13]。综合考虑,拉伸强度和断裂延伸率,选择葡萄糖浓度为 4%。

综合考虑乳清蛋白 - 葡萄糖可食性膜的厚度、透光率、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选择葡萄糖浓度为 4%,在此条件下可食性膜的厚度为 0.119 mm,透光率为 94.76%,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为 2.76 MPa 和 22.7%。

3 结论

pH 值、温度及葡萄糖浓度对葡萄糖 - 乳清蛋白膜厚度影响非常小,透光率随糖基化程度的增加而下降,膜厚度变化较小;在最优条件甘油 1.5 g, pH 10.0,90℃,4.0 % 葡萄糖下,制备的葡萄糖 - 乳清蛋白膜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分别是原乳清蛋白膜的 1.72 倍和 1.91 倍,葡萄糖糖基化修饰可显著改善乳清蛋白膜的机械性能,可进一步对果蔬涂膜包装测试,开发新型可食包装膜。

参考文献:

[1] 黄建蓉,李秋萌,姚逸澄,等. 酪蛋白 - 葡萄糖美拉德反应产物抗氧化活性研究[J]. 中国调味品,2022,47(10): 18 - 21.

[2] LIU L, WANG Q, et al. Effect of ball milling - assisted glycosylation modification on the structure and foaming property of egg white protein[J].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John Wi-

- ley & Sons, Inc.), 2022, 87(7):1.
- [3] 董璐, 吴亚敬, 贾增艳, 等. 糖基化修饰对澳洲坚果蛋白性质的影响[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20, 41(9):25-31.
- [4] 林秋汛, 王淑瑞, 唐学, 等. 基于美拉德反应的大豆分离蛋白-普鲁兰多糖可食膜构建及特性研究[J]. 包装与食品机械, 2022, 40(3):1-6.
- [5] BRABER N V, GIORGIO L D, AMINAHUEL C A, et al. Antifungal whey protein films activate with low quantities of water soluble chitosan[J]. Food Hydrocolloids, 2021, 110(1): 106156.
- [6] 李怡薇, 李祝其, 卫国强, 等. 壳聚糖/聚乙烯亚胺改性大豆蛋白膜的制备与性能[J]. 中国油脂, 2021, 46(11): 78-82.
- [7] LI P, ZHANG, H, GUO H, et al. Performance of zein film modified by glycosylation and in vitro release analysis of hard capsule[J]. Nongye Gongcheng Xuebao/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2021, 37(14):302-309.
- [8] 高文婧, 雷桥, 曹庆龙, 等. 普鲁兰多糖的添加对可食性复合蛋白膜的改性研究[J]. 包装学报, 2020, 12(3): 10-15.
- [9] 穆凯宇, 杨昱姝, 刘佳欣, 等. 不同添加剂对酪蛋白可食膜理化性质的影响[J]. 中国食品学报, 2021, 21(10): 159-168.
- [10] HU Y X, ZHANG Y Y, XV J M, et al. Fish gelatin - polysaccharide Maillard products for fish oil - loaded emulsion stabilization: Effects of polysaccharide type, reaction time, and reaction pH[J]. LWT, 2022, 172(12):114220.
- [11] 林伟静. 糖基化改性对花生蛋白膜性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5.
- [12] REDDY N, JIANG Q, YANG Y.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peanut protein films crosslinked with citric acid[J].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2012, 39(6):26-30.
- [13] 郭浩, 张慧君, 陈又铭, 等. 葡萄糖糖基化改性玉米醇溶蛋白膜的物化性质及在胶囊壳中的应用[J]. 中国油脂, 2019, 44(12):76-80, 9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the Film Formation of Whey Protein Modified by Glucose Glycosylation

SONG Yanxian, LI Shengqiang, MIN Yutao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Food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ith whey protein as a raw material and glucose as a modifier, wet - glycosylated whey protein was modified, and a glucosylated whey protein edible film was prepared. The difficulty of film formation, film thickness, light transmittance,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were used as indicator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formula ratio, initial pH value and temperature on film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H value, temperature and glucose concentration had very little effect on the film thickness of glucose - whey protein. When pH8.0 increased to 10.0, the film transmittance decreased, while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increased. When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from 70℃ to 90℃, the film transmittance decreased, while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increased gradually. When the glucose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from 0 to 4.0%, the membrane transmittance decreased continuously, while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increased gradually. The optimal preparation process of glucose - whey protein membrane was pH10.0, 90℃, 4.0% glucose, 8% whey protein and glycerol 1.5 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t break of the membrane were 1.72 and 1.91 times that of the original whey protein membrane, respectivel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embran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glucose glycosylation modification.

Key words: whey protein; glucose; soluble starch; edible film; mechanical properties